

【当代华语世界人文历史丛书】

薛明剑、孙冶方兄弟

——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

The Brothers Mingjian-Xue & Yefang-Sun

王晓林

 博登书屋
Bouden House
New York

【当代华语世界人文历史丛书】

学术顾问：黎安友

主 编：荣 伟

副 主 编：罗慰年

Academic Adviser: Andrew J. Nathan

Chief Editor: David Rong

Deputy Editor: William Luo

Published by Bouden House, New York

薛明剑、孙冶方兄弟

——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

王晓林 著

出版：博登书屋·纽约（Bouden House·New York）

邮箱：boudenhouse@gmail.com

发行：谷歌图书（电子版）、亚马逊（纸质版）

版次：2023年2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字数：147千字

定价：\$38.00 美元

Copyright © 2023 by Bouden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review.

作品内容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简介

本书旨在以中国受过一般教育的读者为对象，介绍一对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民国民间经济学家薛明剑和“新中国”首席官方经济学家孙冶方。

本书并不适合定位于“薛氏兄弟传”（薛明剑原名薛萼培，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或“评传”，只限于讲述两兄弟在完全不同甚至是不通的两条人生之路、经济学之路上是如何起步行走，如何渐行渐远，又如何奇迹般地会合并达到精神和心灵上的沟通。

假装对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像我这样既非专业出身又非“圈内”的人，写作本身就意味着有了一定的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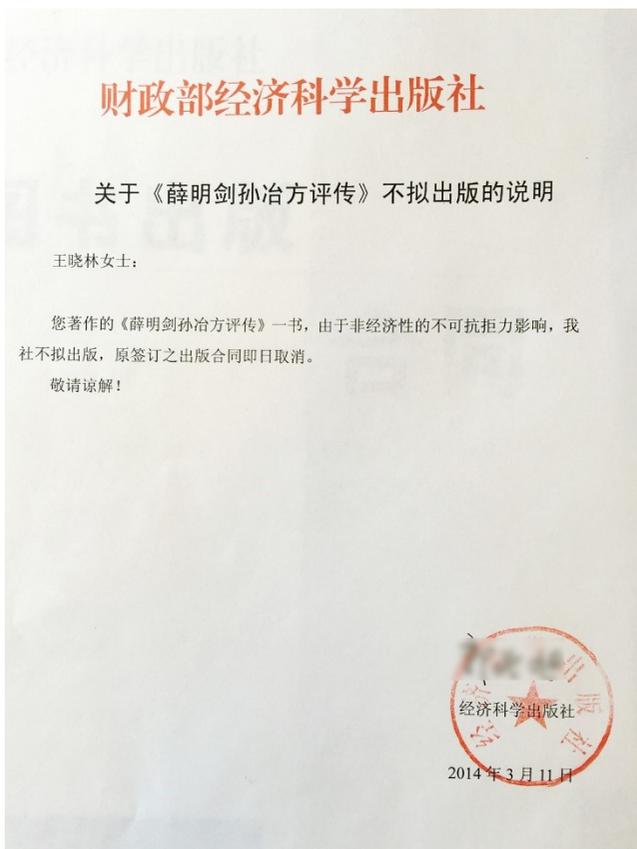
希望能向读者呈现两个合理的、稳妥的、人的形象，他们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像我们行走未远的亲爱的祖父或外祖父那样，可亲可近、可摸可触、可敬可爱。

本书2009年在中国三联书店出版社首次出版，2014年中国经济出版社拟再版，在签订了再版合同后却在“审查”一关卡住。在婉拒了出版社提出的赔偿后，社长亲自来发道歉信，说明终止合同是因“非经济性的不可抗拒力的影响”，见附图。此次在博雅出版社出版的是其第二版。

王晓林

2023-2-12 于上海

附图：



目 录

自 序	I
一 太湖之子	1
二 长兄如父	9
三 青年才俊	15
四 少年领袖	30
五 渐行渐远—到苏联去	36
六 渐行渐远—实业救国	41
七 信仰的洗礼	55
八 一个“民生家”	78
九 孤独的思想者	90
十 敏思、敏言、敏记的行动者	98
十一 实习革命	108
十二 平民英雄	119
十三 戎马书生	133
十四 看云卷云舒	139
十五 沧浪之水	150
十六 不跪	160
十七 薛民见	169
十八 一篇“谏”	185

十九	顾准	190
二十	暮霭沉沉楚天阔	217
	为天下布馨香（代跋）	227

自序

本书将要写到的，不是“新中国”经济学界孙冶方和薛暮桥这对双子星。

这对双子，几十年来都为国人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人们所熟悉，一百多年前两人都生于无锡的玉祁镇，是远房的堂兄弟，都是中共早期党员、都坐过国民党的大牢、都跟着近代大经济学家陈翰笙做过第一次正式的中国农村经济田野调查、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新四军中负责过经济工作、都做过新中国经济部门首脑、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始人和带头人、都著作等身、都是“新中国”智囊型人物和国民经济决策者、都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又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受到极大尊重。

他们的名字不单在中国经济学界赫赫扬扬，在世界经济学界也占有重要位置，他们是经济学科里泰斗级人物，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本书将要写到的、也称作“孙薛”的这对双子星却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孙冶方和他的胞兄，一位“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经济学的创始人，现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民间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学者”¹——薛明剑。

按照人们熟稔的划时代概念，将这两兄弟称作新旧两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应该错不了：两人都没有跨越时代，弟弟在1949年前还算不上是经济学家但已涉足经济学，哥哥在1949年后再未染指经济学甚至与经济也很快绝了缘，但他们是两位实至名归的经济学家，是一对如假包换的亲兄弟却是毋庸置疑的。

弟弟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哥哥薛明剑原名薛萼培，他们同宗同

1 摘自茅家琦《薛明剑文集-序言》P1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9

祖，同父同母，相差 13 岁。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双子”，却从未有人将他们相提并论过；他们生命乐章的交响是“奇异”的，却从未引起过人们的好奇；他们都曾经作为政坛上的“星”闪烁过，却是在相隔了几近半个世纪，两个至今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政坛上。

明剑一生走的是富民强族，实业救国之路，成就的是一位民间社会经济学家和经济事业家；冶方一生走的是共产革命，世界大同之路，成就的是一位敢为民讲真话的官方理论经济学家。虽然今天人们只知道弟弟而对哥哥知之甚少，但 80 年前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位做过中华民国国大代表、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及民选立法委员的哥哥，在中国江南和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民族工业界举足轻重，在那个过去了的年代曾经是名闻遐迩的人物。

直到今天，人们对这兄弟俩到底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亦或是“参商二星”依然没有定论。

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目标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吗？

他们的生命轨迹交叉过吗？

他们内心的最深处曾经有过或者始终有着共鸣吗？

能够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上将他们称作“双子星”吗？

感谢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历时 4 年，遍查史料，编纂了 4 大本 150 万字的《薛明剑文集》。虽然这套资料依然不全，明剑先生大量最有价值的日记和著作都在日本侵华时期和文革时期佚失了，但这些幸存的文字依然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和他的亲兄弟孙冶方一样，首先是一位大写的人，其次是一位应该被后人记住、纪念和研究的民间经济学家。而孙冶方则早已是“天下谁人不识君”，在他逝世后，中国第二个以人名命名的基金会（第一个是“宋庆龄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40 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中国主流经济舞台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公认是中国的经济学最高奖项，许多获奖者活跃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并扮演着重要甚至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中间没有出现哪怕一位像孙先生那样，为提出尽量益民的国计，为维护尽量普世的民生，为彼时的解民倒悬，为身后的国富民强，拼了命地呐喊和抗争，迫害侮辱不足惜，

坐牢杀头不足惧，更遑论哪些劳什子福利待遇、工资级别。穷到连写字的纸也买不起时，他可以满大街捡烟盒翻过来写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²，窘迫到要靠老伴的工资生存时，他可以顶着埋怨苦学德语，为的是真正看懂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眼下的孙奖获得者尤其那些曾经和正处于位高权重地位者，你们不惭愧吗？

有些情况必须先让读者了解，以免将此书当作经济学读物而越读越失望。

我是孙冶方基金会一名多年的志愿者和赞助者，工科出身，完全不懂经济学。2008年是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年，不禁动了斗胆写一篇征文来纪念孙先生的想法。因为和孙先生的外孙沙沙是大学的同学和好友，在二十几岁“英雄崇拜”情结最严重的时候我就见过他老人家并因此与“孙冶方基金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深知眼下人们的心目中是没有英雄的，尤其在这块最不可能出英雄的领域——经济学界，这是一门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真理”的学问，既不像数学、物理、化学那样，其基础理论很难撼动，也不像文学、艺术、历史那样，有许许多多毋庸置疑的大师矗立在前。经济学是一门随着社会的进步或退步变幻无穷的学问，甚至可以说是一门相当吊诡的学问。昨天的“大师”常常是今天的“小丑”，明天却又很可能成了“先知”。各种各样的经济学体系，观点，理论是最容易过时，最容易被时代和社会从吹捧、盲从到嘲讽、诟病、厌恶并抛弃的东西。看眼下的中国和世界，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三五个月的“经济学家”“专家学者”们不是比比皆是吗？

但是在中国一百年的近代史，他们中依然有些人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忘掉的。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被人为涂抹上去的色彩迟早会被冲刷殆尽，但他们作为人的本色，也就是他们本来的人格魅力依然会熠熠生辉，不同凡响。

孙冶方就是其中的一个。

2 徐方口述，见后《暮霭沉沉楚天阔》一章。

于是我想，让一个普通人来写写他也许还是有一点意义的，即使写不出作为经济学家的孙冶方，但总可以写出作为“人”的孙冶方。

就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他老人家的哥哥薛明剑。

其实这两位老人生前我都见过。只是在几十年的印象里，薛明剑就是孙冶方的哥哥，上世纪前半叶的民族资本家，无锡荣氏家族的大管家，一位完全无法和孙冶方相提并论的旧式人物，因此我从未好好阅读过几年前就得到的《薛明剑文集》，此时我翻开它，也只是为了寻找孙冶方的身世而已。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不钻进去，它就是路旁一方不起眼的土丘，等你钻进去了才发现它居然深藏着一座宝库。很快我拿到了全套四册，约 150 万字的《薛明剑文集》，还放胆打着孙冶方基金会志愿者的旗号向无锡的“孙冶方纪念馆”索要更多的资料。

没想到我这个写作上的初学者竟然得到两位老人的亲属和无锡文史方面的学者和普通工作人员热忱的帮助。薛明剑先生的很多亲属接受了我的访问；无锡“孙冶方纪念馆”张建清馆长以特快专递寄来我索要的文史资料；上海文史馆中国工业近代史专家、《世纪》杂志主编沈飞德先生在上海接受我电话采访；薛明剑的长房幼孙薛中全女士热情接待我住在家中查阅和拍摄祖父 26 本幸存的日记；专门研究荣氏家族和薛明剑的专家、江南大学教授陈文源先生还特意到无锡图书馆为我复印了薛明剑家谱，寄来原始用图的光盘。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被学界称为“无锡市宝”的老人居然把自己手抄的 500 多页 A4 纸薛明剑日记都送给了我。陈教授和我素昧平生，假如不是同样地被薛明剑这个人物感动，我们是永远都不会相识的。

第一次看到薛明剑手绘的各种工具、机械、工艺、工厂布置和工场设计图时，我这个工科生被折服了。这么漂亮的手笔，这么严谨的做派！在不知电脑和互联网为何物的年代，一个“旧社会的资本家”，这是我三十多年前就留下的深刻印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无聊吗？怡情吗？还是有明熹宗朱由校那样不爱江山爱木匠活的怪僻？这是我下决心来“读”此人的最初冲动。

于是又返回头来细读他的“五五纪年”，然后硬着头皮读那些原

来颇感乏味的文章，再由文章的发表年代寻找当时的大背景。谁知这些初看极为枯燥的近百年前的文字居然相当耐看，不但时时能从中看到和今日社会极为类似之处，还能看到与今日主流话语高度一致或大相径庭的分析，论述和见解。尤其是在企业管理、文化建设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其见识和实践，眼下的企业家们，无论民营还是国营，还真找不到相似者。

我接触过很多当今中国的国营和民营企业家。这些人在财富增值、创造就业、上缴利税、扶贫救困、以及推动当代中国的工商文明方面都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只是从关注“民生”、投身“民生”和献身“民生”的高度看，即使有所谓“裸捐”者，有所谓一方一地的“救星”者，有所谓中国或世界“N百强”者，有所谓“只知有企业，不知有魏晋”者或“魏晋企业兼懂”者，有所谓“儒商”，“政商”，“侠商”，“德商”甚至“佛商”者等等诸如此类“自封”或“获赠”的名人名家头衔者，却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和薛明剑们（薛明剑应该是一批人，但人数非常少）在本质上的相通³。

请暂缓骂我“九斤老太”，看完此书，摆出道理，再骂不迟。

薛明剑，这是个完全能和他赫赫有名的小弟孙治方比肩而立的人，为什么从未有人将这兄弟两人放在一起来写？

作为一名受过一般教育的中国人，业余的问学者，我的读书史中从未发现过“经济学”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唱过“角”的情况。从老祖宗对“士农工商”的排序，到《红楼梦》对“经济文章”的解读，它从来就是国人眼中“稻粮谋”的庸务俗事。

中国历来士大夫口中的“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和外来语“经济学”一词在词意上有着巨大差别。前者是“学得屠龙术，卖与帝王家”的术，而后者则是作为研究人类生产、交换以及社会财富分配行为的大学问。和西语中“经济”主要是指称“个人行为”不同，汉语

3 在2005年10月《纪念薛明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无锡学者陶伯华先生有这样的发言：“关于薛明剑对于无锡近代工业发展的功绩以及文化上的贡献，要重新认识。他当时在管理思想，管理文化上所达到的高度，目前的民营企业家还达不到。”

中“经济”常常是当朝者、当政或当权者的行政行为。

薛家两兄弟，一个是新时代新政权先抑后扬的官方理论经济学家，一个是旧时代旧政权相当推崇的民间社会经济学家，这两人倒是能表达出些许中西方关于“经济”一词的区别。这一点特别有趣。

也许让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人来同时写这兄弟俩，他们会有一些踟蹰，一些桎梏，甚至许多顾虑。而我，借王朔一句“无知者无畏”，因为不懂，所以不怕。一个什么“家”都不是的人，凭着一点做人的直觉来写世人从未相提并论过的两个“家”，即使让懂行的人们看看笑话，不也是一件不太乏味的事情吗？

也许薛明剑不够伟大，但是“伟大”和“粪土”之间距离很大吗？

也许薛明剑不够光荣，可是“光荣”和“耻辱”之间距离很大吗？

薛明剑和孙冶方两兄弟都在“伟大”和“粪土”，“光荣”与“耻辱”之间翻滚过，蹉跎过，跌宕过。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光荣与梦想》，是一本叙述美国自二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断代史。这本书的名字用在薛明剑和孙冶方兄弟身上倒是非常合适，他们都曾梦想中国的强大和光荣，他们自己也都曾光荣过甚至辉煌过，却也都忍受过常人难以忍受的，被视作“粪土”般的耻辱。他们一生所“梦想”的都不是个人生前身后的“光荣”，而是他们的“国”和他们的“民”的光荣。

从写一篇征文开始到起意写一本书，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曾交替地出现过“兄”太难写和“弟”太难写的感觉，几次萌生罢笔的念头。

动笔前我对写孙冶方是比较自信的。我见过他老人家并和他的老伴洪克平以及众多亲属相当熟悉；他生前密切接触过的人许多都还活着；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孙冶方全集》以及《全集补遗》就在手边书架上；有数个版本的《孙冶方传》可以参考；那么多赞颂，论述，分析他的书籍文章都能在图书馆找到；电脑中储存着全数“孙奖”获奖者名单和他们的获奖论文及书籍；《光明日报》的朋友们甚至为我复印了当年《孙冶方颂》的全部专栏文章，就连那些批判和讨伐他的资料也能很方便地在国内外的图书馆里找到专集。

但是写着写着，我感到了深深的困惑。

如果把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写，那是我办不到的事情；如果按照初衷，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我既要触动到“人”的禁忌，还要触动到时代的禁忌，而一味地褒扬，一味地溢美，对于孙冶方和我都毫无意义。

而薛明剑，除了他的文集几乎找不到其他任何资料，对于能否写好他起初我是很不自信的，没想到就从这仅有的史料里却看到许多活泼泼的东西。坦率地讲，薛老人的文笔并不很好，尤其那些半文半白的东西让我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古文根柢的工科生读起来诘屈聱牙。还有些在当时他认为“显然是不用解释”的人和事对我来说却陌生得很，需要无数次地在沟沟（Google）里摆渡（Baidu），然后翻经查典，确认出处。好在彼时“沟沟”还没有被驱逐出境，“摆渡”尚是黄口小儿，还算实诚。没想到这样反倒是越写越顺手，每每有会心之处，或是哑然或是黯然都令人惊喜。但是和写他的弟弟孙冶方一样，渐渐地我又感到需要触动的“人”的禁忌和时代的禁忌竟然一点也不少。

在写到孙冶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段时真是头昏脑胀，说不出的愤懑与怨怼。亲历文革，那个年代一套套“斗争哲学”的名词术语我还记忆犹新，至今都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和排斥，却不料在这里统统找到了它们的源头。

如果将专业研究人员排除在外，“新中国人民”被告知的中共党史通常是这样的：

上海弄堂+嘉兴乌篷船，南昌暴动+秋收起义，井冈山+瑞金，长征+延安，西柏坡+北京，莫斯科中大这段故事是很少或根本不向“人民”说明或说教的⁴。然而，理论由这里输出、领袖由这里产生、骨干由这里培养的莫斯科中大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地和圣殿，甚至称为党的摇篮也不为过，虽然它只存在了短短 5 年且其繁杂、

4 历年历版《中国共产党党史》直到最新的 2011 年 1 月版，对莫斯科中山大学都只字不提。

紊乱到不可理喻。

像中共党史中每一个重大事件、重大人物一样，因为信息源的严重堵塞，令其格外诡谲和不可信。即使是最资深的党史研究权威和最新版的党史资料库，对莫斯科中大这段历史的描述也是脉络不清、语焉不详，可是要写孙冶方、要写中共，它都是一道绕不过，躲不开的大沟大坎。

就在翻沟越坎的艰辛中，又一个大到了沉重的命题，“到底是英雄（或枭雄）创造了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蓦然冒了出来。这个1971年就由温都尔汗冲天的烈焰挑起的话题是我这一代人至今都记忆犹新的，很多人对它都有思考、怀疑和追寻答案的心路历程，很多人的信仰基石也就此崩塌。

人民是什么？

按照薛明剑的观点，人民就是一个个渔父桑娘，贩夫田丁。他从来不把这些人称作“人民”而是一口一个“民众”，一口一个“百姓”。他一生的追求就是为这些人谋生存，却从未将他们放在能够改写历史进程的高度来虚无神化。和我们耳熟能详的“为人民服务”相对应，薛明剑也有个短句，叫做“服役民众”，也就是“为民众做稻粮谋”。薛明剑的“服役民众”把“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虽很超凡脱俗却难于定义其服务对象且难于实际操作的事情大大简单化了，但却令我的写作陡然复杂起来。为了统计薛明剑和孙冶方著作中提到“人民”这个词的次数，年近耄耋的母亲为我查阅了薛、孙二人数百万文字，除了那些他们必须写出来交给“公仆”们看的文字和不得不套用约定俗成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之外，“人民”一词的出现几近为“零”。

还有一些写到孙冶方的文章提出一个和写鲁迅完全相同的命题，“假如孙冶方活到今天……？”后面的答案当然比鲁迅活到1949年以后还要悲惨和不堪，他们的意思是孙早已过气，虽然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和顾准一道“先知”般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对眼下这种根本无法明确定义其社会学属性的“市场经济”还有任何意义吗？他很难自圆其说的所谓“第二种市场经济”，是独立思

考的结果还是怯懦的表现？这段被他心爱的学生吴敬琏称作老师“最致命的痛苦”的过节应该隐去吗？

有人说“在中国当代经济学术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⁵。没错。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鲁迅和孙冶方都已是历史人物，也都算得上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历史却是最不能，也最无法假设的。好，就让我胆大无知冒犯一下历史，假如孙中山在临终前向美国和欧洲各民主国家的急切呼援得到回应⁶，他还可能转向苏俄吗？那还会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吗？甚至，还会有中共吗？

假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4年，毛泽东甚至考虑放弃“共产党”这三个字而向英美示好⁷，如果得到回应并逼得他和中共弄假成真，中国会走向何方？那还会有薛明剑，孙冶方吗？当然薛萼培、薛萼果还是会有有的。那还会有鲁迅吗？当然周树人还是会有有的，但二薛一周都会很平凡，那样的中国一定和眼下的很不同，甚至完全不同。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很对，但“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叫人如何苟同？试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能算“人民”吗？司马迁司马光，班彪班超能算“人民”吗？他们创造了历史，他们书写了历史，他们却不是“人民”。

“人民”，是个非常虚妄的名词，也是我们老祖宗们很少或根本不用的名词。

2002年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 2002年增补本》中，“人

5 吴晓波《吴敬琏传 最后的孙冶方》P91 & P93 中信出版社 2010.2

6 (美)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 孙中山晚年的秘密》P2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7——“一开始，孙中山便希望美国和英国承认他的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援以资金和武备，助他以武力统一中国。但每次与两国打交道都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转向俄国求助，并马上得到响应。”

7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 1944年8月12日》东方出版社 2004年3月版 P267——“今天，毛泽东把我招去，对我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给我们党重新起个名字，不叫‘共产党’，叫个别的名字。这样对特区形式会更有利，特别是跟美国人打起交道来要更有利一些。”

民”一词的释义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1979年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修订本》中，“人民”的来历是：“1. 人类 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也’；2. 平民，百姓 周礼地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国与人民之数’”；

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压根就没有“人民”这个词！

再往前翻，各种词源、辞源、辞海、字典基本同上——没有！

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林肯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其中的哪个“民”字都和眼下的“人民”二字没有关系。“人民”一词的奥妙，只有近80年来的中国的史官们心里明白。

无法明确定义和科学量化、无法从普世的视角界定，却以最为频繁的次数从上世纪中叶被使用至今的“人民”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词汇，在数千年来只有“臣民”，“庶民”而无“公民”意识的国度里，它的爆炸式流行是有源可寻的。

从新政权第一部宪法，1949年诞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后政府总理所做《关于〈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报告》看，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民”和作为义务主体的“国民”，其人群的范围和法律的性质都是截然不同且泾渭分明的。人民并不包括所有的人，只是人群的一部分，而“国民”则是人群的全部。“人民”是有权利的，“国民”则只有义务⁸。

眼下的“人民”一词并非源远流长，几乎是专为应对“国民”而

8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9.22——“总纲中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很明显的规定。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和生产有利的。”

生的新名词。实际上在中国，“国民”早已是“贱民”的代名词。假如你只是“国民”而非“人民”，那就等同于“贱民”或者“公敌”。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成为“人民外部矛盾”的另一方。当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人民”沦为“国民”，套用一句现成的话“人民，人民，多少残酷和荒唐假你的名而行”就成了必然。

在读孙，读薛以及后来读顾准的过程中，我对“人民”二字几乎患上过敏症。

除了1949年后薛明剑们的各种“贱己”文字例如坦白、交代、检讨、颂圣外，他们从不言“人民”而是言必称“民众”“苍生”“百姓”“民生”。他们的文章和言谈了无“人民”和“人民利益”字样，他们甘心“服役”的就是普罗大众，就是全体国民。

好，薛明剑也就罢了，旧时代人物嘛，不足为奇。可140余万字的《孙冶方全集》加上20余万字的《补遗》，用到“人民”二字之处也极为稀少（特别专用的，例如“苏维埃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等等不能计算在内），他最富盛名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全文近20万字，除了五六处无法避免地出现过“人民生活”“六亿人民”“人民消费”的字样外，竟没有一处出现过“人民”如何怎样，“人民利益”如何怎样。看一个天天讲利、害、益、损的官方经济学家竟绝口不唱“人民利益”高调，岂不邪乎？

人，人民，区别何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给“人民”带来的利和害，益和损孰多孰少，在英雄们的丰功伟业中被碾碎的苍生百姓，亦即所谓的“人民”，到底是不值一提的蜉蝣蝼蚁还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的人文科学专家们也到了该给庶民百姓一个答案的时候了。在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前，希望当权者和史官们还是多谈一点“人”少谈一点“人民”吧。

还有最难写的一章《顾准》。

真是不自量力，3年前开始写此书时才知道顾准，这曾令我不胜羞愧。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写这个人的我，却偏偏碰上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孙冶方精神上的挚友和学术上的知己，想躲，躲不开，想绕，绕不过。

不同世界观的人是可以成为挚友的。他们可以信仰不同，党派不同，甚至阵营不同，但价值观不同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挚友！你视如珍宝的我弃若敝屣，我避如痛疽的你甘之如饴，这样的人反倒是同志，甚至可以是朋友，却绝不可能成为挚友。顾准和孙冶方是学术上的知音和精神上的挚友，这是中国经济学界人所共知的，写孙躲不开顾就像写“高山流水”不能只写子期不写伯牙一样。可把“顾准”单列一章，仍然令我十分犯怵。这个题目即使对于专业人士也太难驾驭，太难书写，更遑论写好，何况我。

读顾准对许多我这代人来说都是一次艰辛的心灵跋涉。尚未读到一半，我已明白顾准在他生命之树最成熟时期所追问、探寻、领悟和向往的，早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更不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所谓“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这几乎颠覆了我写此书的初衷。

很难想象顾准和孙冶方，连被惩罚扫厕所在一起的机会都不放弃交谈的两人，都是底蕴深厚的学者，都是个性张扬的性情中人，都有丰富的人生和跌宕的际遇，一个临终前还断言“老孙出狱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我”，一个出狱后果然在接纳了挚友骨灰的小小三里河边日日徘徊，当他们在一起时会只谈“价值论”，只谈所谓的“时局”，却从不交流双方的价值观（此“观”非彼“论”，但“观”一定涵盖“论”），这岂不像说伯牙和子期在一起时只谈音律或乐理而从不演奏和聆听一样的荒唐！

那么他们谈些什么呢？谈希腊罗马、苏柏亚吗？谈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吗？谈郭沫若、李亚农“胡说八道”的史论⁹，范文澜

9 《顾准文稿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关于海上文明》P300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马克思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时代限制……这一点不能全怪马克思（马克思的目的论哲学当然还是有责任的），因为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史学上出现了一个考古学时代，把古代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 Stalin（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对他们实在觉得可怜。”

“数典忘祖”的史观¹⁰吗？谈雨果的“九三年”、贝多芬的“命运”吗？……

他们是怎样在交流这些他们不可能不交流的东西的呢？《顾准》一章令我整整搁笔一年，就算现在写出来了也还是对自己满腹狐疑、战战兢兢，生怕亵渎了他。

薛明剑和孙冶方，一个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一个是共产革命的参加者；一个是老国民党员，一个是老共产党员；他们的前半生，一个是不周山下要撞破旧天的共工，一个是忧心忡忡要炼石补天的女娲。而后半生，弟弟转换成了哥哥女娲的角色却常常无力回天，哥哥则彻底地沉默暗哑了。

难道他们因道不同而不相谋吗？资料看得越多，越明白不是这样。从《薛明剑日记》中我找到1949年以后兄弟俩无数次晤面或信函探讨民生的记录，原来，在“民生”这一庐苍穹下，“共工”和“女娲”的价值观竟然是一致的！这一庐苍穹在西方有一个现成的名字叫做“人道”，在她之下，一切党、主义、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都是苍白而软弱的。虽然在“新中国”，这二字默默无闻、几近沉寂、几近贬义，但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谁还能找出比它更匹配于人类自身的单词？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¹¹。

200年前法国人维克多·雨果这一声对人道的呼唤与200年间各种革命的呐喊、呼啸、喧嚣相比，前者在薛明剑、孙冶方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更深的印记，他们和这位西方先哲在精神和行为上的相通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他们的国度，“人道”演化成了另一个更加平民化，更加通俗和平实的词汇，就叫做“民生”。

10 《顾准文稿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关于基督教的笔记》P243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范文澜说，宗教狂会产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过宗教战争。他数典忘祖，忘恩负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11（法）维克多·雨果《九三年》

人道，民生。民生，人道。

这就是薛明剑、孙冶方两兄弟间最高度一致之处。即使他们各自所在的两个营垒之间横亘着诸如“围剿与反围剿”“攘外与安内”“土改与镇反”等等充满血腥、势不两立的仇恨，却都没有妨碍两兄弟间这个最终极的一致。

还有孙和薛的方法论，到底是水火不容还是水乳交融？看中国这40年的路走啊走的，不正是照着孙冶方拼命呐喊的方法，实践着薛明剑想要做的事情吗？却是转来转去又一次失了方向，没个原点地东突西撞，莽打乱冲。也许这就叫“历史的螺旋”。

今天，薛、孙两兄弟都已驾鹤西去40年。中国从一个“东亚病夫”型的落后经济农业国走到现在，其国民经济之树已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原来也曾经阔过的，今天又阔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坏事。今天重新来认识这一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双套车”“双子星”，一对都曾经是“中国的脊梁”的人物，叙述他们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叙述我们的国、族、家、民的命运。

这大概还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王晓林

2009-1-1 完成于北京

2023-1-15 修改于上海

一 太湖之子

无锡城紧傍太湖，山清水秀，丰饶富足，灵气逼人，是中华吴越文化的发祥地。

不熟悉无锡的人打开无锡地方志，往往会一目三惊，一惊三叹。无论你专攻什么学科，做什么具体工作，或者仅仅是对哪一门学问感兴趣，通常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你心目中的名人，大师直到偶像。

先从一副国人最熟悉的对联讲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

这幅明代东林党首领，无锡泾里人顾宪成撰就的名联，几百年来都是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而唐武宗相，无锡梅里人李绅在无锡惠山寺苦读时写下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则是中国老百姓人人出口成诵的名句。这一联一诗正是无锡这片土地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出神入化的大写意。这是一方耕读的乐土。

相传战国时秦王掠地至锡，见民采锡于山，山裂，一石出，上刻“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平，天下宁”，遂令改置郡县，命名无锡。自商后期始至汉桓灵帝止，无锡人一千四百余年不知兵革，这在中国兵燹不辍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迄后宋元易代，1275年元兵杀至江南，屠常州，破无锡。宋将纷纷自戕，元人首领传檄安抚百姓，未行屠城：

元明之际，朱元璋大将汤和攻城，亦用游说为降，民未受创；
清兵至锡，诸生王玉如约邑中父老具牛酒迎之，清军未戮一人，
堪称奇迹；

太平天国在无锡占城四年，周围四乡惨遭肆意杀戮，在无锡城却

未有大戮之行；

辛亥革命更加简单，商团赶走知县即宣告光复，未动一枪一弹；

民国十三年江浙军阀齐燮元，卢永祥争夺上海，时称齐卢之战，在无锡也仅焚毁部分商市，民众仅受虚惊，损失很小。

民国十六年孙中山，蒋介石的革命军北伐，无锡民众箪食壶浆迎接北伐军入城，亦无大损失¹。

始自 1937 年 11 月的日军入侵，无锡虽沦入敌手，但仅半年后又开始重新变得有了生机，用史官的原话说叫做“一种日本人控制下的畸形的生机”。

在无锡的各种地方志上，“扯旗造反”“劫富济贫”“啸聚山林”“杀人放火”……这样的字样都是鲜见的。太湖之滨的丰腴举世闻名，“锡常熟，天下足”，这里是中国最丰饶的粮仓，“太湖美”是百姓祖祖辈辈唱不厌，听不够的歌谣，“无锡好”是孩子们世代代写不完，作不尽的锦绣文章。

无锡不怕旱，数不清的河汉湖沼有的是水。无锡怕涝，但即使碰上大涝，人们坐在自家门口捞鱼虾吃也不会饿死人。仓廩足，知荣辱，财赋强，文教兴。无锡的民风绝不彪悍。这里也出革命家，但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譬如孙冶方、薛暮桥；这里也出政治家，却常常是外交家或鼓动家，譬如薛福成、王昆仑；这里也出国家要员，却都是主管文化、宣传、经济的领袖，譬如吴稚晖、秦邦宪、陆定一、荣毅仁……

太湖锡惠孕育出最多的恐怕还是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实业家，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上都以极高的数量和频率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无锡原是可以睥睨傲世的。

且不说离我们太远的那一个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吴王国和江南文明的缔造者泰伯、南宋四大家之一尤袤、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旷古游圣徐霞客、清代大水利专家嵇曾筠嵇璜父子、中国画祖顾恺之、大数学家华蘅芳……只来看看近一百年内那一串串骄人的名字：

1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薛明剑文集 无锡历届兵革记》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文史界——冯其庸、刘半农、徐铸成、钱基博、钱钟书、钱穆……

艺术界——刘天华、华彦钧、上官云珠、顾圣婴、闵慧芬……

书画界——徐悲鸿、钱松晔、华君武、尹瘦石、吴冠中……

教育界——吴文藻、高阳、顾毓琇、蒋南翔、许宏智……

自然科学界——徐寿、周培源、唐敖庆、钱伟长、华南圭、王选……

社会科学界——陈翰笙、储安平、潘梓年、薛暮桥、孙冶方……

实业界——沈缙云、周舜卿、荣宗敬、荣德生、唐星海……

政治界——王昆仑、陆定一、潘汉年、秦邦宪、荣毅仁……

……。

太湖地方极重教育。旧俗对私塾老师男女老幼皆知礼敬，即使科举废除，新学初兴，对诸师礼敬却无减有加。试举一例：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幼年时在无锡荡口镇果育学堂，师从一位名叫华倩朔的先生。此人曾游学日本，美风姿，和易渊博，每每寓训诲于诙谐，深得学生与乡人敬重。倩朔师亦在苏州城兼课，每周一次往返苏锡之间。钱穆在《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记》中还清晰如画地描写过：

“当其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街停泊，几驶过全镇。每当此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自天而降，其相重视如此。”

一位幼学教育者就能受到这样的礼遇，实实令今人不能想象。但不也正因为无锡民风这样地尊师重教，才会出现“神州之大，独钟无锡”的境况吗？

有人又羡又妒地形容无锡才俊的众多是“近代多于古代，当代又多于近代，渐成汪洋之势”，此言大不谬也。

无锡又有个玉祁镇。这个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南国古镇，耕读传家，为文立德的传统几乎是天然玉成。尤其是近代，它又以辈出人才闻名于无锡，文史学家施之勉，工艺大师薛佛影，国画大师秦古柳，教育学家方明，医学家秦伯益……。

据今人不完全统计，三千多人的玉祁镇平均每三十个人就要出一位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学者。而薛姓人家又是玉祁镇的翘楚，除了我

们的主人公薛萼培（薛明剑，大实业家）和薛萼果（孙冶方，大经济学家）外，薛光鄂（国民政府检察院首席检察官），薛光绮（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薛光钊（中央大学教授），薛光钺（江苏省长公署参议），薛暮桥（大经济学家），薛禹谷（中国科学院微生物专家），薛禹群（中国科学院士，水文地质专家），薛禹胜（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力专家），薛中川（中国船舶专家）……数不胜数。

经太湖碧水浸润的“大藩地”无锡真可谓是钟灵毓秀的至德名邦，这里不停地滋养出一枚枚中华硕果，那真是再自然不过了。本书的主人公就是太湖之子中的两位，中华硕果中的两枚。

1908年农历9月的最末一天，公历10月24日，无锡玉祁镇薛华阁家的第六个孩子出生。孩子是母亲孙氏服用药石未果，无奈诞下的，他的前边已经有三位哥哥，二位姐姐，因此他的出生并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太大的欢愉。

薛家在当地算得上是诗书缙纓人家，仅有记载的就有十一世祖太茂公（延珮），十二世祖鸣廷公（椿），十三世祖友佳公（景达），十四世祖孔传公（云鸿），十五世祖方成公（应恒），十六世祖翰瞻公（凤翔），此公生有五子二十五孙，其次子即为薛华阁的父亲，十七世祖鉴湖公（自修）。鉴湖公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娶妻诰封通议大夫浙江盐史蓉晨公次女华氏，于同治元年（1862）28岁时育下头生子华阁，字端性，为薛氏家族十八世祖。同治四年（1864）华阁未满3岁生母华氏即卒，其父续娶儒林郎按察使司孙仲甫长女孙氏为妻，虽然孙氏又育出一子二女，却依然视华阁如己出，将其辛勤抚养成人。此间家族居住在无锡县青城市（当时县下辖市）礼社镇。时称洪杨之役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骚乱中薛氏室庐荡然无存，华阁不得不举家迁回玉祁镇祖上遗屋以居，好在玉祁和礼社两地相距并不远。

华阁成人后娶贡生孙邦烈公次女为妻，就是前面所述诞下六个子女的孙氏。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五个儿女，大女儿蓉生已于三年前去世，大儿子萼栽，二女儿梅生，二儿子萼培，三儿子萼林。孙氏因子女多，怀孕后曾几次服下堕胎的药石，不料罔效，又生下这个小儿子。这一年薛华阁已经四十六岁，孙氏只小丈夫半岁。高龄生产令她

身心具疲，又担心丈夫负担又加一重，产后不禁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

孙氏夫人此刻正愁容满面俯视着怀中的小小人儿。要不是婴儿那出奇俊秀的面容让她惊异，她真是要掉下泪来了。薛家人本来就个个长得物表人华，可这个初到人世的小人儿还是让他们赞叹。

这得归功于当年十六世祖凤翔公，他老人家在新疆做过一任封疆大吏，任上迎娶了一位美轮美奂的维吾尔族小姐并在离任后把她带回了家乡。一位江南才俊加上一位边塞美女，无论从谱牒学还是从遗传学的角度看，生出杰出或美丽后代的几率都是很高的。眼下这个小人儿聪不聪慧尚且不知，可他那挺直的鼻梁、凹陷的眼睛、翘翘的嘴巴却是十足继承了太祖奶奶异域风情的秀美。

但即使那位聪慧的太祖和美丽的太祖夫人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跨入 20 世纪的前后，他们的后代中将出现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位置的杰出人物，并且还是一母所生。他们就是薛家老二薛萼培，民国史上重量级人物——薛明剑，还有此刻正酣睡在母亲身边的美丽小婴儿，中共党史上重量级人物——孙冶方，当然这是他后来改的名字，他的名字早已被满腹经纶的父亲华阁公起好了——薛萼果。这样四兄弟的名字就整整齐齐地排列成了“栽、培、林、果”。

这一年是清光绪三十四年，中国末代皇帝——宣统帝登基。

虽然薛家是无锡大户，可是到了薛华阁这一代已家道中落。华阁之父薛鉴湖，字自修，邑庠生。他天资聪颖，读书能过目成诵，下笔能千言立就。他老人家去世 50 年后，其孙薛明剑（萼培）曾做诔文一篇以做纪念。

“（祖父）弱冠之年即补博士弟子员，会时多难，隧绝意功名。所与交游虽缙绅望族，不稍存谄媚之心。居家勤俭，遇公益事，辄引为己任，不辞劳瘁。凡三党六亲之邻里之贫乏无告者，莫不极其急救其危而不自伐其德。一日晨，因事外出，路经古庙，见树下有一小包，知系路人所遗，遂坐守之。及暮里，有号泣入庙者，询其实而还之，其人叩谢而去，大有古人路不拾遗之风。鉴湖公与僧道无缘，与若辈

素无往来，惟于社庙集资修葺，每岁祭祀，必诚必敬。兴建文昌阁，修葺凤阜社庙他都慷慨捐输，身为之倡。此提倡文风之举常为无锡士林称道。咸丰六年，旱魃为灾，民困实甚。鉴湖公奉其父凤翔公之命设施粥局，以救贫民。他日必亲往督察，栉风沐雨，不辞辛劳。礼社镇附近杨家圩界溪圩等堤岸为淫雨所侵，他与华蓉谿，余莲村，李秋亭等诸公集资兴工，尝以救民饥溺为己任，凡若施棺恤嫠，劝赈平粟诸善举，他靡不竭力为之。”²

可见鉴湖公不但在地方上堪为旌表，也备受自己的后辈尊崇爱戴。明剑、冶方长大后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是承袭了祖辈们骨子里很多的优秀品格。

咸丰十年（1861）太平天国大军攻入江南一带，常州，无锡相继沦为战场。鉴湖扶老携幼，渡江北避，不料中途因登岸购粮被洪杨之兵掳获。太平军首领见他精通文墨，器宇不凡，遂强行委以文案之职，却出入都派人监视。鉴湖知道不能抗拒，只能姑且允之，却利用自己这一点点可怜的优势，诚恳致书驻城首领，冒死提出请其勿掳良民、勿杀无辜等十项要求，竟被这位颇具人情味的太平军首领一一认可，还放手让他将军中掳来之民逐一判问。鉴湖倒真敢“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时三牋并列，顷刻间就释放了数百人。这些原以为己是“俎上肉”的百姓对鉴湖感激涕零，就连那位太平军首领，平时颇以才智自诩，至此也对鉴湖钦服不止，不复令人监视。

鉴湖见军中情形混乱，料杨洪绝非能成大事者，趁机逃回家中。薛鉴湖共计在太平军中留四十九日，拯救了数百无辜百姓的性命。

可见“幸德勒的名单”在中国也是有过前例的，只是无人记载罢了。

然而他返回故里时才发现礼社镇的大宅屋宇已经毁灭殆尽，避难之际藏于地下的一箱金银细软也不翼而飞。有人告发为老家人周英窃取，盘问下周也直认不讳，但坦言所取已用去其半。鉴湖亦不深究，将所余者，除捐地方重建经费一半外，仍分周一份，使其去做小

2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薛明剑文集 先大父鉴湖公行述》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本经营以维持生活。其余全部分给难民，自己分毫不留。

万幸的是战前经营的玉祁镇的店铺尚在，鉴湖遂弃礼社举家迁居玉祁。

经历这样一场战乱，薛家元气大伤。迁居玉祁镇时薛华阁已经十岁。三岁即失恃的他，五年后又失怙。薛鉴湖逝于光绪二年（1876），十五岁的少年华阁不得不放弃祖祖辈辈读书、做官、做学问的家传，弃儒从商，走上做实业的路。到小萼果出世，他已辛勤劳作了大半生，曾随任盐运使衔江西候补知县的外祖父至江西瑞洪景德镇办理厘卡事务；也曾随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叔服务浙江太平、临海两县署。中年在杭州、北京等处帮助廉南湖公（康梁“公车上书”人之一，秋瑾好友，“风雨亭”“悲秋小学”建立人）襄理杂务。辛亥革命时应冷御秋将军（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将领之一）招任陆军炮兵第二团军需长、第四团二等军需等职。

清末溥仪退位，华阁先后任俟实学校和竞志女学的教职，以后又做过业勤、广勤等纺织厂的职员。他性不喜聚财而好施与，凡有贫乏来告者，就是自己去典当也必伸援手。他幼习中医，颇通药理，终年在手边备有各种药石供人索用，分毫不取，为此深受乡人称道。他又和乡党成立“寿星会”，施寿材于去世的贫者，仅这一件事就坚持了三十多年。所以快五十岁了，华阁还是清贫如故，一无积蓄。

虽然清贫却并不妨碍薛家一家人心平气和，从从容容地把日子过下去，也不妨碍薛华阁和乡贤村绅的交往，他反倒越发地被乡人敬重。他和同父异母的兄弟端灼友爱敦挚，终年食不兼味，衣无重裘，好劳作，不喜安闲。儿子们屡请归里休养，终不得许，直到66岁无疾而终。

薛夫人孙氏也是无锡名门之后。她幼娴庭训，持躬弥勤。自嫁给华阁，节俭持家，贤闻乡里，相夫教子，尤识大义。辛亥革命即起，华阁翊赞民军，不遗余力。薛夫人一面鼎力支持丈夫，一面策励在沪读书的儿子投效学生军，这等“妇德”在当时中国的乡间是很罕见的。民国成立后丈夫贯彻初衷，立志教育及女学事并为此多次远游北京，一时离乡时长家居时短，薛家一家十几口，事无巨细都是夫人一

身任之，亲操井臼，仰事俯畜，数十年如一日。闲暇时还要督促儿女读书上进，尤其对淘气的老二萼培，常需她格外正色教导。薛夫人在诞下小萼果时大女儿蓉生已经去世了。三个儿子，老大萼栽 21 岁，已经成亲，老二萼培 14 岁，已经定亲，老三萼林 8 岁，唯一的女儿梅生 16 岁，已许配人家。

小萼果的童年仿佛一支田园牧歌，悠远，简单，从容不迫。这位小小的不速之客很快就成了妈妈和全家宠儿。感谢那些罔效的药石，它们替中国留住了一位文明薪火的传承者。莫看这个小人在母腹之中就尝过人间苦辣，出生后却在清贫而和谐的家庭，传统而浓郁的亲情中长大起来，从身体到心灵都非常健康。

二 长兄如父

到了小蓇果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二哥蓇培已经十五岁了。

今人眼里，十五岁的半大小子那是能吃死、气死老子的魔头。但在那个逼人早熟的年代，蓇培已经俨然是半个家长，帮助父母撑起了半边天。父亲忙于乡村教育，频繁奔波于锡（无锡）燕（北平）之间，母亲操家抚儿，仰事俯劳，日夜辛苦。大哥蓇栽已成家分居，二姐梅生也已嫁人，蓇培很自然就负起了照顾和教养小蓇果的责任。那个年代的家庭结构就是如此，大孩子照顾小孩子是天经地义的。蓇培自己两岁后就“终年与大姐同卧，一切亦由伊照顾与扶持”。大姐的去世曾令他大恸，后来他将大姐的香火与父母一道供奉终生。

蓇培自四岁始由父母授识方块字，五岁读《孝经》与《大学》，口授数遍即能成诵，颇得父母欢。六岁起，从堂叔心一读《中庸》《论语》《孟子》一直到八岁，终觉乏味，要求改读《蒙学课本》，因家长不同意未遂，只得硬着头皮读下去，却偷偷从在城中教书的表叔黄蔚如那里借来新学课本，囫囵吞枣读了进去并自认为颇有心得。再跟心一叔习学“八股”，胸中就有了底气，只是“惟好作文而不喜读诵”，这可是训诂学颇为犯忌的“恶习”，为此母亲没少责备他。十岁起，蓇培改从姑父陈献文读《礼记》，同时终于如愿读起南洋公学所编《启蒙课本》。十三岁终得父母同意入县城的东林学堂，寄宿大姨母家。十四岁接触教授自然科学知识的《无天论》，该书就日月星辰，气候循环，风雨雷电等详加解释，以明迷信的不可信。这一年最小的弟弟蓇果出生，蓇培订婚，未婚妻李钟瑞（字毓珍）是无锡通运路董事李闻三（字经一）的长女，小蓇培一岁，蓇培以“瑞妹”呼之。

别看萼培已经是个订了婚的男子，在弟弟们眼里已俨然“长兄如父”，可毕竟才十四五岁，稚气未脱，童心未泯，加上接触新学，自诩见多识广，有时就免不了要淘气。训诂那几年，他常常趁老师心一叔外出或午睡时行“老虎不在家”之事，以山大王自称，命一千同学俯首称臣，还自称是“千眼观音”，号令同学规规矩矩不得“捣乱”，否则必难逃法眼。在学堂学得印刷术，暑假回家即活学活用创办《消夏杂志》，向银匠借来细锉刀，向邮局索来包邮票的蜡纸，向漆匠借来漆刷，居然刻印成功，与舶来品之真笔版无异，大为得意，兴致勃勃分送左邻右舍东街西巷，分文不取，广被称道。这也是他几十年后居然正儿八经出版了一本《誊写印刷技术手册》的发端。寒假回家乔装女子，利用在学堂学得的摄影术，自摄一影并题诗道：“暂去须眉服，翩翩顾影烛。笑问伊何人，岂我真面目”，博父母姐弟一笑。

薛家终年无人居住的房屋很多，有一处唤作外楼，是储藏柴草及寿器的十余间空房。其东为心一叔家所有。除了堆放杂物外，叔家还设立了一座“狐仙堂”，日日敬谨供奉，不敢有间。一日叔叔发现供奉的鸡蛋少了一枚，虽大惊却不敢做声。隔日这枚鸡蛋又自己跑了回来，但没了黄白，只剩一个完整的蛋壳。家人捡得后惊恐万分，一如大祸将至。其实这都是小萼培在捣鬼，刚读完一本什么《无天论》，他急不可待要身体力行破除迷信，就偷出一枚鸡蛋，两头打穿孔让蛋黄蛋白流出，再将空蛋壳两头用粉笔涂平放回原处。把戏揭穿后叔叔气得要死，斥他不明事理，还代他向狐仙谢了罪，但对狐仙终是不及从前那样虔诚供奉了。

十六岁，萼培从这个以明代清流东林党命名的学堂毕业，轻松考取上海复旦公学，却因为家庭无力负担学费而辍。可见考入名校而因家庭贫困而放弃的，早已有之。不过彼时并不像此时，辍学，哪怕是考上名校而辍学，都不等于人生道路的尽头。这位16岁的高小毕业生旋即被德馨学校聘为教员，月薪十个银元。这是萼培四十年辉煌职业生涯的起始。

这一年小萼果才两岁。

有这么个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式的二哥，小萼果真被邻里

孩子羡慕坏了。别看他话还说不清，路还走不稳，只要二哥一回家他就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拽着他的衣襟一刻也不愿放手。虽然母亲已经开始教小萼果识方块字，闲时还讲二十四孝，木兰从军，说岳全传以及家乡发洪水时祖父，父亲怎样带领乡亲们抗洪救灾的故事给他听，可总不如一身本事的二哥吸引他。二哥的本事实在是太大啦，天上地下，好像就没有他不懂不会的。二哥肚子里有多少东西呀——国文、数学、英文、体操、绘画、手工……。二哥又是多么的能干，他会摄影、雕刻、印刷、修钟表、油漆家具……

特别让这个小男孩崇敬的是二哥投了学生军，无锡光复（辛亥革命）后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镇江各地“反清复明”。现在他已经不叫薛萼培了，这一年的10月，他兴冲冲地上街买了两把剪刀，把小萼果和几百个乡亲脑后的小辫子统统剪掉，二哥“革命”啦！他现在不叫薛萼培而是改叫“薛明剑”啦！

虽然小萼果还不能明白这是哥哥表明他“剑除满清，为朱明报复”之意，还是兴奋得小脸放光。没有了那条小辫子，他的小脑袋也顿时清爽起来，可以想更多的事情了。二哥现在在他的眼里何止是“二哥”，简直就是英雄伟人咯！

小弟跟大哥跟得更紧了。明剑无论做什么萼果都要插手，鞍前马后地帮着“倒忙”。哥哥的手工每每经弟弟的“帮忙”成了废品，连他的伙伴们也不耐烦了，明剑却从不对这个小捣蛋虎起脸来，他太爱这个隽秀聪慧的小不点了。只要有点功夫，他就牵着他的小手到处走走，有时干脆就把他放在肩上扛着，反正小家伙轻得很。他教他阿拉伯数字，教他加减法，弄得小萼果4岁上就能做两位数的乘法和三位数的加法，被邻里视为神童。是年，小萼果进私塾读《孝经》《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还开始学习珠算。

1912年父亲华阁改任陆军第二团军需长，明剑曾一度随侍于苏北临淮关。时旧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并成立无锡支部，同时宣导会¹无锡支会成立，17岁的明剑被推为会长。

1 辛亥革命后无锡同盟会会员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成立无锡党部。国民党、

1913年春，这位从不消停的薛明剑先生又有了新创意，他要组织军乐队！这时他已经辞去德馨学校的教职，到寨门经正二等小学高年级任教。这位18岁的小老师很快就把军乐队组建起来了，整天排练、演出，队列威武，鼓号齐鸣，忙得不亦乐乎。蓁果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消息，缠着母亲一定要去哥哥的学校听军乐。母亲无奈，只好陪着最疼爱的小儿子多次到寨门学校听二儿子的音乐会，四十多里的路程全靠步行或者摇着小乌篷船来回。音乐给年幼的蓁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他接受的又一次重大的美育。后来在莫斯科求学时他又接触了交响乐，这使他终身都酷爱音乐，尤其是古典交响乐曲。

这时的蓁果已经开始读新学的启蒙教材，和哥哥一样读的是南洋公学的蒙学教本。

7岁那年的秋天，哥哥终于给他把嫂嫂娶进了家门。

蓁果的这位嫂嫂李钟瑞也是无锡近代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自幼聪敏好学，善诗文，下笔千言，为阖家钟爱。因看到女子无专门职业而无法为国家社会服务，她少年即到史量才先生在沪创办的女子蚕业学校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嗣后历任无锡县女子职业学校校长、金坛女校教务长、江苏省立育蚕实验所分所长。她自创了无锡蚕种制造场，是江苏省知名桑蚕教育家。嫁到薛家后她辅助夫君明剑主编《无锡指南》《无锡杂志》，自撰《蚕业词典》《实用养蚕学》等国计民生实用书籍，至今无锡玉祁还保留着为了纪念她由其长女薛禹谷奉父亲之命在1946年主持创办的“李钟瑞图书馆”。薛明剑和李钟瑞也是近代史料中唯一一对双双入选《无锡近代历史市志》的夫妇。她教育子女个个成才，后代中既有院士，教授，学者，中共高级干部和企业家，也有默默无闻勤恳工作一生的普通人。这些都是后话了。

明剑、钟瑞的婚礼是在无锡城里举办的，小弟弟当然是最尊贵的

国民公党、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共进会合并成立宣导会无锡支会，年轻的薛明剑被推为会长。

嘉宾。这是萼果第一次进无锡城。

婚礼过后不久，无锡全县公私学校齐集无锡火车站附近广场举行第三届联合学生运动会。萼培被推举为青城市各校联合总司令，率领大批娃娃兵赴锡参赛。已经参加童子军的萼果被二哥托付的人带领着，兴冲冲地再次赶到无锡，虽因年幼不能上场比赛，但做一次“志愿者”，维持秩序，引导观众，打扫会场等也令他兴奋得要死。

不久，萼果又学会了游泳。母亲原是绝不同意放他下水的，她怕这个最心疼的小儿子有个什么闪失。又是伟大的二哥，这时他已做到泰伯学校校长一职并被推举为无锡县教育会治事部主任，娓娓说服了母亲，才让他得以学到这一强健体魄，锻炼意志的技能。在薛萼果——孙冶方以后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体育运动使他在最困难和最险恶的情况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萼果10岁那年明剑有了头生子，因为自己和夫人钟瑞都服务于教育，遂择名“禹言”取“禹拜昌言”之意。六十三年后就是这个侄儿在小叔孙冶方逝世前后，遍寻各种报刊对小叔的报道，悉心剪录，装订成册。现在这两本厚厚的剪报就存放在无锡的孙冶方纪念馆内。

二哥越来越忙，小弟也越长越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萼果已经放开了哥哥的衣襟，他要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了。曾经亲密到“情同父子”的这对兄弟，他们的人生路就要分叉了，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叉路是如此的不可预知，又是如此的漫长。

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兄弟俩走上的人生路是完全不相同的，本书不能苟同。与其说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分道扬镳”，不如说是两条平行的矢量，虽有距离方向却是一样的。两个人的一生都历经磨难，多姿多彩，起伏跌宕，要想梳理出两人生命轨迹中的焦点或交叉点也许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肯静下心来在浩瀚的资料中细细寻找，又能很容易地发现两兄弟最高度一致之处，这个一致之处同时也是两人生命的制高点，那里镌刻着极其简单的两个字——民生！

焦点、交叉点、终点都在这里了。

出于《左传》“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民生”这个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释义是：

“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

民生！民生！这就是他们最终极的追求——中国要强大！人民要生活得好！就是这么简单。

薛明剑、孙冶方，这两条矢线已经在天堂相交，他们相约来世还要再做弟兄也是说不定的。

三 青年才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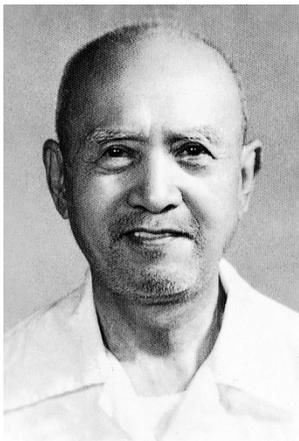
1917年11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

经历了从“师夷之长”到“变法维新”再到“辛亥革命”的中国知识阶层，在几十年的迷茫后又看到了新的出路。“欧洲早已流传的各种主要社会思潮，给中国带来了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旧的政治组织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政治纷纷出现”¹，这令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兴奋莫名，热血沸腾。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救亡，启蒙和文艺复兴的呐喊声交汇轰鸣，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各擎大旗，“德”（民主）和“赛”（科学）两大“先生”终于在中国首次登场，社会主义思潮也渐成气候。

五四大潮对薛氏兄弟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

五四发轫，明剑已经二十四岁，世界观和个人价值体系均已形成。囿于他1919年的日记已经佚失，仅能从他的《五五纪年》中看到他对五四的平静记载。如果说辛亥革命曾令十六岁少年薛萼培热血喷张，那么这个“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²则远没有给他八年前同样的震撼。对于薛明剑，“革命”与“改良”，孰能为孰不能为，“唤起民众”与“教化民众”，孰重孰轻，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并且分



薛明剑头像

1 (美) 哈罗德·伊萨克《中国革命的悲剧》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1。

2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得很清楚³。

薛明剑从未将自己放在一个鼓动家和革命家的位置上，他的性格也令他做不到。五四运动推出的两大“先生”，在薛明剑看来也是社会必然前进的一步，而不是横空出世的“精神昆仑”。

然而对于薛萼果——孙冶方来说，五四的意义就重要得多了。

在思想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了准备的五四，也像“接生婆”一样接生了无数的“革命婴儿”，薛萼果就是其中的一个。从五年后无锡的第一任国共两党小书记到莫斯科的中共小留学生，到抗日“孤岛”上的中共文委书记到新四军的中共教员，从中共高官到中共首席经济学家……这个小革命家的成长轨迹将留待后述。本章单述哥哥薛明剑。

明剑此时已经不再在寨门学校任课，私立德馨学校聘这个年轻人做了校长。不久他又被推举为青城市教育会治事部主任。

受家乡浓酽的治学之风熏染，明剑已“益知非学问不足以应世”而立志教育。他一生都“好为人师”，尤其热衷于向四邻乡人说天文地理，释自然常识，讲破除迷信的故事，就连赶圩坐茶馆也不忘记教人识字认数。这个年轻人已经把教化民众视为己任。对于教育水平极为低下的中国下层民众，这个“好为人师”绝不是个贬义词，它和“名利”无关，而是“民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后边还要讲到。

明剑的组织能力非常出色，经他手成立或操办的无锡童子军、全县学生运动会、与美国海军的篮球比赛、童子军足球会、全县学生大会操等等无不大告成功。是年才十八岁的明剑在家乡已经是颇有名气的绅士。几年间他又历任十一小学，石塘湾学校教务长和泰伯学校校长，江苏省立育蚕试验所事务部主任，和荣德生先生共同组织了无锡商会之实业研究会，向国内外推行改良蚕丝。

1919年明剑主编了初版的《无锡指南》。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公认的将无锡推向中国和世界的第一部书籍，1922年12月由孙中山题

3 未发现薛明剑对“五四运动”有过任何记载，这和他勤于笔头、从不遗漏任何重大社会新闻的风格奇怪地相悖。

写书名，此后谭延闿，冯玉祥，黎元洪，孙科，吴佩孚，康有为，何应钦等民国名人分别为其再版题写书名。至抗战时为止《无锡指南》已重印17次，每次都要修订，补充，印数均近万册。他还和夫人李钟瑞一起创办了《无锡杂志》，黄炎培题写了刊名。

明剑从不惮于和名人打交道。

不为一己私利，无欲则刚的明剑总是坦坦荡荡地要求名人们支持他，他认为名人们为他做“公益广告”不但不是非分之想，简直就是理所当然，谁给谁面子还真说不好。你看他这样写信给孙中山：

“大总统钧鉴：尝思共和国体，首重民治；万端待理，教养宜先……，鄙邑居苏省交通之中心，教育发达，工商勃兴旅锡者络绎于道……。明剑等特编辑《无锡指南》以为旅行鄙邑者之南针……。拟恳大总统赐题《无锡指南》及《沿革形势》封面两页籍使鄙邑增光，不胜荣幸之至。”⁴

大总统果然不负民望，很快就把明剑请求的“墨宝”寄了过来。

在国立中央大学劳农学院及民众教育院编写《衣食住行工艺概要》讲义和编纂《无锡指南》时，明剑更“放肆”了，竟点着名要大人物们题字，一人题一本，一人题一章，多了还不要。

《民众实用工艺第一编（衣类）》是阎锡山题，《第二编（食类）》是蒋介石题。遗憾的是《第三编（住类）》和《第四编（行类）》实在找不到第一版的原版，因此还不知道是哪两位“大仙”所题，但依明剑治学的一贯作风推断，必是因袭头两册的风格下来——谁应该对民生负责谁就得来题写书名。

《无锡指南》就更花哨了：

“序言”由臧启芳（江苏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题；

“第一章 地图风景”由陇体要（国民政府无锡县长）题；

“第二章 沿革形势”由孙科（国民政府副主席）题；

“第三章 交通”由俞大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题；

4 《薛明剑文集 致孙中山函》，原件为真迹。

“第四章 娱乐食宿”由吴佩孚（真不知如何定义此人职位）题；
“第五章 名胜”由彭素民（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题；
“第六章 古迹”由康有为（更不知如何定义此人职位了）题；
“第七章 教育”最是出奇，由共产党大官陆定一题！薛明剑在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时与陆有交往。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全国内战开始后竟然还敢用共党高官题词，好生了得；

第八章“实业”由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题；

第九章“机关团体”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胡汉民题；

第十章“慈善事业”由黎元洪（又一个无法定义职位之人）题；

第十一章“著名物产”由居正司法院院长题；

第十二章“联楹”由艺术家吴观岱题；

最后就连个“附录”也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题！

你看他牛不牛！

看这些纯国粹的毛笔文字，无论是端端正正的“阎锡山题”，老老实实的“中正题”还是中规中矩的“孙文题”，四平八稳的“黎元洪题”，你我都很难做到无动于衷——到底是那时的大人物们太不值钱了还是现在的大人物们太值钱了呢？薛明剑们发一封简函就能求到的和今人们一字千斤还求不到的东西，到底哪个更有价值，哪个更正常一些呢？那个年代不是大人物给了薛明剑们多大的面子，而是但凡事关民生，匹夫匹妇，人人有责，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面对这位初生牛犊般热情纯真的年轻人，大人物们何止是不敢居高临下做出“赏脸”状，除了由衷的尊重和真诚的支持外，他们简直还有些唯恐怠慢的惶恐呢。“平等”和“尊重”在那个年代反倒比今天要彰显得多，这似乎是一件不大好解释的事情呢⁵。

明剑“折腾”得更欢了，他开始在无锡大兴体育。

由于深感国人体质过于孱弱不足与西方在国民体质上抗争，明剑力促无锡县建立公共体育场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国民体质⁶。

5 《薛明剑文集 无锡湖览胜》等

6 《薛明剑文集 无锡县立公共体育场筹备报告绪言》原载《无锡杂志》1923年第3期

1918年10月18日无锡体育场建成并举行开幕仪式，翌日即召开全县联合运动会，他被公推为第一任体育场场长，江苏省教育厅为他颁发了奖章。他组织体育研究会，设立宣讲部，定期向民众宣讲体育，卫生等常识。他还成立了民众体育组织“爱群体育会”，每年集资600元全部用来购买体育设施。体育场除星期一关闭外均向民众免费开发，平均每天到场者在150人左右，时有足球，篮球和台球比赛举行。他举办体育讲习会，培训150多名各学校体育教员。他借体育场成立一周年之际特辑年刊，印刷5千份分送各界以资提醒民众和各界人士重视体育。

1918年，明剑和钟瑞的头生子——禹言诞生。明剑认为自己已经到了应当立德立言的人生阶段，他更加忙碌了。

明剑的德行和才能以及他热衷公益的活跃引起了一个大人物的高度注意。

此人长明剑整整20年，40多岁却已是中国经济界的领军人物。他和兄长从上世纪初开始在无锡，上海，汉口，济南，常州等大埠重镇开创面粉，纺织，机器制造等密切关系国计民生的民族工业。兄弟俩眼光长远，敢作敢为，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将一个家族企业作成了可以和外国垄断资本以及买办阶层抗衡的大型民族工商业集团。

他，就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荣德生。

德生先生观察这个年轻人可不是一两天了。在一次“实业研究会”上，他第一次注意到前庭宽广，剑眉星目的明剑。那天明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蚕丝之改良》，其思路的清晰和逻辑的严密深深吸引了作为研究会主办人的荣德生。

荣家刚刚准备在无锡建造一座新的大型纱厂——申新三厂，他几乎是立即决定要聘请尚不满23岁的明剑做申三的总管，也就是厂长。凭着多年知人善任的直觉，他深信这个年轻人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材。很多朋友，家人和部下都认为这一步棋太险，他们不放心也不服气由这么年轻的人来管理这个将要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纱厂。荣德生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几次来到明剑的岳父李家说服明剑加盟。为了见到这个年轻人，他常常一坐就是几个时辰。明剑当时社会

地位和收入都已经很高，父亲华阁、岳父经一和妻子钟瑞都希望他留在教育界发展，他犹豫再三。

在士大夫之风盛行的江南，“学”是“仕”的必经之途，是所谓“学而优则仕”。明剑的性格天生是开拓型的，荣德生先生的诚意也不谓不大，但“弃学就工”毕竟不是小事，这是两条不同的人生路。明剑反复思考着。

40 多年后明剑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余出世问事之初，会清末朝廷的无能，思欲提倡工业生产，仿效欧美，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故对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士特予优擢……又当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成功后，亦曾倡言实业救国论调，是亦促余改事工业生产……”又说：“目睹中国工业生产事事不如他国，并且存在种种不合理措施，急需改进和改革”，现在荣先生给了他“改进和改革”的机会，为什么不抓住它为国民做点实事呢？”

7

为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明剑最后接受了荣德生组建申三的重托。他只提了出一个条件——到上海申一、申二实习一年并且开出大约只有自己当前收入三分之一的津贴要求。他向大惑不解的荣德生解释道，“德先生，我投身实业界是为了求得新学问，求学是要出学费的。德先生不要我缴学费，还给一份津贴已属非分，怎么还会有菲薄之念呢？”

事后和荣德生一起创业的哥哥荣宗敬对弟弟说：“你 30 块钱请了个总管，薛明剑不是个呆子，就是个大聪明人！”⁸

荣宗敬先生说对了，他们确实请到了“大聪明人”。明剑很快走马上任，先以练习总管名义在沪申一、申二以及日本纱厂习学现代工业管理（1926 年德生先生还出资送他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到日本考察纱厂），同时他还兼顾着无锡申三厂房建筑、设备安装、工人培训等一应事务。他马不停蹄地在锡沪之间奔波。

7 《薛明剑文集 我参加工业生产的回忆》

8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19》

就在这段最忙碌的时间内，他还承担着家乡各种事关民生的事务——担任无锡体育场场长一职直到有了合适人士接手，但仍被县教育局坚留为名誉场长；

一次次修订再版《无锡指南》；

被推举为县教育局调查员；和夫人钟瑞共同开创的育蚕和蚕丝改良事业也在稳步发展。夫妻俩常常在江南各个桑蚕重镇如溧阳，苏州，武进等向民众开讲世界蚕业大势和新的桑蚕知识和技术，先后培训了江南各县派来的蚕桑人员 150 多名；

随德生先生赴江苏南通参加“苏社”成立大会。这是个相当于今天“企业家论坛”的民间组织，发起人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轻工业不能忘记”的张謇。

明剑忙而不乱，凭着他无穷的激情和过人的精力，他把样样事情都做到了尽善尽美。

1920 年终，申三电机装就，试车发电，租买英制纱机 3 万锭，美制纱机 2 万锭，创造了当年中国纺织业之最。同时建成总装机容量三千二百千瓦的配套电厂，为申三和茂新面粉一厂（荣氏集团面粉系列工厂）供电（在两年后的齐卢之战导致的无锡大停电中，这个电厂曾当即拉闸，断开企业生产供电而转为全城提供照明）。次年纱机装置完毕，1922 年春正式开车纺纱。在这期间明剑协同荣宗敬、荣德生处理了大批诸如土地问题诉讼、设备采买谈判、技术人材招揽等棘手问题。

1921 年的“苏社”在无锡召开，黄炎培、沈信卿、江问渔、张季直等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到会，时年已届 70 的张謇老先生派来了儿子，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孝若，荣德生与明剑是主持人。为了显得老成“以利应付任事环境”，二十七岁的明剑开始蓄须⁹。

申三正式开车纺纱之日，明剑认为是自己“弃学就工”的起点。

9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21》“十月二十二日开始留须，预定年满五十时则剃去，为暮年老人以利应付任事环境也。”

未满二十七岁的他郑重其事地将这一天记录为“中年生活的一大转变”，其对“学”的依恋之情跃然纸上。其实明剑一生都没有真正的弃过“学”，只是这个“学”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显学，而是包罗万象的各种学问：管理学，农学，工业学，教育学，旅游学，社会学，统计学，文史学，经济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明剑先生天生是个杂家，他精通工业管理和实业创建，1926年撰就并迅即被各大专院校选作教材的《工场设计与管理》是中国最早期的管理学著作。同时他也在所有可能的时间，地点和境况中学习和求索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一切学问。

其实从骨子里看，明剑一生都是个读书人。他操一手极秀丽的柳体小楷，正楷和草书也十分漂亮；他是当年各大报刊争相邀约的撰稿人，常常就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妇女，劳资等问题做出独特而深刻的阐述；他喜欢呼朋唤友吟诗做赋，也喜欢或登高或放舟纵情揽胜；他醉心于收集各种地方志并建立文献馆，也热衷于办报纸，办杂志；他和被他唤作“瑞妹”的妻子李钟瑞常常文章往来诗赋唱和，直教今人活活羡煞；他甚至热心于钻研中医药，篆刻，盆景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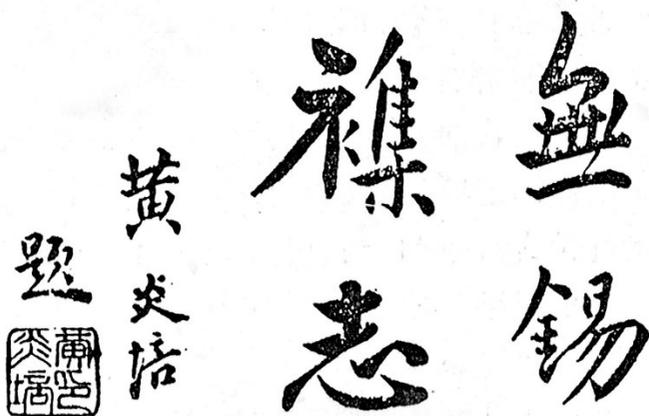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他在宣扬和建设家乡无锡上做足了文章。他编撰的《锡湖揽胜》是无锡太湖、浙江湖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导游手册，从其历史沿革、四乡诸胜、交通食宿、特产物价、直到急救慈善都详细清晰，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这本书起到了无锡形象宣传使者的作用。而由他主编的《无锡指南》则更是影响广大，这是一套一两年来就再版一次的权威性城市宣传手册，一共再版了十七次，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至今还能在世界的各大图书馆觅到芳踪。《无锡指南》得到许多中国知名人士的襄助，这些宝贵的手迹，现在见到的大部分已是影印件，但真迹随失，风采依旧。无锡许多老人都知道，薛明剑是将他们美丽的家乡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薛明剑，他的人生开场就十分精彩。

附：《无锡指南》才俊名人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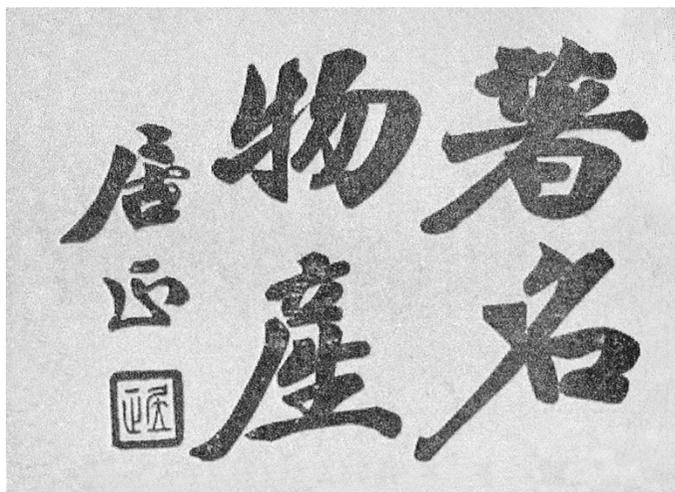
孙中山题



黄炎培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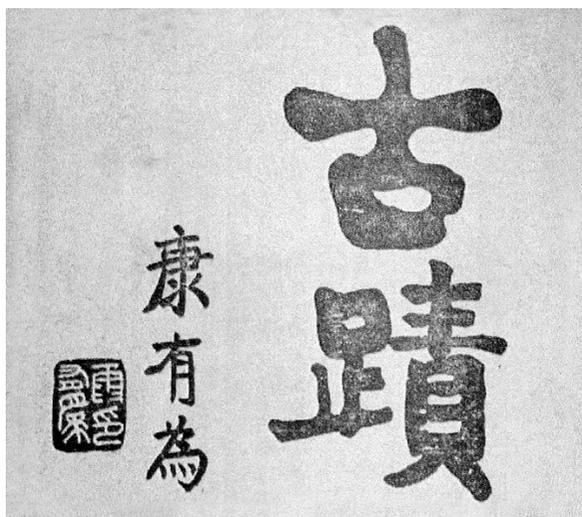
何应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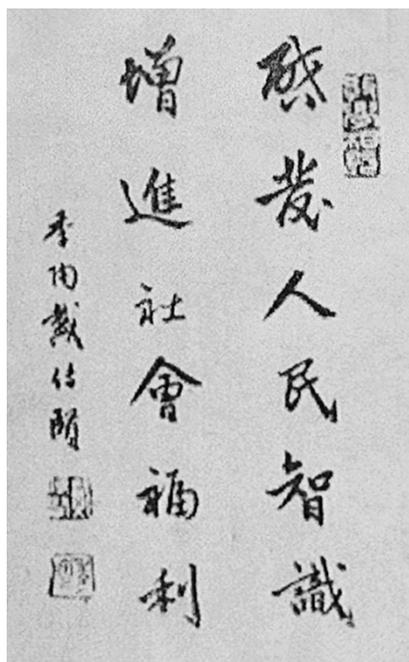
居正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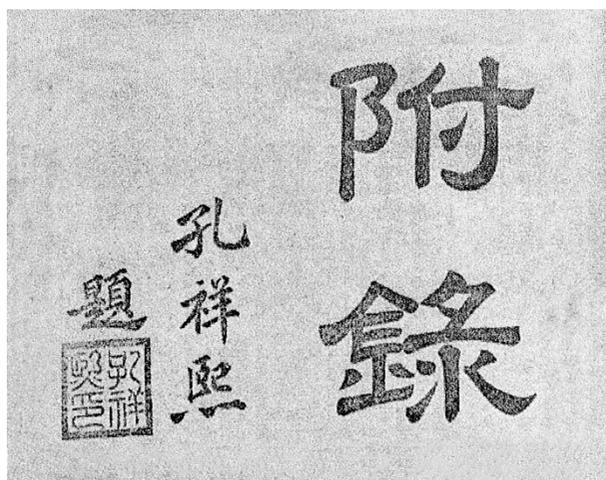
馮玉祥題



康有為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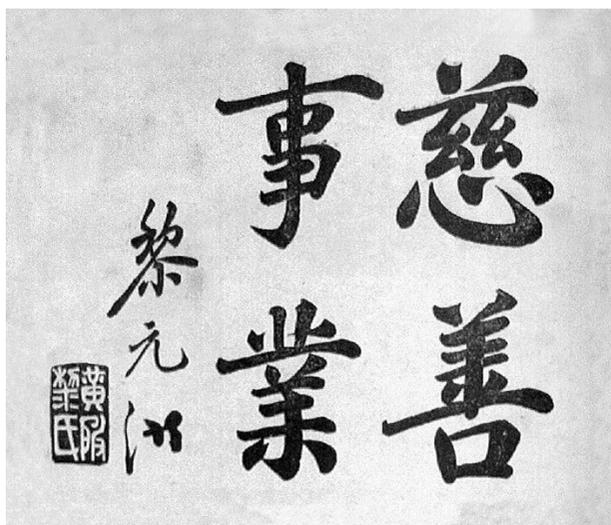
戴季陶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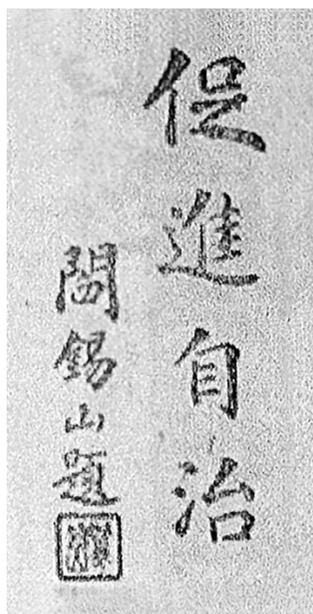
孔祥熙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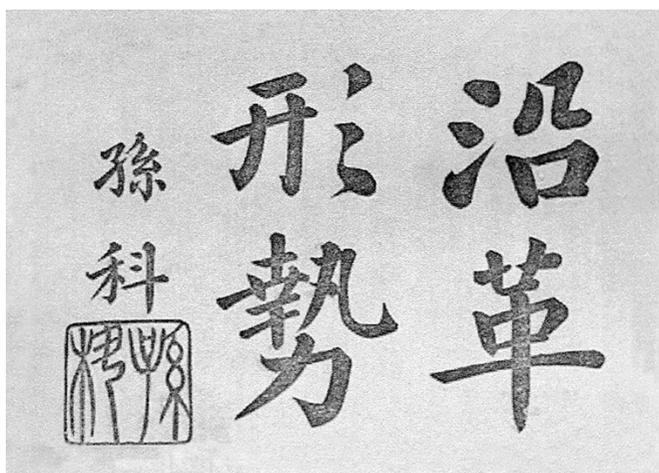
譚延闓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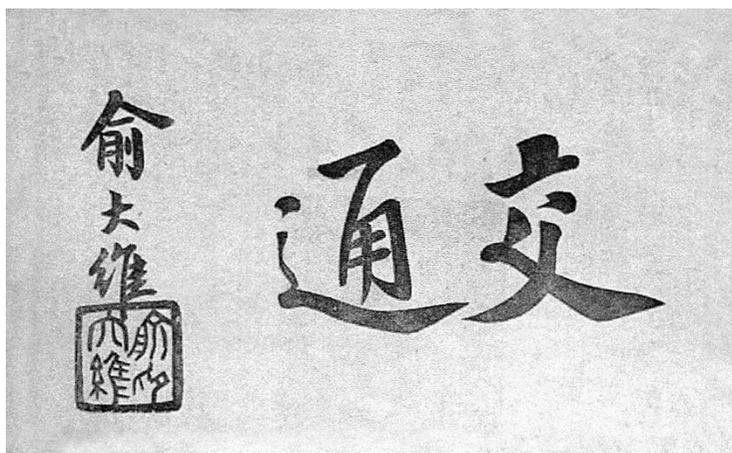
黎元洪題



閻錫山題



孫科題



俞大维题



吴佩孚题

四 少年领袖

蓼果转眼 12 岁了。

三个哥哥——蓼栽、蓼培、蓼林和唯一的姐姐梅生都已经成家立业，华阁和孙氏只有蓼果这个最小的儿子还在承欢膝下。

春节，华阁和结过金兰之谊的同庚好友，江南名画师吴观岱闲叙家常。

华阁提起自己几个孩子都已自立，“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唯有小儿蓼果，虽是读了几年书却还在“溪头卧剥莲蓬”的一派天真烂漫中，不知进取。

年近花甲且身边无子的观岱公，平日里就很喜欢这个可爱的小侄儿，听及此言，立刻表示愿意将蓼果带在身边指点丹青。华阁甚是欢喜，忙唤过蓼果拜师，当即开始跟着吴观岱习学绘事。

可惜这个小把戏已经不是老先生们“最喜”的“小儿无赖”了。受二哥影响，小家伙懵懵懂懂接受了一些“新风”熏陶，虽似懂非懂，却更钟情于新文化，对书画既无爱好也无天分。学了几个月，小蓼果上进甚微，弄得吴老先生也有些丧气。

当两个老友又聚在一起商议这个小儿前途时，睿智使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而是从蓼果的特质入手分析利弊，认为还是让他继续上学为好。此时华阁因连年水涝，正背债惨淡经营那几十亩薄田，观岱当即提出学费由他支付。

蓼果很争气地考上了“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这间开办于光绪年间的老学堂，原名“诤实学堂”，取意“诤实者，养根而诤实也”。由无锡举人杨范甫集资筹办，意欲“以一邑之人力物力，作育一邑之英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在无锡以至江苏都极具名声。同时它又是一所私立新式学校，提倡新学，民国大教育

家钱穆曾在该校任课。

芻果在这里开始了他正规的学习。

翌年7月，芻果的二姐梅生也病逝了。像大姐蓉生照拂过二哥芻培一样，芻果从出生起就被大他16岁的二姐悉心照料着，哄他睡，喂他吃，陪他玩，俨然就是一个小母亲。二姐的早逝令他伤心不已。一直到他的晚年，提起二姐梅生来，还像芻培提起大姐蓉生一样不胜唏嘘。

薛家这个大家庭，物质可能时常会匮乏，但他们不缺的是亲情。兄弟姐妹，子侄孙辈，可能在人生际遇上千差万别，却总是有浓浓的亲情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如今父母都已年过六旬，两个女儿却都先他们而去，其哀痛可想而知。尚喜小儿芻果还算努力，升入高小三年级后他已经系统学习了国文、数学、英文、体操等新学内容，身体也越发健壮了。如果不是第二年学校里新聘任了一位教体操图画的华侨老师张效良，如果不是刚巧来到芻果这个班级任教，也许他会和几个哥哥走上相同的道路——读书，做事，娶妻生子，立德立言……

但历史常常是无迹可循的。张老师回到中国，来到无锡，进入“县立第一高小”，和薛芻果劈面相遇，薛家这个最小儿子的人生轨迹就此被改变，再也没有循着祖辈父兄们的生命之路走下去的可能性了。崭新而不可测的命运在等着他，他别无选择。

张效良（1887—1928），宜兴周铁傍杏村人，第一位宜兴籍中共党员。曾东渡日本求学，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先生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担任侍从副官处书记，是位一腔立国安民激情的热血男儿。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他感觉理想破灭，遂解甲归田。1913年秋应陈嘉庚先生邀请，赴厦门集美大学执教。翌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师范学校，欲聘张效良为校长却被婉拒，他只身奔赴南洋，在南洋群岛槟榔屿华侨中学任教。1917年他才接受陈嘉庚先生聘请，就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教员。1922年春，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者发布了侮辱中国，蛮横干涉华侨教育的条例，张效良奋起疾呼，组织华侨抗争。英国总督下令用暴力驱散示威群众，张效良被捕并被殖民当局驱逐出

境。1923年9月，回国不久的他在上海由无锡籍早期共产党员糜文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月由党派到蓼果就读的“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发展组织，宣扬革命。

这位新来的张先生很快就发现了与众不同的14岁英俊少年薛蓼果。凭着多年的革命经验，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孩子绝非等闲之辈。是年张效良已经35岁，14岁的蓼果就像幼年时崇拜二哥蓼培一样，迅速成了老师的崇拜者。然而这个张老师和二哥又是多么的不同。他可不是二哥那样的孩子王或乡绅村贤，而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他能教给蓼果的可不是修钟表拍照片这样的小技，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志。

20世纪初叶正是中国激烈动荡的年代。皇权被推翻了专制制度还在，民国建立了却没有实现宪政。先是帝制复辟，后有军阀混战，党派林立，异说纷陈，加上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主权的瓜分，中国已是国之不国。

少年蓼果有一种对现实直觉的不满，却并不知道应该和怎样改变它。他朦朦胧胧向往着一种“桃花源”式的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尊重、诚信，博爱，无论晋魏，不分贫富。张老师正是此时向他传输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一些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常识，给他讲苏维埃和列宁，讲《共产党宣言》，讲五四与共和，讲科学与民主，讲中国共产党，讲共产主义必然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终极目标……小小少年如饥似渴都接受了下来，朦胧的乌托邦有了轮廓，心智开化了，他被启蒙并感觉到“觉悟”的震撼。从此他的谈吐和作文中出现了别具一格的气势，一腔渴望行动，渴望献身的热血在少年的全身涌动，随时准备迸发。

就是这位张先生在薛蓼果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完美的存在方式，共产主义必定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的意识形态种子，它成了薛蓼果——孙冶方一生的信仰基石。

很快，蓼果由张效良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十月，张先生回宜兴老家养病，临行前他把薛蓼果和其他几名团员介绍给上海地委派到无锡作建党工作的董亦湘，并推荐蓼果担任

了首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无锡支部书记。不久团员全体转党，十五岁的萼果由团支部书记转为党支部书记。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无锡支部。

在建党的过程中萼果初识董亦湘，此人是他命运旋律中的第二个重音符。孙冶方因着他的带领走上了一条光荣而不可回头的荆棘路，董亦湘却在16年后的1939年，神秘地惨死在俄国某个至今也不为人知的角落。从此以后，无论在董的生前身后还是中共的在野在朝，董亦湘和孙冶方的命运轨迹缠绕纠结了几十年。

董亦湘，江苏武进人，大萼果整整一轮，是年27岁，公开身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上海大学教授。他与陈独秀、邓中夏、俞秀松、沈雁冰等都是早期革命党人，1922年加入中共。董此次到无锡是奉中共上海地委指令，将无锡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全体转党。顺理，他成了薛萼果-孙冶方，张闻天，恽雨棠等无锡早期共产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十五岁的薛萼果成为支部书记，这是他六十年革命生涯的开端。

在中共奉行“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的方针之前，萼果就已经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现在他和其它共产党员又与国民党建立了国民党无锡分部，实施国共合作。他们逐步发展党员，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成立中共无锡县委员会。

此时的薛萼果已经是身兼两党党员身份，以革命工作为主，以学习为辅的职业革命家了。

所有这一切，小小少年都是瞒着父母兄长自我主张的，就连他最信任的二哥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那个年代实际上并不是眼下国民被告知或想象的——中共党员时时面对的都是白色恐怖和死亡威胁，那是个政治上相对宽容的年代，结党结社都很自由。只是薛家那时还是中国典型的“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书香门第，虽然父一辈子一辈都参加过辛亥革命，但对党派、主义、革命、思想这些新名词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尤其是“君子不党”的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对由“尚黑”两字组成的“黨”，避之唯恐不及。你看父亲薛华阁给男孩子们起的名字——

“栽、培、林、果”就能知道，这个家庭对孩子们的期许是与大地，大自然的合一，而不是金戈铁马，对“权”的占有和出将入相——对“术”的操控。

这个家庭包括二哥明剑，对于蓁果的作为都是不太可能持支持态度的。

但是强烈的独立人格开始在薛蓁果身上彰显。和那时许多出身并非赤贫的“小革命家”一样，与其说是社会逼得他们叛逆，倒不如说是革命和历史同时选择了他们。

7月，蓁果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就读商科。这是他接触经济和经济学的最初契机。

这所学校是由当时国内最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族，也是二哥薛明剑的东家——荣宗敬，荣德生于1919年创办的，其师资和教学水平在当时的中国都属一流。到蓁果入学的1924年，二哥明剑已经全面参与了荣家的工商、实业、教育和公益事业，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公益工商中学的校规制定和校园管理，学校的教材之一就是明剑的《工场设计与管理》。校规非常明确也非常严格：禁止学生参加党派活动。蓁果的公开活动在公益工商中学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所领导的无锡党支部的活动也不得不在这里转入地下。

翌年五卅事件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空前澎湃。薛蓁果召集党团员以及国民党组织成员，组织了一次声援上海工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是无锡第一次群众爱国运动。蓁果领导无锡支部的党员发动市民募捐支持上海工人罢工，他们居然募到了几大木箱的铜元。

暑假，蓁果来到李立三领导的上海工人联合会做一个宣传员，调查工人运动情况。他在上海呆了一个多月，走进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工厂的大门，也走进低矮拥挤的工棚和穷困肮脏的贫民窟。他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听到了他们要求人权的呼声，也看到了工联的力量。归来无锡，他一腔激情以社会主义青年团无锡支部的名义，写了《关于援沪游行示威问题向团中央的报告》。

关于这次运动，36年后的1961年，孙冶方在南京的一次演讲中做了这样的总结：

“工人运动是自发的，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迅速发展了起来，但工人运动本身不会产生出马列主义，是由知识分子从外部将马克思主义传输了进来。而共产党却是工人运动的产物。无锡也需要办工人夜校，像上海那样把工人运动搞起来。”

芻果对社会的底层越发充满了使命感，一种“救赎”与“解放”的使命感。这位小小的革命家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他准备回到无锡也按照上海的模式发动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真可谓时势造英雄，薛家这个清秀的小儿子此时尚未满 17 岁¹。

1 本章参阅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五 渐行渐远—到苏联去

1925年9月，小弟粤果突然通知父母，他将要按照学校的安排到外省实习工作很长一段时期。面对惊愕的家人他镇静地掩饰着兴奋之情，一口咬定就在江南一带，离家甚近。年迈的双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最小最心疼的儿子就要远赴千里万里外的异国他乡，走上一条和父兄们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正准备在无锡大规模开展工人运动的薛粤果在这年9月中旬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立即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年的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在军阀割据中，孙氏统一中国的目标由于美国和欧洲各国拒绝向他伸出援手而始终无法实现。起初，他希望英、美承认他的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并援以资金和武备，助他以武力统一中国，但每次与两国打交道都遭到傲慢与断然的拒绝。有一阵他甚至幻想或许日本能成为中国的挚友，在和袁世凯的争斗中他曾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以山东特别是青岛的主权作为交换条件请求日本出兵相助，不惜引狼入室，也确实引狼入了室¹。幻灭感令他不得不转向苏俄求助，竟立刻得到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响应。

“经国民党内中共党员的努力，孙中山和国民党被全力向左推进，他感到中国未来的地位和福祉，极可能要服从莫斯科的反帝总体构想了。”²

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提出“联俄，容共，扶助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孙中山致大隈重信》

2 (美)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 孙中山晚年的秘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工农”的三大政策，一年后就逝世了。为怀念和报答这位中国朋友，苏共中央决定对中国革命作更大的投入，除了枪炮支援外要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徕中国的青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培养，灌输苏维埃的精神、思想和意识形态，使之成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化作人才准备。

这一设想以最快的速度付诸了实践。就在当年，一所共产国际史上最具规模和影响的学校在古老的俄罗斯都会与新生的苏维埃中心——莫斯科诞生了，这就是寿命虽然不长，却对中国国共两党都产生了重大且延续至今的影响，但又在中国共产革命史、联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史以及许多当事人个人史上都忌讳莫深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是一所以信仰为基石，意识形态为主课的学校，培养的是将要为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战的战士。

招生办立即成立，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亲自负责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的招生，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等一干人组成了招生委员会。

消息传开，上万名中国青年踊跃报名，斯大林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蒋介石的黄浦军校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国民党要员的子女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女冯弗能等，都被鲍罗廷直接录取。全国共录取了三百多名，苏沪地区录取了五十名。正在黄浦一期学习的左权、邓文仪等甚至不顾蒋介石的阻拦和挽留，一意转去中大。报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

粤果就在这年的九月中旬，接到了董亦湘通知他立即赴莫斯科中大学习的消息。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成人礼！离开故乡远走高飞，挣脱羁绊冲向理想，哪个少年人不向往着这一天，更何况粤果这样的热血男儿。

粤果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向中共上海党组织交接了工作，包括介绍每一位同志的情况，推荐继任人，今后的联络地点和方式以及对无锡地区革命形势的展望。从小的家教，新学的熏陶和三年来的革命实践让他少年老成，一切都井井有条。

根据组织的纪律，这次远行是严禁告知家人的，但董亦湘还是允许他以学校安排外出工作实习一到两年的理由向父母告辞。蓼果年迈的双亲是年已将近六十三岁，最幼小也是最疼爱的孩子要离开身边，他们虽然还不知道居然要去国万里，却依然是不胜伤感。

尚不满十七岁的蓼果，身穿母亲连夜密密缝制的衣裤，怀揣父兄凑上的一点盘缠匆匆赶到上海。9月下旬，从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纷纷赶来的赴苏学生都汇聚到上海来了。就在蓼果17岁生日后的第四天，1925年10月28日，这一群中国青年，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将要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张闻天、王稼祥、陈绍禹（王明）、伍修权、乌兰夫……登上一条小舢板漂到吴淞口，又从那里登上驶向海参崴的苏联货轮。

在黄浦江、长江、渤海、太平洋交汇的波涛中，在漫天阴霾和灿烂的阳光中，在骇人的惊涛与短暂的风平浪静中，年轻的薛蓼果走向了信仰，走向了漫长而崎岖，不可知也不能回头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

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蓼果一行乘坐的是前俄罗斯帝国遗留下来的西伯利亚铁路，就是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们艰难修复并且巧遇冬尼亚的那条铁路。在中国山清水秀的江南长大的薛蓼果第一次见识如此广袤苍凉的大地。无垠的荒原，皑皑的白雪，黝黑的森林，冰封的沼湖，亘古的苍天，无一不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1925年的苏维埃政权还远未达到后来的强大，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军事上，红军和白军的小规模战斗从未停息过；经济上，它被周边欧洲富裕国家封锁遏制，人民生活异常艰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共依然对他们的中国同志提供了尽可能好的条件。

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行程七千四百多公里，靠燃烧木材做动力的列车走了将近3周。一路上每一个小站都要停下来加柴加水加给养。在苏维埃共和国要按照人头配给微少口粮的情况下却让中国同志们顿顿吃饱，个个穿暖。这也许就是后来新政权领袖所形容的“国际主

义”精神，一种所谓阶级之爱，一种只有同一意识形态内才能产生之爱。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很有趣，顺便写在这里。

行车中途的某一天，列车长——一位大胡子俄罗斯人气急败坏地冲进车厢，声言要找中国的负责人说话。原来一位列车员发现列车的厕所被堵塞了。当他掏出堵塞物不禁大吃一惊，进而怒不可遏，原来竟是一块黄油！在列车服务人员眼里，黄油已是多年不见的奢侈品，是苏维埃领导人和普通公民都不能尝到的美味。这是老大哥专门为中国同志们准备的营养品，现在却被人丢在茅厕里，怪不得列车长如此愤怒。

中国领队立刻开始调查是谁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行”。查查去查出是安徽人陈绍禹干的。这个来自安徽金寨的青年当时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聪明伶俐，比萼果大一些，是年二十一岁。金寨在富庶的安徽省虽然是贫困山区，但陈家是当地的望族大户。吃大米长大的绍禹哪里吃得下如此腥膻之物，又不敢请人代吃，只好往列车的马桶里一扔了之。但就是这个吃不了黄油的小伙子，日后不但适应了俄国的面包黄油，乳酪列巴，且能操一口极为流利的俄语，成为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给中共、苏共和自己制造了一连串的灾难和麻烦并最后死于俄罗斯异邦的土地。

他，就是王明。

这段轶事，因为太小，无关所谓党性，无关所谓原则，党史不会提它，当事人更不会记得，却不妨碍在将近六十年后被曾经零距离旁观此事的薛萼果-孙治方当作笑话告诉了自己的外孙沙沙。

在海参崴，萼果才给自己最信任的二哥写去了一封报告实情的信并接着写道：“如禀明双亲，恐阻碍远行，因此不辞而别，请兄代向父母善为解说”。他深知自己的不辞远行会带给父母巨大的悲伤和烦恼，却绝没有想到此一去山高水远，和父亲竟是永诀。三年后，当他在“江浙同乡会”的泥淖里苦苦挣扎时，辛劳一生的66岁老父薛华阁溘然而逝，给萼果的终生都留下了深深的愧憾。

11月下旬，西行的列车终于在莫斯科库尔斯克火车站停了下来。充满东正教异国情调的苏联首都给薛萼果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和狂喜，我们这些经历过“天安门广场大接见”的一代人是完全能够想象的。

这是一群来到红色麦加的朝圣者。

六 渐行渐远—实业救国

就在粤果进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阶级的名义开办的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最正规的革命训练的 20 年代中后期，他的二哥萼培——薛明剑在无锡、南以及宁沪实业界开始崭露头角。

到了 20 年代末期，明剑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厂申新三厂的掌门人。

在明剑加盟的十几年间，申新系统的工厂从上海的两家扩展到无锡、常州、武汉等开埠城市共九家，大大扩大了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完全打破了日、英等国对中国国民生计最大需求——棉纱布匹几十年的垄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如今大概只有九十岁以上，从小只知洋油、洋火、洋纱、洋布的老人才会懂得。

明剑天生是个管理的奇才。除了资本运作、兼并收购、行业协同、社会和政府关系斡旋等即使在眼下的“现代管理学”中也被推崇为须臾不可离的才能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和荣氏兄弟高度一致地将资本的积累和劳工利益、社会利益、民众生计及国家利益排列了顺序，后者永远在前，不容置疑。

从哪个角度开始叙述薛明剑对申新呕心沥血的开拓曾经使我很犯难。资料浩如烟海，简直无法下手。我绝不愿将此书写成传奇，否则他直接向“当道”求助，致蒋介石两次亲自过问，逼着毛森救出被绑架的老板——荣德生就是最好的传奇 1；我也不想将它写成传记，因为我的资料占有量还到不了写个人创业史的程度；我也不想写成中国江南纺织工业史，否则大量抄录现存的民国档案会相当省事。让我来谈点别的，就从明剑在接手申新不久说的话“全力以赴开始办理申新劳工福利”谈起吧。

经过收购兼并，1920年代上半叶申新就已经是中国纺织业的龙头老大了。这样的一个大民族企业，它上任不久的经营者提出的战略口号居然是“全力以赴办理劳工福利”，既是在高度“经济文明”的今天，您听着也有些惊诧吧？可明剑就这样做了，他好像先验地懂得诸如企业和社会关系、劳资关系、劳工福利、工业关系这些很现代的学科理论。八十多年前的中国，荣家兄弟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们和他们的CEO薛明剑竟然不是国人从小被洗脑的那样“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人”，而是把工人的福利放在极前极重的位置上，这曾经让本书著者大感困惑，并专门为此细细查阅了薛明剑1922年—1928年的日记（1926年的已经佚失），希望从中找出他的思维逻辑，却是无果。

明剑的日记十分平实，事情、事务多，感想、感慨少。还有一点真是羞于提及，作为一个五零后，老实讲，看薛先生那一手毛笔、繁体、竖排的日记体相当吃力，远不如看他1949年后用圆珠笔或钢笔书写的日记容易。但这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是，他和他所属的一群人竟然毫无“资本家”的形象和气味，必须重新认识他们，这才是件难事。

我看过诸如《子夜》《上海的早晨》《不夜城》等描写上海资本家的小说和电影，也接触过不少现代的企业家，可是照他们的轮廓去勾勒荣德生、薛明剑们根本不行，这些上世纪初江南一代旧式的民族企业家们和后人的想象大相径庭。

在他们，做企业简直就是一项义不容辞的集体事业，首先是一种解决民生的手段，其次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赚钱则是副产品。他们并未经过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国之初那种积累资本不择手段的阶段，即中国话“为富不仁”或德国话“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的阶段——例如贩卖奴隶，海外殖民，驱逐或杀戮土著，使用童工等。这群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物，在一个“志不在生产，不仅不能生产，而且一向无意于生产，因此也就出不了资本主

义”¹的国度里，他们一方面是朝气蓬勃的新生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儒家根深蒂固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他们“因其修养上不会‘心猿意马’而到了一种‘知足长乐’的境界”²。

纵观荣德生、薛明剑、张謇、卢作孚这些人的所行所为，没有比这个形容更贴切了。

如今的现代商学院常常要讲授一门课程叫做“企业公民”，教授们的案例远的就扯上比尔·盖茨，近的就扯上中国的某些大地产商。可是去看一看中国工业近代史上的申新三厂、看一看荣德生薛明剑卢作孚们不好吗？如果一定要在一个连公民意识都还没有的社会唱出比“个体公民”更高一个层次的“企业公民”高调，那么申三倒是算得上中国最早的“企业公民”。

《薛明剑文集》收集了数篇论及无锡劳工状况，劳资纠纷，劳工自治及劳资协商的文章，其中一篇《工厂注重劳工事业与本身之关系》甚至提出办理劳工事业要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去做³。还有一篇他发表于1928年的《劳资问题之我见》，从美国的托拉斯到德国的卡泰尔对劳动者权益的垄断讲起，痛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劳资关系，并提出工潮的发生、调解、自动仲裁、强制调查直至强制仲裁的合理过程，得出“盖劳资双方犹人体之手足相依为命”的结论，最后发出“践总理民生主义之实现”的馨香祷祝。本书将其部分内容译成如下，不知对当下的“维稳”能否起到一点借鉴作用⁴。

“甲、考证各国资本家起源，不外乎以下六因：

1. 海盗；
2. 大地主；
3. 官吏；
4. 投机家；

1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2 同上

3 《薛明剑文集 工厂注重劳工事业与本身之关系》原载《无锡杂志》1937年第22期

4 《薛明剑文集 劳资问题之我见》原载《新无锡工商特刊》1928.元旦

5. 商人；

6. 制造业者。

英美之海盗非特江南所绝无，抑亦中国全国所不闻，可以不论。大地主发源于封建制度，我国至秦朝已废，今日江南号称田产有千亩以上者已如凤毛麟角，且无显宦缙绅积资购置以成私产，决非如若欧洲各国至今犹有自昔日公侯所遗之采邑，故江南今日之地主，不但不能称大，为时也非常短暂，既无操作经济之权，亦乏垄断市场之能，仅仅足以安居乐业，鲜有投资实业者。投机家虽然容易晋级资本家地位，而我国投机事业除交易所外基本没有。即使暴富者，也是为数极少，为时极短。至于商业，规模狭小，较之欧美全如小巫见大巫。其他如制造业，外受条约之压迫，内困原料之短缺，无日不在左支右绌，奄奄一息中。现虽有缫丝，纺织等模仿工业，经营方式即简且劣，资金短缺，较之外邦，永远处于失败之地以个人而论，江南莫若荣氏兄弟者，但考起事业实质，全赖银行，钱庄之周转，并无固定资产可垫移。终年劳作，戴资本家之虚衔，实为银行钱庄的牛马，仅得苟延残喘艰难困苦中罢了，既不能操纵经济，更无力垄断市场，虚有其名，正可怜也！

一地是这样，一国也是这样。我国资本家形式的不完备，其一是由于社会沿用‘拆产’制度，‘富不过三代’即由此来。其二则是因国家行政上对于贸易之发展，航海业家之补助，国货之奖励皆未实行，均使企业家失望，直接或间接导致缺乏养成资本家之机会也。

乙、江南劳动者之现状（略）

丙、劳资之关系

我国劳资关系，昔日颇能和衷共济，相安无事。近年因生活艰难，业务纷争，时有工潮发生，眼下更是风起云涌，时有所闻。其远因一则受海外影响，如上年五月的英国全国总罢工，开世界工业界之先；二是由于新思潮之发生，如马克思主义之流传以及国内学者之著作，均足以引爆工潮；近因则一为内乱日剧，致业务不振，二为劳工生活也在提高，职员因权利义务不当而生派别，奖惩不当，予工人以可乘之机。待遇之不良，制度之变更，感情之恶劣，政治之关系，在在足

以为促发工潮之媒介。故欲工潮减少，必上至经理，下迨职工，同甘苦，同劳役，赏宜普及，罚当限制，谋劳工应有之公益，设备之完善，以期他们知识的增高和身心的愉快。并组织团体，联络感情，以勸劳工奋勉之心，皆是消弭工潮之良策也。

若工潮已发生，则：

一曰调解（略）

二曰自动仲裁（略）

三曰强制调查（略）

四曰强制仲裁（略）”

在成书过程中有企业界朋友发问，“薛明剑们的企业规模，就业人数，创造的价值和积累的利润都远不如我们这些人？你是不是把他夸大了？”

其实“夸大”一直在提防，“比较”也一直在思考。毋庸讳言，在写作的过程中爱上自己的主人公是写作者很容易犯下的错误。这里不提孙冶方，他是我从二十几岁起就崇拜的英雄，也根本用不着我来夸大。写出作为“人”的孙冶方，对我来讲并不是难事。反倒是薛明剑，越探究下去越感到他身上那些很少被人提及的东西是多么宝贵，他和他所代表的一整个阶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民族实业家们所作过的事情，对于眼下国人是多么陌生又多么熟悉。陌生，源自从小受到的灌输式洗脑，熟悉，却源自眼下被一再高调宣传、提倡、实践和计划实践的诸般事务——民生、民主、教育、就业、公益、工厂管理、农村建设……，原来薛明剑们老早就在做，而且，比今天的人们做得好。尤其在“私企”领域，薛明剑们和眼下众多动不动就敢称“儒商”“仁商”的私企老板相比，和那些“又在买他那个苏的天堂”的若波兰先生们⁵相比，是一回事吗？

无锡文史部门现存的资料大量记录了薛明剑在申新“伙同”荣德生共同创办劳工自治事业的。一个资本家，一个“资本家的乏走狗”，他们不是盘算如何压榨劳工，而是操盘“劳工自治事业”，如此咄咄

5（法）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卞福汝主教》

怪事，值得一探！

1925年主编《申三临时刊布》，提出此刊物“旨在劳工福利，不及其他”。这份企业报纸涉及劳工生活的每个方面，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稿件由劳工撰稿，观点由劳工论断，明剑任主编⁶。

1926年编《工场设计与管理》，研究改革工人管理和劳工福利。申三将工人宿舍辟为劳工自治区，这在中国是一个首创之举。

1927年任无锡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兼仲裁条款起草委员；

1929年办申三医院和机工养成所，女工养成所和职员养成所（培训所）；

1930年被国民政府工商卫生两部聘为劳工卫生促进会委员；

1933年扩充劳工自治区，实施各项劳工教育及福利事业实验，颇得社会重视；

1934年《无锡杂志》出版《劳工专号》，促使国民政府教育，实业两部合办无锡劳工教育试验区。

请注意，申新系统由于扩展速度太快，这一年资金链已濒临断裂，政府已经计划收归国有。明剑焦虑地在京宁沪间多方奔走，与行政院汪精卫，实业部陈公博等政府要员博弈折冲，力主维护民族工业。即使在如此困窘之时，申新也没有忽视和放弃劳工自治和劳工福利的建设。由于明剑的斡旋，也幸得史量才，吴稚晖等社会名流的帮助，政府不但取消了“收归国有”的原议，还在资金上帮助申新安度了难关。这样的结果和申新劳资关系和谐，双方同舟共济绝对是分不开的⁷。

1935年黄炎培撰文《申新问题的精讨》。《国讯》等报刊刊登文章《介绍一个劳工自治区》，大力推崇申新做法。

明剑认为“夫欲劳其形者，必安其心；欲乐其业者，必一其志；欲用其力者，必健其身；欲改其恶者，必修其德。故实业家则间接必先筹劳工之福利。”他看劳工福利是做企业和企业文化最重要和最不

6 《申三临时刊布》部分原版现存无锡档案馆

7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4》

可缺的一部分⁸。

1936年明剑认为“申新倡办13年的劳工自治已粗成”，凡工人自出生至老死均已顾及。企业设有医院、学校、剧场、运动场、健身房、尊贤堂、功德祠及公墓。更有图书馆、茶馆、裁判所、托儿所、夜校以及养兔、养鸡、养蛙、种菇、照相、酿造等副业，训练种类22种，任凭工友工余之选。机工、女工、职员三大养成所全部建成，大礼堂及新医院也已竣工。

“在劳工自治区最初创办的时候，厂方固然也曾费了不少的金钱和力量，但到现在，厂方对自治区方面，除每月供给事业费一百元外，其余的经费都是由工会和自治区内工人膳食费及其他生产收入项下拨付。所以一种事业的开端，困难和障碍是免不了的，但等到一上了轨道，困难自然会逐渐地减少下去。”⁹

申三的这种“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劳工自治方式，即使在80年后的今天也不失其宝贵的可借鉴性。这一切无一不是荣德生、薛明剑们亲历亲为，仰事俯劳。

读者，假如您不相信这确实是1949年以前发生在中国所谓“大资本家”头上的事情，您可以到现在的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档案馆，看看那方1936年就刻下的石碑——《申新三厂礼堂记》，那一手漂亮的隶书是薛明剑的手迹，而这座礼堂就是当时的工人俱乐部。这块石碑在“史无前例”中曾被申新的老工人们抹上石灰水泥，深深藏匿地下十几年¹⁰。

您还可以到文史部门查阅那个年代的报刊。那是个新闻检查制度相对宽松的年代，申新的工潮或罢工以及引起的后果是逃不脱报刊杂志法眼的。申新系统也发生过工潮，也出现过罢工甚至暴力，但

8 《薛明剑文集 申新第三纺织公司劳工自治区概括》原载《无锡杂志》1934.11“劳工专号”

9 同上

10 薛明剑撰《申新三厂礼堂记》1936年刻成，原碑现存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档案馆

你看到的不是中共电影中常见的“警车哀号，枪声不断，镣铐郎当”的场面，从被记录下的历史中你只能看到艰难的说服、妥协、居停、折冲¹¹。

薛明剑上任伊始就废除了工头制。虽然他十分欣赏日本本土纱厂严格和科学的管理制度，但对日资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纱厂所采用的包身工制度却是深恶痛绝。从现有的资料看，我并没有发现明剑接触过多少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以及西方“天赋人权”的伦理。除了日本他也没有到过其他国家，而日资在中国开办的纺织工厂对工人的管理，有明剑的小弟孙冶方发表于1932年的实证调查型文章《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和左翼作家夏衍发表于1936年的名篇《包身工》为证，其残酷程度令人震惊。但是如果你非要找到他全力以赴办理劳工福利的思想精髓出处，除了从一点在日本本土考察时所受到的启发外¹²，却又的确找不到什么理论。除了日本，薛明剑一生再未出过国，更不用说到“西天”取经。

很难否认薛明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情怀，一种朴素的

11 这里必须提到1948年2月2日的“上海申新九厂二·二事件”，荣德生《兴办事业凭诚信》记载了此事件（见《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不二日，申九发生风潮，因工人要求过高，厂中不允，即行罢工，至三日后，事益扩大，并有人从中煽动。市政当局派警弹压，如临大敌，死三人，伤数十人，捉去二百余人，始告平息。厂中损失甚钜，闯祸如此之大，实为从来未有。”

“二·二事件”为申新历史上唯一一次劳资严重冲突，也是唯一一次闹出人命的阶级事件。是时及后人对此次工潮颇多议论，如李立三曾说：“今年2月间上海申新纱厂工人的罢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坦克、机枪的屠杀下，死伤一百多人之多，表现了上海工人革命斗争的英勇传统。而被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百科全书的《申报》则做了完全不同的现场报导（见1948年2月3日申报“申新九厂罢工冲突流血 官警工人死伤七十七名 政军警当局联合招待记者报告经过”和4月4日“蒋主席重视申新事件 郑介民来滬调查真相”两文），未见“坦克机枪”之说。三死者一为枪击，一为拥挤窒息，一为高空跌落，全部过程为1小时9分钟。另：郑庆声先生发表于《史林》1996年第2期的《论一九四八年初上海申新九厂大罢工》则指出，在这次罢工的指导上有“左”倾冒险倾向。在“选点”上没有正确估计到申九工人的主要要求，在斗争中提出了过高要求，存在等待总罢工的思想，斗争策略又过于僵化，放过了几次通过谈判转弯、收篷的机会。

12 《薛明剑文集（续篇） 东瀛考察记》原载《新无锡》1926.6

人文本能，一种无关宗教和主义的平等精神，一种连他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的人性之光。不仅仅是薛明剑，包括他的东家荣德生以及当年这样一个阶层的身上，都有这种很难言传但很好意会的东西。薛明剑们凭着本能在追求一个人人都有尊严的社会——尊严地活着，尊严地劳动，尊严地死去，不是少数人而是全体民众。

明剑服务申新整整 30 年。他崇尚实业救国，也相信实业能够救国。他有一篇 1947 年 11 月发表在《江苏民报》上题为《民族工业之历史任务》的文章，其中诸多观点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令人振聋发聩：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国家的必要条件就是政治民主化，生产工业化。有了政治的民主选贤与能，消除封建余毒；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改善国民的生活，充实国家的力量。”

“有了民主的政治，才有改善生产的环境，进而提高国民政治，文化，教育的一般水平。政治民主和工业发展因此是相因相成的。”

“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不能不具备现代的国防，而现代化的国防建设是建筑在强大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而强大的生产力又是以工业化的经济建设为骨干。”

“若以‘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的经济意义来解释国内的贫弱根源，我们也只有加速地利用现代的生产工具和发明来改造国家殖民性的经济本质，争取世界新秩序中的国家地位。”

“国家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工业不能离开国家政治权利而存在。”

“工业界的力量必须集中。”

“注重科学管理，奖励科学研究，提倡工业教育，改造生产技术。”

……¹³。

这是绝不亚于文艺复兴的工商文明复兴，只可惜夭折得太快了。

13 《薛明剑文集 民族工业之历史任务》原载《江苏民报》1948.1.15

这样的声音在中国，很多是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更晚才如梦初醒般呐喊出来、还有些甚至至今还不许呐喊甚至不许窃窃私语的声音，而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们其实早就具备我们用了半个多世纪才又慢慢重新悟出的智慧，改革开放的呐喊是他们积累了几十年、几百年的爆发，那些窃窃私语也终有变为呐喊的一天，这是无法抗拒的潮流，不是什么人能逆转的历史走向。

从日本考察回来，明剑深感中日纱厂在管理上的差距，它令国货落后，日货充斥，二者根本无法竞争。他下决心整顿。整顿的第一斧就是砍掉与工厂几乎共生的封建工头制。

这个过程非常凶险，荣氏兄弟既赞同又害怕出乱子，犹豫不决。除了不断拿出数据说服东家，明剑聪明地在申新三厂组织了一场比赛，让工头们管理质量较好的英制纱锭，新聘职员管理较差的美制纱锭，结果后者大胜，促使荣氏兄弟在 1925 年正式废除了工头制。

工头们怒不可遏，纠集数百人群殴新聘职员，捣毁工厂设备无数，还以工人运动名义上告到上海市总工会。次日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即来锡调查“申三工潮”事件。明剑将《废除封建工头制，实行科学管理计划》和《建立工人自治区计划》拿给李看，同时明确阐述“工会不是工头之会”的道理。李立三经详细调查后确认申三事件不属于工人运动而是工头流氓闹事，总工会不予支持。¹⁴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工会不是工头之会”这一简单，明确，坚决的提法竟然是明剑的小弟薛萼果对二哥说出来的。当时萼果已经是中共无锡支部的负责人，但明剑并不知道。前面章节已经讲到，萼果是时已经是调查过上海工运并且正准备发动无锡地区工运的少年领袖，如果不是他用自己的大脑认真思考过，是不会因为二哥的原因

14 《薛明剑文集 我参加工业生产的回忆》“……4月21日下午，（工头）纠集地痞流氓数百人冲入工厂和宿舍，将XXX（工程师）等五六人殴打成伤即行散去。他们亦未向厂方提出条件，更无厂中国人参加暴动。厂方因职员星散无法工作，乃即宣布停工……出事后，上海总工会方面李（李立三）到锡，经过各方面调查，知系封建反对工头而起，与工人和群众并无利害冲突，故亦未予支持即返回上海。”

就维护申三，提出“工会不是工头之会”这样连明剑都赞叹并立刻采纳的提法的。¹⁵

要是我告诉你明剑自己就组织和参加过工潮，你又会怎么想？

1934年，申新系统因世界经济不景气而出现资金链周转呆滞。5月，申七向英商汇丰银行贷款到期，汇丰悍然将价值五百万新法币的厂房，机器半价拍卖给日商丰田纱厂。7月又有政府“收归国有”之说。明剑深知两者都会毁掉这一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为此他除了急切奔走于沪之间与政府折冲，遍访工商界要人以及新新通讯社，申报等大媒体请求维护民族工业外，还发动了申新数千员工在上海集会游行并组织无锡申三员工赴沪声援。¹⁶

薛明剑，这个实实在在的“资本家的代言人”，“大管家”，实实在在地组织了这次工运，它迫使工部局，外商和政府都做出了妥协，中止拍卖，解除收归，签订贷款转期合同，生生把申新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阻止了一个民族工业的瓦解。明剑还不罢休，他又发起联合内地二十余家纱厂呈请行政院实业部纠正对花纱的投机行为，请求免增棉纱统税，均被政府接受。

这年的《无锡杂志》出了一期“劳工专号”记录这个过程。

这和“旧社会”概念怎么这么不同啊？

15 杨旭《荣氏兄弟》海天出版社 1993“由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李立三（化名李成）率领的‘申三工潮调查团’第二天就到了无锡。二十三日上午，薛明剑代表厂主去调查团陈述事件经过。薛明剑对这次传询并不特别恐惧，主要是受他弟弟薛萼果的影响。‘工会不是工头之会’这句话就是萼果对他说的。”

16 薛禹言《八十忆旧》“1934年5月，上海申新纺织总公司因受世界经济不景气之影响，将上海新七厂向英商汇丰银行押款到期，无力偿还。汇丰悍然将价值五百万新法币之以上厂方机器以半价拍卖给日商丰田纱厂，引起上海各界之震惊。7月间又有‘收归国有’之说，政府准备派员接管有关各厂。先生奔走于京沪，与汪精卫、陈公博折衡，一面主张从激发群众爱国心理来反对外商之一意孤行，遂动员申新数千名职工集会游行提出抗议，号召上海工商界与外商银行断绝来往。并组织无锡申三职工去沪声援，又获得新新通讯社冯社长及申报经理史量才之助，更蒙吴稚晖、吴宪滕两先生主持公道。租界当局慑于工人运动之威力，旋即解除拍卖，签订押款转期合同，从而保存了申新七厂，也防止了中国最大的民营集团的瓦解。”

十分巧合的是，此时他的小弟孙冶方在上海《中国农村》杂志上发表《‘资本主义万岁’和‘打倒资本主义’》一文，做出“中国的银行资本无形就成了帝国主义者所雇用的摧残中国民族工业的刽子手”的论断，只不过他没有用申新而是用了天津华新纺织厂作实证的例子。

明剑和冶方虽然各自在走“渐行渐”的远人生路，可在“实业救国”的天空里，人们却时时能看到兄弟俩遥相呼应的碰撞火星。这非常有趣。

明剑管理申新有一整套系统的方法。除了处理劳资关系、废除工头制度外，还有人事管理制度、协调棉纱生产和交易的关系、平衡引进西洋工程师与重用本地人才的关系、商业借还贷，原料调度及存散，生产与职教，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他凡几亲历亲为之事无一不作文作图记录，令后人能清晰看到他们的作为。但由于他的文风十分平实质朴，加之所从事的工业生产本身就是数据的堆积，不能不显得枯燥。假如有人将这些记录整理成册再润色修饰，必不逊于《松下幸之助回忆录》，而此书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私营甚至国营企业家的启蒙读本。

明剑做申新做到后来已经完全可以抽身投入其他事业了。优秀的制度一旦建立就完全可以腾出初创时的优秀人才，让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再去开拓新的事业，再说这也是宗敬，德生两兄弟当初就答应明剑的。虽然明剑在荣氏兄弟的鼎力支持下从20年代初就已经从容行走在商界、实业界、政界之间，持续地发展民生，只是他从未真正远离申新，这里已经是他精神的家园。特别是随着他参政生涯的推进轨迹，我常常能看到他从这个精神家园汲取力量的痕迹。

从1919年始到1949年止，他为申新整整服务了30年。

除申新之外，明剑还创办过诸多其他实业。这些实业包括采矿业、化工业、兵工业、橡胶业、粮食加工业、桑蚕业、机器制造业等，还涉及铁路、物流、交通、边境贸易等等。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企业都很小，明剑是创办者却往往不是所有者。例如他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以飞快的速度创办“允”字头企业，却不论盈利模式，难道个

个工厂都办成福利工厂不成？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薛明剑文集》里。1948年9月11日，这一天他被推举为江苏省工业会理事长，在《人报》记者采访他时有这样的问答。

问：“先生对于今后之工业闻有新愿望，可得闻乎？”

答：“余自幼从事工读，即对社会经济深寄改革之愿。继从荣德生先生游，先后三十年，尝见其所书“饱暖千家怨，金钱万恶魔”一联，初不解其寓意所在，近渐感其意义深长。盖旧社会向有“一家饱暖千家怨”之事实，新社会自左倾之说兴，更使离社会而独自饱暖者其集千家之怨。盖金钱之为物，用之得当，固可为事业之工具；用之失当，实为万恶之魔。我国今日社会，固属大贫小贫，不足以言富，更不足与欧美并论。然前车之鉴，不能不预为之防。余半生经营工业，一向保定工业之收益不应为个人牟利而必须公之于团体或社会。故于抗战西迁后曾在重庆，长寿，涪陵等处经营十八家工厂其股份大半为集体之基金，仅少数为经理及同仁之投资。惜于胜利后因职工之归思与星散，生意之衰退与价落，以至十九未能获有预期之成果……。

“胜利归来，未敢因失败而放弃主张，仍本前定方针重复建立允利，允福，允新，允中，允固，允大，允友等机械，面粉，橡胶等工厂，所收资本仍为集体资金。余对于社会事业近抱有”十项志愿：

- 一、乡村建设；
- 二、太湖风景区建设；
- 三、湖江工业中心区建设；
- 四、协助文化事业人员；
- 五、奖励工业发明；
- 六、（设立）奖学金；
- 七、建立图书馆；
- 八、建立文献馆；
- 九、建立大礼堂；

十、建立各级学校。

故各厂资本大部均为上述各项事业集体基金，除一部分息金已在动用外，其余需俟厂务发展，获利增多，并拟募足投资达百万金元以上之基金，同时并联合成立金融管理机构，方始动用全部利润，逐年预定各项事业之进行。”¹⁷

这就是薛明剑们的“盈利模式”，也是中国在1978年以后才开始摸索、理解和醒悟的东西，比如股份制、工业特区、新农村建设、金融管理、资金流动、旅游资源……这些今天看来已经是浅而又浅的概念却被“新中国”整整丢弃了30年，又用去40年的时间重新捡起。

历史的轮回就是这样的无情、滑稽和不可捉摸。

可惜，薛明剑在讲完这番话的一年后就沉寂了，他走了30年的实业救国之路也随之嘎然而止。如今国人都知道荣毅仁，却几乎没有人还记得他——荣氏家族企业的智囊、开拓者和掌门人。薛明剑的命运在1949年这个历史大变革的时刻起了天地翻覆的变化，他全然地接受了命运安排。这个放在后面叙述。

明剑天生不是一个甘于寂寞之人，他阅历的丰富和履历的繁杂是惊人的，他的任职、兼职、受聘、被公推、被民选……令人眼花缭乱。他过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激情使他的前半生极为多姿多彩，却也是他后半生郁郁不得志的唯一原因。在他最年富力强的20、30和40年代，这位年轻的绅士为自己的家乡，民众和国家做了大大小小无数的事情。

“实业”到底救不救得了国，让政治和社会学者们去探讨吧。无锡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旅游，文化，工商业的重镇，薛明剑应该列入奠基人和开拓者的行列，这个事实无锡人民不能忘记。

17 《薛明剑文集续编 工业会创组动机及其未来》苏省工业会发起人薛明剑答记者问 原载《人报》1948.9.11

七 信仰的洗礼

就在薛明剑在中国江南实业界大施拳脚之际，他的小弟薛萼果却在俄罗斯异邦的土地上经历着痛苦而虔诚的信仰洗礼。

不得不用连续，较长并且相当枯燥的篇幅来写薛萼果——孙冶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经历。这个年轻人在那里五年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内斗争史，是中共几十年延绵不断各种内斗的雏形和发轫，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一谶语的“发祥地”。莫斯科中大中国留学生之间以各种“名义”被挑起的争执，争斗和斗争延续了几十年，即使在它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今天，许多党人以及国人依然还在沿用它的某些“权威性”的，或者“历史性”的，或者“延续性”的所谓“结论”来判是非，定义人物和解读历史。它在孙冶方们的生命轨迹上，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尤其是后者，并因此而连带在中国近代史上打下的烙印之重，影响之深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

作为经历过文革、深谙文革各种术语、行话和切口的一代人，在成书过程中我惊诧地发现那些邪恶暴戾、伤人入骨的词汇，其发源地就是这里——莫斯科中山大学，令人不胜唏嘘。

起初本书也是按照一个“海峡这边的人”所受过的一般教育去审视和看待这段历史的——XX 阵营和 XX 阵营，正确和错误，阴谋和磊落，崇高与卑贱……然而在读过海峡两岸和更远处的亲历者或研究者们不同的叙述后，就再不敢轻易落笔了。

下面的文字，是一个受过一般教育的中国人，初级的问学者，以普通人看世界的角度来叙述的他所理解一段中共党内极为著名，党外少有人知的一段小历史，一个历史的“非典型”切片。好在如今，

这种事情还是我辈这样的普罗大众被允许做的，大不了丢人现眼，文责自负罢了¹。

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 年 10 月成立，距离孙中山逝世仅仅 7 个月。薛萼果们是第一批学员，中山一期。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斯基，这位在苏维埃俄国威望仅次于列宁的政治家对中国客人和俄国主人们说：

“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就不配当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²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 16 号，与世界著名的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比肩而立，是革命前的贵族府邸，俗称“蓝屋”，有花园，球场，冰场，房屋高大敞亮还有一个大舞厅改造的礼堂，是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中大的建立和维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预算高达一千万卢布。在当时国内生产力十分低下的苏联，这是一笔足可以组建一支正规部队的巨款³。

学生享受着比教员还高的生活待遇，生活和学习用具一应俱全且全部免费，寒暑假还有冬令营和夏令营让他们到苏联各地参观旅游。但接下来几件事就又有些超出常识了：

一是在第一个学年，学校每天为学生提供高达五顿的餐食，吃到中国学生从不好意思到个个告饶，最后坚决要求取消；

二是每年每个学生有长达两个月的休学疗养，疗养后学员体重若不增加，疗养院长竟要受到惩罚；

三是学校还负担学生回国探亲的费用和家庭经济拮据学生的养

1 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2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2004

3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预算和决算额以及资金来源至今仍未解密，对这个数目的揣测，从 55 万卢布到 1 千万卢布到 1 千万卢布/年，众说杂陈，很难采信。但按照是时苏共党员工资上限为 225 卢布(根据《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 中山大学的管理与预算》一书)以及中国学生总数和其使用途径推算，应该介于 1 千万与 1 千万/年之间。这笔巨额资金高得连俄国人自己都不愿承认，以致一再宣称是和国民党共同集资办学，但很遗憾国民党从不领情，每每推脱，甚至有“若有钱我们何苦不在中国办学”之说。

家费用，要动用极为宝贵的外汇来支付他们的旅费和寄往中国的家用。⁴

是时苏维埃民众的日常生活，无需赘言，你可以从各种官方推崇的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能勉强容忍的例如《热的雪》、或绝对不能容忍的例如《日瓦戈医生》等书中得窥全豹。的确，这就像一位 8 岁的哥哥自己身处饥寒交迫中，却要让 5 岁的幼弟吃饱穿暖，不时还要他唱一唱卡拉 OK，做一做足底按摩一样，令人唏嘘感动之余又有些困惑。许多史家或过来人都很想探究这种博大爱情的根源以及这笔巨大经费的来源，既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来到“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莫斯科”⁵，果果兴奋极了。每当他在红场悠远的钟声中醒来，在大教堂前的鹅卵石地面上踏雪早操，在莫斯科河畔挟书而行，在普希金与刚察洛娃举行过婚礼的大厅中聆听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朝圣般的感受就不由自主地从这个 17 岁的小革命家心头油然而起，天堂也就不过如此了吧。

基于列宁主义学说对当时世界发展趋势的估计，以联共中央为核心的共产国际认为短时期内完成世界革命大业是有可能的。不尽人意的是，此刻欧洲的革命浪潮正随着一战的结束在消退，西方对“共产主义幽灵”的围剿也从未罢手。列宁发出“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⁶的声音，彻底悖逆了他的那位力主“脱亚入欧”

4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生活》、(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杨尚昆回忆录》等。“当我们一到中山大学，每天开五次饭。过了些日子，我们请求学校取消下午的点和晚上的夜餐，因为我们实在不习惯一日五餐饭。此外我们认为太浪费了，一日三餐足以。”想想吧，一日要进五餐！俄国人准是把我们当饿鬼了。”“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 25 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

5 前苏联歌曲《列宁山》

6 (俄) V.I.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斯坦福东亚图书馆藏书)

的光荣前辈罗曼诺夫·彼得大帝。

俄国人在西方的孤立使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东方。

虽经历了五四大潮却依然身处主权被瓜分，国土被分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乱象中的中国，其“革命造反”“民族解放”的柴薪已经前所未有地高高堆起，现在急需的是火油和火种，是革命大浪的弄潮儿，换句话说，需要大量能按照苏维埃俄国“全球一体化”伟大宏图去驾驭和改造中国的革命精英。

此前苏联已经为国民党的黄埔军校提供了大量经费。

从列宁到斯大林，俄国人一直认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是孙中山博士，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列宁的“世界革命”，在意识形态上无论俄国人怎样磨合也做不到完全的合拍。因此孙中山一死，在自己国土上为中国人再办一所大学来培养革命精华，在俄国人的意识里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历史使命⁷。

中山大学课程的设置有俄文、历史（中国、东方、西方革命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令人困惑的是学校名为“中山”，却恰恰没有任何有关孙中山学说尤其是他“三民主义”学说的课程。

由于国内急需人才，中大学制仅仅两年。这些课程对于薛萼果、蒋经国、陈绍禹这样本来就还是学生且年龄又小的人来说是容易的。原就有英文功底的萼果很快就掌握了俄文，还有了一个俄文名字芬克。他被指定为班级共产党的党小组长。

进校第一年，萼果就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并开始反复阅读俄文版的《资本论》。也许是江南人与生俱来的经邦济世的潜意识在起作用，也许是在中大所有的课程中除了政治经济学就没有更适合他性格发展的方向了，无论如何，一个未满 18 岁的年轻人能一头扎进其厚如砖，深奥难懂，诘屈聱牙的《资本论》，在莫斯科中大上千名男女老少留学生中毕竟是罕见的，我也没有发现

7 这种发乎于信仰的使命感和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国际主义热情”，又令他们事隔 36 年后在莫斯科建立了“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

过他们中间还有谁后来像他一样成为官方或者民间的大经济学家。

《资本论》是影响薛萼果-孙冶方一生最重要的一本书，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本书，是他60年革命生涯的圣经。无怪近50年后，身陷秦城监狱，被没收一切可能造成自杀的随身之物如皮带，剃须刀，甚至鞋带，关进单人牢房中的孙冶方，他哪里想要自杀，他最迫不及待想要做的事情是学习德文。越到晚年他越不相信俄文版的二手《资本论》更遑论四手的中文版了。他终生的挚友顾准曾经这样评价《资本论》的中译：

“现在的《资本论》中译，实在译得谬误百出，而且拙劣异常。例如《原始积累章》之IV，英译标题为 *Genesis of Capitalist Former*，‘Genesis’套《旧约》的‘创世纪’，有一种真实历史的神话化的意思。中译干巴巴的‘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发生’。此外，Protestant 是新教，这是中国人习知的名称，直译应为‘抗议教’。译者用日文外来语的方法译音，结果凡和基督教有关系的和无关系的中国人一概看不懂。原始积累一章涉及大量西方历史，译文更不忍卒读！”⁸

他俩一生都以不能阅读德文原版的《资本论》为憾事。

萼果原以为在中大可以学到所有的革命理论和军事科学，然后就能回到祖国去实现理想，创造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小小少年哪里会领会“革命”的全部含意，也绝无可能预知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物种，尤其是莫斯科中山大学，这里聚集了上千名几乎个个都自认为是精英的中国人的地方，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少年很快就陷入了一场接一场残酷的政治厮杀，这些厮杀对他和他的同学们，对中共以至整个中国都产生了诡异、长久而巨大的影响。

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最早期的党争——“旅莫支部”，“江浙同乡会”和“二十八个半”。

8 《顾准文稿》P327

I. 中共“斗争哲学”的鼻祖——旅莫支部

莫斯科中大成立之初就有自己独立于联共，直接受命于中共中央的党支部旅莫支部。

按照共产国际“工人无祖国”的原则，任何共产党人都应参加居住国的共产党。如果说中共的“旅法支部”，“旅日支部”是因为法共非常弱小而日本根本没有共产党，那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共产党的大本营莫斯科建立本国支部，这从根上就违了共产国际的规，只是因为实在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语言问题，校方才允许了它的存在。

粤果一行来到中大时正值任卓宣担任书记，这个后来做了共产党叛徒的人，领导中大的旅莫支部开创了党内斗争的先河，首创出许多沿用至今的斗争名词。

1925年底，大批来自国内，具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且党龄长、历深的干部，包括粤果一行的领队俞秀松、董亦湘等，一到中大就遭到了旅莫支部的敌视。针对这一行人大部分是江浙籍知识分子的特点，旅莫支部立即看人下菜碟，提出打破家庭、乡土、亲情和民族观念，泯灭个人情感，偏废学习俄文，绝对服从支部，放弃个人爱好，取消个人生活等极端原则，强制所有人进行“思想改造”，鼓励“互相监督”，提倡“打小报告”，强迫“人人揭发”。

无视“人性”和“常识”往往是极端组织的特质，在中共更是党的铁律。

旅莫支部下令所有中国学生不许恋爱，不许看文艺小说，不许听音乐，不许唱歌演戏，并将这些都归纳为罪恶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是莫大的罪过。支部规定每三两天就要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大家互相揭发生活上的所谓“非无产阶级”细节。谁要是苦学俄文或埋头钻研马列主义的理论，谁就被斥为“不注重革命的实际武装训练”的“经院学派”而受到批判。

国人至今耳熟能详、与政治幻想小说《1984》极其相似却又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很多都在这里找到了原创者——莫斯科中山大

学中共旅莫支部。

薛萼果和许多同学都糊涂了，这不但和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斗争”的革命理念南辕北辙，也完全无法满足这些真正向学的青年学子的求知欲。旅莫支部要把学生训练成“共产革命教的清教徒”和绝对服从的奴才，同时为这种奴性起了一个非常悦耳并沿用至今的名字，叫做“党性”。到了最后，任卓宣甚至俨然以中国封建行帮的方式管理支部，以“老大哥”自居，摆出对同志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堂主派头。

萼果和一批青年学子们从困感到反感，从反感到开始反抗。他和许多中国学生联名向联共中央写信，联名再联名，一封接一封，反映旅莫支部的恶行恶状，集体抵制它的领导。

1926年初的一次党员大会上，萼果勇敢地站起来发言，对任卓宣的行径提起质询：

“旅莫支部领导下的党内生活还有民主自由可言吗？”

“三天两头的生活检讨会，要党员互相揭发生活小节，互相攻讦，无限上纲，弄得人人自危，排斥和猜疑，毫无阶级友爱气氛。这有意义吗？”

“埋头读书的就是经院学派，是否不读书就是革命派了呢？”

“党员的日常生活要由支部决定后才能行动，这难道就叫做服从纪律吗？”

旅莫支部风波其实平息下去得很快，俄国人对于这个独立于联共领导的异国组织早就不胜其烦了，等到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群起反对，联共中央立刻借机解散了它，任卓宣回国，新的支部建了起来，由董亦湘任支部书记，正式归属联共中央领导，全体中国同志一律降格为预备党员，连董必武、何叔衡这样的中共元老也不能例外。⁹

旅莫支部的解散使萼果又能安心学习了。原就有英文功底的他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俄语，未等毕业就开始为东大中国班和中大做

9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知识出版社 1984

俄语翻译，这对于原就是个读书胚子的薛萼果来说真是如鱼得水，胜任愉快。1926年，18岁的萼果就如同每一位18岁的年轻人一样，在兴奋，困惑，烦恼，快乐之间起伏着，成长着。但他不知道他正在亲历和创造一段历史，旅莫支部的故事远没有结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以至几十年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论及党的生活不正常时还要提到“这是从莫斯科传来的”¹⁰。

他指的不是联共而是旅莫支部。

薛萼果——孙冶方就要遇到他职业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的挫折，也是对他性格、智慧和意志的第一次考验了。

II. 无趣无聊的“江浙同乡会”

1927年转眼就到了。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占领上海。消息传到莫斯科，萼果和他的同志们兴奋得立刻上街游行庆祝。不料两周后风云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镇压工人运动，屠杀共产党员的4.12政变，国共合作的大厦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鉴于在成书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本书在叙述这一段几乎每一个海峡这边的人都烂熟于胸的历史时起了疑心，为此四次去斯坦福大学专门收藏“蒋介石日记”的胡佛档案馆查找这位最重要当事人的第一手记录。在逐字逐句阅读了是年3, 4, 5月的三本蒋氏日记拷贝件且手抄了4月的全部日记后，疑心就更重了。

这三个月尤其是四月、特别是12日当天和前后几天蒋氏的文字，可谓满纸忧患、一把辛酸，但多为“列强未平”“逆料未除”“扬州失守”“滁州似失”“镇守江宁”“浦口收复”等北伐“战事”，以及“得汉口免职令”“武汉方面压迫异甚”“汪精卫卖党失节”等“党事”。提及中共，虽愤恨之情溢于言表，但大不如前述“战事”“党事”字样多，且多以“CP”替代，如果不是抄录一遍，很有可能漏掉。计有：

10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汪（精卫）陈（独秀）联名宣言不胜惊愕”；
 “讨论共产党事为本党计非与分裂不可”；
 “（北伐军）彼此疑忌不能制敌 CP 阴谋至此可恨”等。

至于上海“工运”，仅“上海工团枪械昨日已缴颇有死伤而浙江各处 CP 皆同时驱逐人心为之大快”一句。而 4 月 12 日当天所谓“屠杀”，日记无全记载，通篇都是北伐军“浦口失守”的烦恼，若说当天发生的事情是蒋介石的“预谋屠杀”，除非他把日记也弄成自己骗自己的把戏。

这些日记是蒋介石家属独家委托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被删节或伪造。在 4.12 的问题上，黄仁宇先生的观点——“至于（4.12）清党终在上海展开者，乃因当地工会组织纠察队五千人，在孙传芳，张宗昌部队退出上海地区时，获得枪械数千支，至此成为严重问题。3 月杪蒋介石与白崇禧已发出通令，此等半军事机构务必将兵器交出。如谓 4 月 12 日事件出于突然，工会人物全无预感，只在懵懂之中被出卖，甚难置信”¹¹，比较令人信服。

但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开宣布取消莫斯科中山大学却是众口一致的事实¹²。苏方匆忙将中山大学改名为“苏兆征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苏兆征何许人也？估计眼下的国人没有几个人晓得，可见是时苏方的仓促和慌乱¹³。

11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 2008

12 《国民党档案馆历史文件汇编-1927》原件存台北国民党档案馆。“国民党中执会根据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的提案，通过了以下措辞强硬的决议，全文如下：‘取缔中山大学，提请政治局（Political Bureau）及国民政府通告全国，禁止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

13 《维基百科 苏兆征》“1885-1929，广东香山淇澳岛人。中共早期领导人，工人运动活动家。1908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掩护孙中山等脱险。1921 年 3 月和林伟民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 年 1 月 12 日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和谈判代表之一，后任代理海员工会会长。1925 年跟随孙中山北上到北京，代表香港工人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席间认识李大钊，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27 年 2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往武汉，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劳工部长。在 1927 年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个突然的变故给中大学生造成的心理震撼实在是太巨大了。

学生们立刻开始分裂，国民党学生陆续回国，留下的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时年龄比蓼果还小两岁的蒋经国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蓼果是同班同学。因为两人年纪相当又兼俄文都很出色，所以私交很好。当经国要和父亲划清界线而仍然留在莫斯科时，蓼果支持了他。

公平地讲，苏方并未粗暴对待这位当时才 17 岁的“太子”。他被保送到红军军政大学和列宁大学学习，到黑海疗养，到苏联各大城市参观，其间还会见了斯大林的母亲。虽然优渥如此，经国的“人质”身份还是十分明显。他在苏联辗转 12 年，结婚生子，直到 1937 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才被允许回国¹⁴。

国共的分裂在中大不仅引发了国共两党学生之间的分裂，也在中共党员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

一个月后的 5 月 13 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向中国学生讲演。他称“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称“4. 12 后的宁汉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7 月，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称“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而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¹⁵

1927 年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后又与瞿秋白、李维汉共三人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12 月广州起义时任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28 年 2 月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 4 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上，与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共五人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 年 1 月回国，2 月 20 日病逝于上海。1985 年 11 月 16 日，邓颖超与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的谈话时透露：中共中央曾经准备让苏兆征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只可惜他积劳成疾，43 岁就过早逝世了，来不及实现。”

14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生活》

15 《杨尚昆回忆录》“……7 月 28 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武汉政府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

斯大林的一系列言论文章不啻于火上浇油，已经严重分歧的学生团体更加混乱了，既然中国革命的失败罪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大学生党支部不可避免地成了替罪羊。学生间原来就有的各种派别加上不久前旅莫支部遗留下来的矛盾，此刻都轰然爆发，分裂已无法遏制。

是年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争斗日趋白热，中大俄方领导层也因此而频繁变动，新老领导人都不同深度地介入了中国学生的派别，使“国内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矛盾激化再激化，“党务派”“教务派”“第三势力”“第二条路线”“观望派”“实际派”“翻译派”“工人派”山头林立，自说自话，谁都没有沟通的愿望，谁都希望能压倒别人，只有雄辩家，没有倾听者，狡辩和诡辩大行其道，同志即敌人，敌人还是敌人。党务和教务此时已截然割裂，前者迅速压倒了后者。学生不像学生，课堂不像课堂，功课就是攻奸，作业就是恶骂，其昏乱，无趣和不可理喻像极了40年后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读几位亲历者的叙述，其杂乱无章和逻辑混乱就连叙述文字本身都弄得人语塞气噎，浑浑噩噩。

这帮血气方刚，心浮气躁，自视极高，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以为这就是革命，就是斗争了。殊不知“革命的酱缸”依然还是酱缸，两千年来老祖宗们就是在不会开会，不善倾听，不屑沟通，不愿妥协，不讲逻辑的酱缸文化里滚将过来的，每每唯一的新意无非是口号不同罢了。

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红场集会上发生了中大中国留学生反斯大林的有预谋的行动。在当局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游行的队伍中突然亮出“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斯基”的标语旗。几乎就在一瞬间，不同派别的中国学生们就在列宁墓前、斯大林鼻子底下呼啸扭打起来，让正检阅游行队伍的斯大林在各国使节面前丢尽了颜面¹⁶。

16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在游行队伍走到红场入口处时，队伍里的俄国人托派分子突然从口袋里掏出布旗挥舞，呼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斯基的口号。这一挑衅当即引起拥护联共领导的其他游行学生的反

节后托洛斯基即被开除出联共中央，而中国“托派”也由此正式形成。

同月，东方大学中国班和中山大学合并。薛萼果已经毕业，和乌兰夫等留在中大做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翻译。现在他已经是教员身份，不再依靠学生微薄的生活零用补贴而是领取教员每月 100 多卢布的工资。

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一遍遍通读了《资本论》，系统研究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苏联列昂杰夫的经济理论学说，这奠定了他坚实的经济学的学术基础，无怪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各党派，各经济学流派公认的中国经济学“大学问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用过的一套俄文版《资本论》现在就存放在无锡玉祁镇的“孙冶方纪念馆”里。

萼果对中大内部混乱的宗派纷争竭力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在他看来，在无谓的权力争斗中荒废时间是荒唐不经的。他年纪尚小，才 19 岁，对每一个能够学到新知的机会都极为珍惜，但最可贵的是他的性格中既没有“权力欲”更没有“权利欲”，这种品格在中国各种党人身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二哥——国民党人薛明剑就非常不同，明剑有相当明确的政治权力诉求，无论是竞选国大代表还是立法委员，他都非常投入。你可以说他没有权利欲，但你很难说他没有权力欲。而反观孙冶方的一生，你甚至可以说他在政治权力上没有任何诉求，他的政治生涯与其说是个官员倒不如说是个学者。

12 月，另一位和他情况相似的年轻学员马员生向中大墙报《红墙》投稿《中国革命失败了，我们怎么办？》。文中说，“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走进巴黎和伦敦的图书馆埋头研读，才产生了马克思

击，于是双方发生斗殴……但一边在打，游行队伍却不停地继续走进红场，走过列宁墓，列宁墓上站着正在检阅游行队伍的斯大林和其他要人。他们自然也看到了在他们目前发生的这场斗殴……一些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都高呼拥护托洛斯基和支持游行队伍前面被围攻的俄国托派分子的口号。他们拼命大声呼喊，比俄国托派分子喊得更响……当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重要来宾的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斯大林看来就好像当众唾他一脸。”

主义；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也是在巴黎图书馆学习和研究，才完成了列宁主义。所以我们应该在国内同志牺牲头颅的时候，硬着头皮读一点书”。马的观点应该能代表薛萼果这群真正希望在莫斯科读一点书，学一点革命理论的人。

遍寻中大当年史料，包括中共和苏共两史以及台湾方面的史料，也没有找到薛萼果早期介入中共宗派争斗的记录。不幸的是，他最熟悉也是最亲密的上级、同志和兄长，他的入党介绍人董亦湘此时已是教务派的领军人物，年轻的萼果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年末，萼果从学生宿舍搬进教职员宿舍内。收入的增加加上他年轻活泼和好客的天性，中国人的乡土情结在他这里也未能免俗。周末江浙籍老同学们常常相聚在他的寝室里，由他出钱请客大家一起动手烧中国菜吃。常来的客人有俞秀松、董亦湘、蒋经国、胡士杰等，但也有非江浙人，例如左权、周达文等。他们有些人此时已经分配到陆军、炮兵、飞机、工兵等军事学院继续学习，这些学校对学生的补贴很少，生活比较艰苦。这些中大的“阔人”和军校的“穷人”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组织了一个“互助会”，“阔人”每人每月交一点“会费”，也就是打牙祭时AA制，“穷”同学白吃就行。更有人戏谑地规定了会规、会章、会费、会员制度等，薛萼果、蒋经国、董亦湘等就是出会费的“财主”，左权、伍修权、屈武等就是受助的“穷人”。

这本是这样一桩充满人情味和同志之情，对谁都没有伤害的趣事，不料竟然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萼果他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用家乡话亲亲热热地笑闹。有一天这叽叽喳喳的吴侬软语被走过窗前的中大学生公社主席王长熙听壁脚听了去。本来就因旅莫支部遗留的宿怨对俞秀松、董亦湘等不满的王立刻向校方支部局报告，声称一伙江浙籍人在薛萼果的房间集会，成立秘密组织，妄图分裂党¹⁷。

非同小可的罪名引起了非同小可的轩然大波。

17 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近代研究》1994-3-4

先是此事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汇报给了刚刚上任的校长米夫。这位是年仅 26 岁，曾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课课长的斯大林亲信，胸中墨水不多但颇有政治野心。年初 4 月他还在副校长的位置上就携自己最心爱的学生，俄语优秀的陈绍禹（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赴中国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此行不仅为米夫取得了在苏共内部有关中国问题的绝对话语权，也为王明将来在中共的政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支部局是将王长熙的小报告冠以“江浙同乡会秘密组织”之名上报给米夫的。刚刚坐上校长位置正想建功立业的米夫立即煞有介事地上报给联共中央。联共中央政治局其时正忙于与托洛斯基派的斗争，无暇顾及中国同志的内讧，对这样捕风捉影的东西也半信半疑。正好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向忠发正在莫斯科，联共当局正巴不得有个人去管管这件棘手的官司，向忠发自然成了最佳人选。

这位后来成了中共叛徒但仍被国民党处死的领导人，此刻正处在他政治生涯的巅峰。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十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这令工人出身、工运起家但文化素质相当低下的向忠发坐上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主席，赴苏代表团团长的位置。

闻听有人胆敢在党内“造反”，向忠发立刻气急败坏地冲到中大，操一口嗡嗡作响的湖北汉川土话当众宣布“凡是在党内组织反革命同乡会的，一律枪背（毙）！”¹⁸

学生们都愣住了。不但江浙籍的学生怀疑自己耳朵有问题，就是那些打小报告和跟着起哄的人也傻了眼。

向忠发的简单粗暴、偏听偏信和信口开河无异于烈火烹油。他要求米夫秘密调查“同乡会”案件。此时已经做到了中大校长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虽然对向忠发向他发号施令大为不快，却不妨碍他煞有介事地把事情捅到前身为“契卡”后称“格伯乌”的苏联

18 同上

国家政治保卫局去。1928年1月，米夫公开宣布“江浙同乡会”案件成立，格伯乌交给他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上明确说明该组织确实存在，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甚至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之分。

这件纯属东西方文化风俗差异的事情就在“煞有介事”中升格成了“事件”。

学生间原就存在的各种矛盾，原旅莫支部未曾厘清的矛盾，“党务派”和“教务派”的矛盾，成绩好与成绩不好学生之间的矛盾，学生出身和工人出身学生之间的矛盾，拿工资的“阔”教员和翻译与进军校的“穷”学生之间的矛盾，支持与反对托派学生之间的矛盾……纵横交错，盘根错节，此时来了个总爆发。中国人亢奋莫名却又人人自危，揭发，批判，叫骂，拳脚相加直至要求处死对方。

其实这些年轻人也没个什么固定的立场，今天还是批判的正方，明天就成了被批判的反方，中共一些当下或将来的著名领袖，例如张闻天、陈绍禹（王明）、俞秀松、董亦湘、左权、屈武、杨尚昆等也在其中折腾或被折腾得不亦乐乎。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则充当了导师的“整人”先锋。

在一次联共中央出面召集的调查会上，薛萼果和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萼果天性磊落，性格令他无法容忍鬼鬼祟祟的人和事，这也是他60年革命生涯分外坎坷崎岖的原因。在危及生命的巨大压力下，他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为自己辩护，初露清晰的思维，磊落的天性，坚持己见的无畏和雄辩的口才。他质问王明：

“请你说明‘江浙同乡会’是谁组织的。你说党的斗争都是有原则的，一般是对的，但江浙同乡会有什么政治意义和理论呢？没有！不是政治性质的嘛。可是领导机关不是引导争论而是在大会上宣告不同观点的都是反革命等，这是正确的吗？而且最先在墙报上说这个组织是反革命的不就是你陈绍禹吗？米夫和向忠发甚至还在你的后面。你的根据又是什么呢？现在米夫又说‘江浙同乡会’不存在了，你们怎么解释呢？”

萼果话未说完，王明一方就群起而攻，斥责萼果为“江浙同乡会”

辩护，是严重的“反党行为”。粤果坚持认为“同乡会”事件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是无聊，无谓，无趣的宗派纠纷，和革命反革命风马牛不相及。这让他遭到王明把持的“支部局”的更猛烈的打击。在联共开始大规模的清党运动中，粤果甚至受到拘捕和枪毙的威胁，罪证之一竟是“薛粤果的二哥薛明剑是无锡大资本家”¹⁹。

悲哉！从诛族，连坐到血统论，中国数不清的派、系、党、主义……在党同伐异时，最稔熟于罗列对方且屡用不爽的罪状就是它了。好在俄国人头脑还算没有热到发昏，联共中央不但否决了处理薛粤果的决定，还保留了他的党籍，只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

“江浙同乡会”事件在3个月后嘎然而止。1928年4月，米夫以“查无实据”宣告事件结束。综合格伯乌搜集的所有材料，他怎么也找不出真凭实据。检举人不是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就是气急败坏倒戈否认，反倒弄得他自己十分狼狈。向忠发对这样草草收场大为不满，但在俄国人面前他也无可奈何。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结束不等于矛盾的解决。中山大学从此以后直到1930年解散再无宁日，不仅中国学生之间斗来斗去，而且随着联共整肃之风的日益兴起，凡是沾过“江浙同乡会”边的人都被它或将要被它深深贻害。只是那几年斯大林的杀戒还没有大开，但它在中共党史上留下的两个奇怪词汇“江浙同乡会”和“二十八个半”害死了多少中共的“自己人”，后人们只能从历史的教科书上去查找了²⁰。

在中共党史上煞有介事地占有一席之地的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无非就是一场“酱缸文化”的闹剧而已。一群年轻人，特别是男性青年，因为精力过剩，争胜好强，门第和地域不同，学历和学识不同，由妒生恨就干了起来。就像一群男孩子，本来聚在一起做一个游戏，玩着玩着就翻了脸，最后非打个头破血流不算完事。可这群人毕竟又不是孩子，事完了，梁子却结下了，加上国人历来煞有介事地喜

19 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

20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欢“煞有介事”的传统，无聊的争斗就被“煞有介事”升级成了又新鲜又深奥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XXX和XXX的斗争”。尤其是这些作为将来革命、政治、阶级的领袖人物来培养的中大学生，绝大部分是工人出身²¹，与西方“精英政治”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物来形成和参与政治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因此逻辑混乱是无法避免的。让我们从一次调查会上部分工人学生的发言来看逻辑混乱和煞有介事的水平：

“工人同志打人，因为我们缺乏知识！可对于‘江浙同乡会’的存在，我们有证明文件！”

“他们有知识，来造反对派。我们工人要和他们斗争！”

“打倒这些王八蛋！我们没有知识，不会说话，来苏联是想跟大家学习，将来也可以提高地位，但来此一看，不然后了！高等的，中等的，低等的，不平等了！”

“你们也有100多元的，200多元的，你们要革穷人的命吗？”

“他们想谋害我们工人同志，不叫我们学习，他们学习得多，回国可以拿大皮包，我们给他们拿枪。”……

“江浙同乡会”无关政治，无关主义，无关阶级，无关意识形态，无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却不幸由于它的参加者很多要在将来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上扮演主角而成为事件，也成为中共史上浓重而丑陋的一笔。它是中共党史上发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它发明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检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各种中国人特有的名词和手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创了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等恶劣的先例，在中共党内创造了“宗派主义”这一概念。它也是中国当代史上历次“运动”的鼻祖，它原创的若干“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造成的伤害直到今天都无法完全治愈，它的阴影在中国直到今天都无法完全消除。

21 《蒋经国自述》湖南出版社 1988 “现在我们莫斯科大学中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九是工人。”

III. 贻害无穷的“二十八个半”

下面这一节暂时跳到 40 年后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张大有来头的大字报传达了康生同志的声音：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是好人”。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一时间“二十八个半”成了中国政坛和民间的流行词汇，虽然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因为出自一贯正确、地位几乎仅次于毛泽东和林彪的“革命元老”之口，它立刻成了一支狼牙大棒，被挥向每一个“康老”认为的政敌和潜在的危险人物。

40 年前的薛萼果，此时的孙冶方，居然也被扣上了这一口最不可能扣在他头上的黑锅——二十八个半之一。

其实“二十八个半”的故事并不遥远，它就发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紧接着“江浙同乡会”，几乎是前一幕还未落，后一幕已开场。它在当时闹起的风波其实比“江浙同乡会”小得多，但它对共产党的贻害却更为久远深重，因此这个词汇在中国的流行程度也比“江浙同乡会”大得多。

无论如何，“江浙同乡会”是个被联共和中共双双做了结论的事件，而“二十八个半”却是到今天都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很多人因它而被迫害，被关进监狱，丧失政治生命直到丧失肉体的生命。

这个有整有零的数字看似精确无比，其实从来语焉不详。仅仅这个“半”就有多种版本，一种版本是说这个“半”因为是个半大孩子，算不上一整个；另一种版本是说这个“半”是个共青团员，算不上是个整数的“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个版本是说有一位投的是弃权票，所以只能算是“半个”的；最无聊的要数这一则——“这半个是指邓小平，因为他个子矮”。至于那二十八个“整的”，也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名单，有说是张三李四的，也有说是王五赵六的，五花八门，热闹得紧，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初初听来还以为是水泊梁山聚义厅又一次排座次呢，只是排的不是“英雄”而是“狗熊”罢了。

最新的考证是，“二十八个半”乃是借用了中国古天文学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二十八星宿”的叫法，张国焘也持此说。还有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个外号，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Tag-ends）而已²²，可那“半个”就孤零零地没个着落了。

有句很直白的话叫做“冤有头债有主”，此话放在中共党史上来看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各种名头的争斗中走出的一代中共干部，真是大为不谬。从那里培养出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几乎无人没有纠缠在诸如“旅莫支部”“江浙同乡会”和“二十八个半”漩涡内的，不是在“这时”就是在“那时”，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被自己曾经的同学、同志“整”得遍体鳞伤，九死一生。

倒看中共党史，最后一次堪成系列的“自残运动”，号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史有前例的，那就是延安整风。“延整”和“文革”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真正是独一无二的，前者更是生生在《大不列颠大百科》中首创了一个“整”字，而莫斯科中大的生死纠纷又何尝不是这两次“史无前例”的前例，前例无史的“前史”？

三次之“整”，都笼罩着“康生同志”的恐怖魅影，历史这样地再再轮回，真是又可怕又宿命。

平心而论，反倒是后来的国民党党魁蒋经国，他老人家在中大各种纷争中陷得很深而受害很浅，这难道不值得去思考吗？

莫斯科中大之乱，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无数运动之一。只不过因为它发生在党的幼儿期，在党史上不能不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和中共后来的无数运动相比，无论是涉及人群的广泛性，夺人性命的数量，还是残酷无情和煞有介事的程度以及改变历史走向的力度，都实在是不足道的同样没有对错是非之分，没有经验教训之谈，没有历史反思之说。它的特殊在于，如果把党比作一个人，那就像在他的幼儿期心中就被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3年后的“延安整风”和40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非是这些种子结出的硕大无朋的恶之花

22 常州武进区政协学习与文史研究委员会《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董亦湘》2006

罢了。这是后话。

还是回到当年的莫斯科，回到沃尔洪卡大街 16 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时间已经到了 1929 年，“江浙同乡会”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上一年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和国民党的彻底决裂，急需召开以解决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重大原则问题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因严重的白色恐怖无法在国内举行，共产国际同意该会在莫斯科召开。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几位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已经牺牲，陈独秀拒绝参加，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周佛海已经脱党，来到莫斯科的虽然有以后大名鼎鼎的周恩来，瞿秋白等杰出人物，却只能由不入流的向忠发率团主事。不入流之人只能行不入流之事。抛开“成王败寇”的概念，反之之事，在中共党史中还真找不出一例。

向忠发，这位被许多党史研究者定义为流氓无产者的领导同志，对米夫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做法非常不满。虽然周恩来在中大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已经正式宣布：“江浙同乡会”确无此事，一切都到此为止。但是一切都没有“为止”。

能够操控读书人党员生杀予夺大权，对于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来说应该是个“蛮过瘾”的事情，岂能浅尝辄止？而陈绍禹王明，作为一名 24 岁年轻的中大教员，因为上年随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回国之行令他身价大增，他已经看到了自己将要成为“领袖”的前景。既是共产党的领袖，其人生哲学当然是“斗争”而非“协调”更非“妥协”。“同乡会”收场了，“右倾”“托派”“内奸”“第三势力派”……名堂还多呢，帽子还大把的呢，需要斗争的对象还有的是呢。在中国，读书人整起自己的同类来，其仇恨和残酷的程度，这里需要再加上一条煞有介事的程度，常常超过对非同类。

这种现象一直令非党人士迷惑。

实际上，王明最希望打翻在地的是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这些人。他们在国内就有实际革命经验，又是中共最早期的老党员，瞧不起赴苏时仅仅是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学生王明。但他们年龄都偏大，俄文程度差，听课吃力。而王明和萼果一样，因为年轻而接受俄语很

快，赴苏当年即在莫斯科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并迅速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俞、董、周和王明的公开冲突发生在1927年的夏季学期总结会上。蓼果是时已经和乌兰夫一起被调到东方大学做翻译了，冲突的场面他没有看见。这次冲突的结果是王明接管了支部局，全面掌握了留苏中国学生的领导权。

对这种无谓的争斗蓼果从心里感到厌恶。他一直认为中共留苏学生的内讧是无原则的，它无关中国和世界革命的路线问题、建党原则以及马列主义理论等大是大非，而仅仅是学校内部教学和党务工作中的某些细节纠纷，其中还夹杂着大量个人意气。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留苏学生中和蓼果观点相同的还有不少人，他们对于王明等动不动就对同志、同学打棍子、扣帽子的行为深恶痛绝，学生中冲突和风潮不断，以至于在1929年夏季的一次支部大会上讨论一个决议案时，赞成的只有王明、博古等二十几个人，其余的500多人都投了反对票。因为王明等人经常标榜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就是后来被讽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故事的由来。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拥护者，但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支持支部局的有90多票，另外还有30多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半个”指共青团员更经不起推敲，因为19天的总结大会参加者必须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²³。

其实这次支部大会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重要会议，其中心议题就是例行的学期总结，决议也不是什么“划时代”的重要文件，就是确认“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样的决议，不用表决也能看出它不得人心。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大批留苏学生对王明把持的支部局发泄不满的一个小小反抗。不幸国人“煞有介事”的德性是兰芝常生、风月常新的，“事情”升格成“事件”也就是一刹那，“二十八个半”就这样成了个事件。

23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在这“二十八个半”中我们既能看到不久后就为中共党首的秦邦宪、张闻天，陈昌浩以及被执政后的党誉为革命元老的吴玉章等，也能发现几十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杨尚昆。而薛粤果——孙冶方，当时是最反感王明的人之一，用“二十八个半”来区分好人坏人本身就够荒唐的了，把孙冶方也算作二十八个半就不知是张冠李戴还是指鹿为马了。

然而这个中共党史上稀奇古怪的“事件”却是个百试不爽的整人法宝，康生先生就是最善于使用它的巫师。

康生是个才子，更是个无德文人。他善道能写，最擅长“政治攀援”术和“整顿组织”伎。康生并没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但他在党内的得势却源于中大最有名的学生王明。

1931年，王明靠米夫的支持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共产国际指定为代理书记。正紧紧追随李立三反对王明的康生立刻反戈一击，全身心倒向比自己整整年轻6岁的王明。昨天还在高叫“谁反对立三同志就是反党”的他，今天就能喊出“王明万岁”，连气都不用换一口。到了延安，在发现了更有攀援价值的大树后，这位被俄国人称作“刑官”²⁴的组织部长又是肃整王明最下得了手的人，以致需要联共方面出手，老主子才算苟延活了下来。这故事，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只怕没有谁是不知道的。

此刻，他正在王明手下春风得意，不仅升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更作为王明的副手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6年他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运动，是为他至死不辍几十年的“整人”功夫初试牛刀。1937年他随王明返回延安，1938年开始他的“铲除托洛斯基匪徒”运动，同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2年春“延安整风”开始，中央设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他提出“整风——审干——肃反”公式和所谓“抢救失足者”，制造了一大批所谓“红旗党”“特务团”的案子，成为中共最惨烈的内耗之一。1966年他在“史无前例”中被

24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

主子任命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令他的“整人”癖好得到最过瘾的发挥，在近“随心所欲”之年兴头无两地处处“逾矩”到处鼓动造反、夺权和武斗，一时全国大乱。其后又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搬弄是非，聒噪生事，直到痛苦万状地死于癌症之前还念念不忘再最后“参”江青一本，而江青正是由于他的支持才得以嫁给毛泽东。

详述康生一生的恶行恶状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本书传主薛萼果——孙冶方就是因触动了这位“整人狂”最隐秘最忌讳的那根神经而在文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整整7年，究其根源竟还是要溯源到“二十八个半”。

王明在延安整风失势以后，康生立刻另寻高枝弃他而去，他整人的武器库里却多了一样利器——“二十八个半”。最典型的就是本节开头提到的“康老”恶狠狠的诅咒：“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没有一个是好人”。他是怎样挥舞这支狼牙大棒的不在本书叙述范围内，但他和王明的那段历史遗迹谁能来擦干净呢？他和王明合写的《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²⁵此时还墨迹未干，1937年他和王明一起经新疆回国，而俞秀松、周达文也在此时被“新疆王，狼种猪”军阀盛世才逮捕并解送苏联处死，董亦湘则直接在苏联伯力神秘死去，他和王明的手上除了墨迹是否还有血迹呢？延安整风对别人都那么严酷，他自己又是怎样和王明划清界线的呢？

这些中共党史上的百年之谜大概永无破解之日了。

25 王明 康生《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 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 1934（斯坦福东亚图书馆藏书）

八 一个“民生家”

先请读者原谅本书著者于经济学完全是门外汉，生生造了这么一个词“民生家”，因为苦思冥想很久，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头衔送给薛明剑先生。

他曾运作过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巨额资本，可他既不是银行家，也不是资本家；

他曾掌管过中国最大的纺织业系统，可又不像美国那些最著名的“首席执行官”们，频频地与股东悖逆，频频地跳槽并因此身价大增而成为事业家；

他投资过无数的实业，却并没有为家族和子女积累大量的财富，所以也称不得投资家；

他办理了数不清的公益事业，却并没有施粥放赈或者建立起著名的救治机构，因此也算不得慈善家；

他有一个现成的头衔“实业家”，可“实业”在他的生命中并未占到绝对的比重；

你也可以称他为教育家或者学问家，可是他既没有教出什么显赫的学生也没有做出什么深奥的学问；

许多学者把他定义为“民间社会经济学家”，可没有官方的正式文件认可，说实话，也忐忑；

他留下几十本著作，可你却不能称他为作家，因为那些都是实用技艺，通俗读物或调查报告，讲义笔记什么的；

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倒是收藏了他的大作，您猜是什么？《实地养兔法》！在大学问家眼里，简直连“雕虫小技”都算不上哦！

称他为“社会改良家”还算是比较贴切，可这个称呼还是有些意犹未尽，有些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东西没有涵盖进去。不敬地说，薛明剑实际上是一位“杂家”。

但是有一个“家”，放在薛先生头上却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那就是“民生家”。

他一生密切关注民生状态，醉心于研究民生措施，倾全力改善民生现状，他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几乎每一件事都不离“民生”这两个字。

薛明剑信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你纵观横览《薛明剑文集》和幸存的薛明剑日记，却不难发现他对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论述和心得都不多，虽说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很深的民族主义印记。但是民生主义却是贯穿他前大半生的主线，是他人生的理想，志愿和终极目标。

马克思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孔子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但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像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

孙中山则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民生主义叫做：天下为公；

薛明剑的人生理想莫过于此。

中国当年有一批像他这样的所谓“资本家”，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精神，将生产和积累当作了一种高尚的事业，他们热衷于这个事业并且对其赋予了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这一群人形成了一种势力，成为那时中国的一个阶层，被后来的执政党冠名为“民族资产阶级”。

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最著名的三个词汇：“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曾被孙中山先生传神地对译为“民有，民治，民享”。明剑读过这篇青史留名的演讲没有，找不到根据，但这个“三民”（不知能不能称作主义），却是那位著名而伟大的美国人和

他，一个既不著名又不伟大的中国人最一脉相通之处。林肯祈求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美国永不凋零，薛明剑追求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和政府在中国赶快建立。

就在小弟薛萼果在异邦的土地上接受共产主义信仰虔诚而痛苦洗礼的五年中，二哥薛明剑已经在中国江南名声鹊起。扣在萼果头上的大帽子“你二哥是个大资本家”，如果不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定位，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明剑此时确实算不上是个“大资本家”，用今天的术语说只能算这个大企业申新三厂的“CEO（首席执行官）”。从手头的资料也看不出他在申新是否有股份，但他的两位东家荣宗敬和荣德生都对他礼遇有加，言听计从倒是不争的事实。

荣氏兄弟是两位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宗敬重业务，重视交易所，德生反对交易所，重生产管理；宗敬重西洋，重新设备和新技术，德生重乡谊，重工匠，重国学；宗敬重沿海，德生重内地；宗敬喜冒险，德生性稳健……

这样两个冰火般不同的东家居然被明剑居停得平平稳稳。

他能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加以说服和平衡，以期达到最理想的经营目的。宗敬德生虽然性格各异却兄弟友爱至笃至深，宗敬见到明剑总是说：“很好很好，快些扩张，我弟不肯用的钱，从我账户里扣好了”。

两兄弟的账户都是明剑在管理，从未发生过龃龉。这在今天的家族企业界不仅仅是做不到，几乎连想象都很困难。

其实这“三驾马车”能平稳运行三十年，最重要的还不是荣氏兄弟的手足情深以及明剑高超的经营管理技巧和人际协调技巧，而是他们在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和投身公益的热忱上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一致。

除了将劳工福利，劳工自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外，他们一有余力即创办学校，建桥修路，美化环境，造福一方。

无锡的梅园和锦园均是荣氏家族出资修建。更有许许多多的小学、中学、女学、职校、工商学校、养成所、图书馆、公园等等出自

他们的资本支持和设计，建设手笔。

他们创办的“江南大学”至今沿用着德生先生所起的校名。

这些公益事业有许多部分的实际运作者是薛明剑。

他比荣氏兄弟年轻很多，在他们面前是执子侄礼的，因此一旦大家决定了要投资什么项目，申新系统也好，公益事业也好，明剑都是具体的执行者，从设计，资本运作，人事调配，征地拆迁，政府关系协调甚至细致到请谁来做校长，请谁来做教员，他都是在荣氏兄弟的鼎力支持下全力以赴去办理。

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们享受到的那种“做一件实事，福一方百姓”的乐趣，大概不是我们今天的各种企业家们能够轻易体会得到的。

这些人服务“民生”业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做这些事情极其自然，岂止自然，简直是怡然！他们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是在施舍而是在凭本能，尽本份，现本色。

明剑将这种工商业理念归结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这些人把教育和公益看得比赚钱重要得多。直白一些说，他们把“一世的清名”看得比财富要重要得多。

国人曾经受到的一般教育，是把这群人的这些行为定义为“伪善”“欺骗”和“沽名钓誉”。但是那些仔细研究过民国实业史的专业人员们，是绝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这些人所谓的“一世的清名”，实质上是他曾为地方民生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在无锡，在江南，这是一般民族资产阶级的共性，他们认为财富的来于民去于民就象日月星辰的周转，天经地义，再自然不过。在没有战乱的平稳和谐周转中，自己好了，百姓也好了，国家自然好了，人人身边都是一个“善意社会”而非“恶意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与进步。

这些人说到天下苍生时多呼“民众”“百姓”“苍生”，不称或极少称“人民”。

“新中国”有一条最著名的短语“为人民服务”，很脱俗很高雅，却难于制定标准且难于实际操作。谁去“为”？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服务项目都是些什么？怎样才算是提供服务和服务到位

了？一百个人能从一百种立场出发得出一百种解释，例子不胜枚举。

薛明剑们的“为民众做稻粮谋”，“服役民众”则比较通俗易懂且便于操作。

谁去“服役”？实业家们，事业家们；

谁是“民众”？芸芸众生者也，田丁工匠，桑妇纺娘，贩夫走卒，渔樵猎户……，一个个具体的人；

服务项目？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惟此，惟此为大；

怎样才算是服务好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社会和谐，国家进步；

怎样才算是服务的终极目标？独乐乐？当然不算！与少乐乐？不算！与人乐乐？勉强算！与众乐乐？这才能算！

薛明剑那一群人好像都不太懂“人民”这个词汇，更遑论“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名义”这样“深奥”的概念了。他们只知道让芸芸众生得温饱，受教育，才是一国一邦一地最重要的事情，至于自己身家几何，他们好像就没有这个概念。别人不敢说，薛明剑，我知道他几乎是没什么身家。

1934年，26岁的孙冶方在日本政治避难。由于他已经失去党的关系四年，对继续为党从事革命理论工作研究的理想几近绝望。不能革命救国但也不能碌碌无为呀，他写信给无锡的二哥明剑，提出请二哥借给他600元钱以投考东京帝国大学，将来也走实业救国之路。半个月后二哥的回信来了，汇款只有60元，信中婉言招呼：“力不从心，爱莫能助。”

在孙冶方年表上看到此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明剑是因为不高兴小弟造反革命才这样“抠门”。许多著述孙冶方的书籍在提到此事时也都是对这位“资本家哥哥”愤愤然，一个大企业的CEO，岂能区区600元都拿不出来？吝啬鬼、反动派罢了！

然而在明剑《五五纪年》中，民国二十三年，即四弟向二哥借款未果的1934年的记录中，真正的答案却赫然纸上“资本家”薛明剑当时竟然真个是拿不出这笔数目的钱。

那一年申新资金链濒临断裂，政府要将其收归国有。为了保住这个中国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他在京宁沪的政府，银行间奔走呼号，折冲调停，不仅如此，他连自己的薪金都投入了拯救企业的生产再循环中，能汇给四弟60元，他已经捉襟见肘。

再看一件更小的账目，这是他1923年的一篇收支表。此时明剑加盟申新已过4年，怎么也应该是“小有积蓄”了吧。这又是一篇枯燥的“数据篇”，稍有趣的在于它是一篇家用开支豆腐帐。记住了专门研究薛明剑的陈文源老师“要注意这些“流水帐”，“豆腐帐”，因为它们既是民国时期国民生活标准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探究江南民族资产阶级阶层生活方式的第一手资料”的特别关照，细细检查这个全国最大纺织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月支出明细，竟发现“……袜二双，支出0.40元”“鞋一双，支出1.20元”……的字样，直令人跌破眼镜。

薛明剑的“身家”，一斑窥豹吧。

无独有偶，中国另一位民族资本家，长江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卢作孚的资料中也有相同的“豆腐帐”。看来这群人的身家、身价是大同小异地“寒碜”。

明剑一生生养子女十二人。作为他的儿女，从生于1918年的长子禹言到生于1946年的幼子禹全，没有一个人继承过一间房屋，一个企业，一分土地，一厘钱。

长子禹言到了1949年已年满30岁，还依然是允利公司里的工薪族。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明剑由于在精力和经济上都实在顾不及照拂家庭，甚至不得不把两个女孩子禹润和禹惠托付给上海租界中的四弟孙治方抚养，以致70多年后，明剑的大女儿禹谷，是时她在流亡贵州的浙大读农业化学系，还对父母当年把两个年幼的妹妹留在敌占区颇有微词，虽然她是爸爸最宠爱和最信任的孩子。

你也可以将明剑的一无所所有解释为缘于政权更替而被褫夺了的结果，可即使没有这个原因，薛明剑身后也没有什么好继承的，除非你将他倾其一生积蓄，从二十年代始创，面向民众和小知识分子开放的“钟瑞图书馆”，“桑蚕图书馆”和“泰伯文献馆”硬要计算在内的

话。但就是这三个图书文献馆，明剑也全部捐献给了“新中国”的“苏南文物委员会”并且坚辞钱基博（钱钟书父亲）委员希望能向他付一些钱的好意。

其实薛明剑是个极爱子女的男人。在他晚年的日记里，父慈子孝的小故事可说俯拾皆是，倍极温馨。但他除了使子女个个都尽可能地接受最好的教育外，其余则只允许他们“够生存即可”。也正因如此，孩子们每一个都独立，上进，出息。我们前边已经说到，薛家可真算得上是中国一个小小的人才库呢。

“民生家”，薛明剑担得起这个称呼。

眼下中国这个“家”，那个“家”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也做了和正在做着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和事业，也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是像薛明剑这样将“民生”放在名利与身家之前，从容澹定地一路耕耘下去却从不过问收获的，还真是未见过。

“民生家”这个硬生生造出来的“家”，难道不是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最需要却最缺少，最容易做到也最难做到的“家”吗？

有三个人对明剑的一生影响至深。一位是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孙中山，一位是发动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首脑康有为，还有一位就是最早提倡实业救国的中国民族工业先驱张謇。明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

明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他反感一切窒息社会活力的制度，这从他的文集里时时可以感受到。而帝制是最集权，专权和擅权的，因此这位一生热衷改良而远离革命的人却是最早的革命拥护者。

1922年第三版《无锡指南》即将付印。明剑突发奇想，何不请孙逸仙先生题写书名以扩大影响呢？

明剑做事属于“动若脱兔”型，执行力极强，想到了就立刻要办。他致信孙中山要求题写书名的函件很快就有了回音。中山先生欣然命笔手书的“无锡指南”墨宝至今还存放在无锡的博物馆。他还为明剑主编的《沿革形势》题写了封面，原件已经毁于日本侵华的战火，但有数量繁多的影印件流落在民间。看到明剑文集中每每提到孙中山都是发自内心的敬重。

1926年5月康有为来到无锡，距他次年的去世还不足一年。

被弟子梁启超评价为“若天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篇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始”的康有为，这年3月在上海创办了“天游学院”。这位折腾了一辈子的社会改良家从来都是不甘寂寞的，以近“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重开书院讲坛，采用演讲加讨论的教学方式传授自己的思想学说，同时讲授天文地理，讴歌哥白尼的“绕日说”，牛顿的“重力吸拒说”，古今中外，兼容并蓄，唯物唯心，纵横捭阖。一时沪上热闹非凡，蔡元培、徐悲鸿、吴昌硕、刘海粟、刘绶等海内外学者名士都成了他的座上客。

既然办学院，他老人家当然要遍访教育界人士。

1926年这位名震海内外的社会改良家到无锡梅园游玩，乘兴专程到小自己一半还多的薛明剑家中拜访。

是年69岁的康有为与年仅31岁的明剑执手抵膝，彻夜长谈。临别这位“康海南”还向明剑赠送了诗文和对联，可惜这些珍贵的手札在文革中被人“借走”，再也没有归还。

是“教化民众”的共同主张和方法令这一老一少完全忘记了年龄，阅历和际遇上的差别，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康的改良主义主张对明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再一个人物，就是被新政权领袖称作“中国轻工业不能忘记”的张謇先生（领袖虽然轻易不褒扬近人，但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军人物，例如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等都曾冠以“中国XX业不能忘记的XXX”加以褒扬，可惜个个没有好下场）。

一百多年前，这位光绪年代的恩科状元，翰林院大学士就敢于“下海”，弃学就工就商。他要仿效汉末田子泰经营“无终山都邑”的模式在中国建立现代的理想社会，其基本内涵就是从实业到教育到慈善浑然一体，形成“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自治村落，建立广大劳动阶层的社会保障体系，继而“成聚，成邑，成都”，由点到面，渐成规模。

这种被史学家称为“区域经济”的思想是在中国近代极其复杂的

社会环境下，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借鉴西方特别是日本现代化过程，通过自身点滴酝酿，勇敢探索，卓绝创造，艰苦实践，精心积累而成的。

“区域经济”，这一思维在中国历史上是独特的，虽然在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愈来愈多元化，经济上逐步和世界一体化，但她终究还是农业国家，“区域经济”思想至今仍能给人以启示，至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中可以供制定政策的人们借鉴。

1920年由张謇发起在江苏南通成立“苏社”，旨在“专谋自治事业”，即苏省人管江苏事。苏社宣言疾呼“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于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这年25岁的明剑随荣德生先生参加了苏社成立大会，1924年又随德生出席苏社在扬州召集的第五次年会。

一年一度的苏社大会应该算是最早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了吧。

荣氏兄弟和薛明剑在申新系统大力推行劳工福利和劳工自治，以及明剑后来在家乡无锡推行乡村自治，不能不说是受到张謇“无终山都邑”式理想社会的影响。从实业到教育到公益慈善，再使得到温饱受过教育的人来充实实业，以这样良性的循环来营造一个和谐发展的地方社会，这就是明剑前半生走过的一条又简单又明晰的路。

明剑是一位行动家，且行动的速度就像前面用过的一个形容词“动若脱兔”。让我们来看看20—30年代明剑除了管理申新之外还做了多少事情：

任江苏实业厅咨议（1922）；

组建明剑工业社（1923）；

任红十字会无锡总务主任（1924）；

任无锡电网防务首脑以避军阀沪锡起衅造成的民众困苦（1925）；

为美国费城博览会征集展品（1926）；

参加上海实业家赴日考察团并作《东瀛考察记》，演讲日本教育

及纺织业情况（1926）；

发起成立蚕业图书馆，征集各类书刊 5 千多种，向全体民众开放（1927）；

任市政厅委员兼工商局长（1927）；

任县建设顾问（1927）；

创办女子商店，创办我华工业社种植除虫菊生产蚊香（1928）；

创办无锡养鸡场（1929）；

协助荣德生开浚梁溪河并任监督（1929）；

主持无锡国货展览会（1929）；

筹建时疫医院和戒烟医院（1930）；

起草全县农业设计计划，任无锡蚕业公会临时主席（1931）；

发起成立无锡各界国难自救会（1931）；

创办无锡广播电台宣传抗日（1932）；

兼任省立教育学院教授（1933）；

随荣德生发起修建环湖马路，接洽计划一切。兼任申新高小校长（1934）；

任全国国货工厂联合会理事长（1935）；

以江苏工商业界候补代表得票之冠竞选国大代表成功，两年后递补为正式代表（1936-1938）；

任国民政府抗日第六战区办事处处长（1937）；

创建钟瑞图书馆（1946）创建和泰伯文献馆（1947）；

.....

每一件事情明剑都做得兴致勃勃，虎虎有生气。

这里没有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业，也没有诡异奇特的情节，更没有红粉佳人的八卦，每件事都只和两个字有关，那就是“民生”。

明剑每每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愁民众所愁，乐民众所乐，急民众所急，办民众所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士大夫情怀从未因为他的“弃学就工”而真正离他而去。

1916 年江阴诸军阀兵变，与江苏都督冯国璋混战。冯都督大兵来锡，败于石幢，继而退守无锡城附郭，致百姓被乱兵骚扰。明剑不

顾个人安危，与蒋哲卿等人在兵燹中发起组织红十字会无锡分会并任救护队长。他们在车站，路边，桥下昼夜轮值抢救受伤人员，备极辛劳，直到战事结束。

1917年他和妻子李钟瑞一起在无锡各乡讲演改良桑蚕并组织中华职业教育会培训新型桑农；1919年在他任场长的无锡体育场设宣讲部，定期向市民宣讲卫生、体育之常识；和钟瑞同赴宜兴、溧阳、扬州、丹徒等地宣讲改良桑蚕并发行《江苏省立育蚕实验所汇刊》。由于明剑伉俪一生热爱并服务于棉蚕事业，且均与农田有关，特意将他们的次子命名为禹甸（“甸”是古汉语中农田的意思）以明志。

1922年明剑主持新建的申三投产，他同时受聘江苏实业厅咨议。这一年他既要继续编辑由代大总统黎元洪题写书名的《无锡指南》，又为贫苦大众编成了《废物利用》一书，教他们怎样利用废弃之物制作居家用品。下一年他既辑《锡湖揽胜》一书，又发明“不发霉糗糊”并创建“明剑工业社”来生产，大受各学校欢迎。

1924年直奉军阀开战直逼无锡，明剑令申三停工，组织保卫团日夜轮值保护工厂和工人。战乱中无锡北城饱受抢劫之苦，明剑受各公团之托挺身而出，担任发电和电网防务总指挥，尽量减少民众和企业的损失；战后又推举为农会调查员，调查战时损失之蚕种，稻种以备政府救济物资投放的准确。

1927年他被任命为无锡市政厅委员兼工商局长，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这更有利于他“保护全邑生产元气”。此时妻子钟瑞已被任命为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由于两人都深感女子因无技能而备受社会忽视之苦，遂创办女子商店，创办“我华工业社”，培训妇女种植除虫菊制造蚊香，创办无锡养鸡场为妇女创造就业机会。1929年他受聘上海女青年会顾问。解放妇女的生产力一直是他十分热衷解决的社会问题。

他还兼任劳农学院农村工艺讲师；他协助荣德生开浚梁溪河并任工程总监；他兴修芙蓉圩水利工程，不但消除水患之虞，还使四乡民众在四十年代就用上了电灯！

彼时乡民能够用上电灯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本书著者 1968

年到湖北荆门插队，在如豆的煤油灯下看书写日记，眉眼常常被熏得乌黑甚至额发被燎着的情景还宛如昨日。荆门已属长江流域富庶地区尚且直到1980年代才算“四乡民众”用上电灯，这比明剑的无锡乡村晚了整整40年；

他编写《民众工艺》《手工艺》《农村副业》以教化最下层民众；蚕丝滞销的年份，他写书教桑农养兔，养蛙，种菇补救蚕丝业的失败；蚕丝畅销的年份，他和妻子到处讲演怎样改良桑蚕以使桑农获得更大的利益；他赴沪调解邮差罢工，赴省呼求政府阻止农村经济的崩溃；赴中央行政院吁请通过《救济纺织案》。

.....

这是个不因小善而不为，也不因大善而不为者，小善大善都“善”在民生。

这样定义“民生家”应该没有什么大错。

薛明剑，这个行动者和他的小弟正在异国他乡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孙冶方，两兄弟走的人生路看上去是如此的不同。

但是且慢下断语，让我们看下去。

九 孤独的思想者

现在掉转笔头，接着叙述本书另一位传主在异邦土地上正在经历的、痛苦如脱胎换骨般的信仰洗礼。

1928年是薛萼果来到苏联的第四个年头。

8月，正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瞿秋白、周恩来等经过无数艰难的调查，取证、谈话、协调和妥协，终于与苏方的“专案组”——“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达成共识，否定了所谓“同乡会反革命组织”的存在并在全校师生大会正式宣布此事到此为止。

“江浙同乡会”虽然被否定了，但“同乡会余孽”的帽子还在王明手上，薛萼果不但和俞秀松，董亦湘们最接近，还和自己严重对立，无论如何“同乡会”被人听壁脚是发生在这个小家伙的寝室，从“斗争哲学”的角度看，他被判定有“政治问题”无可非议，至于是什么样的“政治问题”，这位“斗争哲学家”是不发愁没有名头的，诸如此人的亲哥哥是江南的大资本家啦，对支部局态度暧昧，政治面目不清啦等等，不愁“整”不垮他。

人一旦操上“斗争哲学”，当他面对邻居同志，弟兄爹娘，甚至亲密爱人时都会“斗”意陡生。“斗”意既起，恶性预期以及疑罪从有是必然结果。臆想和论断他人是随意的，自己“满眼的梁”看到的必是别人“满目的刺”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直至你死我活，胜利者从头再来过。难怪鲁迅先生把“中国”这本书拿起来，正看反看颠看倒看，才从字缝里看出两个字“吃人”，是为“斗争哲学”（其实更贴切应该是“争斗哲学”）的通俗叫法。

薛萼果——孙冶方一生都在面对“斗争哲学”，此时“托派”“右

1 摘自《圣经 新约》马太福音 7:3

倾”“余孽”“内奸”……都是顺手拈来，就是先给你薛蓁果戴上一顶“莫须有”又能怎样？谁让你最年轻又最不听话？

王明决定先拿这个还不成熟的小家伙开刀。

蓁果已经不再有一张清秀的娃娃脸，原来就比一般汉民族人轮廓清晰的脸颊如今更加棱角分明，两道浓黑的剑眉下是一双深凹的星目，高耸挺直的鼻梁不像俄国人的大鼻子而是有一种希腊的古典美，只有不高的身材和时时紧抿的双唇还保持着中国江南的灵秀。他沉默了下来，现在用的最多的不再是嘴巴而是大脑。经过这样一场场疾风暴雨，他冷静了许多，成熟了许多，也长大了许多。他20岁了。

就戴着这项“莫须有”的帽子，蓁果在中大继续学习了下去。许多过去的朋友、同乡和他疏远了，他们心有余悸，不知道和有“政治问题”的人交谈又会惹来多大的麻烦。蓁果成了不可接触的“贱人”。

风波后的安静，反倒使他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他的俄语愈来愈熟练，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社会发展史、联共党史、西方革命史等也学得愈来愈深入。除此之外他还涉猎财政史、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预算学、公共行政学、历史学、社会学……。他读完了俄文版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原版的《列宁文集》和《斯大林文选》。蓁果觉得和这些知识恋爱已经足够幸福，从未想过自己的哥哥们在他这样的年纪上都已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他常常独自微笑着站在布满浮雕，高大宽长的西班牙式走廊上，望着熙来攘往却不敢和他交谈的同学；也常常一个人沿着学校白桦林中那条悠长的小路走到一片小湖岸边，抱膝坐下去沉思。有时他一整天都呆在图书馆里苦读，只是偶尔到马列学院找董亦湘、俞秀松聊聊天。在极端的孤立和孤独中，他慢慢地发现了自我，慢慢地学会了“慎独”，学会了“省身”，体验了做为一个革命者身处逆境时的坦荡心境。这让他又惊又喜。

“一个自己也难以解放自己的人，怎么能去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呢？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如果自身都不能解放，怎么去胜任肩负的使命呢？”这是年轻的薛蓁果——孙冶方在那些日子里反反复复思考的命题。他已经熟悉了孤独和孤独地思考。

除了自己人闹剧式的争斗，他在苏联感受到的还是有很多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给普罗大众带来的美好现实（从另一个角度讲，俄国人展现给这批革命种子人看的也必然是它最好的一面，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日瓦戈医生眼中里的俄罗斯）。薛萼果没有因为前者而动摇信仰，相反更加意识到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需要一个坚强而团结的先锋组织共产党来领导人民走向她，而他是这个先锋组织的一员，在入党的那一天就随时准备为了自己所信仰的而祭献生命，那么孤独孤立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 20 岁的男子越来越坚强，在他往后 5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这种习惯孤独，甚至享受孤独的性格使他看淡了多少大起大落，大荣大辱，跨过了多少大风大浪，生生死死。

人们播种下一种行动将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下一种习惯将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下一种性格将收获一种命运。薛萼果-孙冶方，这个年轻中国人的行动、习惯、性格、命运的轨迹在莫斯科就已经形成且定格了。共产国际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员仅和这位年轻人见过一面就立刻判定他不能做秘密工作²，这是一个喜怒哀乐都无法隐藏的典型外向型人格的人，加上少小年纪就遭遇如此的冤屈和打击，这奠定了他终其一生都不惧挑战甚至渴望挑战的叛逆性格。

也许正因为萼果具有这样的性格，他非常地热爱生活，懂得生活而且会生活。出生在中国江南士大夫之风啸傲的太湖之滨，萼果从娘胎里就带出来的对文学和艺术的敏感和热情在俄罗斯这个文学和艺术的大国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课余他去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2（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中大秘书处曾在 1927 年秋使我们全体在学校里忍受了神乎其神的一周。我相信此举是由格别乌操纵的。整整一周，我们全都受到详尽的体格测量，各种数据全都做了记录，装进有我们个人小传和其他有关资料的档案袋。他们测量我们的身高，头部大小，眼睛，鼻子和耳朵的相对位置，颈长，头发的颜色和形状。他们还记录了我們所有生理上的任何可供识别的特征，例如：伤疤，疣，痣……这使我们迷惑不解，引起多数学生的愤慨和怀疑……（但）只好屈从……非共产党学生对此尤为愤慨，用尽各种刻毒话加以咒骂……俄国人是不是想用这种记录追踪我们一辈子？……我们已经把全部身心都交给俄国人了”。薛萼果的被“考察”很可能就在此时。

去听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乐，去读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和托尔斯泰史诗般的小说。他遍读高尔基的每一篇著作，遍看莫斯科的每一家博物馆，遍寻这座东正教名城的每一处历史遗迹。他从来就不认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除了舞刀弄剑之外就应该不具一技，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和革命并不冲突，它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薛萼果的理想不是要消灭它们而是要使全人类，不分穷人富人，不分种族阶级都能接触和分享它们，从中了解真善美，追求真善美，创造真善美，从而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为此他愿意付出生命。

在贝多芬伟大的《命运》不朽的叩门声中，萼果完完全全地平静了下来，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理想，信仰，革命和生命。

他一刻也没有浪费地攫取着知识。他学会了苏联学者比留切夫的时间“分割法则”，把每天的24小时分割成1440分钟，按分钟安排和使用有限的时间。孤立和孤独使他能够完全自主地支配这些时间段。他心中的目标非常清楚，在中大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他要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学到尽可能多的革命理论，学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学到调查研究的方法，学到改革现状的方法，回到祖国后用这些理论和学说去实践，去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建立一个更加理想，像他们允许他看到的苏联这样的新中国。

王明还是不想放过薛萼果。

汉民族是个记忆力极强的民族，这原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和另一个民族性对他人往往不假思索就能迅速产生恶感，继而是恶性预期，最后是仇恨结合起来，事情就不大妙了。所谓“仇恨”是一种很容易产生又很难消弭的剧烈情感，所以汉民族人常常容易“结梁子”，从紫禁城“军机”“户部”里的老爷大人到胡同市井中的百姓泼皮，概莫能外。这也是中国酱缸文化、文化酱缸中一颗天生的大酵母。

王明是个典例，只是这一次更加无聊了，他以支部局的名义先将一名“托派”学生和一名“布哈林右派”学生安排住进萼果的寝室。虽然萼果坚持“慎独”，埋头学习，绝少交谈，还是被扣上“不向支部局打小报告”“知情不报”“包庇反革命”等等吓得死人的罪名。

粤果对这种卑鄙猥琐之术厌恶透了，他的处境也越来越险恶。雪上加霜的是联共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始清党，所有中共党员一律转为联共候补党员，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只因不满这样的歧视，将候补党员党证当众撕毁而神秘失踪，至今不知所终。另一名在高压下承认自己是托派的中国学生在交出一份多达百人的所谓“托派”名单后在教室上吊自戕³。

事情闹到这一步，大多数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年轻的粤果没有慌张，少时二哥明剑讲过的吕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故事使他越发镇定了。你斗你的，我学我的，你越是气急败坏，我越是坦坦荡荡，斗争也罢，争斗也罢，小人本就常戚戚，我改变不了你，但我可以在心灵上远离这种妖氛。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紊乱，粤果铁打的学习和生活计划从未被打乱，他照常去听课，照常去做课堂翻译，照常去向后来入学的同学讲课，照常去辅导中国学生俄文。后来邓小平称比自己还小4岁的孙冶方为“老师”，其出处就在此时1926年由法国旅欧支部转道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邓小平，被小老师薛粤果辅导过俄文。几十年后冶方告诉外孙沙沙，这位矮小、活泼的学生在中大有两个绰号，一个叫做“小钢炮”，因为他一口四川话又快又响，干脆利索；还有一个就不太好听了“墙头草”，这是因为他在中大异说杂陈的党派纷争中始终没有坚定地支持或者站在哪一方，你可以说他“政治智慧”也可以说他“机会主义”，可也是中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幸事。

1927—1929年联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王明把持的支部局很想趁机把薛粤果这颗嚼不烂砸不扁的铜豌豆清掉，要是能从肉体上消灭当然更好。联共清党一开始，他们马上将粤果定为“托派”，“阶级异己份子”，坚决要求把他开除出党并要求处决他。忍无可忍的薛粤果此时才向联共中央做了明确而坚决的的申诉，结果联共中央只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处分，幸运的他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保住了宝贵的党籍。真是“说你有事你就有事，没事也是事；说你没事你就没事，

3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有事也没事”。几十年后的薛萼果——孙冶方谈到这段历史还仰天大笑说“那可真是心满意足啊！”

本书写到这里已经是惊栗不已。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曾经出现过的术语，手段，伎俩，语境等等，居然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之“旅莫支部”，“江浙同乡会”，“二十八个半”，“支部局”，“清党”……中就有了，那一种对人的极度蔑视，对人格的任意践踏，对人性的褻渎，对生命的不尊重早就在党规党律中并发扬光大快一个世纪了。

人们，你们可还记得三十多年前的“一介书生”姚文元先生面对主子最“娇嗔”的

天问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⁴

你们可还记得“延整”后仅仅因为要节约子弹而被斩首并分尸的另一介书生王实味？

本书著者永远难忘我那位 14 岁就参加“解放军”，1960 年代跟着戎地屯垦大将军王震从北大荒粮海转战海南岛胶林的姨父，在“文革”中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自家门口被活活枪毙掉，身上留下密密十六个弹洞，至今未能找到尸骨。

这些识文断字的族人为什么总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比任何人都迅速地丢开“识文断字”的初始目的，所谓“仁义礼智信”而疯狂地践踏人性，人格和生命的尊严？难道那个“初始”，那个文化的基因和人性，人格，人的尊严不是一回事吗？是什么样的邪恶才能释放人类最残暴，最兽性的，抑或是人类本能的一面？如果将来有一天当这样的邪恶又要发生时，有什么力量能束缚，制约或至少减轻它吗？

就在萼果最孤独的日子里，一位杰出的女性注意到了这个沉静坚强的年轻人。她不是他的情人，更不是他的爱人，但他们的友谊就

4 吕相友《中国大审判 姚文元咬文嚼字的抵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1

从这时开始维持了整整半个世纪，只有死神才将他们分开了。她就是中共党史上的传奇女性陈修良。这是一位大蓼果一岁的小姐姐，却是比他晚一年进入中大的学妹。是年 21 岁的陈修良已经是一位“老”革命，1907 年她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富裕的读书人家庭，和姐姐陈维真一道是宁波最早期的共青团员。她善写作，长书法，来苏前做过向警予的秘书并由警予介绍转为共产党员。

1927 年末修良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是那一届赴苏学生主席团成员。陈修良来到中大正是“江浙同乡会”事件闹得最乌烟瘴气的时候，弄得新来的同学也人心惶惶。她凭借着自己“老革命”和新生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在联共中央，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团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找她调查的过程中，坚决否认有新生加入什么“同乡会”，进而还大胆推测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东西。周恩来几次找她谈话，她都坚持这一观点，以至周多年以后还记得这个大胆的女孩，赞扬她不畏权威敢于坚持真理。同样是江浙籍的她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万幸的是由于她到莫斯科到得晚才没有被卷入。

修良很快就注意到了眉清目秀、聪慧勇敢的小同乡薛蓼果。她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只影单地独往独来，脸上不是落寞惆怅而是坚韧镇定。她知道他年龄小，俄文好，知识渊博，爱好广泛，洁身自好。每次迎面碰上他，俩人都会友好地笑一笑。修良几次开口问他这样孤独究竟是为了什么，蓼果都一笑置之，避而不谈，他已经学会了谨慎⁵。

入学虽晚，修良回国却比冶方早三个月。1930 年 6 月，随着联共“清党”的愈演愈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清党”也进入高潮。时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陆定一告诫她不要去中大参加清党，否则一定会被开除党籍。犹豫再三修良决定回国。7 月她随中共代表团从莫斯科出发，经海参崴、绥芬河、大连回到上海。七年后是她和丈夫沙文汉帮助因被捕仅仅七天就被党拒于门外达六年之久的薛蓼果-孙冶方恢复了组织关系；四十七年后是

5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薛萼果——孙冶方为曾任浙江省委书记和浙江大学校长却屈死于“反右斗争”的沙文汉高呼平反。

他们之间的友谊是需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叙述的。

陈修良在孙冶方去世后写出《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孙冶方年谱》两书，留给后人一份精神遗产，也是本书的依据。

1928、1929 两年就在 800 多个被萼果分割为 1440 分钟的日子里飞逝着过去了。22 岁的萼果已经成长为具有独立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健全的心智的学者型革命者，如果说去国时他还是一只雏燕，那么现在他已经是一只成熟的海燕，一只孤独而骄傲的海燕，狂风暴雨乌云浊浪都经历了，甚至生死都经历了，他变得冷静，凌厉而自信。到了该回自己的祖国去的时候了，那里有更深不可测的海，更惊天骇地的暴风雨，更浓的乌云和更汹涌的浊浪，但这难道不是一只海燕最渴望的吗？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十 敏思、敏言、敏记的行动者

和小弟相比，明剑活得要率性得多。

他的所言所行都见于当时的社会改善、改造、改良、改革、但绝不革命，反对暴政也反对暴民。他认为民众绝非天生的暴民，但帝制或军阀却会产生暴政，有暴政必生暴民，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是也。中国只有“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选贤与能，消除封建，发展工业，改善民生，充实国力”¹。因此他在少年时就反对帝制，青年时参加辛亥革命，成年后极力提倡“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立志在“政”与“民”之间做桥梁，让政也好民也好，所谓“政通人和”，这样中国就好了。

他远离“主义”，也不埋头于各种“理论”，他情愿站起来行动，在行动中思考，而不愿坐下来苦思冥想，想好了再干。他是个边行动边思考，再行动再思考的行动者，他敏于思也敏于言，更可贵的是他还敏于记。明剑在世八十五年，日记记了六十年，一共将近一百本。除毁于日军侵华年代，被丢失的重庆年代和被查抄无法索回的文革年代的几十本，还有后来被一位号称要研究薛明剑的人“借”走了若干本，如今只剩下26本，几百万字的日记文字嘎然而止于1966年8月23日。除此之外他一生撰文无数，从再版17次的《无锡指南》直到说明为儿女取名用意的短文，无不认认真真地记，平平实地写。他说“文之于人犹帆之于舟也。舟无帆，行不速，人无文，学不显”。

1 《薛明剑文集 民族工业之历史任务 中国问题的所在》原载《江苏民报》1947.11.11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国家的必要条件就是政治民主化，工业现代化，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选贤与能，消除封建的余毒有了工业的发展，才能改善国民的生活，城市国家的力量。”

明剑的思维范围极其广泛，其思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羁绊的，虽然在逻辑的严谨和体系的完整上远远不能和他的小弟孙冶方相比，但他的天性、才能、激情和精力都由于他敏思敏言和敏记的特质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前面我曾形容过他行动的速度可谓是“动若脱兔”，而这是需要以“静如处子”般的思维做基础的。明剑是有思就记，就言，言了就做，做了再记的人。这一点又是他与中国旧式知识分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美德标准不太相符之处。

明剑敏于思也敏于记在无锡近代史上是有名的。读他各时期的文章、杂感、诗词歌赋、日记、随笔，每每有会心之乐。

他骂民国“实际无一不是专制”²，又哀同胞不服于任何政权皆因“习惯之难改”³；

他忿中华素有的重男轻女之习，又申饬高唱“独身主义”“恋爱离婚皆自由”的女权主义者⁴；

他思中医之存在是否合理，又不满西医的蛮横霸道⁵；

2 《薛明剑文集 杂感五》——“今日名为民国，实际无一不是专制。惜时号称专制，孟子尚有‘民之所好而好之，民之所恶而恶之’之说。由今较昔，相去不知若何耶！”

3 《薛明剑文集 杂感六》——“秦废井田，人民怨之；新莽又制井田，人民亦怨之。赵武灵王服胡服，人民不从；魏孝文帝除胡服，人民亦不从。清初剃发，人民不服；光复后明令剪发，迄今从者祇半。甚矣，习惯之难改，有如此也！”

4 《薛明剑文集 杂感一》——“我国古时，素有重男轻女之习。凡拥皋比享大禄者，莫不粉白黛绿罗列闺房，以逞一己之兽欲，绝不顾女子之自由更遑论人道主义。甚有品评女子之容貌举止，而定其值之多少，以求鬻者，直视女子为工场之出品，商店之货物，是诚大不可也。”“今日自命‘文明’之女子，高唱‘独身主义’‘自由恋爱’，往往趋于极端，不特无裨于实际，转足以阻碍女子之发展，是亦大不可也。”“天下之事，往往不得其平。吾恨无力，不能使天下男女之心同趋于平顺之途也。”

5 《薛明剑文集 杂感八》——“西医谓挑痧不能治病也，连日尝见发痧者，每见一挑而痊愈者。何我国挑痧方法传世已久而未见消灭也。其中或有一理西医未所经研究者，亦未可知也。”

他比较私塾和学校的优劣⁶，思考发展和生态的平衡⁷；

他投身实业，关注工农业，也预见旅游业将成为无锡的大产业，要早下手⁸；

见丧家衣衾棺椁华丽诵经礼忏他要申饬，谓“无锡民风纯朴，近渐染苏申繁华之习，日趋奢靡。长此以往，不知伊于胡底！”⁹，令人莞尔；

睹女子出嫁时藉炫耀妆奁争一时之场面他要批评，曰“证之盗不入五女之家重可信矣”¹⁰，让人发笑；

看女界“一，二不肖”每每奇装怪服招摇过市，他直接呈请国府内政部出面取缔，部长薛子良还真就乖乖地复了函，恳请庶民薛明剑“容俟正式服制颁布后，即行处理”¹¹。

-
- 6 《薛明剑文集 道尔顿教育》——“溯自私塾而变成学校，普通以一人同时教一班，可谓尽经济与便利之极。然学生一入学，随班上课，受同级之牵制，不能自由发展个性和知能，实为学校之一大缺点。最近美国道尔顿中学，就以前私塾式不经济个别教学法，改为自动式之自由发展教学法，可为近世最完整之教育法，愿邑人起而研究之。”
 - 7 《薛明剑文集 向无锡县第三次行政会议递交的三项提案》——“明令禁止沿湖开掘山石，免损风景，一面另择偏僻山地准许开采，以维矿工生活。”
 - 8 《薛明剑文集 锡湖览胜》
 - 9 《薛明剑文集 改良礼俗之商榷》——“无锡民风，素称淳朴。近十年来，渐染苏，申繁华之习，日趋奢靡。每逢婚嫁丧庆之事，辄不量家之有无，极尽铺张，以炫耀于一时，彼此相仿，相习成风……（明剑）曾有《改良婚制》（及）《改良婚制私议》（见诸报端）……益感夫外强中干之社会，宜示以黜奢崇俭之方针。”“薛明剑为新式婚嫁丧庆方法的详细规划（略）”
 - 10 《薛明剑文集 敬告妇女界：应负纠正婚嫁之责》——“……甚或不惜以半生血汗之资，用助嫁奁之需，籍争一时之场面，博瞬息之虚荣。而为女者，复怙恩其母，争多论寡，嫌好道坏，证之盗不入五女之家，重可信矣。”
 - 11 《薛明剑文集 呈请内务部：从速规定妇女服装》——“呈为请求规定妇女服装，以壮观瞻，而为风化事。窃维近来女界，每有一二不肖，喜奇装怪服，招摇过市，恬为不怪。不特有关女子人格，且损国家观瞻，应请钧部从速订定女界服装通令全国执行。在钧部未经规定前，亦应严令全国，禁止奇服怪装，违者从严取缔，籍维风化，实所企禱。”原载《锡报》《新无锡》1928.7.16。内务部长薛子良复函“迳复者：来呈已悉。查各种服装，业经本部呈准国民政府组织礼制服装审定委员会专事议定。所呈各节，切中时弊，至甚嘉许。已将原呈提交该会参考矣。至禁止奇服怪装一呈，容俟正式服制颁布后，即行办理。”原载《锡报》1928.7.22

真是乐死人！

坦率地讲明剑的文章算不上文笔优美，行文流畅，也绝无“体统”之计，常常是信马由缰，想到哪写到哪。计算这四大本《薛明剑文集》，加上他百十本日记，加上他在锡沪宁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还有因种种原因不便收入文集的他各时期参政议政的提案，“条陈”，“上书”，发言，杂感，最后还得加上他老人家在新时代各种“运动”中撰写的名目繁多的坦白、交代、检讨、认罪，此生他写字足有两千万是绝无问题的。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看来“爱动笔”是无锡人的又一光荣传统。

明剑是个很典型的“中庸”平实者，做人做文都心平气和，从容不迫。读他的文章你是闻不到火药味的，至多惶惶然，忿忿然而已。四卷本《文集》最激烈的一篇题目也就是《经济上的除暴安良，根据良心反对到底》¹²，是他作为立法委员对于另一名立委刘不同先生的“提议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不同意见。

明剑写文章，上书行政院置喙国家总预算¹³到为儿女起名、为父母作诔，从起草全邑发展计划书¹⁴到为农夫村妇作《养鹤歌》¹⁵，从为名人如黎元洪，黄兴，薛福成，秦邦宪编写年表事略¹⁶到为女工宿舍

12 《薛明剑文集 经济上的除良安暴，根据良心反对到底》——“本人坚决拥护对泛滥在投机方面以获取暴利为目的的游资和豪门独占资本收取重税。临时财产税的目标应对准豪门资本和游资，而不是拿小贫和生产资本来打屁股。如照刘案，中小型工厂将逐渐倒闭，接着是大批工人失业，生产崩溃。有钱的该多出钱，豪门一定要多出！有钱出钱这原则是不错的，但同样是钱要有个区别——用于生产资本的钱已在为国家社会服务，所以不为国家社会服务的钱——投机资本要尽量地多出。有人因为我反对这提案主张罢免我。行宪才开始，大家便能认真注意权力的运用，这是好事情。但我还是要坚持我认为对的主张，即使遭罢免，我也将引为我的光荣。”原载《江苏民报》1948.6.24

13 《薛明剑文集 对国家总预算之感想》原载《江苏民报》1948.1.15

14 《薛明剑文集 无锡改革之刍议——开辟商埠问题》

15 《薛明剑文集 养鹤歌》

16 《薛明剑文集 黎元洪年谱 秦邦宪烈士事略 黄兴年谱成稿》、《薛明剑文集续编 薛福成年谱(卷三)》

订立舍规¹⁷，从撰写荣丈昆仲创业史¹⁸到为农户养鹌场编写标语¹⁹，他无不专注地思，用心地写，也因此而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正、草、隶、篆、行样样来得。

明剑的文章多用文言文，所以今人若不细品会觉得他的文章没有味道，其实不然。举个例子给你看并依本书著者的汉语水平译成白话：

“佛教以仁道普及天下万物为旨，所以信佛者往往菜食，以动物为荤，以植物为素。其实既然都有生命两者就是同一物，无所谓荤素也。我以为，以正当技艺得来之物皆为素，反之或造孽金钱换来之物，虽属植物亦荤也。希望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再论荤素，再言佛旨不迟。”²⁰

多么活泼有趣。

再举个列子。有一篇他的短文题为“读《行乐秘术》有感”。怎么？薛老先生也好这一口？且慢，你看他怎么说：

“淡虚名，薄浮利，跳出得失场就是欢乐之境……非欢乐之境拒我不得入，实我之不欲赴也……余有生以来未知忧患悲愁之为何事……吾谓吾人当以生产为行乐，服务为消遣，做到行乐不忘生产，生产既是行乐，永远循环，岂不妙哉？”²¹

哈哈，迁是迁了一点，可你不觉得这些话有多么可爱吗？今天有多少“心灵鸡汤”不是还在说着同样的话吗？

1923年明剑作文《无锡改进之刍议》。他感叹无锡丰饶如许，美丽如许，但市政，实业，教育却无一不在停顿之中。他提出辟商埠，拆城墙，筑道路，浚水道，增名胜，建公署，扩教育，兴实业，利交通，增娱乐这十大繁荣无锡的建议，呼吁邑人与自己一道“急起图

17 《薛明剑文集 申新第三纺织公司劳工自治区概况——（二）女子区宿舍》

18 《薛明剑文集 实业家荣丈昆仲创业史》

19 《薛明剑文集 鹌室标语》

20 《薛明剑文集 杂感四》

21 《薛明剑文集 读〈行乐秘术〉有感》

之”并专门另撰一文《吾邑开辟商埠之私议》，专事论述经费解决之道，还画出流程图，详解官家和民众怎样配合来成此大业，怎样预算，怎样用人，怎样组织，怎样监督。这些文章被刊载于邑中各报，他和荣氏兄弟后来在无锡的许多作为都是围绕着这十大项来措施的。

明剑还有一个特点，他对数目字特别有兴趣，特别敏感。我看他硕果仅存的28本日记，总的感觉是数字占去了一半。《薛明剑文集》收集了一份民国12年即1923年他的个人收支统计表，收入只有“申薪”和“编辑费”，支出真是五花八门，从“宗敬女嫁”的随喜到“布鞋两双”的消费，笔笔清爽。²²

专门研究荣氏家族和薛明剑的陈文源老师一再提醒要注意这些数字，它们是很难得的民国经济史数据。如果你觉得这种豆腐帐很乏味，你也可以去看他的图表啊，大到中国历年工业生产额，贸易额，小到每支纱锭的产量记录，每个工人的工资表，就没有薛明剑不感兴趣的数字。这是个用数字说话的人，他的大脑基本是理工型的。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数字真够让人替他老人家后怕的“旧社会”的数目字到了“新中国”往往就成了“变天帐”，在这个可怕名词面前你是没理好讲的。薛明剑能逃过这一劫，大半还是因为他沾了身处上海这个中国文明化程度最高城市的光，搁在东北，光是这些数字也能要了他的老命。

又扯远了。

在兴建实业的过程中明剑开始接触经济学基本理论。1932年他在《人报》发表《金融与实业》一文，从美孚、德士古、亚细亚三大火油（石油）公司结合成托拉斯垄断火油价格谈起，惜叹中国因为没有自己的石油产业而在托拉斯之巨灵掌下被任意搓揉，沦为经济奴隶。继而嘲讽“穷得眼都花了”的政府收购招商局是“骤然做了一笔便宜买卖，发了一笔大财”，“可是观夫历来无论官办，商办的‘一股

22 《薛明剑文集 民国十二年收支统计表》

脑、一团糟’的现象，不晓得这有限的资产能供给官僚们若干时的挥霍？”²³

写到这里，正赶上荣德生先生的孙辈荣智健在香港退出中信集团，不禁恻然。其实他的祖父辈们早就知道“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过，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1934年荣伟仁的一封信）”。正是这种坚持使荣家很少有所谓政商烦恼。中信几乎相当于当年申新，但在资本意义上中信却不像爷爷们的申新那样有创意。中信始终没有资本独立的意愿，加之享受了政府无穷的政策好处，令今天的各位荣先生们忘却了祖辈们在中国经商的基本逻辑就是远离官商背景，从而在香港信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的商业氛围中造成了巨大的反感与抵触，使荣家对中国商业的影响力毁于一旦。又扯远了。

明剑喜欢“上条陈”也是有名的。

看他的文集会有个很有趣的感觉，就是他从不“住嘴”。从大总统孙中山，前大总统徐世昌，蒋总司令，孙科院长到韩省长，王处长，钱司令，孔县长，从内政部，教育部，财政部，行政院到救济总署，县衙门，公安局，工艺科无不被他聒噪个遍。你不就是个民营企业家吗？一无战功，二无权势，三无“太子党”背景，凭的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参政意识呢？民国修宪你要管，国家预算你要管，政府收购你要管，经济复原你要管，救济署先救济谁后救济谁你也要管……太不懂规矩了吧？！

可怪就怪在这里了，薛明剑除了曾被动议“罢免”立法委员一职（这也是民主政治最正常不过的举动）外，还就从未受过什么大人物的申饬，更别说斥骂了。每每被聒噪的那个人，注意不是秘书哦，还得诚惶诚恐速速给这“碎嘴子”具体的答复。可不怪也就不怪在这里了，他的每一次“聒噪”都离不开那两个老字，还是那个“民生”。他的“敏言”其实很单调，既无风月又不风流，就是把“民生”这两个字颠来倒去地说了又说，叫了又叫，喊了又喊罢了。我说风月你可

23 《薛明剑文集 续编 金融与实业》原载《人报周刊》1932-6

以烦，我说学问你也可以烦，可我要是说“民生”你也烦，呸！你还不想“混”了？

明剑喜欢看书尤其是古籍，否则也不会倾其所有购买古籍开设泰伯文献馆和钟瑞图书馆。受江南士大夫之风的熏陶，明剑也喜欢写游记，写谱牒，写人物略传，年表等。他也喜欢研史，特别是民国史，民国实业史更是他的长项。

对比明剑和治方在文字上的功夫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国粹拙朴，憨厚平实，一个西化精确，尖锐激越。说到写字本身，那治方可比哥哥差远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去国太早，错过了训练的最好时机，他写的中国字那可真是不敢恭维。明剑照推理应该不懂外文，可在他的日记中屡屡发现他用英文记录的地址啦，药名啦，人名啦，分子式啦什么的，略略花体，相当漂亮。还有他的申新三厂各种统计表格，那可是中英文双语²⁴。须知那个年代可是既没有“Word”又没有“Excel”的。

明剑对妇女事业好像特别关注，也许这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注重妇女教育和就业问题的杰出的新女性夫人李钟瑞的原因。他的很多文章都谈到妇女问题，小到女子的服饰，大到妇女社会地位，广到婚姻制度细至女蚕校学生的成绩，深到妇女解放的社会意义，从小到大，从浅到深，从远到近，从俗到雅，徐徐道来，细细说开。

有一篇明剑写于1923年，题为《改良婚制私议》的文章特别有趣，他把结婚过程分成“求婚”“约婚”“结婚”和“余兴”四大部分，又列出年龄、交际、资格、抉择、问名、递书、防变、场所、时间、婚费、证婚、仪式……等小项，还自编结婚歌，结婚祝词，证婚箴词，甚至画出婚礼场面平面图，谁左谁右，谁前谁后，看得人能笑出声来。他还呼吁妇女应负纠正婚嫁之责，不索取彩礼，不苛求嫁奁。他的这些文章都是正式刊登在本埠或上海报刊杂志上的，可见是被时代肯定的移风易俗之举。想到这些可都是发表在将近九十年前祥林嫂的年代，却又令人笑不出来了。

24 《薛明剑文集 续集 申新第三纺织厂调查报告—附表4》

明剑还是上海女青年会，江苏省立女蚕校，无锡妇女职业学校的顾问。他一生没有娶过如夫人，除了对前后两位夫人李钟瑞和孙馥铨的敬重和柔情外，不排除妇女解放思想对他的影响至深至重。当时的中国第一夫人，妇女界领袖宋美龄对薛明剑大有好感，许多事关妇女的举措她每每征询他的意见，明剑也因此于1949年被扣上“他和宋美龄相处得很好”这一条“罪状”²⁵。

明剑的婚姻家庭生活非常幸福。

在男人的世界里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女人的世界里他是个温良恭让的真绅士。他的元配夫人李钟瑞与他青梅竹马，志同道合。他们互称“瑞妹”和“明哥”，常常诗赋唱和，文章来往。钟瑞是江南桑蚕业专家，明剑支持妻子办桑蚕业和妇女教育事业，常常陪她到江浙各县宣讲改良蚕桑，还以夫人的名字创建了“钟瑞图书馆”和专门收集蚕业图书的“钟瑞蚕业图书馆”，得到全国各大图书馆支持，获赠从宋，元年代起直到现代的蚕书数千册。钟瑞对明剑更是敬爱有加，从家庭事业到教养子女，他们从不相悖。钟瑞爱丹青，明剑常为其题诗题字，明剑喜文史和收藏，钟瑞就为他搜集资料，编辑目录。他们把自己的家题为“明瑞堂”，把自己称作“明瑞堂主”，很多文章作品和送展展品都署名“明瑞堂主”。最有趣的是明剑钟瑞常常在各种学院、学校、讲习所相替讲课，一是他俩讲课受欢迎的程度是相同的，二是互为替补队员已被听众观众长期接纳，所以从未出过差错。他们还互相代为起草文稿，钟瑞有时也代明剑去中央大学劳农学院和教育学院上课，教材就是夫君的《民众实用工艺》。

在近年新编的四卷本《无锡市志》中，薛明剑和李钟瑞是唯一一对双双被列传的无锡名人夫妇。他们养育了七名子女个个成才，却丝

25 中共华中工委调研室《无锡概况 人物调查》1949 “三. 工商界 薛明剑，55岁，无锡人，住西门内序成桥7号，荣氏代言人。他和宋美龄相处得很好。连任两届参政员。胜利后以功臣自居，竞选了立法委员，在幕后策划私人事业，有米行，米厂，石粉厂，酒精厂等各种企业，现在交他儿子薛禹言办理。曾任自治实验区区长，现任自治实验乡乡长”。“他弟弟薛鹤柯（薛萼果错音），即宋亮，留俄后在华东财办工作，他们兄弟意志不相投”。

丝毫没有妨害他们事业的发展和感情的维系。几十年后，明剑的外孙沙沙在祖父文集的出版发布会上发言，“我们薛家的缺憾是计划生育搞得不好，但正是这个缺憾给国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人才库”。

此言不谬矣。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11月，钟瑞因心脏病猝卒于流亡中的重庆，这教夫君明剑直痛彻肺腑。他仰天长吁：“旧业议重兴，偕老愿虚，大计千端成梦幻；故乡悲陷落，忧时情切，长征万里瘁心肠”。明剑大办丧事收取丧仪，加上自己的一份后再全额捐出，于次年二月在重庆长江南岸龙滩子老牛湾购地数十亩，建成了重庆“无锡人公墓”，使客死他乡的乡亲亡灵有了一个安息之处。²⁶

一年后经著名社会教育家俞庆棠介绍，明剑续娶无锡世家孙复圻之孙女馥铨为妻，这位孙氏夫人美丽、善良、和钟瑞一样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子，三十四岁上遇到明剑才改变了终身不嫁的意愿，不离不弃地陪伴明剑走完了一生。

我看明剑和钟瑞以及馥铨唱和的文章时，常常生出“羡慕”的感觉。他们怎么能活得这样从容澹定？如今的人们十有八九都只有一两个孩子，却往往无法做到一生家庭事业双双美满。我们急迫，焦虑，烦躁，常常弄得灰头土脸，为那些带不走的東西，牺牲活着的快乐和生命的情趣。也许你会说明剑的年代色彩单调，没有那么多的诱惑，但正如前面提到他对“行乐”的解释“淡虚名，薄浮利，跳出得失场就是欢乐之境……非欢乐之境拒我不得入，实我之不欲赴也”，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多想一点吗？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明剑夫妇在江南苏、锡、沪、宁一带实业和教育界已经名声鹊起，那正是他们人到中年，即积累了足够的人生智慧又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时段。

中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了。这一年薛明剑三十五岁，他的小弟薛萼果二十二岁。

26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 1938、1939》

十一 实习革命

蓼果在莫斯科中大残酷的纷争中挺了过来。

1930年9月，22岁的蓼果沿着来时路踏上归途，莫斯科—海参崴—上海。有一种说法，薛蓼果——孙冶方是背着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从苏联被遣送回国的，无法采信。这座中共最早期的基地在本年底就彻底关门了，很多人回国还在孙冶方之前。

“就在欧美回来的学生把他们记着‘科学’与‘民主’内容的课堂笔记和书籍，也许还连同他们的梦想，一起带回国来的同时，留学俄国的学生们带回来的却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理想及其施政纲领，还建立了为实现这些理想的党的关系。”¹

5年的时间不算短，17岁的少年被打磨成了22岁的革命者，渴望投身革命实践的激情取代了5年前朝圣的兴奋。沿途俄罗斯大地的景色依旧，不同的是现在正值9月，是收获的季节了。蓼果已经熟悉了俄罗斯广袤的大地，熟悉了她的圆顶巍峨、金碧辉煌的宫殿，古老幽长的街巷，了解了她纯朴善良的人民和他们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在领略了她美丽夏季的百花齐放和严寒冬日的冰天雪地后，他爱上了她。俄语是他的第二语言，芭蕾交响是他最高的享受，列巴、奶酪、酸黄瓜这些最普通的俄罗斯食品都成了他终生的爱物²。

1 (美)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 2004

2 孙冶方非常喜欢红色外皮的俄式奶酪，到了暮年常常念叨想吃“红萝卜”——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表达“奶酪”这个词。后来是陈翰笙老托当年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友人从莫斯科为他这位“老学生”，“老部下”买回了“红萝卜”解馋。后来当外孙沙沙发现其实北京就买得到这个东西后，就不再舍近求远跑到真正的“莫斯科”去买了，而是常常从“老莫”（北京莫斯科餐厅）买来“红萝卜”孝敬外公。每一次，70多岁的老人都快活得像个孩子。
-沙沙口述

回到阔别 5 年的祖国，萼果立刻感受到了恐怖的氛围。中共已经转入地下，上海处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之中。共产国际已经用密电报通知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萼果的到来，两天后他就见到了潘汉年。作为中共历史上传奇人物的潘汉年是年 24 岁，已经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中共上海地委高等级负责人。潘汉年当即指定薛萼果到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开展工运。中共中央曾根据留苏学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现状专门作出决议，规定中大和东大回国学生一律要先下最基层锻炼，再根据他们的表现调到党的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工作。

22 岁的革命“海归”薛萼果开始实习革命。

人力车在上海也叫黄包车，这种今天已经绝迹的运输工具在 30 年代的上海却是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人力车夫是被压在生活最低层的群体，也是最困苦，最悲惨，数量庞大的群体，人数达数万之众。22 岁的萼果接任了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

深秋的上海暑气未消，萼果穿起短衫短裤，颈上搭一条毛巾，赤脚穿一双胶鞋，一头扎进了人力车夫的人群。白天，他和他们一样在骄阳和暴雨中奔跑，夜晚，他走进他们居住的棚户区，一家一户地和他们谈话。他想和他们交朋友，做他们的知音进而说服他们加入罢工队伍，为解放自己而斗争。他知道 1921 年施洋、林毓南等老革命者成功地在汉口领导了人力车夫大罢工，他希望能像前辈们一样。

但四溢的激情替代不了无情的现实，萼果虽然整天一身土一身汗地奔波却收获很少。工人们无法把这个满身书卷气的年轻人引为知己。

30 年代初正是“李立三路线”在中共风行之时，他们将一切改良人士或者资本家组织的工会称之为“黄色工会”，“国民党的走狗”，而这些工会很多是真正关注和关心工人生活和经济状况的。对于中国下层民众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们不懂得各种“主义”，更不知道“党”为何物。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极短，不仅不能像苏俄那样一蹴而就至少名义上成为领导阶级，更无法像英美等工业大国的工人一样真正形成劳联工联意识，组织起来和外

界抗争。中共在上海的人力车工人中完全没有群众基础，曾经发动过的两次人力车夫，电车汽车司机，清道夫，工程队，沟工队等多种行业的大罢工都失败了，死伤被捕多人，这就是残酷的现实³。

蓼果意识到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做为革命的“实习生”，他没有话语权。

冬天来到了。12月，上级终于暂时放弃了人力车工人这块阵地，将蓼果调到沪东区筹备成立工会联合会，任筹委会主席。

沪东是上海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蓼果再一次脱下西装长衫，走进恒丰，永安，怡和等几家日资，英资的大纱厂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参加他们的集会，了解他们的现状和要求，从教他们识字入手，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

很遗憾蓼果没有走进申新，走进由他的乡亲创建、由亲哥哥管理、中国人自己的纺织企业。是蓼果在回避还是上级的安排不得而知，命运弄人。

1931年1月7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蓼果的“老朋友”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被共产国际新科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代理总书记，中共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所谓“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这一段极为“罗生门”的中共党史，重写和修改的次数无数，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定论，任何时候，谁的拳头大谁的话语权就大。

六届四中全会虽然仅开了四个小时，却经历了漫长的逐级传达。各级党组织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沪东区委是争论最激烈的党组织之一。蓼果还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大会，但他从区委书记的传达中，又一次完整地看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那一套闹剧。王明的上台更是让他疑窦丛生，从莫斯科时代起一直到四十年代王明退出中共主流领导地位，蓼果从来认为此人不宜领导中国革命，他的价值观、方法论、见识、胸襟、人品和性格都有重大的缺陷。

3 邓加荣《走上世纪坛的学者——孙冶方》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1931年既是中国党同伐异愈演愈烈的一年，也是中共党争进入白进红出的元年。若将江西乡村苏区毛泽东那套农民军内讧式的“洗党”“肃AB团第三党”之类屠杀排除在外，如果把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党争称作它的“奠基”之礼，那么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它的“开山”之作。与后者的残酷血腥相比，前者的喧嚣拳脚就太小儿科了。拥护与反对四中全会的党人立时成为死敌，米夫和王明的“国际派”誓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中央特科顾顺章在率“红队”下手不成后借刀杀人，告密国民政府特务机关和英法租界巡捕房，致1月17日正在东方旅社开会的何孟雄、恽雨棠、林毓南、李求实等20多名“反对派”党人被一网打尽、2月7日被集体处决于徐家汇龙华。此刻距四中全会开、闭幕仅1个月⁴。

作为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龙华英烈”故事，史官们最难堪的尴尬在于不可、不许、也无法向听众交代故事的前因后果，他们是死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还是自己人的红色恐怖？

李求实之子李齐泰先生未经正式出版的一本家族史，其中说到父亲死去，不但无人对他们孤儿寡母安抚和安置，王明还要他的母亲即李求实的夫人秦怡君去参加名为“悼念”实为“鞭尸”的所谓追悼会，要批判父亲他们的右倾。在李夫人伤痛至极，断然拒绝到会，王明立即指令上海方面停止执行党给烈士遗孤每人每月15元赡养费的规则，并立刻断绝了和遗属的联络，致使李家孤儿寡母顿时陷入绝境⁵。

粤果侥幸逃脱，但厄运并未结束。上级的牺牲令他失去了组织关系，在焦急万分中寻找党的关系又被特务盯了梢，旋即被捕。这是他第一次啣铛入狱。

粤果很快镇定下来，在提审中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在求老师帮助找工作的穷学生。四弟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二哥薛明剑和上海无锡同乡会那里。大家连夜磋商，一定要把粤果尽快救出来。

4 《罗章龙回忆录》、无文《绕不过去的点》、

5 李齐泰《这就是人生》

粤果去国五年加上回到上海的7个月都没有回到近在咫尺的无锡故乡，且第一次露面就已被捕，二哥明剑一定相当懊恼。但懊恼归懊恼，救出小弟才是最重要的。上海的无锡同乡会当即请出大名鼎鼎的社会学者陈翰笙、钱俊瑞出面作保，加上特务们也确实没有拿到什么真凭实据，七天后就放了人。根据中共地下工作纪律，粤果被捕后立刻就失去了组织关系并且自动脱党。出狱后粤果已经不是党员并且陷入了衣食无着的地步，恰逢陈翰笙正在上海宝山县做农村土地租赁关系的调查，陈先生不忌嫌疑马上雇用他参加调查组的工作。

衣食有了，粤果却更加焦灼，他已经入党将近9年，没有了党他很茫然。

通过陈翰笙，粤果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遂用俄文写了两封信，托她分别转交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不久史沫特莱带回一个不祥的口信：“你的信已经交给了你所希望转交的人，他们答复说现在暂时不便来找你。”他的党从不相信被捕或被俘后获释的党人，粤果第一次找党就这样失败了。

接着他又认识了第三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一位苏共秘密党员，此人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传奇人物佐尔格。佐尔格后来在东京被捕并壮烈牺牲，他的雕塑直到苏联解体后还耸立在莫斯科街头。由于这个超级间谍的出没无常，粤果又一次失败了⁶。

第三次机会，是陈翰笙派粤果到中共领导的“民众武装自卫会”转交宋庆龄的捐款，在这里他遇到了杨尚昆。然而依据党的地下工作的铁纪，他不能与杨尚昆谈论组织而只能谈论局势和任务。粤果先后三次为这个组织送去几万元捐款却依然未能与党取得联系⁷。

粤果每天都生活在离群孤雁般的煎熬中。他不解为什么仅仅因为坐了7天牢党竟然就对他背过脸去了。其实粤果的一切行动党都知道，只是党在俄国人米夫和中国人王明手中，他们厌恶他，尝过这位长于独立思考的倔强年轻人的苦头，现在有机会可以将他排除在

6 杨国光《理查德·佐尔格 陈翰笙与佐尔格一章》 格致出版社 2005

7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守节者》

党外，何乐不为？

二哥明剑已经知道了小弟的境况，他力劝粤果回到无锡，凭着他在江南实业界如日中天的名望，为弟弟找个工作是轻而易举的。粤果拒绝了，他知道无锡是国民政府的天下，他们都知道薛明剑的弟弟薛粤果曾经是中共党员，公开的职业会招来许多麻烦，他找党就更困难了。他决定在上海坚守下去，一面找党，一面革命。

营救粤果出狱的陈翰笙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国共两党执政期间都担任过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机构的领导人。他早年留学美、德两国，1924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因此认识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李大钊被捕出走苏联，成为和佐尔格一样的第三共产国际直属秘密党员。1928年回国应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实际一切事务由陈翰笙主持。在蔡元培鼎力支持下，他开始扎扎实实做中国社会调查，搜集大批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他所做的有关上海日资纱厂实行包身工制度调查曾经震撼了整个社会。1929年他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团成立，全团45人先后在无锡22个自然村和河北保定的10个自然村深入每家农户搜集第一手资料。这是我国第一次以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的大规模农村田野调查。

粤果参加这个调查团是他正式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开始。

在这期间，他常常和薛暮桥、钱俊瑞、张稼夫等人一起学习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有莫斯科中山大学打下的坚实的理论功底，粤果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其中政治经济学部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他时常有新的心得，甚至计划写一本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书。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阶层正在崛起。以冶方二哥薛明剑的东家荣氏兄弟，还有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真正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本家正处在破土而出的萌芽阶段，生机勃勃。这个年代甚至被西方人称作是中国资

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⁸。但无论如何，冶方要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是嫌太早了，中国的民族资本集团不但没有形成一个“主义”、一个“阶级”，至多算得上一个“阶层”的它们甚至连一个较长的寿命都没有。十多年后，这些萌芽尚未成树更遑论成林就彻底夭折了，直到今天也还没有什么复活的迹象。

冶方没有写这样的文章，也许是他的万幸。

是时中共并无经济理论工作者，革命家们无暇、无心去做这种缺少“高尚”性质的工作，理论界非常混乱，各党派都有理论家站出来阐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可是能阐述出如亚当·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李嘉图这种高度经济学理论的一位也没有。粤果却最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为党作些工作。在莫斯科中大，他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但他已经因被捕而找不到党了，而在党外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他来说又实在太难。他决定暂时放弃理论研究而转到文化和新闻方面来。

秋天，9.18 发生，两天后中共发表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粤果迅速写就近万字的政论文章《“满蒙积极政策”的分析》和一万三千字的译著《迷样的日本》，以孙勉之的笔名发表在《读书月刊》上。前者以日本经济侵略数十年的大量数据揭露日本当局有系统地一直准备着一件重大的侵略事变的事实，后者详述日本迷样的经济结构以及它迷样的氏族宗法制度等，帮助民众了解侵略者的真实企图。

他走进日资纱厂做深度调查，写就《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次年发表在《华年》杂志。如果说4年后左翼作家夏衍发表的名篇《包身工》是一篇感性的揭露，那么粤果的《包身制工人》则是一篇理性的数据统计，它用一个个翔实的数目字为夏衍的文学性揭露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数据。

他还在陈翰笙主办的《中国农村》担任记者，到工厂、农村、学校和群众团体采访。他撰写了大量新闻通讯稿，报道中国的抗日爱国

8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行动。他的这些通讯稿不仅被国内大量刊物刊载，还频繁地被世界其他大报采用，尤其是苏联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今天还能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找到当年日本本土报刊对他文章的转载。

为了安全，他已不再使用薛萼果这个名字而是用母亲的姓氏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孙冶方。本书也将开始用这个响亮而大气的名字来称呼他。

孙冶方的生活慢慢安定下来，但他还是放不下自己最钟爱的理论研究。撰稿之余他自修了《语法》《修辞》《形式逻辑》等，精心钻研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著，翻译了《新哲学简明辞典》，与人合著了《新知识词典》。

党不理他，他却下决心为党“守节”。

1933年，冶方再一次随陈翰笙到广东农村做社会调查。

初夏，曾经在上海出色抵抗日军的国民革命第十九路军因为受不了蒋介石的排挤，在福建宣布“造反”。李济深、蔡廷锴等十九路军骨干联合其他民主派别，在福州宣布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南京政府气极败坏，不惜对福州狂轰滥炸，终于在年底平息了“叛乱”。南京方面高度怀疑陈翰笙、孙冶方等广东农村调查团人员与“福建事件”有关。是时政府剿共日趋白热化，第五次围剿以红军兵败西撤结束，所谓“长征”已经开始，加上上海地下党亦遭破坏，调查团此时若回上海定是凶多吉少，陈翰笙和孙冶方不得不转道日本暂避。

冶方在东京杂司谷町一处简陋的格子间住了下来，又一次陷入了衣食无着的窘境。

他为商务印书馆翻译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史》并为国内报刊撰写日本报道以维持生计。撰稿之余他到补习学校学习日文。两年脱离中国现实的东京生活是他有生以来最苦闷的。

1935年秋危机才算过去，冶方回到上海。

依然没有恢复党的关系，但他已经冷静下来，开始埋头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他和薛暮桥共同编辑了《中国农村》月刊并开始在各大大报刊发表论述中国经济的文章，例如在艾思奇主编的《新认识》上

发表关于中国工业的文章，阐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而不可能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可彼时中国根本没有资本主义，何来什么脆弱性？冶方此文的牵强连本书都不能赞同。

他在《中国农村》上发表《如何维护民族工业》一文，驳斥上海商会把民族工业的落后归罪于工人因要求改善生存条件的罢工运动。他还发表了《论财政资本——帝国主义》，详析帝国主义资本侵略的规律，这个题目未免有点太大。但是他在30年代就提出“人类的劳动力（智力与体力）是最主要的生产力”的观点，这对近50年后中国初启改革开放大门时的思想解放都还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1936年末的“西安事变”强力促成了国民党再次“容共”，中共决定在上海重新建党并调整上海的群众组织。直到这时冶方才恢复了党籍并立即担任了中共上海学生联合会书记。

六年之后重新找到党，冶方激情喷薄而出。

1937年淞沪抗战失利，11月上海沦陷。此时冶方已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委员会书记，他的副手就是他一生在精神层面上最相知相投的挚友和难友，30年后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位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顾准。

是时冶方，不满三十岁却已久经磨练，沉着冷静，尚未结婚的他甚至被刚刚入党的小青年们称作“妈妈”⁹，可见其风度和亲和力。而顾准，二十刚出头却已才华出众，激情四溢，又是这帮小青年们的“偶像”。两个年轻人成了“孤岛”上抗日力量的组织者，这也是至今在中国传为佳话的一段崇高友谊的发端。

在四周都是沦陷区的英法租界里，冶方和文委的成员们如夏衍、田汉、钱俊瑞、曹荻秋、巴人、梅益等共产党员和爱国文人，报人一起，高举抗日大旗，办起《译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学习》《求知丛刊》《内地通讯》等一批进步抗日报纸。与此同时抗日的文学，戏剧创作也异常活跃。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上海孤岛文化运动”。

9 《顾准再思录 怀顾准—王元化》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孤岛”时期是治方和他的同志们生命中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郭大力、王亚南“十年一剑”的《资本论》宣告译完，梅益译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诺出版了《西行漫记》，于伶排出了《夜上海》，巴金写出了《家》《春》《秋》……我的主人公孙冶方除了组织文化艺术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积淀已久的政治经济学功底混合着革命的热情，如火山岩浆一般喷涌出来。他不断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社论，评论，例如《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论日军进攻华北》《抗战建国的好榜样》《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进步的一年》等，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政策，分析世界经济情势，论述民族的解放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提倡抗战建国。上海的各个报刊杂志几乎每周甚至每天都有他的文章¹⁰。

租界不是世外桃源，危险处处存在。日本人、国民政府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这支抗日的生力军。

是年治方和洪克平结婚。

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的克平是位平实、安详的女子，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无论她那激情而倔强的丈夫如何起伏跌宕，她都默默无声地站在背后，支撑、安抚和等待他。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活到97岁才驾鹤西去，桃李满天下。

治方、克平位于“孤岛”内贝勒路的家是党的秘密联络点。潘汉年，沙文汉，曹荻秋等中共高级领导和夏衍、张宗麟、王元化等左翼文化工作者都多次在此开会，克平常常坐在弄堂口为他们望风。

治方还负责着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每天编辑出版延安新华社电讯。他们的家成了中共领导下的“孤岛”时期上海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之一。治方反复对克平说：“要是过了午夜十二点我还没有回家就不要等我了，那我一定是出事了。你要销毁文件立刻离开。”¹¹

他随时准备甚至渴望把自己年轻的头颅祭献给他的国家、他的党。

10 详见《孙冶方全集》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

11 邓加荣《孙冶方传》

那真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年代，是个令人极具使命感和英雄感的时代。那是孙冶方们的时代，他们生命和理想的激情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望其项背的。

这里把那个年代的诗人郭沫若的名篇《炉中煤》送给我的传主吧，趁郭诗人还没有写出令人作呕的《猪狗比赛唱红歌》之类的“大跃进红旗歌谣”：“我自从重见天光，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十二 平民英雄

三十和四十年代也是薛明剑的时代，是他一生中最激越的年代。假如把他的一生比作一支交响乐，那么此一时期就是其中最华彩的乐章。

在把申新系统管理得井井有条之余，他一刻也没有闲着。读薛明剑年谱的人常常感到眼花缭乱，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样过人的精力？生命的激情怎么可能如此澎湃？连写出来都感觉吃力，他可都是怎么干出来的！

这里不得不用罗列的办法把明剑在这二十年中所行所为挑重要的写出来。他的这些作为，写者感觉平实，读者可能感觉枯燥。没有伟业，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但苍生不就是这样的吗？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

有一个被用滥了的词条叫做“平凡而伟大”，将我的传主称作“平民英雄”应无大谬，他配。

I. 开创实业

早在接手申新的二十年代，明剑就开始着眼纺织业之外的实业界。

他开采嵩山石矿建石灰厂并同时修筑小铁路以运输，兼产碳酸钙、镁、电石、烧碱、漂粉等，是无锡第一家建筑材料企业。要知道那是个管水泥叫“洋灰”的年代，中国还根本没有生产建筑材料的能力；他创立“我华工业社”，购地种植除虫菊生产蚊香。时至今日无锡的蚊香都是供出口的名牌产品；他在宜兴蜀山建立中国釉面砖瓦

厂，生产仿古琉璃砖瓦以供应江南修复古旧建筑的需求；他在荣德生发起的公益项目环太湖马路建筑工程中统筹和指挥一切；他办“三乐公司”，生产牙粉等日化品；他建渔业养殖场；他建无锡公园……。

他事事敢为人先，也事事立足“人”想。

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帷幕。爱国的激情和开创的激情在明剑一身交相碰撞，这令他行动的速度益发不可收拾。战争伊始前线在沪，无锡成为后方重镇。第三战区长官冯玉祥在无锡设司令部，明剑被委任为办事处长，稍后又随冯玉祥与顾祝同的调防，接任第六战区驻京沪办事处长。

请读者不要看到“处长”二字就以为明剑步入仕途了，须知“那处长”不是“这处长”，明剑所要作的是筹办军需，购地埋葬死难烈士民众，安置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供茶供水，提供医药，好言安慰，抚兵保民。这些都是出力不讨好的差事，钱都是要由他一手筹措，是个包赔不赚的“买卖”¹。

十月六日至二十六日，敌机对无锡日夜轰炸，死伤无数。一千四百年没有经历兵燹离乱的无锡人惊恐万分，一时人心大乱，蜂拥出城逃难。申三受到重创，储棉仓库大火三日，损失极巨。明剑置自身并一家老小于次，每逢轰炸暂停必随救护队出发救护，救伤掩尸，三次险些遇难。夜间轰炸停止还要随冯长官赴前线视察，极尽疲惫。明剑的所作所为使冯玉祥将军深受感动，但也因此被日本人恨之入骨，以至无锡沦陷伊始就被日军下令通缉，在锡的全部企业和房产都被查封，“一经逮捕，就地正法”的通缉令贴满无锡大街小巷²。

1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7》——“十一月初，冯长官调任西北第六战区三战区由顾祝同接任，冯改聘余任第六战区驻京沪线办事处处长，更努力于棉衣、棉裤等各种慰劳品征集与运输，并向地方各界人士募资，订购下锡山下土地数十亩，备作抗敌英雄墓地……十五日后，前线败兵云集锡城，余乃与同人供应茶水。继则柴米饮食时告中断，且无法筹款相助……”

2 1980年4月19日民革中央上海负责人姜梦麟在薛明剑追悼会上的发言——“（薛明剑）这种崇高的爱国行动，使冯将军深受感动，因此也受到日本侵略军的万分仇恨。无锡沦陷后（他）立刻被日军下令通缉，并查封他的住宅和有关企业，扬言‘一经捕获，立即正法’。”

明剑在“办事处长”的位置上一直做到弹尽粮绝，柴米无以为继的十一月下旬，无锡沦陷前夕，才率一家老小、亲友同仁八十余口经芜湖，汉口向重庆方向仓惶逃亡，历经两个多月才到达，一路上的危险艰辛一言难尽。

不得不写一点小插曲在这里，不是叙述他逃亡的艰危，而是我的主人公即便是在逃命的过程中也不失本色，其机智、幽默和从容令人有点“瞠目结舌”的感觉，不写下来真是不尽兴。

1937年11月19日，“第六战区京沪办事处长”薛明剑连夜“弃职逃亡”。跟随他的族人有八十余口。他们买三舟经伯渎港进入长江。原处长大人命青壮们帮同舟子操櫓，又命人用肥皂刻就一方“第六战区京沪线办事处”的印章，将自己写就的若干路条盖上肥皂大印，又着人用白床单缝成旗帜高悬船头，一路通行无阻地向上游开去。沿途船只遭盗窃及抓差者不知有多少，此三船居然都得幸免。就在这么险恶的流亡途中，明剑大人也不丢名士做派，一路过去既要“考察民情”，一一记下各色风景、民风、特产、物价，还要上岸拜客会友，竟把个亡命的过程也搞得风生水起，妙趣横生。

船抵芜湖，冯玉祥亲赠花篮、书籍和食物，以表达他对这位“战区办事处长”的感谢之情。除夕夜，船抵藕市口，明剑命全体留泊过年，自己登岸游览，做“今日大年三十夜，长江边上看浪花”之咏。至沙市又上岸，遍问鸡鱼肉蛋、房租粮米价格。至宜昌亦如此一番，直至重庆龙门浩，被申四迁渝办事处人员接到。他老人家还很抱歉地写道“风景虽佳，无心赏玩”³。

3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7》——“十九日晨二时半偕室人……等八十余人在吴塘门分乘三舟……引至伯渎港进口。二十日晨，舟子无法前进，命甸儿（第二子）等帮同舟子摇船……途中由光圻兄用肥皂刻就一钤记（第六战区京沪线办事处钤记），用白衬单缝制为旗帜，沿途盗贼及捉差者不知几凡，吾等三船居然幸免……二十一日宿南渡……二十二日遇军警封船，余等闻风先行启碇……午后不分男女加入拉纤……二十四日渡固城湖。沿途风景随佳，无心赏玩……余等在途中叠遇抢劫民船事，余时服戎装（三战区），每立船头昭示……二十六日抵芜湖……冯先生并赠余花篮及书籍食物，并手书对联……大除夕抵藕市口，留泊过年。余有‘今日大年三十夜，长江边上看浪花’之咏。”

薛明剑们这种士大夫情调就像是从小娘胎里带出来的印记，浪里火力也难洗清，即使把它贬低到泥淖，丑化到不堪，也没有办法从他们的骨子里除掉。反过来说，你也无法从贬低和丑化它的人们的骨子里，除掉那种又妒又恨，又爱又羡的潜意识。

在重庆北碚刚刚安下身来，明剑就摸清了周围的新环境。这里是中国另一位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家乡，被国民政府划作“北碚试验区”，正以“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的模式做建设现代化乡村实验。

卢作孚，这位中国内河航运事业的创始人，民间企业家的翘楚，从二十年代起就凭借着长江，嘉陵江航运业迅速崛起。和江南荣家一样，卢作孚也没有把船舶运输工业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当民生轮船公司资本的原始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卢作孚立即开始着眼和着手更广义上的“民生业”。从他的所有产业统号“民生”，可鉴其志。卢作孚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是建成现代化国家，而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乡村现代化为基础。他在政府支持下建设的“北碚试验区”就是一个乡村现代化的实验特区，政府和卢先生自己都希望能提供一个“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模式。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社会实验。

卢作孚以谋民生、保民享为依归，追求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使“一切产业都工业化”，破除“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的中国旧文化观念，代之以“现代集团生活”方式⁴。

明剑到达重庆时正值北碚试验区初获成功，工厂建起来了，铁路公路交通建起来了，电话、电报、邮政建起来了，学校、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也建起来了……。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愿服务公众，皆无不良习惯，地方皆清洁，皆有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这令他眼界大开，直呼“胜利后，余立志照办乡镇自治者！”⁵

4 凌耀伦 熊甫编《卢作孚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

5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8》——“……卢作孚之家乡由省政府划为‘北碚实验区’，办有中学校、体育场、图书馆（尚见藏有余之《工场管理法》及《公益概要》，《无锡杂志》等）。物价殊廉……吾等几视为避秦胜地。胜利

后来他在玉祁也真的照办了。

1938年初，荣宗敬先生于战乱中歿于香港。此时身在重庆，家都还没有完全安顿好的明剑只身飞赴汉口，一来安慰荣德生先生，二来力劝将申四迁川开工，支援抗战。返渝后他既着手筹备迁厂，却因董事会意见不一，申四迁川纱锭仅不足万枚，荣德生未去重庆，明剑知事不可为而退出，也因此与荣家关系逐渐远离，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⁶。

他开办了同心酿造厂，制造南方口味调料，供应入川的江浙人；他兼任荣氏迁川之公协，复兴两机器厂经理，代理兵工厂制造地雷、枪弹、引信等抗战军用品；他协办江南肥皂厂，建国工业社，提倡用木材替代金属，利用废物制作用具，利用土地增加生产，利用矿山开发原料并据此开办各种小型福利工厂，小到如剃头、除污、修理车辆、改造油灯，无一不是创造就业，解决民生，节约消费，增加抗战力量。

明剑和他的搭档们所办的都是不起眼的小工厂、小作坊和小企业，产出的也大多是小商品，却在战时陪都重庆出生了很好的民生效果，得到政府和民众的双双首肯。

年末，明剑爱妻李钟瑞女士歿。明剑和钟瑞琴瑟谐鸣近20年，一朝钟瑞遽尔长游，明剑的痛可知矣。然而丧妻之痛并未影响明剑爱国和创造的激情。1942年日军开始空袭重庆，这就是举世震惊的重庆大轰炸。日军的暴行令他愤怒万分，也令他行动的脚步更快了。他着手创办允利化学实业公司，亲赴锡沪抢购物资，其资金来源一部分是他战前投资的实业之利润，一部分由国民政府经济部赞助。随即他又创办了允利重庆、雅安两间化工厂。允利系统起源在明剑家乡无锡，但他严令留守人员绝不允许与敌伪合作，纵使玉石俱焚也在所不

后，余立志办乡镇自治者，亦因是而起。”

6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8》——“春初，以汉口申新四厂当局力主不作迁厂计划，即迁亦主陕不主川，余则力劝迁川并应厉无咎、章剑慧两兄之托，两度与汉通电话以敦劝并一度航汉面劝，始允运一部分纱锭来川（不足万锭），且不用申新名义……余即退出。”

辞⁷。无锡允利在抗战初期既毁损殆尽，但重庆允利却自此初具雏形。

他还兼理滇缅海外贸易，在奉节建允利铁工厂，在重庆、万县建允利碾米厂，在万县，江津、涪陵建允利米面粉厂，在重庆建允利第三机器厂和非营利的豆浆厂。这些生产铁钉、肥皂和米面粉加工这些在今天互联网时代里根本提不起来的工业，在70年前的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仅为盟军提供面粉和培训面粉加工技术人员一项，就是明剑和他的同伴们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为此得到了政府和盟军的大力嘉奖，获颁国民政府“胜利勋章”⁸。

在罗列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凡是以明剑为创建者或发起者的企业，均以“允利”冠名，允利的意义何在？在他1948年底所写的《明剑初步愿望十则》有了答案，“要知事业能发展，社会能繁荣，一家子女之求学谋事，均属小焉者也。故余对所办事业取名‘允’字而不用‘永’字者，即寓公允无私，两利为利之义也。”

这种理念拿来放在今天，你会觉得过时吗？

II . 参政议政

“参政不做官”，这是明剑一生的原则。

他参政很早，参政意识很强。他认为“国计”和“民生”是不可分的，“国计”好，“民”才好“生”，反之是不成立的。从少年时代起，骨子里的士大夫思想就令他认为对于两者自己都“匹夫有责”。

7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0》——“家乡原有允利各工厂，敌伪派人要求开工生产或合作，均函复保管者谢绝。致窦慕仪先生函，有“宁可全部毁去，不愿为彼方经济张目”等语。直至抗战结束，允利化工厂等均拆毁无存矣。”

8 樊明五《无锡薛明剑先生》原载《允讯》1948-1——“抗战军兴，允利实业公司内迁，先生赤手空拳，苦心擘画，业务进展，由一母体衍化，有面粉，碾米，铁工，机械，纺织，化学，酿造等十余工厂于重庆，昆明，西康，江津，万县，长寿，涪陵，白沙，宜宾等地，复自制纺织，机械，面粉供给经济部及中央工业试验所，暨成都，兰州，昆明等地新创工厂，亦有数十处之多，并应教育部之请，亦有面粉，纺织人员培训所，以补救技术人员之缺乏。是以胜利之日，蒙国民政府颁赠‘胜利勋章’”。

明剑的参政记录同样令人眼花缭乱。

初读年表，不排除人们会生出“好一个华威先生！”的笑叹。但是你错了，因为“华威先生”是个只开会不做事的“天桥把式”，而明剑先生是个又开会又做事的实干家，更重要的是他开会是为了做事，而做事绝不只是开会！

先来看看他的参政历程。

明剑是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国民党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光复中原。明剑投学生军开赴镇江并参加围攻南京的战役。他还一度随侍在革命军中做军需长的父亲薛华阁于苏北临淮关。同盟会改为国民党，1912年无锡党部成立。国民党、国民公党、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共进会合并成立宣导会无锡支会，他被推为会长。1917年他在任县教育会治事部主任期间组织了中华职业教育会、无锡学生会、筹建了无锡体育场并任场长多年。

1926年康有为来到无锡，明剑与他彻夜长谈并互赠书联。康有为对明剑的影响很大，这很可能是明剑在正式“弃学就工”后参政意识反倒更加强烈的原因之一。

1927年革命军北伐占领无锡，明剑被革命军委任为市政厅委员兼工商局长，还被公推为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仲裁章程起草委员，受聘无锡县政府建设顾问、商团会董等。他还是上海女青年会顾问，无锡红十字会主任，劳工卫生促进会委员，全县农业设计委员会委员，无锡蚕业公会主席，全国《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修订委员会委员。9.18事变后，他又被推为无锡抗日救国经济和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他参与发起组织了国难自救会，创办了抗日的无锡广播电台。他被选为江苏省国货工厂联合会理事长，任《大公报》顾问，任江苏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任中山纪念堂筹备委员会委员……

1936年他当选为国大候补代表，不久就递补为正式代表。在陪都重庆他被公推为无锡同乡会会长。1941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被选为驻会委员。1942年他受聘为全国劝储委员会顾问。同年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工业协会，任江苏分会理事长。1944年他被选

为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被农业部聘为蚕丝委员会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他被聘为复旦大学复建顾问。当选中华纺织协会监事，江苏省善后协会委员。受聘为中国工矿银行监事。

1946年明剑返回无锡，任国府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委员，兼任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委员。

发起无锡扶轮社。任无锡运动会总裁判长，无锡救火会理事长。

1948年明剑竞选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起初明剑并无意竞选，他与国民党中央素无渊源，也不在候选名单之内，但他得到了江南各界特别是实业和教育界贤达的竭力怂恿和支持，后由邵力子先生力争为候补的最末一名。结果明剑做为民选（即非指定候选人）者在无锡、江阴、常熟一带获得选票近三十三万张，大大领先于正式候选人，迫使国民党中央取消正式和候补候选人之分，明剑遂以得票数江苏省第一当选为立法委员。

有一个细节不能不在这里谈到，所谓“誉不掩疵，毁不益恶”也。薛明剑先生在竞选立法委员的过程中是有“贿选”行为的，但绝非像今天我们的很多“公仆”那样，向上司“跑官”“买官”，而是贿赂百姓每一张选票赠大米一斗⁹。这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他“竞选班子”的伎俩已无从考据，但是这样的“贿选”是能原谅的，虽然更希望将来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连这样的事情也不要发生。

明剑这些五光十色的头衔确实令人眩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华威先生”¹⁰。那么下一步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些位置上都做了些什么。

在无锡教育会的任内，明剑所行最重要的事情是组织职业教育。

“职教”是现代社会的须臾不可离却同时又是个枯燥的话题，明剑夫妇却一生钟情于它。钟瑞是蚕桑业的专家，明剑支持她做了许多改良蚕桑职业教育的事情。他们特别注重妇女在蚕桑业上能得到才能

9 薛明剑外孙沙沙（武克钢）口述

10 张天翼短篇小说《华威先生》

的发挥并由此得到精神和经济两方面的解放。他们在江南主要产茧地宜兴，溧阳，嘉兴等地讲演，建立江苏省育蚕实验所，创建钟瑞蚕业图书馆，创办女子商店等等。他兼任省立教育学院教授，讲授《职业与求学》，《教育与实业》这样的课程。荣德生先生就是在听演讲时初识明剑，两人一再约谈改良蚕丝并推行国外之事。

他推进江苏省教育厅改良审核学生升学办法。

在齐（燮元）卢（永祥）之战和冯（玉祥）阎（锡山）之战的军阀混战时期以及国民革命、中日淞沪战争时期，明剑在各种委员会任职的目的只有一个“保护民众，保护全邑生产元气”。

他组织“国难委员会”，在无锡募捐架设电台与沪上取得联络，无锡拥有广播电台即从此始¹¹；

他赴苏州接洽流通，金融，交通等事宜，全力安抚百姓¹²；

他赴沪调解邮工罢工¹³；

他赴省请求救济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¹⁴；

他函请无锡县长减轻田赋附税以复苏农村经济¹⁵；

在申新系统由于资金周转呆滞，濒于被政府当局者图谋收归国有时，他奔走于宁沪之间极力斡旋，保住了这个中国最大的民族民营纺织企业¹⁶；

在行业性任职里明剑的作为就更多了。

他曾代表纺织业赴京向行政院财政，实业两部请求免增棉纱统税以振兴民族工业，被政府接受¹⁷；

11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2》——“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阀要挟上海市长取消抗日救国会，发动淞沪战争。余与同事担任宣传工作，并与邑人钱孙卿等组织国难委员会，余任经济组国际研究组委员。是时，邑中广播电台设备悉由地方捐款，偕教育学院同事汪畏之赴沪购办机械，设电台于教育学院，与沪上取得联络。此为无锡有广播电台之始。”

12 同上——“又办理后方救护，慰劳等工作。”

13 同上——“五月二十五日，商会推余赴沪调解邮工罢工。”

14 同上——“7月被推赴省厅请求救济农村经济崩溃事。”

15 同上——“函请无锡严慎予县长，减轻田赋附税，以苏农村。”

16 《申三临时刊布》部分原版出版物现存无锡档案馆

17 同上

他发起联合内地各纱厂，呈请行政院实业部纠正上海股票交易所对花纱投机，以挽救中国纺织业免于崩溃¹⁸；

他代表各纱厂请求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提出《救济纺织案》动议并获通过¹⁹；

他为城区贫民窟设计篷户²⁰；

他为抗日死难烈士购地建陵园²¹；

在他流亡到重庆后听说家乡人民在日寇铁蹄下民不聊生，毅然谒见国府主席林森，请求派员赴苏施赈，请求政府统一沦陷区游击队禁止扰民，均蒙政府首肯²²；

他电促江苏省教育厅长回苏北恢复学子教育，挽救国运²³；

他严令家乡原有企业宁愿玉石俱焚也不得与敌伪合作²⁴；

……。

在当选国民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后，他的提案更是不计其数，必须有一篇专门的文章甚至一本书来详述。这些提案即使放在今天，也不失为各党派政治协商共讨国是的范本，只是它的内容丝毫不沾政治，不谈主义，不涉意识形态，还是那万变不离其宗的两个字——民生！民生！！民生!!!

18 同上

19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5》——“十一月八日，代表纱厂请求张静江等向国民党六中全会提议《救济纺织案》，决议交国民政府转飭主管机关妥筹办理。”

20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6》——“二十七日，无锡县政府函请余任整理城区蓬户设计委员。”

21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7》——“向地方各界人士募捐，购定锡山脚下土地数十亩，备作抗战英雄墓地。”

22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8》——“九月间，闻苏北各县哀鸿遍野，即与无锡，江阴同乡会及江苏同乡通讯处（联合）请求赈务委员会派员赴苏施赈。谒见国府林（森）主席，请政府统一沦陷区游击队组织，并要求严禁扰民，与正规军觅取联系，均蒙首肯。”

23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38》——“电促马元放迅回苏北就教育厅长，利便青年学子，冀以教育挽救国运。”

24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0》——“家乡原有允利各工厂，敌伪派人要求开工生产或合作，均函复保管者谢绝。致窦慕仪先生函，有“宁可全部毁去，不愿为彼方经济张目”等语。直至抗战结束，允利化工厂等均拆毁无存矣。”

这些提案（议）有提倡教育，选派英才留学，振兴实业，废除金圆券，国共坦诚和谈，停止征兵征粮，倡建农村自治乡，保护太湖，兴水利，开放神农架，保甲改革……不胜枚举，就连南京贫民区居民的饮用水卫生问题，也在他的提案之列。

III . 最贴近民众的教育家

明剑是担得起“教育家”这个崇高称呼的。

因为家庭的清贫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他，凭着一腔教育救国的热情和非凡的聪明才智自学成才，并且在教育青年、教化民众方面有许多作为，前几章中已经多处讲到。

由于家境贫寒，明剑考进复旦公学而未能走进校门，最高学历也就是“高中毕业”，但他从未因学历浅而自卑过，更没有因此而远离教育。书香门第出身的他视教育为国运振兴之本。虽然他自称已经“弃学就工”，但你遍读年表却处处是“学”，页页有“教”。从1912年做小学教员开始，他做过十多所大、中、小学、职业学校、夜校、成人学校、农校和各种讲习所的校长、教育长、教授、讲师、教员、宣讲员。从十几岁开始在家乡推进扫盲运动，到近五十岁做复旦大学复建顾问，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江南大学董事兼教授，再到七十多岁教孙辈（也只有孙辈可教了）背诵古书，读《论语》。

他一生“好为人师”，可这个“师”是多么贴近民众。

前面讲到明剑一生任职无数，却没有真正当过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官”，这里还要讲到他一生著述无数，却没有一本为自己标新立异，树碑立传。这里列举一些书名：

《纺织工作之苦难与改进》；

《工场设计与管理》；

《民众实用工艺》（即后来的《衣》《食》《住》《行》概要）；

《农村副业》；

《教具制作》；

《现代军用毒气及制造防毒面具常识》；
《战时工业制造法》；
《教育与实业》；
《桑蚕改良》；
《实用养兔法》；
《提倡养兔补救蚕丝失败》；

……

看到这些题目，可能有人会很不屑，因为它们既不是立言立德的传世之著，也不是教人怎样升官发财的“励志”之说，都是紧紧关联国计民生，解救民众生存问题的急救方，甚至是“急就章”。譬如在农村经济濒于崩溃时教民众养兔、在日军进犯时教民众制作防毒面具、在蚕丝滞销时教民众改良桑蚕、在学校缺乏教育经费时教大家怎样制作教具、怎样制作不发霉浆糊……。

小事啊，真是太小了，小到“上不了台盘”。明剑也是生于世代书香门第的乡绅名士，他难道不怕那些所谓“真正的”读书人笑话他写这样雕虫小技，鸡零狗碎吗？

他还真就是不怕，岂止不怕，简直是乐此不疲！

他不但写，还要画。他画的机器图、厂房图、工艺流程图等等简直就是专业水平的工笔画，就连他著作中的地图都是自己手绘的，他从不用现成的标准地图。明剑非常清楚绝大多数民众是不识字的，看图，看尽可能简单的图，会令他们更方便一些。

那可是个不知电脑为何物的年代，他的这些手稿，画稿曾令使用电脑超过40年的本书著者钦佩不已。那一手漂亮的柳体蝇头小楷，复杂而清晰的手绘机器图、工艺图，是造成我要研究薛明剑这个人的最初冲动。你可知道，就是这些“雕虫小技”，“鸡零狗碎”的小书小册子，在无锡，在江南以及后来的陪都重庆都发行无数，民众用它们解决自己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困苦，这些书至少做到了暂时“解民于倒悬”。

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功德无量啊²⁵。

明剑又是一位儒雅的学者，让我再来罗列一些他别的著述给你看看：

《改良婚制私议》；
《锡湖揽胜》；
《江浙三次战争之罪言》；
《甲子秋季江浙初战梁溪风鹤记》；
《荣丈昆仲创业史》；
《民族工业之历史任务》；
《五五纪年》；
《周舜卿略传》；
《中国词典目录提要》；
《黎元洪年谱》；
《秦邦宪年谱》；
《无锡历届兵革记》；
《南阳公学创办史事纪略》

.....

还有那些寄情山水，藉物咏志，史实记录，随咏偶拾的书、文、诗、赋就不再一一罗列了。仅无锡史志办公室编纂的四大本《薛明剑文集》就收集了他 150 万字的著述，更遑论那些佚失在战火中的许多史料和最宝贵的他六十多年的大部分日记。

明剑一生倾其所有收集古籍建立蚕业图书馆、泰伯文献馆和钟瑞图书馆，藏书粗略估计曾经超过 20 万册，但其中大量在抗战期间流失。这些藏书中最珍贵的各省，市，县的地方志和数量可观的专志两万三千五百多册，全部于 1952 年捐献给了苏南文物保管委员会。他在回复该委员会负责古籍收集的钱基博先生（钱钟书父亲）关于希望能付一些钱给他的信中写道：

25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实地养兔法》一书，华汝成、薛明剑合著

“泰伯文献馆原为大众而设，剑仅代表保管一时，决非个人私产。夫书既为大众之物，归之公家，理所当然。故书款二千万元，最好分文不受。如必完一手续，请务必先决定一用处，决不可化公而为私也。”²⁶

读者，看到这里，您还认为称呼薛明剑为“平民英雄”过分吗？

26 《薛明剑文集 与钱基博往来书信 为捐赠泰伯文献馆藏书复钱基博先生函》

十三 戎马书生

冶方在上海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一直工作到 1940 年秋。

“孤岛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界和政治界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她不但在抗日救亡、激励民众、反帝反封建等方面为中国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还是中国近代文化界一次“百花齐放”的短暂时期。中国很多后来的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都经历过这一时期并且在生命的品质上得到过极大的升华，但是在 30 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重创，其中一些人死得极其悲惨和蹊跷。这些名至实归的“30 年代左翼文化人士”为何在时隔三十多年后遭到当年的同行或某些根本不沾边的“新中国”权贵们极度的嫉妒和仇视，这个题目过于夹缠，众说杂陈，不是可以轻易置喙的。还是来看看我的传主孙冶方的命运。

1941 年，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头。新年刚过，正在陪都重庆为战时国计民生呼号奔走的明剑，突然在北碚临时的家中和小弟冶方、弟媳克平不期而遇。这两位不速之客从上年 8 月即由上海出发，绕道香港，辗转两广，历时 4 个多月才千辛万苦到达重庆。他们这是正在赶去延安的路上，借道陪都奔赴红都。有些孙冶方年表类记载，是“长江局书记王明指名道姓要孙冶方赶赴延安参加整风”¹，也有孙冶方传记类文章现场报道一样描述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不怀好意地问“那个名叫薛萼果的托派分子现在在哪里？”²。

1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后来他（王明）又利用组织名义，决定指名调冶方同志去延安审查历史，因为那里有他的同伙康生在掌握审查大权。”

2 同上——“抗战之后，一位同志向长江局汇报工作，王明问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一薛萼果的托派分子现在何处？’”

但是，中共长江局在 1938 年 10 月已经撤销，1940 年秋的王明怎么会是“长江局书记”？孙冶方是在 1940 年 8 月接到“特别指令”的，但所有的中共党史都把“延整”的开始，要么定义在 1941 年 5 月《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要么定义在 1942 年 2 月《反对党八股》的发表。为什么孙冶方在 1940 年 8 月就接到参加延整的通知？

最大的可能性他并非被命令去参加以“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为主攻方向的延安整风，而是被尚未失势的王明集团“请去”延安，去“说清楚”那永远也不可能说得清楚的“江浙同乡会”之类东西的，换言之他是背着所谓“托派”的嫌疑而到延安接受审查，去被“整”的³。

本书很想在写作的过程中把“整风”尤其是“整”这个字好好弄懂。

50 岁以上的国人对这个词和这个字从小就都耳熟能详，人人都怕它，避之唯恐不及，又有许多人喜欢用它，手法不一而足，而有兴趣去探究它的来源的人却不多。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的《辞海》、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的《辞源》和 1986 年的《不列颠简明词典》居然都收入了这个字，它并非我们太上老祖的发明，它就起源于中国共产党 1940 年代的党内整顿和清理⁴。

人们常常不能理解中共为什么总是在大敌当前之际要搞整风，譬如面对国民党大军围剿时搞“清理 AB 团”，面对日寇大举进犯时搞“延安整风”，面对大饥荒时搞“庐山整风”，面对行将崩溃的国民经济时搞“四清”，面对被“文革”糟蹋得满目疮痍的国体时搞“清理阶级队伍”……。“新中国”所有历史教科书无一例外严批蒋介石

3 《顾准自述 1956-1964 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他在莫斯科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同学，受过他们的打击，被他们打成所谓‘江浙同乡会’反党小集团，因而此事成为他的一个未解决的历史问题。1940 年他从上海去重庆，打算转去延安，就是去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直到 1952 年为止，这个问题似乎还未作出结论。”

4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 年 6 月版收入新词条——“整风”

的“攘外必先安内”，可中国哪个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党同伐异”？

古今中外凡属党纷概莫能外？

自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世界格局出现了许多巨大的变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订；1941年，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德国入侵苏联，珍珠港事变祸起，美日宣战；1942年，美英中苏等26国发表“华盛顿反侵略及不单独媾和宣言”。世界政治舞台上各大国的国际政策都在随风使舵，朝秦暮楚，这不可能不在中共党内引起严重的思想混乱，而党需要高度的思想统一，需要“只有一种声音”，说白了就是在对党魁的认识问题上高度统一。在这一点上统一了，一切就自然而然地统一了。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如何斗争，怎样战斗，只要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党魁即可。

“整风就是要改造每一个党员，摧毁传统的道德观念，建立一个新的伦理与行为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要将人性改造为党性。”⁵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一个崭新的中国单词“整”诞生了，那就是在法律之外或者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行法，行“家法”之法的简称。家法者，当然是由家长来行，谁做家长谁理所当然可以“行家法”，也就是理所当然可以“整”。

治方是磊落的，加上对党的忠诚，他立刻携妻踏上赴延安的路，足见其义无反顾。那时上海和延安是无法直达的，重庆是必经之路。他们历时四个月才到达重庆，却因为赴延安的最后一架飞机实在是塞不下了又无功而返⁶。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巴巴地把人从上海调到延安去“整”或者“被整”，山高水远千里迢迢，至少从经济学角度讲也是成本太高、不合算，至少“路费由谁来出啊？”

明剑见到小弟却是喜出望外。

5 (苏) 罗勃·C·斯诺《莫斯科与中共》 亚洲出版社 1956

6 沈树正《孙冶方年谱 1941》——“周恩来对孙冶方说：‘现在的情况很紧张，去延安的最后一架飞机就要起飞了。你要坐上去就得将别的人留下来，你看怎么办？’”

从16年前粤果赴苏留学算起，这一对曾经情同父子的兄弟总是聚散匆匆，从未有机会在一起共事过。眼下国难当头，兵荒马乱之际能在大后方的陪都相聚，而锡沪迁川的企业正缺人手，要是小弟能留在重庆从事实业，那有多好。但小弟早已不是当年的粤果了，他是一位革命党的成熟党员，已经不可能和他作为执政党老党员的哥哥合作去改良和修补这个世界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二哥在大后方奋力从事国计民生和民族自救事业的敬佩之情。《锡山文史资料——孙冶方年表》记载，他在二哥重庆的家里常常可以看到冯玉祥、吴稚晖、黄炎培等国民党元老和马寅初等著名学者，他们和明剑共赴国难，共商国计，冶方不仅没有“不解”，“不屑”，反而“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

50年后，粤果——冶方曾向外孙沙沙讲起当年和二哥明剑最终也没有走向同一条人生路的情景，他没有标榜自己天生就是个共产主义者而绝无和哥哥走同样道路的可能，而是老老实实告诉沙沙，要是自己早生几年，和二哥在年龄上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很可能就跟着二哥接受了民族、民生、民权，民有、民享、民治的思想，走上实业救国甚至是追求民主、自由与法制的道路了。但是到了1941年，这种可能性早已消失殆尽。

冶方没有留在重庆，也没有去成延安。就在他踏进哥哥家门之时，“皖变”事发，国共再次交恶，重庆到延安的交通也中断了，这就是前边讲到“最后一架飞机”的缘故。也许应该为冶方庆幸，他这种在莫斯科接受俄国人的教育的人，懂俄语，懂理论，懂经济学，死抠马列原理，性格外向，倔强，不盲从，加上对王明和康生之间关系的了解，对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之死的深深怀疑，如果他真的去了延安，被王明整的可能性是没有了，但是落在“刑官”康生先生的手里，其命运就叵测了。

延安整风从1941年整到毛泽东上位、日本投降，整了整整三年，国民党蒋介石在各个前方与日本人苦战，共产党毛泽东在陕北一隅与自己人苦斗，其间的“抢救运动”，“党外问题”，“红旗党”，“坦白典型”……一个个高潮迭起，学习高潮，坦白高潮，自贱高潮，揭发

高潮，刑讯高潮，自杀高潮……把个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看得目瞪口呆，用日记的形式留下一本《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⁷，无论你有多反苏反修，也无论你对父辈们所经历的一切具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你也无法将这本共产国际史上有名的“日记”完全看做是捏造而无动于衷或不予理睬，更何况那时的俄国人，至少国人被这样洗脑，尚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盟友、老大哥和救星。

身在重庆的周恩来让治方在留渝加入《新华日报》社和返回抗日前线参加新四军的两个方案中选择一个，他选择了后者。按史料记载，这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中大的许多同学现在都在陪都国民党政府中做了高官或“特务”，国共翻脸，治方已不便留在重庆⁸。

辗转来时路，又耗时数月，7月治方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时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立即请他担任主管宣传教育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工作。从此，治方从一位地下工作者转成了公开的战士。他讲授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与理论等课程。在此期间他和刘少奇之间一封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通信，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共文献《答宋亮同志》⁹。

治方还担任了苏皖边区财经处长，华东局财办秘书长等财经类职务。对于这个科班出身学过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海归”书生，总的来说胜任愉快。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皖南事变”后不久曾又一次度携手的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面前终于彻底撕破了脸。国民党拒绝在合法政府内给共产党一席之地，共产党则马上从民族解放“转成长”为劳工解放，摩擦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升级成了战争，即使有1945年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1月的停战令发布，加上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召开，也都无济于事，明剑的在朝党和治方的革命党再一次兵戎相见。

7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 《延安日记》 东方出版社 2004

8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60年》 知识出版社 1984

9 《刘少奇选集(上) 答宋亮同志》人民出版社 1985

明剑已经回到无锡并作为荣氏家族的代言人开始竞选国大代表，冶方则仍留在苏皖边区负责边区政府的物资管理。此间冶方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边区生产，繁荣边区经济，保证边区内外的物资流通，而明剑则早已恢复了“服役民众”的老本行。

“曹营”“汉营”中的两兄弟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战线分明，剑拔弩张。分别在两个阵营中都是弄“粮草”管“辎重”的哥俩，双双要对楚河汉界两岸的百姓负责，这个粮草辎重可绝不仅仅是供应军队打仗用的，他们更重要的要“服役”的对象是平民。

小弟请二哥安排中共地下党员徐雪寒做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纱号经纪人，目的是促进边区贸易的发展。边区丰盛的农产品和沪宁及苏锡常地区的轻工及医药用品，大量都是以走私的形式在进行着交换流通。这是一种很滑稽的局面：内乱中服务于两个政府的兄弟俩在长江两岸互相违反对方的法律法规，暗通款曲，大肆走私贩私，目的却只有一个即保障民生。

这和 1960 年代最卖座的电影《51 号兵站》可确实不搭调，虽然它们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同一地点和同一背景下。

应该说冶方在新四军和边区政府期间的工作是合乎他性格发展的。他的疑惑被解答，建议被采纳，批评被接受，工作被尊重，突出的性格被包容。其实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比他更加异数的共产党员在和他在一起工作。几年前在上海的“孤岛”上他们就是战友，现在两人又在苏皖边区相遇，一个做财政金融，一个做货币发行（边区政府正发行着自己的货币“中华币”），此人就是孙冶方一生在精神层面上最相知相投的挚友以及后来的难友，被许多中国读书人誉为本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位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顾准。

两个戎马书生，一对翩翩才子，都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青壮年之交。从上海孤岛时期起，到现在的苏皖边区再次相遇，到将来“新中国”时期的 24 年，他们生命轨迹的交叉，碰撞和缠绕将近四十年。比起孙冶方和薛明剑这对亲兄弟，他和顾准的故事更加悲怆，更加荡气回肠，也更加令人深思。

十四 看云卷云舒

1949 年到了。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它都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用汉民族最传统的说法，这是个“改朝换代”的年头。虽然 38 年前中国刚经历过一次“改朝换代”，但对芸芸众生来说，上一次的振荡和这一次的颠覆完全无法相比。

卑贱者高贵了，反之亦然；天经地义变成了荒谬绝伦，反之亦然，“常识”已经一钱不值。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令惯看秋月春风的江渚渔樵们也很难再把酒笑谈，从官贾学伶到贩夫走卒，谁也无法置身事外。这是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

这一年明剑五十五岁。

元旦清晨，他开始动笔作《五五纪年》，追录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抗战胜利那年他五十岁，已更名为薛明剑，这是很早他就为自己预定下的用名。他的一生曾经用过五个名字：父母命名萼培，少年时自己改为锸佩，十七岁参加辛亥革命时改为明剑，五十岁改为民剑，六十岁改为民见且备好了“民间侍者”的笔名¹。

极重“名正则言顺”古训的薛明剑是不会心血来潮，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来改去的。他最后的两个名字“民剑”和“民见”，尤其是笔名“民间侍者”“民间不老人”都有“民生”的情愫在内。如果您能踏下心来读他的文字，就会发现“民”在其中的分量。在这些成百上千万的文字中你看不到譬如“以人民的名义”“解放天下的

1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895》——“余行二，出生后父亲命名萼培，维改锸佩。年十七参加辛亥革命，易名明剑，至五十后用民剑，预订六十岁后用民见，笔名民间侍者……”

劳苦人民”“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之类很抽象的词句，薛明剑的“民”绝非毛泽东的“人民”，语境不是、内涵不是、他的“民”就是普天下的苍生，既无“政治”也无“阶级”更无“敌友”。他最后一个用名民见，清晰、平实、智慧，如箴言般定义、定位了他后30年的人生。

现在五十五岁的薛明剑在民剑与民见之间，但人们一直还是称呼他薛明剑。

明剑仍然在奔忙。这一年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还没有细想，已经习惯于动乱的他最大的愿望是家国长治久安，至于哪个政权上台，打什么旗帜，冠什么名号都不重要。国共一直在打内战，他忧心如焚，不停地呼吁两党停战谈判，停止征粮征兵，给民以喘息之机。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不知疲倦地斡旋和调停，求见或致电两党的老朋友，包括邵力子、何应钦、张治中、徐永昌、董必武、张士钊、李宗仁、陆定一、邓颖超等，请求他们罢兵止戈，铸剑为锄。他认定只要能停战，解民于倒悬就好²。

明剑虽然参政议政多年，可他毕竟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他不能明白国共间的争战和他曾经司空见惯的军阀间的地盘之争是截然不同的。按照共产党的理论，这是两个阶级之间的事，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角斗，只有你死我活这一种选择，没有妥协，没有中庸。

可怜明剑对党派、主义、阶级、意识形态这些所谓的“上层建筑”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只知道不管谁当政都得谋国计，管民生。天下苍

2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三月六日向江苏省议会议长庞甸材历述江苏工商业之危机，力促停止征兵征粮；三月二十五日赴京，知已派定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莫德惠六人为和谈代表，参政会同人占其四，因与详谈必须完成任务之重要；三月三十一日，赴京，午应李德邻邀宴，强调和平之重要，不可再以兵事相见；四月一日，在京送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赴北平和谈，与邵谈决不能再以兵革相见；四月十四日，代电邵力子，陆定一，努力和谈之完成，以副人民之渴望；五月十九日，接邵力子先生北平来信云：和平任务未成，而精神颇觉愉快，因确认中央精神符合当前需要，建国已有希望云云闻之欣然。又谓无锡解放，必可了解中央城市政策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方针……；六月三日，偕范谷泉，朱怀冰等访饶漱石，谈工资，原料，经济应急事务……”

生是无法将主义，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拿来当饭吃，当屋住的。他更加埋头于“民生”“教育”“实业”这些他最为熟悉的领域，对党派、主义、理论、学说则越来越敬而远之。因此，当这年年初胡厥文、胡越中等来无锡力邀他参与组建民主建国会时，虽寓薛家三日竭力游说还是被明剑婉拒了³；吴宪滕邀他赴穗组建新党，他设宴送行婉拒了⁴，雷震约他赴台经商他也婉拒了⁵。对于党、派、会、盟，明剑已经信心大失，他只想身在民间，为国为民多办些实事。

上年末，他写就《明剑初步十愿》一文，开年又做了些文字修订，他发下了十愿：

一、愿乡村男女老幼均能自治，终年安居乐业。盖各乡能平安既全县能平安，推而至于一区一省全国全世界均能平安，则进入大同之治矣；

二、愿家乡无锡能仿瑞士，吸取外来人士游览风景之收入，平衡公私支出，至少可供养全邑三分之一人民；

三、愿江阴筑港，外轮舍上海直达江阴，更藉电车、铁路以达无锡，完工业中心之区；

四、愿仿各西方国家例，筹措奖学金奖励清寒子弟之力学；

五、愿筹集基金设文献馆，编印先贤著述，收藏地方书志；

六、愿捐地设无锡公墓于重庆；

七、愿筹集基金襄助文化事业，因深知文化事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且目睹文化界服务人士之清苦之故；

八、愿筹集资金傍大学而设颐春学院，因深知七十以上老者，办事既限于精神，废事亦有所不能，其苦闷与无聊尤甚于少年之失学，壮年之失业之故；

九、愿募集资金设立工业研究奖励基金会，因目睹我制造发明古

3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十一日，胡厥文，胡越中，颜耀秋，张汝励四人来锡，寓吾家三天，委组民主建国会事，辞之。”

4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十七日，吴宪滕约赴穗，辞之，并设宴送行。”

5 《八十忆旧》薛禹言——“……雷震约他赴台经商他也婉拒了。”

国，近代发明亦不弱于欧美却少有成就，考其究竟，社会无同情协助也。

十、愿出资建华阁大礼堂，托儿所，儿童公园，儿童图书馆。

明剑的发愿简单至极，既没有难懂的术语也没有高深的理论，乍一看去很像是一个普通乡村知识分子在新年开元之初对家国，乡土和亲人的祝祷。但如果你闭目深思，让这十愿在头脑中一一展现，岂不正是田子泰的“无终山都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改革工场”和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的情形，一副栩栩如生的无锡“民生图”吗？

60年白驹过隙般过去了。走过了无数无谓弯路的无锡人，如今又摸索着在走薛明剑这个将他们的家乡推向世界的第一人理想中的老路。可惜无锡已不是60年那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太湖的蓝藻，惠山的尘雾，江南特色民风的淡化，让她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代价去苦苦寻觅一种最适合的模式。

扯远了，让我们还是回到60年前。

年初，明剑和荣毅仁为江南大学选择校长事奔波于锡沪杭之间。江南大学首任校长，法学家章渊若于1948年去职赴美，寻找合适的校长就成了校董们的当务之急。在那个时代，校长就是学校，校长的性格就是学校的性格，薛明剑们深知这一点，学生们也心急如焚，他不得不一边寻贤，一边安抚学生。这个命运多舛的大学至今安在，并且已成为所谓“211”重点大学，但其中的坎坷跌宕却一言难尽，不再详述。

他仍在为泰伯文献馆购进大批志书，同时结束在川时成立的二十个允利企业业务；

他访教育厅长，催询教育学院经费和贫困生补贴；

他访保安厅长，力陈不能再事征兵；

他访省长何梦麟，力陈地方公粮不可再行借出的利害；

他召集成立无锡县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设立总务、联络、自卫、生产安全等小组以维护地方民众安宁。

明剑 1949 年上半年的日记佚失了⁶，但从《五五纪年》看他在 1949 年的心绪还是很清晰的。这一年的记录已经不能称作“年记”，几乎可以称作月记，周记或日记。从一月到七月，他一共做了 84 天的记录，直到 10 月访东北老工业区归来嘎然而止。从这 84 天的记录中我看到希望与疑虑，惶惑与镇定一直在他胸中纠结缠绕，令他疲惫不堪。

他开始着手捐出土地和种子基金并物色基金会人选，一件件落实年前所发十愿，先后为乡村建设基金，苏南工业中心建设基金，文献馆、图书馆基金、协助文化工作基金、江大及颐春学院基金等筹集到小麦一万七千五百包。

三月，明剑赴南京参加立法委员会，商议经济及停止征兵案。除了一如既往地疾呼停止征兵征粮，明剑也实在是无技可施了。为民生鼓与呼了几十年的嘴，眼下可能不得不闭上了⁷，不过最后“言而不罪”的数月他还是没有忍住。

他致电行政院何应钦、国防部徐永昌吁请停止征兵，否则必致天怒人怨⁸；

他赴（南）京听张治中、邵力子两代表报告和谈事⁹；

6 薛明剑 1949 年上半年的日记佚失得十分诡异。这本应该最能读出他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极为频繁的社会活动（例如斡旋和平，保证民生）和极为复杂的思维活动（例如对新旧政权的认知等）的宝贵史料，却在 1948 年下半年和 1949 年下半年有幸存留下的两本之间神秘消失，了无踪影。相对亲属们怀疑的“毁于文革”，本书更倾向于明剑出于对不知哪一次“运动”（“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四清”或“文化大革命”）的恐惧，自己销毁了这本日记。

7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余过去无会不建，今实无话可说，故已多时不说话。历数三年来办理乡政，深知乡中痛苦万状，保甲长经政府要粮，要兵之困难，详述无遗。次述个地方对于现有之保安团士兵，尚不能吃饱穿暖，安心服役，如再妄事扩充，无疑养虎遗患。”

8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与翔风代电行政院何应钦、国防部徐永昌，略云：全民方吁请展缓征兵，而无锡大事指名征集，一意孤行，迅肯电令制止，俾免扰害地方。”

9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二十九日，赴京听邵力子，张治中两代表报告和谈事。”

他致电陆定一等中共朋友，请求考虑人民对和平之渴望¹⁰；

他在李宗仁的宴会上他力陈和平之重要，两党不可再兵戎相见¹¹；

三月十日，立委许闻天、金绍先因策反镇江江防司令陶鸿钊投诚解放军而被捕，明剑联合萧觉天等十人在立委会发言，强烈要求保障人权，查办抓人者，要求主管首长到会报告。当日《大公报》载，薛明剑在会上疾呼“立法委员都可以随便抓，遑论百姓？我们都应归去，何贵立法哉？”¹²

明剑对国民党失望极了，对共产党却也不抱希望，“君子不党”！“君子不能党”！！“君子万不能党”！！

4月21日解放军江阴渡江成功，从江阴直逼无锡北栅口，23日占领无锡城区。旧政权瞬间土崩瓦解，县政府焚毁文件，县长和公安局长望风而逃，商家停市，市民闭户，无锡城呈无政府状态。几天前已预见局势势必突变的明剑，紧急与各乡绅领袖及申新管理层开会，磋商如何维护村镇和工厂的正常秩序和日常生产。

短暂的混乱后市面恢复了正常。解放军军纪严明，对民众秋毫无犯。经历了漫长的抗日战争和紧接着的三年内战，江南已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无论如何，停战，对于明剑和所有普通百姓都是天大的好事。军管会来了，新市长来了，最让他又惊又喜的是四弟粤果——孙冶方也回来了。兄弟俩已多年未见，小弟也已年过四十，虽然又黑又瘦，可那双星眉剑目还是犀利不减当年。

他是胜利者中的一员。

10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四月）十四日，代电邵力子，陆定一，努力和谈之完成，以负人民之渴望；”

11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三月）三十一日，赴京，午应李德邻邀宴，强调和平之重要，不可再以兵事相见；”

12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立委同席许闻天、金绍先被捕，余与萧觉天、武和轩等十人在会发言，并决议：一.保证人权；二.将主办人立即查办；三.着主管首长到院报告。”是日《大公报》载薛明剑说：现在已不单是本院两位委员的问题，以江苏省为例，还是到处捕人，老百姓的痛苦实千倍于二位立法委员。可是老百姓不敢说话，立法院应当替他们想一想，否则我们都应归去，何贵立法哉？”

冶方是从苏北赶往南京的路上专程转道无锡会见亲人的。虽然他绝无衣锦还乡之意，亲热地和二哥以及诸亲友晤叙，还赞扬二哥对保存锡沪民族工业的贡献，讲解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政权的经济政策，但他那一身黄色的军装仍然使明剑陡生陌生和疏离的感觉。

让明剑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先是大女儿薛禹谷现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个 24 岁的薛家大小姐，1944 年在浙江大学农化系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1947 年春在复旦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夏初，她就受党的指派，以患肺病必须回家乡无锡修养为借口，从复旦大学助教位置上辞职到爸爸任校董的江南大学任教，其任务就是通过父亲薛明剑做荣氏家族的统战工作，力挽申新系统不要迁厂台湾或香港，为锡沪以至江南和全国的民族工业做出榜样。

明剑并不知道女儿的真实身份，但他读了女儿带给他的，一位叫做毛泽东的人写的一本书《新民主主义论》。对于这个人明剑已闻名日久。从内心深处，他对革命的大人物是怀有恐惧和排斥心理的，虽然四弟冶方早就是个共产党，他却总当四弟是个造反的秀才，当不得真。但当女儿告诉他，新政权将要实施的建国方略“由‘新民主主义’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再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就是那位毛先生提出的建国方略，他立刻表示了高度的钦佩和赞同。

作为一位民族工业家，明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先生提出的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经济纲领自然非常拥护。毛说这个纲领是对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向未来社会转变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的集中概括，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还有着没有充分发挥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毛甚至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即使革命在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¹³。既有这样的建国方略，薛明剑们何愁在新国家没有用武之地？

1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8年版

然而这骗局太大了，大到连薛明剑也骗过去了。这个留待后面详述。

其实在解放军即将进城之际，明剑在走与留之间曾经非常踟蹰。

据女儿禹选回忆，那天早晨一家老小都已经坐进雇来的轿车中准备“逃”去上海，却只是绕着无锡城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家中¹⁴。这是明剑的徘徊还是计谋，因为他1949年上半年日记佚失已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很快帮助大女儿禹谷与荣家人接上了关系，使这个年轻而勇敢的姑娘得以直接面见荣德生，将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转达给这位真正的资本家，令他不顾大多数荣氏家人和企业同人的竭力说服，毅然放弃了迁厂港台计划，为新政权留住了中国最大的纺织和面粉加工企业。

这对解放初期稳定国民经济起到的异常巨大的作用迄今无人否认。

四女儿禹满也回家来了。抗战中她在上海读书，有一天在课桌上留下自己写的请假条就消失了，而苏北新四军的队伍里则多出了一位名叫薛蕙的女战士。现在她已经是一名年轻的老革命，刚和战友夫君汪德芳一起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了亚洲最大的电厂东北抚顺电厂。

明剑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

他已经五十五岁，阅人无数，阅世极深，他做不到“欢欣鼓舞，雀跃迎新”，但他可以做到镇静有序地把手中的实业移交出去。在《五五纪年》的最后一章，他说今后将“不再过问他事，并作居沪长期打算，以期回复民十前情状，誓不再事资产阶级剥削生活。”

这最后的一句话本书深深怀疑是明剑后加上去的，在阅读他的日记时果然发现是他在1951年后加上去的¹⁵。将自己近40年的职业生涯称为“资产阶级剥削生活”，这种忐忑和无所适从已如见如闻。从几十年后禹谷对父亲的叙述中，我还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不安。

当1949年4月28日，禹谷向父亲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14 薛明剑第五女薛禹选口述

15 对比《薛明剑期间 五五纪年-1949》最后一章与《薛明剑日记-1949(下半年)》结果

时，“爸爸看了我很久，才说了一句话：‘共产党都安插到我的家里来了，他们能不胜利吗？’”¹⁶。

冰雪聪明的明剑是个“识时务者”，再加上原就平实的个性，他掩藏了内心深处的不快和不安，配合着新政权的接管。毕竟有禹谷女儿讲给他的共产党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做底，他对新政权还是抱着希望，绝想不到他们变脸会如此之快。

六月五日他与在沪立法委员萧觉天、葛敬恩等四十余人“通电反正”，即“与旧政权脱离关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¹⁷。这个通电由邵力子转周恩来同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但是旋即明剑就告“旧病复发，急需长期修养”，将一切荣氏家族实业职位辞掉并将地方公益，政治“亦借此全面卸肩”¹⁸。

薛明剑的心底对新政权的疑惑开始看得见摸得着。

反观新政权对薛明剑的态度，总感觉前后十分矛盾，先热后冷继而厌弃，大不同于对待那些进入新政权参政机构的前朝遗老们。

中共高层董必武、饶漱石、高岗、李富春等都曾和明剑约谈，他们十分看重他在江南工业界的地位和经验。人民政府4月接管无锡，9月就请明剑到东北老工业区参观。董必武并致信高岗，介绍薛明剑是抗日时期自己在参政会的同席云云。明剑在沈阳、抚顺、大连、鞍山、哈尔滨、安东等重工业城市都受到新政权党政要员亲切的接待，规格甚高。共产党起初也还是非常看重明剑这位工商业奇才，知道他们在建设国家，巩固政权方面有旁人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政权的哈尔滨市法院甚至立刻就请明剑起草农垦加工计划书。

此行东北，明剑还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要为新建一座热水瓶厂选

16 薛明剑长女薛禹谷口述

17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六月)五日，与在沪现任立法委员萧觉天，葛敬恩等四十余人商议通电反正。”

18 《薛明剑文集 五五纪年-1949》——“余因旧病复发，急须长期休养，不仅职务求得解脱，地方公益及政治亦借此全面歇肩，今后拟遨游各地，兼事著述，不再过问他事，并作长期居沪打算，以期恢复民十前情状，誓不再事资产阶级剥削生活。”

厂址。中国人离不开热水瓶举世皆知。莫笑话这种眼下已不多见的民生用品，就在不久前它还是每一个稍微像样的城市家庭的必备品，农村家庭中的奢侈品和婚嫁聘娶的定礼，更何况薛明剑的年代了。据四女儿薛蕙的回忆，他曾选中了长春，从他的日记中我甚至发现了他设计的瓶壳图纸，可见直到东北之行开始，他还是志在实业的。

但是这个热水瓶厂却没有像那些抗战时期大后方如雨后春笋般被明剑建立起来的工厂一样的命运，它永远停留在计划书上了，这份计划书的主人放弃了它。

东北之行不是令明剑更加了解和靠近新政权，适得其反，凭着几十年做民族工业的经验和直觉，明剑的疑虑变成了焦躁。他私下对大女儿禹谷说过这样的话“东北工业这样搞是不对的”。

薛明剑在东北看到了什么令他不安的东西？在老人零散的26本日记里，本书著者迫不及待、单刀直入地就翻开1949年下半年的那本（上半年的一本佚失在文革的大抄家中），结果令人失望。没有一句批评，甚至没有一句评论，整个东北之行的记录就是流水帐和数据，什么轧辊、纺锭、火油、焦炭、硝酸啦，什么涨跌、成本、利润、统购、核算啦，什么工时、规格、舶品、供求啦……涂涂改改，密密匝匝还都是繁体文言，怎么也看不明白。

然而就是从这些数据中，从事制造业30多年的薛明剑得出了极负面的结论。他的结论绝非空穴来风。在一派莺歌燕舞中听出不和谐音，在一片光辉灿烂中看出破绽和荒谬，无论如何这都是令当权者扫兴、恼火以至愤怒的事情。东北之行后的明剑是睿智还是愚昧，东北工业“这样”搞到今天，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请读者见仁见智，但薛明剑对新政权、新政权对薛明剑态度骤变的根源一定就在这里。

1949年对于孙冶方却是“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日子，他是胜利者中的一员。为之奋斗了近三十年的新社会终于来到了，再矜持的人也无法掩盖狂喜之情。

1949年冶方随大军从苏北南下进入南京城。

他一头冲进南京军管会，当他重新见到老朋友、老战友、老同学——新政权的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时兴奋得不能自己。

“我们胜利了！我们又会师了”！

握住修良的手不放，孙冶方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是“请我吃糖！”那时中共党的干部全部实行供给制，修良虽然身为市委书记却也没有一分钱买糖请客，只能好言安慰这个曾经的小弟弟，“等上海解放后我一定请你吃！”¹⁹

一提起“上海”二字，冶方更兴奋得眉飞色舞。离开上海八年了，“孤岛”中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还宛如昨天，多么希望能重回故地，去看看新社会中的上海。

他如愿了。上海很快解放，冶方随同大军进驻上海，接管了国民党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驻沪机构和物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他担任处长，年底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工业部副部长。

从新四军时代起就开始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他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新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摸索出一条适合新中国国情的工业和经济发展道路，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和迫不及待想要做的事情啊。生命之书翻开了新的一页，虽然他一直是理论经济学家，可他喜欢歌德那句万分浪漫的名句，“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

他的生命之树正根深蔓盛，枝繁叶茂。这一年冶方 41 岁。

19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十五 沧浪之水

1949年后的冶方一直忙碌在新政权工业和财政两个决策部门。

他深感经验的缺乏和理论的薄弱，但那时他还没有建立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的想法，而是渴望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用以新中国的建设。

他提议和具体负责筹建了上海财经学院并兼任首任院长，这个学院的工业经济系就是二哥明剑兼任校董的荣氏江南大学并入的。他希图尽快培养出新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型，研究型和实践型人才。

他翻译了《战后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经济中的技术进步》一书，期望能从中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他深信这是自己的党的时代，也就是自己的时代，是能让他大有作为的时代。虽然他已历经磨难凡二十多年并已年过四十，却依然保持着一腔纯真的男儿热血，恨不得一肩就挑起建设新国家所有的重担。

冶方从来不是个盲目的乐观者，对自己国家薄弱的经济底子，他了如指掌。早在12年前的1937年，他发表的《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一文，就以翔实而冷酷的数据，清晰地将中国低下的生产力和陈旧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几乎为零的重工业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

是什么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经济这么落后的一个大国，出路在哪里？排障开路的程序在哪里？他痛下决心要研究和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又一次，孙冶方捧起他的“圣经”——《资本论》。

俄文已经非常熟练的他，依然不能满意自己在语言程度上对它的理解。为了接近这本革命圣经的精髓，年过四十的冶方请一位白俄

老太太做老师来做精读的提高。从内心深处，孙冶方始终对俄文版的《资本论》心存怀疑，更遑论第四手的中译版了，这是他后半生极其渴望学习德文的唯一原因。

五十年代，孙冶方已经是新中国屈指可数的理论经济学家。除了醉心于经济学，他对一切和经济学有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由衷的尊重并且充满兴趣，例如工程学、材料学、历史学、特别是数学，那是他经济学“专攻”的强大辅助。他曾对中国微生物专家，侄女薛禹谷说过这样的话：

“不懂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是一个次品。”为此，他在四十四岁“高龄”上正式拜师我国著名数学家顾毓琇，开始学习高等数学。

冶方对“正品”和“次品”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到了今天反倒很难说还能否成立。眼下在各类 MBA，EMBA，各种经、金、财学系教授经济学的“著名”或不甚“著名”的经济学家们林林总总，何止百千，坦率地讲，还真不敢用这个标准来论断他们。

多年高度紧张和劳累的工作使冶方的肝脏受到了损伤，从 1952 年到 1955 年他不得不放慢工作的频率，在上海、青岛、家乡太湖等地边疗养边工作。1954 年，病中的孙冶方仍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然而这次他实在是无力和病魔搏斗了，不得被送到他的第二祖国苏联，在维辛托夫斯基疗养院治疗了半年才得以康复。

像孙冶方这样既有科班功底又有实践经验的经济理论家中国实在是太缺乏了。回国后他继续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这是孙冶方从政开始到去世为止在官场上做到的最高级别。从今天的眼光看，他做官往高说至多也就是个“副部级”，何况也没当几年就去了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可他在中国政坛上闹出来的动静之大却非比寻常，尤其是他和顾准反复唱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那可真算得上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出大戏。

关于顾准，将在后面专门叙述，任何记述孙冶方生平的文章不提顾准都是不完整的。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这样一段话：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是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中国从表面看是个轻“商”轻“工”，重“士”重“文”的国家。“士农工商”曾是亘古不变的座次，只是到了现代，“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头衔才算渐入佳境，不再被人不屑。但是纵观中国大历史，从商鞅、李斯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眼下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学专家大师，有哪个不想“为王者师”，又有哪个王朝或政府不是应验了凯恩斯的谏语“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好为王者师”，与其说是中国历朝历代经济学家的通病，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宿命。顾准不也曾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刍蕘之献”¹能献给“明主”吗？如前所述，历来中国士大夫口中的“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和现代意义上外来语的“经济学”一词，在词意上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前者是“学得屠龙术，货予帝王家”中的“术”，而后者则是作为研究人类生产，交换以及社会财富分配行为的学问。和西语中“经济”主要指称“个人行为”不同，汉语中“经济”常常是“当朝者”或者是“当权者”的行政行为。经济这个东西在这片土地上，一般情况下只能由不懂或者不甚懂经济的当权者们才能去实践，但可怜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做不了“王者”，他们只能“为王者师”，却往往没有好下场。

孙冶方和顾准都没有逃脱这样的宿命。

主观上他们并不不要做什么“帝王师”，可很实际地说，一个官方经济学家除了这一份职业是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好干的。以孙冶方1956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职位看，他已担纲了国家首席经济理论家的重担，而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位置反倒成了他的辅业，是任他纵观国家经济局势的“大沙盘”“气象站”“数据库”以及

1 顾准的文存、文集、自述、文稿以及大部分涉及顾准的书籍文字都频繁提到“刍蕘之献”这个成语。

培养年轻经济人才的“博士点”。

冶方认为统计部门是学习经济的最好去处。每一张综合统计表都是可以写出论文的²。以这样的心态对待统计，冶方很快看出了“全本照抄苏联”的中国经济大盘上巨大的谬误和危险。各地劳民伤财做出的堆山填海般无用的数据，沙器一样在他眼前堆积起来。凭着经济学的功底，他意识到这种“赵姨娘般没有威信可言的统计数据”³不但无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还必将误导不懂、不甚懂或稍懂经济学的当权者们，令他们生出盲目的激情并反过来作用于社会，这对社会、民生都将贻害无穷。

面对新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作为新政权下的经济学家，冶方也曾试着去理解和修正它。但他很快发现这是个与人的天性，社会的普适性和普世性以及最基本的经济规律相悖，极其荒谬而愚蠢的体制。

1956年孙冶方率国家统计局代表团赴苏考察。此时的他已经做了近两年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对中国各种宏观经济数据他不敢确认了如指掌，但还是认为胸中是有数的。在苏联，他观摩在建项目，阅读已公开的报表，直接和工厂的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庄员交谈。得益于17岁就打下的俄语“童子功”，他冷静地看，专注地读，倾耳地听，不动声色地作下了尽可能详尽的记录。

和哥哥明剑一样，冶方也是一个数据崇尚者，在理想和激情与数据发生冲突时，他一定是毫不犹豫地偏信数据，用数据去判断理想的对错，压抑激情的滥殇，得出尽量接近真实的结论。他和苏联统计学和国民经济平衡学方面的专家就价值、价格、成本核算和总产指标等问题做了长时间的交谈和讨论。随后他又赴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统计局考察了两周。

几乎用不着动用什么深厚的学术素养，仅仅出于统计学家的直

2 《孙冶方全集 第3卷 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和改革统计体制的问题》——“在这里（统计部门）不仅接触到一般的实际，而且接触到综合的资料。这些资料每份都提出不少问题，专心钻研都是可以写出博士论文的。”

3 同上——“统计部门变成了长官意志，随心所欲，任意使唤的小丫头，就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没有威信。”

觉和经济学家的基本知识，他已经对苏联和东欧在斯大林时代奉行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后斯大林时期苏东对经济政策的修正。

他极为赞成这种修正。

回国后冶方撰就了日后著名的“大毒草”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用他在苏联看到的一期《鳄鱼》杂志上讽刺漫画“一个服装师把一块狐狸皮缀在一袭完美的狐皮大衣上以增加服装店的总产值”，来说明不计成本追求总产值是多么愚不可及，大声呼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学也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声音。

本书这里很想写“呼出真理的声音”一行字，却没有勇气写出“真理”这两个字。

这个词汇不可能属于世间而只能属于上帝。对于人，所谓“真理”是只能无限地接近却永无到达之日的彼岸。孙冶方是无神论者，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就是所谓真理，但这些思维结果充满了智慧之光却是不疑的，这种相对比较接近真理的，放在几十年后将是不言而喻的理性的声音，对于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兴头上的新政权却极不顺耳，何止是不顺耳，这是需要立即扼住的刺耳噪音。

就像事先约好、现在遥相呼应一般，这年顾准也写成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次年发布于第二期《经济研究》。

这是“孙顾反革命联盟”的发端。

对于单纯追求“总产值”，冶方深恶痛绝。他明确提出“总产值指标不能作为国家计划的综合指标，它只会推动企业去制造笨重而昂贵的产品”。这不啻于明目张胆向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接着，他连珠炮般向各地审计部门钉是钉铆是铆提出了各种具体要求统计的依据、抽样的方法、报表的客观性评估、数据的来源等等，同时也上报中央。一句话，中国不能再跟风了，更何况苏东已经在修正，我们却还在“瞎搞乱搞胡搞”，太落后太愚昧了。改革现有的统计制度，独尊统计的真实性，反对个人迷信和长官意志在中国已经刻不容缓。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和“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中国，这是多么“不顺耳、不懂事、不自量”的讨厌声音。上面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可这个“宫廷经济师”却连看都没想到去看一眼。

他从不知道“看脸色”这门“学问”，他没功夫，也不屑于看。

接着，冶方极为不识时务地提出“利润挂帅”的主张，力主统计工作要重新建立起以利润为综合指标的体系，并且比喻为“利润才是牛鼻子”，牵起这个牛鼻子，再庞大不驯的牛也会跟着走。他利用一切机会疾呼“要为社会主义创造利润！利润！！利润!!!”，又用鼻孔里出冷气的不屑嘲讽那些害怕利润范畴的经济学家，说他们“像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⁴

“像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

这句一针见血地指明某些人心中其实是有“利润”这个鬼的，却又囿于各种原因对它唯恐避之不及的刻薄真话，真叫是入木三分，伤人伤到骨子里。

人们现在都知道，孙冶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思想的产生受顾准先生影响很深，孙先生自己也一再强调这一点。

但还有另一种可能。

在薛明剑 1956—1957 年的日记中，屡屡可见他工工整整贴在当天日记页上的各种票证。从五寸的布票，半两的粮票到四分之一两的油票、糖票、肉票，不著一字却非常刺眼。这是从前 30 多年日记中都未出现的“奇观”，而这两年正是他的四弟孙冶方在作着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这些票证少见大额，这可以有两种解释：

1. 他舍不得把宝贵的大额票证留下不用；
2. 不著一字，仅仅用数据说话。

两者又何尝不是异曲同工。

从 1949 年冶方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到他 1954 赴苏联疗养，从

4 《孙冶方全集 第 2 卷 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害怕‘利润’范畴，有些像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

该年年底回国到 1955 年他被调入北京国家统计局，再到 1957 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所，10 年内明剑，冶方两兄弟接触极为频繁，这很出人意外，尤其出乎薛家人意外，因为两人就是两个社会的代表人物，民国的和“新中国”的。薛明剑幸存下的、写作于“新中国”的 17 本日记中有无数他们兄弟相见相谈，相知相交的记录。虽然依薛明剑 1949 年以后记日记的习惯已经形成“仅陈述事实，不诉诸评论”的风格，所有记载不外“下午访四弟，所谈甚欢”“四嫂带四弟函来”“四弟来访，谈至深夜”“四弟自北京来函”“四弟谈殊久”“和四弟谈农业”“和四弟、德方（四女婿，新政权能源工业高级干部）谈工业”等豆腐帐式文笔，但只要认真去看，往往能看出端倪。

冶方身为彼时有资格安装电话的高级干部，明剑上海的家中直到文革也一直是电话的，如果哥俩只是想聊聊身体家常，时时通个电话足矣。孙冶方位居中共要职，很难相信他每次都是去说服哥哥改造思想、搞什么“一帮一，一对红”⁵的。相反，孙冶方从五十年代就开始的“犯错误”和哥哥倒是不无关系。

冶方在沪工作以及后来调京工作期间常常繁忙不堪，每次到苏沪浙的时间表也安排得十分紧张，可拜访自己早已不受“新中国”待见的“资本家”二哥，这位四弟倒是从不吝时间、从未有顾忌。他们“叙谈”“长谈”“深谈”“畅谈”，常常乐此不疲，通宵达旦⁶。他们谈二哥的“东北之行”，谈工业，谈物价，谈废物利用，谈时局，谈历史，谈苏联东欧……明剑的日记里甚至有四弟“指导”和“批改”二哥写的坦白交代的文字⁷，说到资本和资本家，不是指其批判“不够深刻”，反是嫌二哥说得“太过”，这二者并非不需要而是还不够！

无论你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还是“人之常情”的眼光看，两兄弟都必有深层次的交流，他们的对话绝非泛泛而是精神和心灵上的

5 彼时术语，意为一人对另一人面对面的“思想教育”。

6 查 1949-1966 年《薛明剑日记》，仅涉及与四弟“叙谈”“长谈”“深谈”“畅谈”及往来信函达近百处。

7 《薛明剑日记 1952.5.7》——“看四弟病并将思想坦白文稿交彼阅，彼深以太说过大处（如说资本家丑恶处）嘱须改去。盖资本家并不是不需要云云。”

沟通。一个官方理论经济学家兼高级国家公务员碰上一个民间社会经济学家兼老道的工商实业家，又是同根不相煎的亲兄弟，他们必有思想火花的碰撞，按现在最时髦的说法，他们之间必有“头脑风暴”的产生，那后面的故事就真的不好猜测了。

1957年，孙冶方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

所长？所长是个什么级？在这个官本位的国家简直就算不上是个官嘛。是的，从这个角度看，冶方和他的二哥明剑真是太像了，他们从来没有把“仕”作为一种“途”来看待，那只是个工具，做“仕”是用来做“事”的。

说起来官不大，可这一位置不啻新政权的“宫廷首席”经济学家。

冶方参政的意识一点不比明剑当年弱，他在政坛上闹出的动静更是大大地超过了二哥。他做着“所长”，却兼着国家计委的党组成员，这样的职务安排在今天看不啻为“本末倒置”，他却认为相得益彰。4月，他同苏联顾问一起在江苏调查统计工作凡40天，其中也到了家乡无锡并一呆四天，和三哥萼林见了面。

明剑是年5月9日日记写道：“三弟自锡来沪……并谈四弟在锡四日，曾说我不如孙卿⁸聪明，何故迄今不肯出来问事。三弟答以二哥确有不同，只看抗战时期二哥之坚定可知矣。他人则虽不居名，而实际则幕后操纵。胜利如再延缓若干年，一般人必卷入无疑……”。

三弟转达了四弟希望二哥出来“任事”的希望。此时已是1957年，天真的四弟居然还在希望能和才华横溢，经验丰沛的二哥共商国是，他何止是“政治上不成熟”，说他政治上麻木甚至迂腐都不为过。可冰雪聪明的二哥却早已经闻到了比8年前更为不详的味道，“出来任事”？他连想都不愿意想。

“胜利如再延缓若干年，一般人必卷入无疑”。1957年和“胜利再延缓若干年”有何相干？“一般人”又是指谁？一句似是而非之

8 孙卿即钱孙卿，钱钟书伯父，民国时期无锡商会理事长，“新中国”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苏南行署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民建副主任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撤去本、兼各职，文革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975年去世。

语，细细品来却令人后背发冷，老朋友们去世的去世⁹，自戕的自戕¹⁰，被捕的被捕¹¹，他薛明剑躲还躲不及呢，在谈及“四弟在锡四日，曾说我不如孙卿聪明，何故迄今不肯出来问事”同一天的日记里，他已在筹划“决定往黄山养蜂”了，其明智和恐惧了然纸上¹²。

四弟孙冶方却绝无出世的想法。

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他的党已经从共工的角色转换到了女娲的角色。“解放区的天是自己的天”，任由女娲本身的无知而把天捅个窟窿出来殃及天下芸芸苍生而坐视不响，他做不到。作为一位理应对任何事物都“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共产党员，不幸这件事却是他最为畏惧的。

这一时期他有大量的文章问世，其敢讲敢言的程度在党内达到了可以形容为“骇人听闻”的程度。但是这些文章几乎全部用的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内参”形式，他不愿也不能对外发表，他要为自己的党“藏拙”。如今虽然事隔已经 50 多年，可这些内参、哪怕一份也好时，依然被告知“不可以外借”或“尚未解密”，《孙冶方全集》以及《遗补》删除了这些东西，只能从彼时当事人或在场者口中听到一些，就像二哥薛明剑遗矢的那 30 多本日记一样。

无论命运对孙冶方多么不公平，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至死都没有改变过。少年时他渴望为党献身，年轻时他苦苦为党守节，中年时他既要为党“补天”又要为党“藏拙”。虽然此时他还没有料到将来到了老年自己还要“为党”身陷囹圄 7 年，这和今天的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动机和行为完全不是一回事。

看薛明剑的日记，看孙冶方的文章，仿佛能听到两千多年前那位“莞尔而笑，不复言，鼓枻而去”的渔父留在身后沧浪水面上的一串又空灵，又悠远的歌声。

9 《薛明剑日记 1952.7.29》——“(荣)德生去世”。

10 同上 1952.9.7——“冠生园店主冼冠生跳楼自杀”；1957.11.14 “知同学王普函自尽”；1958.1.9 “知梅焕藻自杀”。

11 同上——1957.4.5 “访孙凤翔知被捕”。

12 同上——1957.5.9 “张里元来谈，决定往黄山养蜂”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沧浪之水，清兮浊兮，弟弟有如行吟泽畔，深思高举的屈子，哥哥则像沾泥扬波，哺糠啜醢的渔父。许多人评价这兄弟两人，弟弟太天真，太执着，太迂腐；哥哥太世故，太聪明，太圆滑。

不是这样！

屈原是一个民族所需要的，可屈原多了的民族一定是不幸的。而一个多是快快乐乐的渔父而少有屈原的民族则前途无量。

十六 不跪

如果说上世纪30-40年代是哥哥薛明剑生命中一段华彩乐章，相对弟弟孙冶方，其一生最光彩夺目的，应该是中国国门洞开后直到他去世后的那几年，怀念和赞扬他的文字在全国铺天盖地，其数量和重量仅次于周恩来。但实际上，孙冶方生命交响最激越的乐章奏响在上世纪50-70年代。这十几年的孙冶方，从“人生际遇”的角度看无论如何是灰色的，失望、愤怒、悲哀接连不断，申饬、批判、羞辱接连不断，从撤职罢官到锒铛入狱，哪有一点光明的色彩和欢快的旋律？

可你听过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第2乐章吗？那喘息般的律动和呻吟般的慢板如漫天乌云中隐隐的滚雷，遥远平线上绰绰的闪电，没有回旋的婉转，没有咏叹的哀怨，没有协奏的绚丽，一个个音符却箭簇似的直射人的肺腑，内中敛藏的力度和将要爆发的征兆直教人魂动魄惊。

用这支交响乐表现冶方的生命华彩最是贴切。

这个有血有肉有情感，身为“新中国”首席经济师的男子，人在宫廷却始终腰杆笔直，不下跪、不叩首、不喊“喳”、不贱己。而这“四不”是当年多少中国读书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

人们至今找不到他任何的坦白、交代、检讨之类文字。

在那个凡有书写能力的人都必须写出各式各样的检讨书、坦白书、交待材料、认罪书之类无聊无趣文字的反常识年代，从国家主席到公社社员，从耄耋白首到黄口小儿，写这种东西是个常态，几为国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仅薛明剑一人就有数十万字的坦白、交待、检讨、检查、认罪书。文革过去，他的这些文字装了整整一麻袋，他老

人家一篇 1.4 万字的真迹如今已被文物爱好者收藏。凡那时过来人，人人皆有如此文字，只是没有像他那样“传世”而已。亿万人从遣词造句到文风文笔，“亿”篇一律，如出一辙，“我犯下……的错误（或罪行），辜负了……的期望，请求人民（或老师，同学，同志）的原谅，我决心……悔过自新（或脱胎换骨，或重新做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云云。

国人特有的这种行可称为“贱己”，以区别于帝王们的“罪己”。

“就我知道的情况是孙爸爸 64 年就开始被批判，所以如果有检查，他的检查也可能就是解释、说明。文革中他根本不检查！四十年代有检查，57 年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只是猜测，我没有见过他的任何检查。他的所有东西应该都在档案里。”¹

“文革中他根本不检查”！

这怎么可能？难道是“大革命”中的“小奇迹”？

就连最桀骜不驯的顾准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顾准几十万字的“文存”“自述”很多也是以“贱己”的方式流传下来的。看他 33 万字的坦白交代材料，27 篇“历史交代”加上 5 篇“补充交代”，加上被“删的”“节的”“不方便收入”的，其字数和篇幅和薛明剑老先生应该是有得一拼。只是顾准的这些东西里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若能学得鲁迅先生“狂人看史书”的办法，从字缝里看，你会看到很多拍案惊奇的东西并惊诧于审查人员的愚昧，竟然看不出这些文字后面其实更加“反动”到“不可救药”的精神根源。但毕竟这些文字也和十亿人民的文风很近似，本着“一步到位，能省点事就省点事”的精神，遣词造句尽量做到旱地拔葱，竹筒倒豆，干净利落，不留后患，你想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但豆是什么豆，葱是什么葱，我说了你看不看得懂，那不关我的事。所以诸如《我的反动世界观的阶级根源及其反革命的实质》，《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等等极力“贱己”的臃肿长句比比皆是。

看中国历史，无论正史野史，正说戏说，中国人动不动就下跪、

1 孙冶方养女李昭口述

叩首、喊“喳”和“贱己”是常态、常景，钱钟书先生对前两者有个绝妙的形容词叫做“肛开臀裂”²，形象、精彩得无与伦比！始自周礼的三跪九叩颇具“形体运动”性质，国人所有劣根性和这个体姿都有关系，大概也是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少有身姿挺拔的原因。恳请中国历史片的大小导演们再导“正说戏说”时为祖国藏点拙、遮点丑，不要动不动就特写这个动作，还常常要以“团体操”的形式出现。

在人类的所有体姿中，找不出比它更难看和难堪、猥琐和屈辱的。

孙冶方的“四不”是最令人敬佩之处，也正因如此，这位瘦小的老人在他周围许多人眼中格外高大。在必须“要跪”的年代而“不跪”，其际遇可想而知。

时至1958年，整个中国被糟蹋、践踏在毛氏“三面红旗”下。这位对经济一窍不通的党魁自诩要创造“共产主义经济奇迹”，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导演了这场规模空前的人间闹剧、悲剧和惨剧，票房则是数千万人的性命。在他“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啊？”的做眉做眼、举手投足间，一大群说谎不眨眼的“跪人”被训练出来，其荒唐、愚昧、颟顸和残酷眼下已有叠床架屋的描述，本书无意再多嘴。

1959年，已经完全谈不上什么国民经济了，为害最甚之处例如河南、安徽、甘肃等省份，人们杀人而食，易子而食，吃死人更是不胜枚举。《人日》则于此时发长文《人民公社万岁》，要全民大办食堂，家家砸锅去炼铁渣。名曰“大炼钢铁”，户户拔灶灭火，名曰“进入共产主义”。中共在党魁、全国在中共带领下在世人面前无下限地彰显着国与族的愚昧。这是个没有经济学更遑论经济学家的年代，何止没有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文化、脱离文明的年代。

此时，孙冶方的经济所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以人民公社大食堂现况为主题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委婉而坚决地提出“阐明迄今

2 钱钟书《人·兽·鬼》一文中的自造成语。

为止尚未有一种经济组织是完善无缺的”³。

当这份报告送到正在庐山会议的毛泽东面前时，正是“彭黄张周”所谓“大闹庐山”之际。党魁火上浇油，怒不可遏。庐山会议直接引发了又一次严重党争，其中经济国策又是矛盾焦点。孙冶方和他领导的经济所对中国最高当局发出的、基于最基本经济学规律的警告立即被视为危言耸听，岂止是不合时宜，简直就是居心叵测！

这帮经济学家算是撞在枪口上了⁴。

中共对1958-1961年发生的人相食式大饥荒至今没有任何要“清算”的意图，甚至哪怕仅仅是“表示”。杨继绳在国际上获奖无数的《墓碑》，伊娃《寻找人吃人的记录》等，至今还是中国头号禁书。古希腊哲人西奥菲拉斯图斯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被古罗马“思想帝王”马可·奥勒留摘录在他流传千古的《沉思录》里：

“因欲望引起的犯罪比那些因愤怒引起的犯罪更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后者是不自觉地失去了理智而前者犯罪却是因为被快乐所压倒，这种罪行更加放纵也更加怯懦，是被他自己的冲动驱使做出恶事，是受欲望的牵导。”⁵

以强行实现个人重构社会的政治抱负为目的而生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应该属于那种“被快乐所压倒，被冲动所驱使，更加放纵也更加怯懦”的罪愆。如果将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海外殖民，贩卖奴隶，驱逐杀戮土著和使用童工”等行为称作“第一种罪愆”，那么把这种罪愆称作“第二种罪愆”应该是合适的。

造成过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所谓“三面红旗”，多少年来被看作是“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这次事件所产生的结果极具“第二

3 董谦（原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王绍飞（原中国科学院经济所财贸研究室研究员）《人民公社大食堂报告》

4 李向阳《走近中国经济学家 孙冶方篇》——“《食堂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在会上对经济所的严厉批评……孙冶方身为经济所的所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5（古罗马）马可·奥勒留《沉思录 来自命运的东西并不脱离本性》

种罪愆”的特质，至今也没有任何对其正式和明确否定的官方文件出现，更遑论清算。

就在毫无理性的狂热飓风中，孙冶方沉着地坚持着他的理性。

在“大跃进”正如火如荼的1958年，他就对来访的苏联经济学家索波里道出“（那是）头脑发热”的讥讽⁶：

他更直言不讳地对波兰经济学家说：“‘大跃进’是错误的”⁷；

他批评“大跃进”运动把最好的原材料变成废钢铁，把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变成了废品⁸：

他大胆提出要向资产阶级经济学学习运用数学的方法，经济学家不能是“数盲”⁹。1960年他在农村，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乡无锡玉祁镇的调研中发现并采集了大量有关“一大二公”的共产风负面的数据，这些真实却令人扫兴的数据致使他成为招人厌恶的，“该杀的”报丧信使¹⁰：

6 邢小群《顾准日记 附录：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孙冶方的罪证里还有一条，是他曾对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苏联统计局副局长索波里讲过‘大跃进是头脑发昏’，用俄语说的，他的随从懂俄语的人就记了下来，揭发了他。”

7 沈树正《锡山市文史资料 孙冶方专辑》——“(1959年)5月2日，孙冶方同4月就来中国访问的波兰经济研究所所长明兹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

8 同上——“孙冶方离京考察，看到‘一大二公’‘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升级冒进’‘砸锅炼铁’带来的恶果深感痛心。回到北京……他说‘这种唯意志论歪风造成的恶果，比暗藏的阶级敌人对国家的破坏要严重得多。’”

邓加荣《孙冶方传》——“1959年6月在人民大学召开的关于计划规律讨论会上，（孙冶方）直言不讳地说：“就速度和比例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说，不能说速度是主要的而应当说比例是主要的。大跃进中把最好的原材料变成废钢铁，把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变成废品……”。

9 沈树正《锡山市文史资料 孙冶方专辑》——“乌家培回忆：‘有一天我去了冶方同志的办公室，他向我谈了很多。首先他向我交代了赴苏学习‘经济数学方法’的任务和意义，其次他强调研究经济学必须学习数学，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方法也可以‘为我所用’。经济学家不能是‘数盲’。”

10 同上——1960年冬，孙冶方到家乡玉祁（调研）。有一位青年人愤然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刮共产风，再加自然灾害，社员肚皮饿得精光。吃不饱饭，怎么搞生产？你看看人们的面色，再看看田里的荒草，向毛主席汇报吧！’公社干部要制止，孙冶方说：‘让他说下去，我就是来听真话’。”

1961年在上海，他公开肯定美国的会计制度优于我国正在沿用的苏式会计制度；1962年他开始全面批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将它们称作“主观唯意志论的错误”¹¹。

此时多少人都已随着庐山会议“雷霆之怒”的愈演愈烈，随着国家主席都受到申饬的情景而噤若寒蝉，多少识时务的“跪人”们已经开始新一轮“肛开臀裂”，“山呼万岁”。庶民们饿着肚子高唱郭沫若作词的颂歌“……总路线光芒万丈，外层空间都照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加油干，总路线，万岁，万万岁！”¹²还宛若昨天。

到了风声鹤唳的60年代中期，冶方四周的学生、同事连同社科院的清洁工都感到了山雨欲来的浸骨寒意。当有人善意地提醒他“现在风声很紧”时，他袖子一甩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风声？对不起，没研究过那玩艺！”¹³

孙冶方从来是极端反对“超经济论”和“自然经济论”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批驳“超经济”论者抹杀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真实意义。他认为我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的不是为了一个空洞的民族光荣，也不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的独立，而正是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我们子孙的生存，即为了经济¹⁴。这个观点他一直坚持到死，人民的生存，子孙的生存就是政治，就是经济，就是政治经济学。他的这种观点在一切都“政治挂帅”的那年、那岁、那党、那国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了。姓“资”姓“社”重要还是民生问题重要，中

11 孙冶方1961年10月在上海和南京所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感想》学术报告和1962年8月1日在经济研究室第五支部“关于讨论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12 郭沫若《三面红旗万万岁》

13 凡写到孙冶方的文章书籍，少有不提及的他说的这句话。

14 《孙冶方全集 遗补 全民抗战的理论基础》——“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用不到罩上一件‘超经济’的外衣。把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称作是‘超经济’的，在字面上或许可以减少些‘铜臭’，使得我们自己可以‘高尚些’，然而却抹杀了我们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真实意义。因为我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的不是为了空洞的民族‘光荣’，也不仅是为了政治上的独立，而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更为了我们子孙的‘生存’，即为了经济。”

国不是至今还在争论吗？

然而即使勇敢如孙冶方，也没有把他对那恐怖 4 年的评价“哪里是天灾，分明是人祸”¹⁵，这样对亲人好友多次讲过的话写进正式呈报中央的文件里。对中国共产党极为忠诚的孙冶方，情愿把再明显不过的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当权者听，讲给自己的同志们听，骂我，我要讲，打我，我要讲，就算要杀我，刑场上枪响前我还得讲。

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民众的生存啊。

对那些完全不懂经济学，完全无视经济学的权贵们，孙冶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怒火和鲁迅对阿 Q 们的怒火一样，一个没有经济学的国家是连长期存活都做不到的，什么兴盛、什么强大、什么主义，都是痴人说梦罢了，这些人就愣是不明白，愣是要凭着无根据、无基础、无理论的理想和自己“朝夕间的激情”¹⁶行“即兴之作”¹⁷呢？

孙冶方难道是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者？

中国绝大部分经济学者接受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都是经过了数种语言转译成中文的三、四手文字，例如“德-俄-日-中”或者“德-日-中”或“德-俄-中”，即使译者没有任何演绎和诠释，其精确度也会大打折扣，这是任何一个翻译家都了解的常识。有位研究“控制论”的学者说，经济学上的术语和表述方式难以用中文表达之处非常多，其错译、反译之处的数量要比《圣经》汉译还要多得多。

拿最著名的，被马克思称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作例子。

开篇第一句“*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几乎所有的中文翻译都是“我们坚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生而平等”。然而这却是一个多么大，多么离谱的误译，它事关“有神论”和“无神论”这样冰火不容的世界观，二百三十多年来却被我们中国人稀里糊涂地读着，演绎着，诠释着，少有人去思

15 洪克平、李昭、沙沙禹谷等亲人口述。

16 顾准论到“三面红旗”时的言论。

17 章乃器与顾准论到“大炼钢铁”时的言论。

考为什么美国人用“created（被造）”而不用“begotten（受生）”。实际上这句一语就道破了美国本质的话还仅仅只通过了一次翻译就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那么经过两次、三次转手的《资本论》就可想而知¹⁸。

冶方最后一任秘书冒天启说起冶方读《资本论》的情况非常传神，每次出差，年轻的冒天启最要紧的事情之一就是背上老师的俄文版《资本论》，走到哪背到哪。冶方从来不看中文版，看德文版一时又办不到，这是他终身的苦恼。

中国所有的教科书说到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把《资本论》归类于马氏政治经济学核心。既然它是“论资本”的著作，那一定会讲“价值规律”吧？孙冶方既然把《资本论》做为圣经来看，那他总不会用“圣经”来反对“上帝”对吧？好，由此只能让人产生出这位“上帝”是不是他“圣经上的那一位”的疑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朱贻信、梁启超、马君武等，他们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某些区别，令孙冶方、顾准这些人在他们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祖国总是像荆棘鸟一样，情愿付出性命也要发出不祥的啼鸣呢？

正是如此！简言之就是：

“必须由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通过过渡和进化而进入社会主义”¹⁹；

“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革命的形式获得成功”²⁰。

正是如此！中共的上帝，至少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上帝还真不止一

18 见《百度百科》对首次在中国面世的郭大力、王亚南（德-英-中）译本《资本论》的介绍。

19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

20 列宁的社会发展观

个。可惜除了顾准、孙冶方这样“独具慧眼”或曰“独居毒眼”的真正的经济学人，中国的革命者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们，无人能领悟这一点。

50年代和60年代初，像三十多年前一样，明剑和冶方两兄弟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渐行渐远人生路。不是像上次那样两兄弟千里万里天各一方，而是二哥明剑越来越出世，四弟冶方越来越入世了。

沧浪之水啊，两兄弟无论是涤足还是涤纓，都请帮助他们吧。

十七 薛民见

薛明剑生命的后 30 年（1950—1980），与他的前半生相比基本没有什么建树。除了依靠早年沉淀积累的历史知识和史料做过一些文史研究方面的文章，例如年表年谱类外，他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流传下来，比如像沈从文先生在同样遭遇下写出诸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样可资成书成册的文字。那本就不是他的长项。他的长项是搞经济，办实业。在这个领域他文能理论，武能实践，举重若轻，长袖善舞。而文史类只能是他的业余爱好且并不擅长，每月 60 元薪水的文史馆员职业只能算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在中国却确实可以算是“已经够便宜他的了”。

是的，他确实算得上是“够便宜的了”。

至少他活着，并且一直活到八十五岁。像他这样的“资本家”或者“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的也没有坐过牢，没有进劳改营，没有全家被撵到乡下自食其力，自生自灭。本来就活得粗糙、鄙陋的民族大都是以活着作为生活标准的，而薛明剑确实活着。

这三十年他已经不再、也不能对政局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五十年代他还常常记录一些今天看来有史料价值的东西，从六十年代开始他渐渐学会了不讲真话，即使在日记这种最私密的文字上，他也一改从前数据连篇、人物姓名连篇的文体，变成了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流水帐，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会感觉十分枯燥。

这种表象背后是怎样的一种人生？

从他这 30 年遗留文字的字缝中，你能看到一个真实的走向衰亡的老人，也是中国上世纪一个人数很少的阶层，一个差一点成为中国由农耕文明走向工商文明的萌芽阶层，中国早期工业实业家兼社会

实践家阶层，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从绝望到死亡的过程。前一个过程极为短促，大约不到两年，第二个过程也最多不过五年，第三个“过程”基本上就不能算作过程，绝望即死亡，几乎是不容分说的一瞬间这个阶层就灰飞烟灭了，只是人还活着，尤其是薛民见，他又活了整整三十年，真不知是悲还是喜。

就在他进入耄耋之年，中国一轮新的轮回又开始了，中共和他们的党魁用去近三十年功夫阻止的这个过程，绕了一个大圈却又走向原点、从零开始了。其间的愚蠢癫顽、装疯卖傻、佯乖弄俏，不说也罢。

非常幸运，薛明剑老人从1950年到1966年的日记保存完好，它们令人喜出望外地发现了薛明剑和孙冶方精神与感情上数不清的交汇点，此外还有一些东西，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事件和人物的轨迹、社会风气的变迁、锡沪一带民俗风情的变异等等。明剑一生曾经用过五个名字：父母命名萼培，少年时自己改为锷佩，十七岁改为明剑，五十岁改为民剑，六十岁改为民见。没有“明”也没有“剑”，只剩下“民见”去看1949年后的幻化了。

这个“民”都看“见”了些什么？

全部幸存的26本日记，除1949年下半年使用印有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由左向右书横排书写本外，其余25本用的都是由右向左竖排书写本。1922—1929均使用“国民日记”本，1949年除去上述半年和的1950—1955年印有“人民日记”字样的“自制日记”本外，从1956年开始到1966年结束的11本均为“薛民见日记”本或“民间不老人日记”本，后者明显是民见自己印刷的书脊。

1949年开年，无锡新旧政权还不曾交替，明剑（本书后面将视境况混用“明剑”和“民见”两个名字）已经丢失的上半年日记想必用的还是“民国日记本”，下半年那本新式的，印有领袖头像的横排笔记本，肯定是新政权将他作为统战对象和党的朋友而赠送的小礼物，他坚持用了半年，这令人兴趣顿生。

有本福尔摩斯小说上说起过关于人类书写问题专家的刍议，一

个人的书写习惯是极难改变的，它几乎像指纹一样代表了写字者特质，其中包含着大量信息。明剑由于乐于使用这本有着特殊意义的笔记本而在1949年下半年将自己习惯了五十多年的，由右至左的竖写书法改成了由左至右的横写书法，这绝不是一件容易和简单的事情。

说它不容易，可以请你现在就试着把你熟悉的由左至右的横写改为由右至左的竖写，估计任谁也坚持不下来；说它不简单，这难道不是明剑愿意和新政府合作也决定和新政府合作的最好证据吗？

可惜这种笔记本明剑只用了一本。从1951年开始，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竖排本日记本。1949年这一本比其他25本短了整整半寸，却又列在差不多正中间的位置上，相当刺目。是明剑自己不愿意再用新式的笔记本了还是新政权不再发给他了？两者都是。

本书斗胆给各年的薛明剑日记起了名字：

1949（下半年）——忐忑之年

1950——小作坊—勤业年

1951——厂事极为艰辛年

1952——三反五反坦白年

1953——鹤鹑年

1954——鸡年

1955——兔年

1956——蜂年

1957——最后的真话年

1958——1966“长亭连短亭，何处是归程”，茫然凄惶年。

怪异吗？一点都不怪。

在一个怪异的年代，不怪异才不正常。假如薛明剑的日记还如他过去四十多年日记那样写法，想到什么写什么，见到什么记什么，东叫几声，西喊几句，再加上一大堆数据，那倒是真正的怪异了，何止是怪异，那是诡异，是“变天帐”，是罪恶，是大逆不道。

刚回无锡，明剑就接到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函，他被正式聘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幸运的符号。4个月前他还被新政权邀请到上海，对那里的资本家们做过报告。

临离开无锡前他还向新政府做过“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农工商同时并举”的建议，这也是老东家荣德生 1949 年 9 月上给新政权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条陈”之一。

从东北回无锡的路上他还作“客中陈”，给人民政府提了两个提案：

1. 开浚南北大运河，发展航运事业，解决水上劳动人民生活案；
2. 利用学生或另招艺徒开发各大学和专门学校内所存之机械设备案。

这期间，他几次接到邵力子力邀他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信函。在从东北回沪路过北京时他和黄炎培，董必武，邵力子和章乃器都见过面。由此推断，要他出来“服役人民”的，不可能单单是邵力子先生的一厢情愿。“新中国”是没有“在野党”的，作为一位刚刚被推翻党的前党首，邵力子应该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话语权。要薛明剑“出来问事”的应该是执政党高层而绝不是凭邵力子先生“个人好感”就能作出的决定。

可是刚从东北回来的薛明剑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彻底的沉寂。在此后长达 30 年的岁月里，他不仅再也没有“出来问事”，甚至连如此这般的意愿都没有。这位素来喜欢到处“嚷嚷”的前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至死别说嚷嚷，除了在 1957 年那个相当怪异的年份里嘟囔过几句不知所云的所谓“意见”外，就再也没有发出过任何自己的声音。而在那个可怕的年份里，人人还都被强求必须得嘟囔两句，哪怕是“领导太不注意自己身体”“门前水沟需要疏通一下”都行，否则无法过关。

1949 的东北之行对他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令他彻底明白属于自己的舞台已经崩塌，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

从明剑后辈亲友的只言片语中有个众口一词的信息，当年曾经有过一个冷酷而权威的声音，“孙冶方是革命的，薛明剑是反革命的”。

这个可怕立论根据何在？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当事人是否曾经辩解？没有记录。

1949年3月，也就是新旧政权尚在武力交接之际，一份由中共华中工委调研室做出的《无锡概况》就已摆上了各级党务工作者的桌面。其中“人物调查”篇分为“军政”“党团（特）”“工商”“其他”四栏。看其前言“且临此全国解放之前夜，匪伪内部变化频繁，仅供参考，尚希鉴阅”，可知它就是一份“敌、特”名单。

这份包罗军、警、特、宪、资、地、富、反、坏（是时尚无右）名单一共100多人，是一份政权指导性文件，薛明剑的大名赫然列在工商一栏的第二名¹：

“薛明剑，男，55岁，无锡人，住西门内序城桥7号，荣氏代言人。他和宋美龄相处得很好，连任两届参议员。胜利后以功臣自居，竞选了立法委员，在幕后策划私人事业，有米行，米厂，石粉厂，酒精厂等各种企业，现在交给他儿子薛禹言办理。曾任自治试验区区长，现任自治实验乡乡长。他弟弟薛鹤柯（即薛萼果。执法者连当事人的名字都弄错），即宋亮，留俄后在华东财办工作。他们兄弟意志不相投。”

就是这短短的几行字决定了薛明剑此后30年的命运。

“他们兄弟意志不相投”？这种完全属于个人主观思维，外人无权，更无法臆猜的，怎么就堂而皇之地上了党的文件？是薛明剑或孙治方告诉第三者，还是第三者自作聪明，因为孙治方是革命的，只能假设“兄弟间意志不相投”，依此推论出薛明剑为反革命呢？

“反革命”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没有不知道的人。谁被戴上这顶帽子，别人要不了你的命你自己也能要了自己的命，这是十恶不赦之罪。一位民族实业家，一位社会改革家，一位真心帮助新政权做了真事的人，只怕他连“正革命”都懵懵懂懂，怎么一夜之间就会成了“反革命”？！

多亏了薛明剑在江南，特别是锡沪一带特殊的声望和地位，加上他的几个女儿女婿都是中共党员，特别是小弟孙治方，四女婿汪德方已是党的高级干部，他暂时没有性命之虞。

1 第一名是钱孙卿，钱基博的孪生弟弟、钱钟书的叔父。

10月东北之行后，薛明剑很可能没有像其他受到如此抬举的工商界人士那样，做出一些由衷或不由衷的欢呼雀跃，反倒很可能道出些诸如“东北这样搞”之类的“不逊”之言，这也是“反革命”之说的立论根据吗？

是！

明剑的日记对此一字未提。他只对平日最信任、如今又最不了解的大女儿薛禹谷说了一句真正不逊的话“我再也不相信说话不算数的人”²。

谁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这是个极其极其简单的问题，你只要花上一点时间和心思去阅读毛泽东的两篇最著名“讨‘旧’檄文”，《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从它们的初版看到终版，就什么都明白了。如果再加上笑蜀先生的《历史的先声》那就不需要再向任何人问任何类似的问题，本书这里也无需赘言。

1949年的明剑作为一位“名士”还有诸多“不明智”之举。

除了东北之行用无数的数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外，他还婉拒了一切要他“服役人民”的建议。他宣称自己已对“一切隔眩”，“一切卸肩”，要他再次参政无异“滥竽充数”，以至聘书都送过来了他仍是坚辞不受³。

“隔眩”？什么叫“隔眩”？旧时代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时代你就晕眩糊涂？聘书都送去了，这是多大的恩赐，你居然不受，不是对新政权不满又是什么？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民见虽然也准备付出代价，但是代价是如此之高，高到他无法承受却又必须承受，却是他始料未及的。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生态度

2 薛禹谷口述。

3 《薛明剑日记 1949.12.13》——“最近市政府拟定15日开无锡市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顾市长知余东北返里，拟聘余为特聘代表。经余一再托钟汉X请市长勿滥竽充数。一因余离市内情况已久，对于一切隔眩，二因最近对各团体会员及代表均已辞去，不宜受任此职。三因在外日多在家日少，开会时恐误事。虽得钟汉X同意未曾提名，X又经萧XX提出通过，已将证件聘书等送来。”

令他活了下来，三十年冷眼向洋，看热风吹雨江天一色，看云横九派三吴白烟。虽无桃花源可遁作不得陶令，却也没有像他亲爱的四弟那样，受到不堪的压制、折磨和屈辱。

福兮祸兮，不评也罢。

1950，不复有幸继续使用“领袖头像”日记本的薛民见过得很惶惑。毕竟只有五十多岁，作为一个男人他正处在创造的最佳年龄。政是不会再参了，实业是不是还能做下去呢？还能像以前那样做下去吗？他看，却看不见，想，却更加“隔眩”和糊涂。

他试探摸索着与几个和他有着相似落魄遭遇的人开办了一家叫做“勤业”的复写纸厂，厂址就在他的家，上海威海卫路五零二弄四十一号，电话 38590。

复写纸也叫做印蓝纸，踏蓝纸，和今天的复印纸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功能类似，作用相当于如今的喷墨头或者硒鼓，效率虽然极低却是当年国民经济中须臾不可离的产品，是编印、誊写的重头工具，就像今天的复印机。

民见做得真是名副其实的“勤业”，从采买原料，试验生产到推销广告，销售纳税都是他和夫人孙黻铨一手操办。不但如此，民见还不改“恶习”，不到十人的小厂，不及申三零头之零头的营业额，他还要办一份小报“勤业通讯”来做企业文化。这种骨子里的东西要想让薛民见们抛弃，那真要脱胎换骨啊。

勤业厂生产的“风筝牌”复写纸和蜡纸销路都相当好，全国各地不断有订单发向威海卫路。可薛民见，这个运作过全中国最大纺织工业实体的企业老操盘手，办个作坊式的小厂却做得战战兢兢，艰辛异常。请看他 1952 年为勤业事务做的“坦白书”以及“补充坦白书”即可知一二：

“……因美帝加拿大白蜡缺货改用中国腊料……造成复写纸售出 XX 万盒……公司未能立即将价格降低……使国家人民受到损失。这是犯了严重错误……彻底交代明白求对得起领导的工人同志……1950 年二三月间物价尚有波动，发行所经费以售去百筒取五筒做经费……货物税虽然照纳未开发票，漏纳营业税十万元……又发行所

在 1950 年有临时兼职的职员六七人，照章非专任而取佣金者须纳佣金所得税，应缴佣金所得税七百余万元未缴纳。已另具坦白书报明数字……上年因有一张发票忘贴印花，依法照 30 倍处罚……曾支出请客费二十七万元，亦有违和，应行补行坦白……1950 年公司经营困难……曾由我先后垫了三千万元及三千三百万元。当时要求董事长胡庭梅也垫一些，胡先生当时答应，后来垫不出，我代他垫出五千万，均照银行规定结算利息，并照章扣付利息所得税，惟冒用他的名字及不合金融规定，特行提出坦白，今后决计改过自新……。”⁴

坦白书中提到的“拿不出一一点垫资的董事长”胡庭梅，是中国模型仪器誉印教具制造业的创始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头像、“湘江评论”“新青年”等印刷出版物就出自他手⁵，现在竟落魄至此。

银行停止放款，原料无力购买，他的客户国营百货公司天天开出违约罚单，工人工资绝对不能拖欠，勤业濒临破产。民见甚至为此赴京向邵力子、张治中求援，四弟冶方也致函沙文汉和张劲夫，力陈企业不应破产理由。政府确实没有见死不救，政府代为付清了工人工资和购买原料的款项，勤业保留了下来，只是民见成了国家（不是银行）的债务人。他无力还债，整天惶惶不可终日，随时准备着去坐牢。

四弟问他，你到底有没有条子（金条）？哥哥说我有没有条子你还不晓得？有限的所有积蓄都变成了书籍、志乘，无偿献给了国家，一家人饭都快开不出来了。四弟说那就不要紧，政府不会抓你的。四弟预料的没有错，政府没有逮捕这个无力还债的债务人，仅仅将勤业收归国有，这是“新中国”沿用至今的惯伎。

可怜民见连公私合营的浪潮都没有等到⁶。

公私合营在中国是一个“创举”，曾被人不知深浅、坐井观天地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⁷。新旧政权更迭之际，中国工业

4 《薛明剑日记 1952 年开篇（无日期）》

5 王建辉《出版与现代文明》

6 关于薛明剑的复写纸小作坊也被收归国有的过程均摘自《薛明剑日记 1951—1952》

7 管大同《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

总产值的比重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3.2%，其中民营工业的比重占 15% 左右，即民营工业占去原有工业基础的三分之二，商业方面更是占去十之八九⁸，这是无论什么政权都不得不依赖的决定性力量。新政权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不能不说是要比“强制放弃，公开没收”高明得多的政策。

然而到了 1956 年，“强制放弃和公开没收”就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压倒了“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其原因不在本书探讨范围之内。

薛明见又幸运又窝囊，连“糟方（介于资方和劳方之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代理人、管家、和奴才，“新中国”江南一代自造字——上次下力，任何字典都查不到。—著者注）”都没有当上就陷入了困境，从一位大半生不抽烟，不饮酒，不啜茶，私生活严肃、被人称作“老夫子”的谦谦君子沦落到了真正“无烟无酒无茶”以致“无饭”的窘迫地步。

只是这个老实业家还是不甘心彻底放弃实业，再说一家老小总得生存，从 1952 年始到 1956 年他进入上海文史馆止的⁹年时间里，他在养鹌鹑、养鸡、养兔、养蜂等养殖业上狼奔豕突，东碰西撞，却始终不得要领，即便有黄炎培，邵力子这样显赫的人物在帮助他，徐雪寒、邵力子和冶方四弟甚至还帮他联系鹌鹑蛋的出口，只因做小企业、个体户在那时的上海实在太难了，终是事倍功半，不成气候。

看他这几年的日记真叫倒胃口，不是“鹌鹑”就是“鸡”，要么就是“兔”，从交配、育种到饲料、防疫，他事无巨细地记着，也事无巨细地做着。看一位运作过全中国最大纺织企业的实业家在鸡兔、粪便间满头大汗，灰头土脸地瞎折腾，真挺心酸的。

到了 1956 年，61 岁的薛民见实在折腾不下去了。

孙夫人所出的四个孩子都在念书，最小的儿子禹全还不满十岁。虽然孩子们都非常懂事，也都惯于清贫，但作为一个父亲，民见不能眼看他们沦为赤贫。这年，61 岁的民见终于向命运低下头来，进了

8 这些数据均来自管大同上书。

9 《薛明见日记 1956.4.3》——“接上海市文史馆（56）沪史 X 字第 86 号公函并附聘书，自 3 月起，月薪 60 元。”

上海文史馆，月薪 60 元。

其实搞文史研究，特别是民国史和民国工业史的研究，薛民见是拿手的。从很年轻时起他就热衷于收集书、籍、志、典，又是个笔头极为勤奋的人，加上他在江南文化界的声望，进文史馆应该不是难事。沈从文、陈寅恪、柳亚子这些文化名人都早早进入了中央或地方文史馆，薛民见为什么直到 1956 年才进去呢？应该说答案很明显，沈，陈，柳们本来就是文人，不过是不再创作而改为研史，对这些人来讲也等于送进保险柜，创作是要“触雷”的，而研史就要保险得多。沈从文从一位小说家转化为中国传统服饰研究家就不啻为一个典例。

但是，薛民见不是单纯的文人，他是个实业家，而且曾经是个大实业家，他放不下、也不甘心放下实业而当个坐馆先生。然而到了 1956 年，他毕竟垂垂老矣，不得不顺从了命运的安排。

上海文史馆某副馆长在一次思想检讨会上，以国人惯用的夸张口吻亦扬亦贬地说到薛民见：“你原本是可以作现代司马迁的，但就是立场不对头，不写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不谈四大家族的罪恶，只潜心研究文史，没出息。”¹⁰。

这一次，薛民见破天荒为自己、为无锡、为无锡人、为无锡做企业的人（实际上就是资本家）作了一次辩白，“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上海文史馆召开征集史料会议，由李清崖副馆长主席列十四人，对各人均予以启示及希望，各人皆唯唯是命。最后及余，先带高帽子，略谓‘以子之勤学肯干，得天独厚，将来不难成为司马迁第二。惟子多顾忌，始终不肯将资本家之丑恶事迹暴露。例如把他们如何利用资本，如何剥削起家，如何勾结蒋，宋，孔，陈四大豪门等真凭实据写出来，由无锡而可以推及上海，而至全国，由是而得知大概。此实有功于人民，不要有意对资本家留一手，将来还有相见之日’。余即起而答复之：

10 《薛明剑日记 1960.10.29》”

（一）余自幼失学，于文字无深切功夫，就根底而论，做同馆各前辈小学生尚无资格，安敢妄想来步太史公乔梓之不朽事业！况余过去虽曾失足于名利，惟最怕者亦惟名利耳。故近年曾于《休养一得》诗文内写有：‘解得乐观病自捐，心情愉快胜神仙。反闲知足远名利，百岁寿辰在眼前’；

（二）资本家本质固然丑恶，惟无锡人绝无勾结四大豪门者。如有，则亦侮辱锡人之言，此余可担保也。

考其原因有四：甲. 无锡人个性喜欢自树一帜，不甘寄人篱下，受人节制；乙. 俗有‘宁可独偷一只狗，不要合偷一头牛’的个人主义思想，此即不肯接受外来资本之最大原因；丙. 无锡人创业之初，每喜借债办厂，达其虚本实利之目的，故有轻财重权思想，因此不可接受外来资本；丁. 就余所知，“五反”运动时，经过查账，未闻各厂有四大豪门之资本，可以取信；

（三）过去，我对无锡资本家确实有过联系，惟多我独自之主张，亦不是出于完全信仰。如在初期之主张，办工业必须与教育做联系，对职工福利必须予以重视，后期则更主张只招集体资金，舍职工可以少量参股外，不招私人资本，更主张组织职工参加工厂管理审查事宜。此为余与一般资本家不同之主张也。经学习，故知此种主张迹近改良主义，错误更多。

（四）至恐不敢得罪资本家，不敢将工业史料认真写述，尤为不当。因关于申新史料，已由市人民委员会参事楼震旦及科学院编写资料，由余处给予资料较多，更何顾忌之有？”

1952年，民见的伯乐、老东家、老朋友荣德生在无锡撒手人寰，正在上海做勤业做得焦头烂额的薛民见连夜赶到无锡送他最后一程。民见记录此事的文字依然是淡淡的，却道尽心中的酸楚。

荣德生之死死于忧郁。

此年2月，民见还从上海到无锡专程会见过一次老东家。当时新政权的无锡市长顾某招见荣德生，告知在三反五反中无锡工商联正副主席均有问题。身为无锡工商联另一副主席的荣德生噤若寒蝉，不知自身是否也在其中，故向老朋友老搭档呼求，希望民见能回到无

锡，助他一臂之力，至少也能壮壮胆。民见匆匆赶去安抚，但还是以“血压不正常，心脏亦有病为由”婉拒了。他自己已是惊弓之鸟，何谈去安慰和帮助老东家？

6月，荣德生又亲身赴沪探访民见，老人已是憔悴不堪，颓唐已极。民见亲送老先生返锡，不料此一别竟是永诀。一个月后德生既去世。这位一辈子集谦逊与骄傲、智慧与激情于一身的中国最大的“儒商”就这样彷徨蹒跚着“下场”了，其凄恻令人不忍落笔¹¹。

民见闻讯立即起身赴锡，为老东家居停大殓丧事、扶棺挂挽。7月底又开始为德生先生编纂创业史，和同仁商议为德生“集文”事。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当地，真是要多不合时宜就有多不合时宜，你还以为这是民国不成？。

民见是在自己“泥菩萨过河”的情况下去为老朋友、老东家尽最后人事的。他头上的“疑似”已经够吓人的了，通电反正疑似“潜伏”、办小作坊疑似“组织反革命集团”。你来无锡原是指望你对荣家“三反”“五反”的，你可倒好，歌功颂德来了。

民见可以“贱己”，可若要他去“贱人”，尤其是他不能、不可以去“贱”的荣德生而“卖主求荣”，那还不如干脆杀了他。文革中他为这点点骨气吃尽了苦头，和同一时间关在秦城监狱的四弟冶方，这两位360年后的东林党乡党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柔弱的江南书生面孔下都是一副铮铮侠骨，只是少有家庭羁绊的四弟生生的“士可杀不可辱”，儿女成群的二哥为了孩子们只得默默地“忍辱偷生”罢了，孰难孰易，不评也罢。

民见在新政权30年活得战战兢兢原是不屑消提起的话题。把常态和常识写在文章里往往是不招读者待见的，既不惊栗如林昭、张志新，又不宏大如“五八年”或“六六年”，平民的战就算什么呢？作为“人民”，谁又没有经历过呢？本书著者一位好友，文革乍起时不足9岁。每当我自豪地宣称自己从未在人的面前弯下过双膝时，他

11 《薛明剑日记 1952.8.13》——“旧同事之相送者，只有茂仪，翔德，家彬及毕业于工商中学者，不到百人。盖以站稳立场下，多未参加。”

总是幽幽地说“让我跪我就跪，这样他们至少可以少打我外婆两拳”¹²。

同样的跪，为了亲人尤其是孩子们，薛民见是无法也不想像四弟那样宁死不干的。

1957年是民见一生最后还讲一点真话的年头，但也仅限于上半年的头几个月。

他调侃千篇一律的时事报告发言领导是“无何特殊见解，惟口齿极清楚，语调徐疾适当”¹³；

他和当年立法院旧席们吟咏唱和，尽讽国民党时期的流弊与黑暗，也发泄了对新政权和国民党一样摧毁民主社会的基础，“三权鼎立”之“衡失”的极度失望。这种绝对可以成“狱”的文字，只是由于薛明剑文字的过于浩瀚，加上当年专干“文字监察”人们的普遍文化水平低下才使他逃过一劫罢了。请看：

“同学萧觉天，霞飞集中吟立法院即事有：

基本人权无保障，诛求征借犹相望，吾侪议席为何来，岂代管家但分谤。

又咏反对临时条约诗有：

两党均衡失，三权一笔销。无人知此意，反怪我嚣嚣。

又反特务组织咏中：

黑单填有籍，红帽落无声。我自为陈说，凄凄四座惊。

又反征兵征粮咏有：

天下皆烦费，民间糜子遗。吾侪言有责，岂可缩如蝇。

又和谈五律云：

七上庐山日，商调窘马卿。三人成小组，大事误陈诚。鬼哭天心

12 我的这位朋友，其外祖父的名字曾见于薛明剑的文字。文革期间，9岁的他常常陪着外婆（外公很幸运地早已过世）挨斗，人们说“狗崽子，跪下！”他就跪下，这样他亲爱的外婆会少挨一些打。薛明剑的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也是一样，最小的儿子禹全只要听到敲门声就会跪下来，这样爸爸妈妈都可以少受一些折磨。

13 《薛明剑日记 1957.1.13》——“听周 XX 作时事报告，无何特殊见解，惟口齿极清楚，语调徐疾适当”。

乱，民冤国本倾。骄盈不悔祸，何处觅和平？

又吟良禽操序云：

圣有伊尹，立就桀而不辞，贤如屈平，九涉江而见放。大抵仁人用心，冀胜残于万一，改良梦想，曾碰壁于再三。当立委题名之日，正国人望治之时，以为党派纠纷可资协调，联合政府有待完成，孰知独裁顽固，借外力而起萧墙，帝国阴谋利俱伤而伸魔手而进一步退两步无救于亡，以一人死万人，问心何忍，买办封建实力不破不了，人民民主政权，不专不立。于是联名起义，为时局呼急转之声，通电陈词为群众吐不平之气，彼贼兵为虎翼者逃窜海角，自绝于民，而责居守者以罪，岂理也哉？宣言联署五十三人，内有周杰仁一名，逃往广州告密。反动政府于吾人以通缉，究竟谁为叛国，因作良禽操贻之。国家杜马忆沙俄，十月功成变革多，我辈深知兴废例，莫将真伪故传讹。君不见四月烟和雨，豹隐深林虎变鼠。又不见前山啼鹧鸪，后山啼杜宇，唤起国魂成伴侣，良禽择木集于枯，不飞不鸣胡为乎，暴风骤雨防长膊，地覆天翻有臭于（韩长膊于仁寿皆阿附地主者）。吁嗟，五十三人书一纸，一切譬之昨日死。棉蛮黄鸟止丘隅，可止不止鸟不如。气势纵横吾无此能，除已于十四日记之外，特录其诗，以实吾记”¹⁴。

如此文字何止“反动”，简直就是“造反”啊！

他批评现政府劳动部调配劳动力，解决就业方法之矛盾和部长张溪若之官僚，并为当年中小学毕业生就业事致函张部长和《教师报》。

“报载劳动部开会确定调配劳动力办法，决定就现有人员中统一调配，鼓励求职人员自找职业。说服家庭妇女安心家务劳动，认识教育子女是对社会贡献。然今日大小事业均属合营，即学徒亦不能随便可添，安有自找职业之余地，此实矛盾中之矛盾话也。同时教师报102期载，部长张溪若为指导儿女正确地对待毕业后升学和从事生产劳动问题敬告中小学生家长。广播原文一则曰：考不上学校就应该从

14 《薛明剑日记 1957.3.19》

事工农业生产劳动或其他建设工作。再则曰任何鄙视生产劳动的思想都是不对的。又复一再强调工农业生产战线上是需要知识青年的，要求家长指出从事生产劳动是有光明前途的，另一方面又要求帮助他们克服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错误思想。又是一件矛盾中的矛盾说话也”¹⁵。

他对北京号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深感疑虑，“怕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¹⁶，竟是一语成讖：

他看出了通货膨胀的危险，却自知“闲散之人，不敢言矣，亦不欲言矣”¹⁷；

……。

6月形势突变，民建开始揭发批判钱孙卿“谬论”——“爱国守法，官有法民无法，运动一到，宪法丢掉”¹⁸；

7月钱基博劝他不要在风头上再去湖北搜集黎元洪的史料¹⁹；

8月终于因在小组会上提出的各种不合时宜的疑问引火烧身，开始检讨²⁰；

11月文史馆同席王普自戕，文友钱基博“大鸣大放之后来一次思想大批判，此非意外之事”，话音刚落旋即长逝²¹；

12月沙文汉、厉无咎成为右派，开除党籍。章乃器、顾颉刚等前朝人物噤若寒蝉²²；

15 同上 1957.4.24

16 同上 1957.5.12

17 同上 1957.5.31

18 同上 1957.6.21

19 同上 1957.7.9

20 同上 1957.8.10

21 同上 1957.4.11.4——午后到校知同学王普确系自尽，事前曾发一信与家属，因有高桥邮戳，故呈报公安局，后数日始在高桥发现尸首，即由家属火葬了事。王原籍山西渭南，长余一岁，日本明治大学药学士，曾任陕西省自治筹备处处长，印花烟酒税局局长，河南行政人员训练所副所长，与余在参政会同事。此次事出意外，事前亦无所闻，惟遗作托同学周伯敏及另一孙照顾其妻。

22 同上 1957.12.22，报载沙文汉及孙章录两人及浙江省党委内之右派分子，又厉无咎为武汉右派份子。沙孙已受党除名处罚，厉在京与章乃器对面斗争中。

……。

随后是没完没了的检查、检讨、交待、坦白。好在薛民见 50 年代初就已熟稔这一套“贱己”行文，倒是篇篇信手拈来，不费老身功夫。

反倒是四弟冶方不识趣，来信询问二哥对右派分子看法。哥哥答曰“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适，何必高位厚禄，发号施令，役人奉养，然后为乐？益见我八年来，诸事不问，阅书求学之有道也。犹忆 1950 年与弟同客京华，乃器坚邀留京，余有苟劝参政，即予割席，时弟深以我言为不然，果使兄而随之留京参政，今日至少须得到右派头衔甚或有同党嫌疑，甚矣出处之难也。检查八年来一事不问，一物不知，论理随固须内疚，论情故亦有是，故深以为乐矣！”²³。

从此往后，薛民见对时局、政局再也没有发表过自己的确看法和想法，一切都似是而非，人云亦云，或者干脆就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从养兰栽菜到淘米买菜，从儿女考试分数到孙辈嗷嗷趣事他都一一记下，殷殷道来，聊以延续他 60 年不辍的笔耕。

从 1958 年到终于辍笔的 1966 年，民见这九年的日记给人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的恍惚感觉。且看他写于 1960 年 1 月 6 日的一首《就述怀诗复四弟孙冶方》：

一事无成白发翁，十年学习未全通。
万千时日川流去，六五韶光瞬息同。
有弟英明知务本，愧吾衰老智难丰，
两般劳动均不逮，甘向工农拜下风。²⁴

如此的寡淡无味，堪比写出过《凤凰涅槃》《炉中煤》这样恢宏作品的大才子郭沫若写于 1958 年的《猪狗比赛唱红歌》，只是没有郭诗人那般下作而已。和司马迁相比，他们都幸运地保全了身体，而精神被阉割的痛苦又有多少怎能像太史公那样被后人理解和记住呢？

23 《薛明剑日记 1957.7.17》

24 《薛明剑文集 就述怀诗复四弟孙冶方》

十八 一篇“谏”

今日无锡官方的《薛明剑档案》和“孙冶方纪念馆”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原件，各类“大人物”们给薛明剑的题字、合影、孙冶方的早期照片、病床上和遗书照片、手稿等等。还有近90年前由上海唱片总公司总工程师陈祖祥亲自帮他选购的手摇留声机和贝多芬全套九阕交响乐大碟、他狱中读过的夹着花花绿绿糖纸，划着重重叠叠指甲划痕的《马列全集》等等。

可是有一张最不起眼的照片，其颓唐、肃杀和突兀令人不安。

这是一张普通黑白照，明剑最小的儿子禹全1976年初春为自己的父母，薛明剑与孙馥铨的最后一张合影。孙夫人满头华发，安详地坐在小小天窗射进屋内的一缕阳光中读报，《文汇报》，看不清日期，只能看到报头旁大大的“语录”框。屋里简陋而凌乱，与孙夫人的整洁和安详形成巨大反差。是年已近生命尽头的明剑就躺在孙夫人的旁边，眼紧闭，嘴微张，已经是植物人状。由于没有一点光线的照射，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存在。

这是一张典型的“苦难中的中国”照，奇异地融安详与不安，驯服与躁动，高贵与卑贱于一身，并且，没有一点虚假做作，令人过目难忘。薛家上海的房产一座石库门大宅早在1966年就瓜分殆尽，一家三代六口人住在西北向一间逼仄阴暗、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孙夫人身上的那一缕阳光就是一天中唯一能射进屋里的一点光明，她在尽情地享用它。

就为这张照片和照片上我的传主，为他所代表的一个过早夭折了的中国阶层来做一篇“谏”吧。

昨天到友谊医院探看病中老父，路过一个新建的路口，十分宽大

敞亮。我问开车的丈夫“这是哪里？我怎么会不认识？”他说“这就是菜市口啊，谭嗣同昨天才在这儿给砍了头，你就不认识啦？”真的啊，不就是百多年前的事情吗？前人一腔腔报国无门的无声热血和后人一浪浪生财有道的熙来攘往，不是在白驹过隙，须臾之间就变幻了吗？人们怎么就不认识了昵？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建立工厂和输入机器。这个被称为继《南京条约》后最为卖国的条约大大地伤了中国士子们的心。康梁率十八省一千二百多名书生愤而“公车上书”。它也激发了一小批中国读书人“兵战不如商战”的实业救国幻想。这一年，江苏南通人张謇开始筹办“大生纱厂”；江苏无锡人荣宗敬和父亲在上海开办了广生钱庄；浙江上海人穆藕初入夜校学习英文；湖南湘阴人范旭东在长兄，梁启超最喜爱的弟子之一—范源濂庇护下发奋读书，并在五年后东渡日本，进入帝国理工大学学习应用化学；这一年，浙江定海人刘鸿生七岁，重庆合川人卢作孚两岁。

还有，这一年我的主人公薛明剑出生。

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等就是这“一小批”中国读书人的典型代表。而薛明剑则是这批人最典型的“代言人”。

这些人，他们不同于农耕文明产生的流通型商人如晋商徽商，如“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们也不同于“洋务运动”产生的官商如盛宣怀、唐廷枢、郑观应，他们是这个“志不在此，不仅不能生产，而且一向无意于生产”，“（即使上溯一千年也）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新旧之间不能衔接：所有因素都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¹的国度里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他们投资于“服役民众”的新式企业，包括冶铁，盐碱，棉纱，

1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不仅不能生产，且一向无意于生产；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上述各国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总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一千年的历史”。

桑蚕，纺织，面粉，电话，轮船，化工，火柴，水泥，煤矿等；他们早已摒弃“中心之国”的夜郎自大，努力于工艺的改良和创新，从不排斥西方和日本的新技术，新机器，以开放的心态向西洋和东洋学习；他们创造了崭新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以工程师，职员和工人的现代工厂制取代封建化、奴隶化的工头制；他们从未将利益的最大化看作首要追求，而是在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后立即开始更高一级的精神追求——实业救国，民生救国，棉铁救国。

他们热衷于教育和公益，重“声名”轻“得失”，重“事业”轻“资本”，重“参政”轻“做官”，重“民生”轻“主义”。他们具有明确的核心价值和旺盛的经济创造力，其企业社会公民责任感和规模生产型企业管理制度，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企业与社会精神，而他们倾心致力打造的“村落自治”，“劳工自治”，“实验区自治”等等，更是萌动着一种与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描绘的理想社会十分相似的初级共产主义理想。

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和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当年都曾是很轰动的社会事件。1936年7月，国际劳工局（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下属劳工组织）派专员伊士曼到无锡观察了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区。事后伊氏对它大加赞赏“工厂规模宏大，组织完善，尤以关心工人福利兴办劳工自治区的举动，为工人的民生详尽谋划，无微不至，我们非常钦佩和推崇。”²

这，就是“企业的社会化”。

这些企业几乎包揽了职工生老病死在内的一切事务。例如民生公司，它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而是拥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澡堂、宿舍、理发室、子弟小学、子弟中学、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

2 上海大学、江南大学《乐农史料》整理研究小组《荣德生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程海峰于上月偕同国际总局特派员伊士曼氏到锡，视察各厂。程氏等视察后对于吾邑申新，华新各厂一切设备非常钦佩。特由程氏致书等厂当局答谢。略曰：贵厂规模宏大，组织完善，尤以关于工人福利事业之自治区，足树国内工业界之模范。伊氏对之尤为赞美不已，具徵借箸代谋，无微不至，钦仰曷极等语”。原载《新无锡》1936.7.23

校、夜校、防疫站、医院、俱乐部、电影院、报纸、图书馆、剧团、花房……，一个十足的“小社会”——企业社会。

在老一辈无锡人口中有一个很新鲜，很有趣的名词“二政府”，这是百姓对这些企业主的称呼，也可以算是“乡绅政治”的一种民间叫法吧。近一个世纪前出现并发展起来的这种“二政府政治”，为一个不强势的官僚系统“小政府”弥补了最为重要、最为薄弱也最为致命的缺陷——国家的基层建设，使这个刚刚由皇权转入民国的国家尤其是它的城市不致崩溃和倒退。它也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主导了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而这“两化”恰恰是构成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却原来，这种“企业社会化”并非俄国传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产物，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而是中国的本土产品，是我们的祖父、外祖父们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公车上书”“张謇创业”“明剑出生”的1895年起算，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走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已经发生的一百年之路”的希望，以工商文明取代动乱、暴力、战争和阶级斗争并同样达到小康的道路。而且，不仅仅只是一个“希望”，它其实已经萌芽、吐蕊并且在差不多15年以后进入过一段被西方人称作“黄金时代”的好时光³。只是这段好时光实在是太短了，短到完全来不及孳生强大到足以阻止一场异族的入侵。但是异族的入侵并没有使它夭折，抗日战争胜利后它曾竭尽全部的生命力去争取回暖返青，萌发新枝。可惜这一次历史给它的时间机会就更短了，在苏联红军枪杀张莘夫们的子弹声中⁴，在国共血腥内战的大炮声中，在庆祝政权更替的秧歌声中，

3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

4 张莘夫事件——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1946年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从投降后的日本人手中接收东北工矿事宜。是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一行8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8人全部遇难，张时年48岁。张莘夫的被杀曾引发中国全国性反俄运动，重庆，上海，南昌，北平，南京，青岛，汉口，杭州等中国各大城市发生示威大游行，要求“赤色帝国

它迅速地枯萎、凋零下去，终于彻底灰飞烟灭了。

即使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周期来计算，五十五年也太短促了，更何况一个阶层（她不能算作一个阶级）。英年早逝的她远没有生长成熟到可以左右社会，抵御外敌和进行“阶级斗争”的程度，甚至连“苟且偷生”的能力也没有。1926年就已去世的张謇先生曾经在临终时发出悲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⁵，1952年自戕的卢作孚先生生前也有“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⁶的哀鸣。作为这个阶层典型的代言人薛明剑，在1957年不也发出了“良禽择木集于枯，不飞不鸣胡为乎？”⁷这样悲怆，无奈而“反动”的绝唱吗？

这，就是这个阶层命运的主旋律。

不要再侈谈曾经有过的“希望”了吧，历史只有“实在”，没有“假如”，更没有“希望”。历史只能用来反思，不间断的反思，反复的反思，永远的反思，对反思的再反思，这才是历史能够馈赠给人类的最大恩惠。反思，犹如控制论中的“负反馈”，任何一个闭环的、活的系统，例如人类社会，如果没有负反馈功能都会随时处在可能“自激”的危险中。在电子学中，“自激”表示系统的不稳定；在经济学中，“自激”就是系统的失控；在社会学中，“自激”是系统混乱的表征；在政治学中，“自激”又何尝不是系统（System）“崩溃”的代名词！

一个热衷于反思历史的族群才是有希望的族群，一个善于反思历史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认识反思，学会反思，修炼反思的能力吧。

主义”（苏联）如约撤军。

5 《张謇全集 第三卷》

6 卢作孚《一桩惨谈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

7 《薛明剑日记 1957.3.19》

十九 顾准

苦于寻找不到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精髓“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的源头，在友人提醒下我开读顾准。21世纪了才开读顾准已是落伍不堪，读过之后忽然发现文章竟是无法写下去了则更是难堪。顾准在中国全体读书人面前竖起了一座大山，是高山仰止的山，更是想绕却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山。

“写孙冶方绕不开顾准”，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共识，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读书人的潜意识中大概都在寻觅着一个人，一个每个国家都一定至少会有一位的人，在法兰西他可能叫维克多·雨果，在不列颠他可能叫查尔斯·狄更斯，在美利坚她可能叫哈利特·斯陀夫人，在俄罗斯他可能叫列夫·托尔斯泰或者多斯妥耶夫斯基（还有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假如《静静的顿河》确是他写的话）……。在中国这个人是谁呢？是鲁迅吗？是沈从文吗？都可能，但都不太像。

鲁迅在解剖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锋利和深刻度上、在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描述上几乎是全民公认还没有出其右者。然而树人先生极端地蔑视悲悯和宽容，一如他的遗嘱“我不要任何人的原谅，也不原谅任何人”，对中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怨跃然纸上，令人绝望；

从文先生一生“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他想到的只是美，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美是沈从文的上帝，他的文字令人心生悲悯，却不能像雨果或狄更斯，斯陀夫人或托尔斯泰那样开启人们最认真也最痛苦的思考。

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和底线？哪里是这个根本，这道底线

之所在？他们的文字告诉人们，为了保住这条底线，无论多大的苦难也必须忍受，无论多惨烈的心碎也必须承担，这些文字明明白白道出了这道底线——人道，那些令人疼痛的文字像一块块砖石，筑成的就是这条亘古的底线。

人们，请考虑顾准。

把顾准和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放在一起？脑子进水了吧。有可能，否则为什么读顾准的过程中我曾几次出现掩卷呆坐，大脑一片空白，和青春少年时节读《九三年》，《双城记》一样的境况？每逢至此必下意识地翻到文章末页，一次次看清 1972，1973 的字样，才能接着读下去。

那是何样的年份？我们和我们的父一辈，祖一辈那时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如果用顾准作标准，可以很不敬地说，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想了也没有去做，像顾准那样在血和汗、饥饿中和棍棒下把思想记录下来，给中国留下一点非物质遗产，给中国人留下一点人的尊严，给中国读书人留下一点可怜的体面。还有最坏的，就是我们做了，做了无数侮辱同类同时也侮辱自己之举，却什么都没有去想。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的文字令我流泪，读顾准是第一次。

李慎之先生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被海外学人并无恶意地质询：

“你们中国知识界在 1949 年以后究竟有没有哪怕稍微像点样子的人物？”

已近耄耋的慎之先生慢慢站起来，不假思索、毫不迟疑地回答：

“有，有一个，顾准！”

按照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的观点，“十年文革”只是一段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小历史”。欲说还休，不说也罢的这段小历史至今都还在“不准说，不许谈”的桎梏中，却绝无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在集体癔症中，近十亿人不思不想，装疯卖傻，斯文扫地活了足足十年，几无一人置身事外，仅此一点在世界史上就是空前，至今也还是绝后的。亲历者绝大部分人还在，境迁事

未过，曲终人不散，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段在中国史上显得特别突兀，特别诡异的小断代，其蹊跷乖张和莫名戾气，至今都无人道得明白。

很多西方文人和学者，他们几乎是艳羨中国曾经有过这样奇异的人性大展示，给史家和作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研究创作的源泉。可中国自己的许多所谓史家和作家们却宁愿去臆断夏商，妄论唐宋，戏说明清，也不愿细究这个小断代加大展览。像人类史上诸多的小断代一样，要将它们和大历史连续和清晰起来，需要时间和智慧，需要人类文明自身进步的支撑。这不是单靠历史学家就能做到的事情，这是全体中国人人人有责的一件事情。

学者朱学勤提出过的一个很尖锐的疑问：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是的，顾准“何以如此”？顾准的故事“何以如是发生”？

即使顾准确是天才，他的成长过程大部分也是在“母体”内完成的。到他四十岁左右被从“母体”中排出，按照中国式逻辑，也是“被人误解”，“遭人陷害”而已，就像父辈们很多人身上发生过的故事一样，被殇情滥情的多，被分析推理的少，被逻辑思考的几乎没有。

从顾准 19 岁与潘序伦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直到他的临终遗言，读完他存世的全部文集，文存，文稿，日记，笔记和各种传记，才知道读完他的所有文字是不可能了，因为大量他的那些被毁掉的和不被记载的东西，还有他来不及留下以及人们不愿意他留下的文字是永远也读不到了，更令人遗憾和难过的是，他那些还存世的文字也非常蹊跷地难以觅到¹。

1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无法看到一个完整的顾准，明显的例子见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版《顾准文存·自述》，“此处删去一段约 XXX 字”“此处删去 XXX 字”“这部分内容计二段，XXX 余字，删去”“此处删去一段，约近 XXX 字”的字样比比皆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因为出了一本薄薄的《顾准文集》未删节单行本而被中共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严厉处罚，责任编辑被约谈后解雇。

经过肃反镇反，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四清，文革……，吃得苦中苦的国人在精神上已经被“齐斩斩”得只剩下“归属”和“分享”两大原动力。前者货真价实，后者极为可疑。十亿人每时每刻都浸润在“阶级斗争”大酱缸里，学习讲用会，忆苦思甜会，批判检讨会，吹风务虚会，斗争公审会……一刻不消停。有几个人没有感受过被拒之会外的恐惧？又有几个人不渴求身在“人民内部”的喜乐？能参加各种“会”，你就有了归属感，能在这些会上讲些话，你就充满了分享的快乐。

汉民族是个最惧怕孤独的民族，百姓和读书人要的都是“摩肩接踵”的热闹，“十万人家”的扎堆，惧怕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苍凉，“羌笛杨柳”的孤独，许多人至死都不能明白“灵魂只能独行”这样一个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常识。顾准却是这个民族，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异类。

过于出众的他没有生逢一个崇尚“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的民族和年代，恰恰相反，他生在一个好同恶异，最为推崇“齐斩斩”的民族和只允许“万众一心”加“万众一声”的年代，其“行”又过于突出，即使在眼下这个已经大大进步了的年代，这位很喜欢用“睥睨”二字的知识分子被“摧之”，“湮之”和“非之”也几乎是难免的。

顾准的不幸在东方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那个汉民族的民族性中猥琐的成分被最大限度地放大的年代。

顾准的职业生涯开始得非常早，多彩而辉煌到了夺目的地步。他的成功来得太早，这样的人生在激情和理智两方面往往很难平衡。抛开为人熟知的他的青少年时期神童般出类拔萃的经历，中国会计学大师不谈，也不谈他1949年前自认为是职业革命家却被他的“同志们”所不屑的“业余革命家”历史，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马太一样，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仅止于税吏——他的党的税吏。

和孙治方一样，顾准也是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俩有一个异于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特点，都精通于一种非母语语言，一个是英语，一个是俄语，而且两人都通晓日语，这就比别人少了一道桎梏的藩篱，多了一条探索的绳索。

孙冶方正因为纯熟于俄语才会对中国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马列主义理论产生深深的怀疑，以至于到后来连俄文版也不再相信，即使身陷囹圄还孜孜以求，渴望攻克德文以触摸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而顾准，由于掌握了英语这门几乎可以称作是“世界语”的语言而能从更广阔，更深邃的角度去探索历史，剖析历史人物，因此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以及源头之外的东西。更可贵的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顾准想到，看到和道出了几乎全体中国读书人都不能，不愿，不敢想到，看到，更遑论“道出”的偶像们的各种问题，论据的缺略，论证的偏差，结论的谬误以及导致的后果。

从这个角度看，顾准比孙冶方的起点要高得多。

但是孙顾两人又都是母体内的官员。和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别无他途。在这一母体内，做官就是服从，独立思考绝无可能，特立独行不啻自毁，洁身自好一事无成，同流合污理想又成泡影。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对于顾准，孙冶方这样的知识分子最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纵有顾准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以鱼死网破的勇气向这可憎的宿命一头撞了过去，但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你仍处处可见他们的无奈和妥协。

1952年，做大上海“总税吏”还不到3年的顾准，因为反对“全国采用民主评议方式征税”，这种在今天看来过于不可思议的“人治”方针，坚持所有企业都应依率征税而被撤销职务。试想，即使在非常时期非常地域，没有“律”至少还有“率”吧，依率征税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更何况在执政后的和平年代。

可是往往，最无趣的地方也是最不讲常识的。当权者丢给他一句话却相当有趣：“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²

如此的言简意赅、铿锵精要，爹娘的训斥加主子的呵斥，多少中国的读书人都听懂、理解和领受了，再不“胡思乱想”，再不“淘气”，可顾准他就是做不到，死也做不到，用膝盖而不是大脑去思、去想。

这个大知识分子在落入“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的屈辱境地

2 时任财政部长的薄一波语

后开始学习数学和几何学，他把这两门最容易让人掌握逻辑推理方法的学问作为研究经济的基础课一头扎了进去。

不愧天才的称谓，未几他就从数理中触摸到了强烈的逻辑感，这令他狂喜并沉醉其中。不过很快，他就跨出了对数字和图形的迷恋，“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话音未落，他就一步从圆规三角尺和计算尺的神秘丛林跨入了历史的广袤平原，从读史，研史开始，一步步向解史，以历史解读现实进发。

看顾准读史，研史，解史的过程，就像看一个人怎样把自己脑子里的酱糊一勺一勺生生挖出，倒掉，腾出一块清清爽爽的地盘来接纳真和善的过程，怎一个“美”字了得！

读顾准，首先从美的角度上人们就被征服了。美的思想，美的文字，美的魂灵，美的人，真可谓美不胜收，而他对人性的追问又是其中最美的部分。

就从这最美的部分说起吧。

有一本顾准的传记《拆下肋骨当火把》，资料丰富，下笔严谨，尤其书名出奇制胜，引用了泰戈尔的名句，令人联想到脱衣跳涯，以身饲虎的摩珂王子和背负十字架向各各他行走的耶稣。然而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度众生的传道士，只有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辩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追问人性的悲悯者，一位和薛氏兄弟一样磊落但在罪恶面前更加警醒，也更加桀骜不驯的人。

自幼即接触西方基督教文化，未及弱冠就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基督教“爱人如己”的氛围中，及至成年又任教于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顾准无论从哪种角度讲都是一位很纯粹的人道主义者。

顾准并非出身基督教家庭，从现有资料看，也从未“成为”过基督徒。他的文章每每提到基督徒还会有一种调侃，将他们唤作“愚夫愚妇”。他也曾直白地宣称自己“不喜欢基督教”³。但只要你认真读

3 《顾准自述》——顾准的“历史交代”文字。

过顾准，一定会留下强烈的印象就是他对基督教独特和深刻的理解。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轨迹都没有离开过对人道，对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追索和探寻，而这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根基所在。

从顾准的《历史笔记》检索出一些例子可以看到他很明确的思维轨迹：

“范文澜不懂基督教，当然更不懂共产主义思想是渊源于基督教的”⁴；

“（中国）没有一般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契约观念也没有”⁵；

“孔老二的礼乐仁义，出发点是‘尊卑’，是违反人性的，是一种矫揉造作的伦理学，远不如粗野的日耳曼的一夫一妻制，尊重女人，以至于彻底的个人本位为可爱”⁶；

“即使 Marxism（马克思主义）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是另一种基督教意识”⁷；

“和 Plato（柏拉图），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哲学相结合的基督教神学，在一个方面固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却也为科学精神中不可缺少的理性主义开辟了道路”⁸；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方懂得这并不可怪”⁹；

“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

4 《顾准文稿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5 《顾准笔记 历史笔记 中国古代思想中没有自然法的观念——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观念》

6 同上《历史笔记 <中国通史简编>旧版和新版对儒家及宋明理学评论的变化（一）》

7 同上

8 同上《顾准文稿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关于基督教的笔记》

9 同上

授”¹⁰。

除了《历史笔记》，顾准文字中提到基督教以及对其教义的“悟”和“解”也多到数不胜数。

他用《圣经》中著名的“红豆汤”故事镇住了想要“镇住”他的无知的军宣队员¹¹；

他抱定“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的信念，推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基本教义。面对好友拿出“牙牙眼眼”之说激烈反对《圣经》的“左脸右脸”观点时，他将“只有提倡宽容和仁爱，才能遏制‘阶级斗争’，这个《圣经》启示录中早就描述过的‘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的怪物，让中国几千年的恶斗停歇下来”的道理娓娓道来，请他们反思历史，汲取教训，而不是种下仇恨，拳来脚往，冤冤相报；¹²

他十分乐意向周围人传输“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社会¹³，却从未将“共产主义天堂”挂在嘴上；

他开玩笑地自称是向他请教各种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年轻人的“忏悔神父”¹⁴。当懵懵懂懂的年轻人问他“中国的共产主义”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时，他把身边“美好无比的天堂”与杜甫的“悲惨世界”连在一起，幽幽低吟“天堂固然好，路有冻死骨”¹⁵；

在世人都以为是他最痛苦，最绝望的生命最后一程，他却满怀着“面对金黄的庄稼，工人就要开镰收割”的喜悦，并不断地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而这个比喻正是《圣经》“新约”中最著名的譬喻之一。

顾准在他生命之树最成熟时期所追寻，探索，领悟和向往的，早已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

10 同上

11 邢小群《顾准日记 附录：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

12 陈敏之、丁东《顾准寻思录 回忆顾准伯伯 徐方》

13 徐方《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14 徐方口述

15 同上

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

“1917年：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¹⁶

“与其研究共产主义，不如研究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¹⁷；

“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文明形态，这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然而，人类文明也将以基本趋同的走势，朝同一方向发展，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原则与方向”¹⁸。

顾准认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他都仅仅是“看到用野蛮的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是“多么不能满足啊”。他对社会的终极愿望是“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¹⁹；

在反人道，反社会行为导致的饿殍遍野，人相食的真相面前，他“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向地球宣战的战役”而立志“要做一个历史观察家”，他断言“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然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代替目前的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使命”²⁰；

面对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他毫不犹豫地论断“人性最少阶级性最多就是兽性”²¹；

直视人性被彻底泯灭的恐怖和残酷，他多次在心底，在日记中痛

16 贵州人民出版社《顾准文集 民主与“终极目的”》

17 同上

18 同上

19 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

20 《顾准日记 1959.12.4》

21 同上 1959.12.22

苦不堪地咆哮“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来审判啊”²²；

在剧烈的饥饿逼得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要偷东西吃的境况中，离开九死一生的信阳商城劳改营，他不是额手称庆而是被“一种悲恻的情绪浸透了”²³；

刚从劳改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面对挂着虚缈的“人民”二字的巍巍“大会堂”发出了最锥心泣血的哀鸣，“我永远也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²⁴。这成了顾准最著名的反革命言论，也成就了他这个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打成右派的右派。

50年代初遭受无端猜忌打击时，有人传说他曾进入教堂向基督做祈祷，还有人说他到寺庙去烧香拜佛求平安。所有有关顾准的传记文章都十分避讳却又不愿完全不涉及这一传说。本书不敢采信“祈祷”一词，但绝不采信“烧香拜佛求平安”一句，这与顾准一生的行为模式无疑相悖得过于荒谬了。但是他去这些地方感受宗教氛围却不能轻易排除，从他日后写出的关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儒教，道教（假如你一定要把孔子学说和老子学说归入宗教的话）的精彩文字看，他不但可能去了人们传说的基督堂和佛庙，只要条件允许，甚至还可能去过清真寺，道观或其他宗教场所。对“一神教”持极其鲜明肯定态度的顾准，绝不可能在身处逆境时“临上轿扎耳朵眼”般慌张到要到处去买“平安保险”，他到这些宗教场所（若确有其事的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去做“宗教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和“知识的探索”而已。这绝非当年的人们可以理解，也不是现在的人们能够轻易理解的事物。

几十年前基督教在中国已近寂灭，他不惜冒险以戴罪之身四处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仔细研读；

在受尽屈辱与逼迫，本该“鸟将亡其鸣也哀”的1974年，他却咳着，喘着，笑着，最后是吐着血翻译了乔治·卡特林论述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主要著作《基督教》；

22 《顾准日记 1959.12.29》

23 同上 1960.1.17

24 叶炜《顾准，一个负重前行的人》

他推崇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鲍尔丁的主旨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既要成为经济人又要成为道德人。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不行，没有道德调节和政府干预也不行。而有道德的人一定是有宗教意识的，这种意识的顶尖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对生命和存在的感悟——信仰。”

他写于1971年6月10日的日记，强烈质疑赫胥黎的《天演论》。他将伟大领袖好听点叫“激情万丈”，难听点叫“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定胜天”说，释为“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非仅人事，特为自然”，并斥为：“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柢悉在此”。说到此处他还嫌不过瘾，又接着大加嘲讽：“此义极精，可与否定之否定相比较。又可与《实践论》中思想改造——共产主义论相比较。”²⁵

此书是那一年作为文革后对西方经典政治，哲学，文艺作品开禁后引进的第一批书籍，书名不用多年约定俗成的严复的《天演论》而是叫做《进化与伦理》（白话，译者不详），与赫氏另一本《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同样白话，译者不详）以及严复译的《天演论》旧译同时内部发行，扉页上还有伟大领袖语录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这篇如果按照当时的“政治敌情”标准衡量，本应属于“最本质上反动”的文字，混杂在被某位后人评论为“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分肯定斗批改”的顾准文字中，当年竟如漏网之鱼，侥幸没有被查出和销毁，成了今天人们洞察顾准世界观，价值观的最好入口。

尽管顾准从未受洗成为基督徒，然遍读顾准还是无法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思维方式和精神根基最接近的还是基督教精神，是“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过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²⁶的

25 《顾准日记 1971.6.10》

26 《顾准文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一种特别的，比普罗大众对基督教教义的朴素理解更加深入一步的思维和解析。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思维和解析的能力反倒可能妨碍了人对基督的接近。但往往持有此种能力的人，在肉体生命接近结束的时段所有“妨碍”会突然消失，而从前的思维和解析却一点都没有浪费，他们甚至比普通的基督徒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和祂无尽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达芬奇，牛顿，甚至“被造论”的对立面，“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这些世界上百年都难出一个的科学奇才，在肉体的生命行将终结时会不约而同地在“神圣的必然”面前，在“第一推动力”面前，在“有意义的永生”²⁷面前，在“人对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²⁸面前俯伏了下来。

顾准的临终非常异于常人。就算是魔鬼也能被宽恕的神圣的“最后时光”，他竟然没有一位亲人在身旁，亲爱的“秀儿”早已不在人世，毫耄老母不敢相见，那些被他心爱地唤作“秫头”“高粱”“小米”的孩子们一个都没有来，尽管为了能最后看一眼他们，这位父亲已经接受了精神的凌迟，写下了被他视作奇耻大辱的“悔过书”。一颗高贵的灵魂在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被施以最后的酷刑，相比之下，火刑柱上的贞德或布鲁诺都要算是幸运的了。

可是人们，请在夜深人静之际，设身处地体会顾准之死，你会又觉得他很幸福，何止是“很幸福”，简直是太幸福了，在一群由“来自内心的爱”而自发集合起来的人们中间，这些人除了他亲爱的六弟陈敏之之外无一亲人，都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经济所的同事们，有年过花甲，自己还带着右派帽子的老经济学家，有曾经批判过他如今却对他崇敬有加的年轻学子，也有被他嘲讽，挖苦甚至批判过，如今却和他达到了一种心灵契合的老上司，老学人。这群人不顾一切地想抓住他，拖住他，把他留在这个世界，留在他们中间。只要能救他，治他，这些人甚至连尊严，也就是读书人最爱惜的“脸面”都顾不上了。

27 (俄)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诸神的复活 列奥纳多·达·芬奇》

28 (美) 艾瑞克·沃格林《自传性反思》

66岁的老学者骆耕漠拄着拐，提上装了八样点心的匣子摸上医生的门求治，找20年代的同狱难友，眼下能调动汽车的部队老友求车。平时温文高雅，大家闺秀的张纯音连对人下跪磕头的准备都做好了。²⁹

顾准就在他们悲哀的环绕中，平静地留下死后捐献遗体供医学实验的遗嘱³⁰，安详而尊严地死去，在自己心爱的学生身边，他正在按照老师最后的吩咐，支开陪床的行军床准备躺下——停止了呼吸。

读者，请想想吧。

古今中外，从“大人物”到芸芸众生，有几人能享受到如此这般的“死亡待遇”？其逝，如山崩地裂者有之；其逝，令国民泪飞倾盆者有之；其逝，备极哀荣者更是不胜枚数。但那不都是身外物，身后事吗？像顾准这样“贫病交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人，死在如此美丽，如此无边无际爱海中的，大概只有一个苏格拉底先生可以媲美。

怪不得所有熟识顾准并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是面带微笑从容离去的。有人说他“意志无比坚强，感情有些脆弱”³¹，有人说他“英雄肝胆，儿女心肠”³²，也有人说他“死不悔改”，但你将其译作“虽九死其犹未悔”不也很合适吗？

人的临终是最能展示其本性的，顾准的临终是他苦难的顶峰，也是他人性展示的极致。他的从容与留恋，意志与感情，欢乐与痛苦，肝胆和心肠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见证，再多说一句都会显得苍白。但这里无法不再说一次那位叫“咪咪”的女孩，顾准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美的一抹阳光。当所有的儿女都对临终的父亲背过身去，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看一眼遍体鳞伤的顾准时，是这个女孩抚摸着心灵和肉体的巨大创口，对他说“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女儿吧，难道我不能代替他们吗？”。

29 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

30 顾准遗嘱

31 病友、著名导演焦菊隐语

32 经济所经济学家，顾准老友陈易语

上邪！咪咪何止仅仅代替了他们，她不也代替了我们吗？年轻的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在她写于 2009 年末的文章《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不也在文章的末尾深情地说出“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吗？

顾准留给这位小天使最后的礼物是一本中英文双语的《新约全书》，他将他最宝贵的留给了他最宝贵的人。

顾准的后半生多半都是活在“非人化的气氛中”，社会、人群对他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就没有停止过。没有遮雨的屋檐，家早就散了，没有避风的港湾，爱人已经自戕，更没有桃花源，除非你把他最后的寄身处，风雨飘渺的经济所和自身难保的孙冶方计算在内。读他的《商城日记》，你能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苦难造人”；读他的《坦白交代材料》，你能明白人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苦难；读他的《文集》，你能明白人能将苦难转换为思想的潜力有多大。

然而他的后半生却绝不是“绝望”的。

他有信心，相信自己正在无限地接近真理，其思想如即将成熟的庄稼，开镰收割指日可待；他有盼望，盼望一个“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的“神武景气”³³国度和一个充满了善意的社会的终将出现；他有足够的爱，足到既能爱那些爱他的人，也能爱那些嫌恶他，鄙薄他和加害他的人；他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虽然看上去生活对他是那样不公平，生命对他是那样脆弱；他原谅和宽恕一切人，虽然有那么多的人对不起他；他不惧怕死亡，当死亡猝不及防劈面而至时，他直视它，勇敢地迎接它的到来。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顾准对承受苦难已经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³⁴。须知他不是苦行僧，不是受虐狂而是一位翩翩才子，一

33 指日本 1955-1957 年出现的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

34 徐方口述——顾准伯伯和妈妈多次说起，虽有很多人都不对不起他，但他都宽恕他们，他也请求他们的宽恕；他希望“宁肯天下人负我”也不要“我负天下人”；他尤其推崇《圣经》十诫中“不做假证”一条，认为是中国道德律中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一条；他十分欣赏《圣经》中耶稣教导门徒对人要“宽恕七十个七次”和“为什么只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到你眼中的梁？”；他在恶势力面前十分骄傲，并号称“骄傲使人进步”；他质疑“天才是 99%

位真正的绅士。惟其如此，这个文弱书生才堪比二千年前身陷古罗马斗兽场，伟岸挺拔的色雷斯贵族斯巴达克斯同样深重的苦难，同样高贵的尊严，同样悲壮的事业，同样瑰丽的传奇，只是斯巴达克斯面对的是饥饿到要立刻吃人的野兽，顾准面对的是蒙昧到不可理喻的要吃人的人。

“基督教并非一个宗教或一套哲学，而是一种关系和一套生活方式。这种思想方式有违人的本性，它是反潮流的，罕有的，也是很难实践的。”³⁵

这句摘自一本非常著名的圣经灵修读本的话曾让许多基督徒困惑，倒是在顾准身上你能悟出几分明白，在“头破血流”，“唾面自干”的苦难中，“忍耐”生成了，在“忍耐”中，一种生活方式生成了，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一种罕见的品格生成了，它使最易滋生仇恨的土壤挺拔出最绚丽的人性之花，使最非人化的熔炉锻造出人最应该具有的形状——上帝自己的形状。

难道这不是一种信仰的胜利？

有人判断晚年顾准其实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我不敢、也无意下这样的判断。

“是一位基督徒”和“做一位基督徒”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情。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眼下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言而喻国人都能懂得。顾准最终是否“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不重要，他“做了还是没有做”一名基督徒，比之前者要重要得多，前者仅仅关乎“宗教”，后者才真正关乎“信仰”。

现代神学家汉斯·孔³⁶对“基督徒”下过一个定义，“任何人，只要他拒绝专制，只要他指责神学家或教会头目的傲慢自大，只要他批评教会专制，批评教会与国家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假如从这个定义出发，顾准何止仅仅在晚年“成为了”基督徒，

勤奋+1%天赋”的说法，并拿爱迪生说事——“没有那1%他还是爱迪生吗？”
35（美）华理克《标杆人生 成长之道》

36 世界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德国杜宾根大学荣休教授，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和世界宗教》、《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合著）等。

从读史，论史，纪史，解史开始并竭尽生命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知识，追求美，追求真理的他，其后半生就已经在“做”基督徒了，否则那些关于“契约”“宽恕”“罪愆”“诫律”“审判”“悲悯”“反偶像”“反专制”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年轻的央视主持人柴静在《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文章里写道：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顾准）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非常钦佩在这样的年代里，在央视这样的地方还会有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柴静的提法依然令人无法完全赞同。在人文，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知识”必是要有一个“宽广度”标准的，这意味着你要具有对文明进行比较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种或几种文明的“知识”。你不仅要知道现代文明，而且还要知道古代文明，不仅要知道东方文明，还要知道西方文明，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的原点，使你能从具象的“知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取舍，也就是“逻辑”，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否则凌乱的“知识”真的就会是“风暴中的石子”（柴静的形容太贴切了），试想，在“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风暴中，小小的石子如何能让人“扣住”而“不被吹走”甚至“不被沾染”？更遑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知识”，许许多多“逻辑学家”和他们的“逻辑”自身就已成为了风暴的一部分，以“飞沙走石”的方式助纣为虐。

从“知识”和“逻辑”两个词汇辞源本源的词义上说，你还真不能将这些“石子”统统归为“假货”，不能说十年中国一点真正的“知识”和“逻辑”都没有。无论如何，虽没有阿姆斯特朗那样的登月，总还有上了天的“东方红一号”；虽有1958-1961年滔天人祸造成的大饥荒，总算还没有弄出1974年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那样，以屠杀

三分之一国民的手段搭建起一个“猿的社会”的事情³⁷。

顾准在风暴中扣住的，决不是两颗“石子”而是两块“磐石”，宽广的“比较知识”和有原点的“逻辑思维”，而这两块磐石又都是“大山”的一部分，这座大山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换句话说，顾准的“知识”和“逻辑”之原点就是信仰的原点。

柴静也提到学者朱学勤的判断，“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大限何在？“逻辑”为何乏力？难道在这个领域顾准是唯一的天才？难道他占有了比别人多的资料或文献³⁸？难道他掌握外语的水平无人能够企及？难道那时的史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希腊或罗马，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两河或海上文明？那还能称为史学家吗？难道那时的哲学和社会学家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西方哲学或逻辑学？那么中国各大学还开办那么多的哲学系是做什么的？抑或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都是错误或片面的，而唯有顾准当年“完全（根据）XXX 宣传部给出的资料和文献”所得出的理解才是准确的？

撇开被顾准刻薄了又刻薄，贬损了又贬损的郭沫若，范文澜，李亚农不谈，难道十年里就没有一位青年学子像顾准那样掌握“知识”和推理“逻辑”吗？难道只有顾准拥有一个亲爱的“六弟”陈敏之，保留下他这些日后直教人惊心动魄的文字？须知这是个当时有着八万万人口，现在有着十四万万人口的国度啊！

以上的所有原因其实都不存在，只有一个解释：上述的所谓“知识”和“逻辑”是没有原点和凌乱的，而顾准，非常幸运，他找到，咬定并彰显了“原点”。

如果说两千年前是“治史”为中国留下了一位知识分子司马迁，那么 50 年前是“解史”为中国留下了另一位知识分子顾准。

中国从来不缺“知识分子”。

37 （澳大利亚）David Chandler 《波尔布特小红书——安卡如是说》

38 仲维光《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从古至今，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的中国读书人，都会将自己视为“知识分子”。眼下则更热闹些，几凡读了些书，写了些字，有几张文凭的人都能自视自称为“知识分子”。雷海宗先生所下，顾准又再次强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的断语在今天看似过时，吵吵嚷嚷的“娜拉”们遍地都是，只是谁也不想真的出走而已，知识界依然是一片“静土”。更有趣的是，不愧为“发明大国”之读书人，中国知识分子自己近年来又首创了一个新名词“公共知识分子”，以区别于“非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非知识分子”。说白了，这里有一个西方人看不懂的“体制内外”之分，娜拉们的境况，看“内”“外”的不同和不衡即可略知一二，在那些即非公共又非“知识分子”眼中，无非就是体制内或外的读书人罢了，根本不用搞得那么复杂，而原创于俄罗斯车、别、杜一代的“知识分子”一词词义“以抗衡政府为己任，能对权力说‘不’字的人”、西方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在中国都是当不得真的。

不幸，中国缺的恰恰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顾准算得一个，孙冶方算得半个。

写顾准你可以不写孙冶方，可你要是写孙冶方，就无法不写顾准。有很多人都曾经以为孙先生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然而错了。这个第一人不是孙冶方，是顾准。

孙冶方一生有很多朋友，他是个很纯粹的人，有学问而无机谋，有性格而不狂狷，有风骨而无怪癖，有脾气而无傲慢，老老少少的人们都愿和他交朋友。但纵观他的一生，能被他视为知己，能无话不谈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前面已经讲过的陈修良，他们是终身的挚友，直到耄耋之年他们依然直呼“蓼果”，“阿纳”，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的同志友谊一直延续到冶方生命的终点。另一个就是顾准唯一能从精神，思想和学术上影响和启发孙冶方的人。

顾准能将自己的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与孙冶方从1957年开

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后立刻就给了已无立锥之地的顾准一个定下惊魂，喘息栖身继而任思想驰骋的精神家园密不可分。

尽管他们两人二十多年前就是战友，尽管自己眼下黥面戴罪，苦难中的顾准也绝不会自轻自贱。别看他已经被整得七荤八素并且喜出望外能来到他最渴望的，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经济所，他却毫无要“叩头谢恩”的意思。性格使然，顾准对法家鼻祖《韩非》之“利害说”和“术”深恶痛绝，他对人从不行“术”也不容“术”来委屈自己。他一生唯一一次对“利害”的低头和对命运的屈服如前所述发生在他的临终，它残酷地褫夺了顾准最后的尊严和终极思考的神圣权利，令他神圣的临终时光蒙羞。虽然这一举动非人性到令人发指，却又不得不承认执行的人们并非出于个人心理的邪恶，只是在那个体制（System）中，以最高尚的名义做出最下流的举动已经成为常态，人们习以为常罢了³⁹。

把话头收回来。顾准对孙冶方，这位当年的战友，如今的顶头上司和不久后的“阶级敌人”永远是平视的，也只有两个互相平视的人，才可能成为顾孙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说到顾准和孙冶方的生命交叉，前人已经有过无数篇文章书籍谈及。多少学生，亲属，后辈，

39 陈敏之《我与顾准》——“五哥咳血不止……因为没人照顾，不得已打电报给我，把我又招去北京。见面后第一件事，他便是表示想见见所有的孩子……五哥写了两个条子，一是表示他已宽恕了孩子，也希望孩子能宽恕他……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到医院与顾准谈话。来人拿出一张预先写着：‘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这一类内容的认错书，郑重地告诉他，只要他在上面签个名，就能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重新回到人民中间来。但是，顾准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签字。他觉得他不需要什么摘帽。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随便怎么劝说，坚决不同意签字，他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顾准实在不愿让自己临终再受一次灵魂的侮辱。朋友们只得上前恳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啦。顾准听到这话，深受震动，思考了片刻，才极其勉强地同意了。他颤抖着在这份最后认错书上签字时，由于内心倍感痛苦而流下了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临终还在认错书上签字，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奇耻大辱啊！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经济所党组织收到顾准的认错书后，派代表来病床前宣布了摘帽通知（但不恢复党籍）。”

仰慕者对这一对中国理论界的苦命人，中国政坛上的荆棘鸟充满了敬意，多少人对这一段学林佳话津津乐道，他们的文字给本书留下的余地已经不多了。这里只想从顾准一篇写于1969年的“坦白交代”材料《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副题）我和孙冶方关系的补充交代以及我对这一关系的政治性质的认识》入手，它已足够让人理解两人的“高山流水”之交，更何况一本《顾准自述》（其实更接近事实的题目应该是《顾准坦白交代材料大全》）已完全可以将其看做是他的自传，素材之丰富已是大大超出预期。

早在30年代末两人在“孤岛”文委共事时期，顾准不时“睥睨”一把的毛病就在冶方头上犯过。他知道孙是留苏学生，“中国农村派”的经济学家，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的译者，但这并未引起他的敬佩，他对这位单线联系的上级是这样评价的：

1. 是一个并不熟悉实际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
2. 对文化工作各部门的领导拿不出什么深刻的主意，领导一般化；
3. 但不拿架子，平易近人，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⁴⁰

1939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二号人物，负责上海职员、工人两委员会的刘长胜先生开始“清算顾准路线”。用顾准自己的话说，刘对他的嫌恶几乎是“先天的”和“根深蒂固”的。顾准毫无先兆地被从自己一手组建的上海“职业救国委员会”调到孙冶方在孤岛上领导的上海“文化救国委员会”⁴¹。到1940年7月顾准离开上海去苏南解放区，孙顾两人在文委分别任正副书记11个月。这一时期用顾准自己的话来说，是“并未全神贯注的”，“不认真的”并且事后是“感到内疚的”，还应该加上一条，是“有情绪的”，24岁上就被人“清算”了一把“路线”，无论如何是过于夸张和煞有介事了些。离开他组建和熟悉的职委到他并不佩服的人手下干革命，他不无沮丧，“革

40 《顾准自述 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

41 同上《1934-1940年的上海地下工作》

命更业余”了倒是很有可能⁴²。

两人的第二次相逢是在1941年9月的苏北新四军军部。上年顾准离沪奔赴他向往的苏区，一个月后冶方也接中共中央特别指令赴延安去“说清楚问题”。他携妻子克平辗转四个月才从上海来到重庆，却因重庆延安之间交通断绝无功而返，按周恩来指示到苏北华中局工作，在这里两人第二次相逢。他们的短暂重逢依然没有波澜，用顾准的话“因为不在一起，见面机会很少，对他的了解无所增进。刘少奇《复宋亮信》好像在报上读过，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多少是不关心的”⁴³。

1943年3月顾准赴延安参加延整，孙冶方却没有和他一起再一次奔赴延安，王明已经失势，不再有人非点着他的名“整”他不可了。

顾准和孙冶方下一次的相逢是顾准从延安回到苏北淮阴的1945年底，这一次两人共事了长长的6年，一直到1952年“三反”中顾准被撤职。这6年才是两人一生友谊的真正开端。还是用顾准的话来看冶方：

“这6年中，因为我和他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就相识，而且他在上海是我的上级，此时是我同辈的同事，他对我完全平等相待，所以我和他的关系还特别密切一些”。这种“特别密切一些”的私人关系甚至差点促成当时顾准所在的上海市财政局向冶方所在的华东工业部所建工厂投资。

哈，这哥俩差一点“徇私”啊⁴⁴。

“他不担任何种工作，都没有卖老资格或悻悻不平的表示”；

“这六年中我不记得孙谈起过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也没有听到他提起刘少奇的《答宋亮信》以为夸耀，他似乎自知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个缺点，埋头实际业务绝口不谈理论问题”。

这样的人品，顾准是欣赏的。

“三反撤职以后我很不服气，羞见故人，从前熟人极少往来，孙

42 同上《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社会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1937-1940》

43 《顾准自述 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

44 同上《上海市财政工作，1949/V-1952/II 历史交代（十八）》

治方是少数例外之一。……但他态度鲜明地认为我确有错误，罪有应得……。他对我的案件不知内情。”⁴⁵。

这，顾准是不服的。

1956年，被整得“饭也要没人给得吃”的顾准开始撰写《试论》。

在酝酿阶段，他拿着《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作用的一段论证向孙冶方“请教”。这段论证，用顾准的原话说，对孙冶方起了一种“惊蛰”的作用。

从此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两人接触频繁，谈话主题就是一个价值规律，并且对骆耕漠等经济学家抱住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某些论点不放大加非议。其间孙冶方甚至趁访苏其间直接就马克思的这段论证向前苏联大经济学家索包里请教，得到索的认同，而此时正是“老大哥”慢慢向“修正主义”右转的开始。

1957年，顾孙两人先后发表了三篇著名的“反党文章”，在顾准是《试论》，在孙冶方是《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正是这些文章为“孙顾反革命思想联盟”奠了基。

此处摘录顾准的“坦白交代”材料，让同时代的人重温一下那个年代的气场，也让年轻人了解何谓精神上的相知，何谓真正的友谊。

“我拿这段论证去请教孙冶方时，他似乎很‘震动’……也许这段论证他从前没有想过，此时在苏共20大逆流的影响下，抽芽盟长，蠢蠢欲动，（论证）对他起了一种‘惊蛰’的作用。”⁴⁶；

“（我们）炮制出来的毒草，在我是《试论》，在孙冶方是《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推动我写《试论》的实际经济问题是农业问题，尤其是几十年来苏联农业停滞不前这一可惊的教训。孙冶方的议论中心则是固定资产问题，他对‘只准复旧，不准革新’这一可怪事实（颇有微词）……”⁴⁷；

“我的《试论》，批判文章都发表出来了，深深感到《试论》所陈述的观点是违背大跃进方向的……以后在《经济研究》上读到孙冶

45 同上《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

46 同上

47 《顾准自述 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

方的《价值论》，很惊诧何以这个时候（他）会公然（唱）出这样严重的反对大跃进的‘反调’，尤其不理解我的‘老朋友’怎么会在我已划为右派，我的《试论》已经公开批判后还公然出来继续唱他的反调。”⁴⁸；

顾准这里有点“不老实”了。怎么可能不理解“老朋友”所唱的“反调”？他绝对理解！只是被“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氛围中老朋友的“赤膊上阵”（那时人们很喜欢用这个不雅的成语，孙冶方也很喜欢用）吓了一跳罢了，他没有料到这位尚在“位上”，应该有所顾忌的老哥，胆量和勇气居然比自己这个“二次戴帽”，“开水死猪”还大，这着实让他高兴之余吃了一惊。

“那时曾动念写信劝告他以我为‘前车之鉴’，当心一点。后来想想我是右派，和他通信不好，就放下了。”⁴⁹；

哎呀，幸亏顾老没写。倘若老顾真写了“劝降”之信，老孙一定会对他甩袖或者嗤鼻“怎么？真理只能靠你坚持不成？”

两个真正的朋友之间一定会有这样的翻脸。

“当时孙冶方之所以特别表明经济研究不是我的任务，是因为他已经有‘灭顶’的预感，要和我这个摘帽右派划清界限。我因为不理解当时的局面，对于我这位‘老朋友’的这种态度很生气。”⁵⁰

“虽然孙冶方不要我卷入他的经济研究，我要搞的又是自己的‘体系’，孙在报告会上不提‘非会计’的部分……不过在同一天，他自己动手破坏了这一‘不卷入主义’”⁵¹；

这一段“坦白交代”好有意思：顾准先生和孙冶方先生之间大有竞争，何止有，其激烈的程度还不低呢。老孙很想搞一个“个人体系”，老顾又何尝不是？可老顾是搞“会计学”出身，在经济学大家族中，会计学大概只能算个庶出的探春，再优秀也有点“出身”的自卑。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会计学大师顾准又不大瞧得起经济

48 同上

49 同上

50 同上

51 同上

学大宅门正出的孙冶方，你看他说：“由于我对孙的理论能力估计不高和文人相轻的习惯，我并不认为孙能写出好书来，所以我对它（孙冶方的《经济论》）毫不关心。”⁵²

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就是到了孙冶方认为“捍卫价值论就是捍卫民生”的时刻，这两位竞争者的“门户之见”“文人相轻”一瞬间就收敛了，一个马上敞开“庶出不得入内”的大门，双手欢迎“探春”参与管理“大观园”理论的探讨，一个欣然加盟，立即就折旧、财务控制、价格论的论证方法、资本利息等等等等，肯定属于“非会计”领域的问题提出自己的高论，纵横捭阖，淋漓尽致，弄得正出的李纨，薛宝钗反倒只有听这位探春小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份，到头来反落得孙冶方埋怨顾准“不民主”，并且自我表扬一番“自己是彻底的民主”了事。

哈哈哈哈哈，真不愧是顾准、孙冶方，乐死人了！

“（听）那次报告以后，明确知道孙冶方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出于我反动阶级的本能，我不能想象孙冶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一向自承，如果我关于经济问题的见解是修正主义的，那我比孙冶方更为彻底。如果孙冶方因持有并发表这些意见所以有罪，那我的罪更大于孙冶方。既然孙冶方是运动中的重点，我也跑不了。”⁵³

你可以说顾准是在为自己的“难兄”开脱，但你也可以说是这位“难弟”在“争功”呢。

“1964年2月讨论张闻天‘笔记’会上孙和我互相支持……都是孙顾问思想交流的具体环节。”⁵⁴；

你听，最精彩的三声部合唱开始了。张闻天，孙冶方，顾准开始一唱两和或两唱一和，此“三家村”可比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彼“三家村”早好几个时辰呢。

“他对于我的会计‘理论’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理论完全

52 同上

53 《顾准自述 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

54 同上

合拍一点，绝对不会有所怀疑。”⁵⁵；

他当然不会怀疑，他老孙要的就是这种“完全的合拍”嘛！

1964年，看出中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必须改革的顾准，不知深浅地将文献级的《美国总会计师制度》译成中文，也不征求孙所长的意见就直接投稿给《译丛》杂志，被该杂志编辑部看出端倪，抵制不发。全靠孙冶方的“直接干涉”才得以刊出。其中的过节译者本人竟全然不知，直到文革中被揭发⁵⁶。

“我的会计研究和孙冶方的《经济论》‘最大最小’黑线是完全合拍的。假如孙冶方的《经济论》居然得以公开发行，流毒全国，我的会计学就是《经济论》在企业经营管理和经济计算范围内的贯彻。”⁵⁷；

难得难得，这是《顾准自述 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这篇“奇文”（那时人们常常说“奇文共欣赏”）过程中很罕见的、我们顾先生比较“谦虚”的地方，竟然“屈尊”将他的学问投名到别人的名下，承认是别人的“马前卒”和“打手”。孙冶方的《经济论》没有“居然”得以在全国公开发行，才使得顾准的会计学也就没有在其“靡下”“流毒全国”。

还有一段顾准对自己“坦白交代”的注释，尤其令人钦叹：

“有的同志把我说成是孙冶方的‘启蒙者’，我觉得并不确切。因为孙搞经济学比我早得多，这种反动经济思想在他脑子里恐怕早已存在，无待我来启蒙，充其量我不过通过请教《资本论》那段引文对他起了‘惊蛰’的作用。至于我自己，我完全清楚我的反动经济思想和我的反动世界观的关系，我绝不是如所内许多同志那样，不自觉地受了他的影响，受了他的蒙蔽不自觉地犯了错误。孙顾二人，是分别在自己早已形成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共同酝酿了反动经济思想，这两个人的经济思想基本相同，然而大同小异，两个人彼此独立地想搞

55 同上

56 同上

57 同上

自己的‘体系’，谁也不是谁的助手。所以我说，孙顾关系是‘反革命思想联盟’。”⁵⁸

顾准真不愧是“顾准”，写个坦白交代也这么咄咄逼人，你们甭说是我给孙冶方“启”了“蒙”，可也甭打算说我是孙的助手，我俩之间的“官司”哪里是尔等人物能够理解的？我也犯不着跟你们解释。既然你们非要给我俩套上一个“名头”不可，好嘛，“反革命思想联盟”老子还算勉强能接受！

如此这般的“坦白交代”，既然当局你水平低到压根就看不懂，看不出孙顾们真正在说些什么，你要他们写它有什么意义？除了浪费纸张，还得要个地方存放。但今天的人们可得好好谢谢当局，没有这些揭发批判、坦白交代，后人怎么得看这一场华丽的“高山流水”？

因治方毫无征兆的突然入狱，“伯牙”“子期”失了“相揖而别”的尾声，被后人视为憾事。那年头，连冶方最信任的学生们也担心老师会不会在残酷的单人监禁中疯掉，只有顾准大不以为然地嫌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老师，“老孙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就不会发疯”。他还把握十足地告诉这帮年轻人，“老孙只要出狱，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

“老孙”出狱，顾准却已经遽尔长行，两人失之交臂，阴阳两隔，时间只差4个月。尚是“待罪之身”的冶方，日日徘徊在接纳了顾准骨灰的小小三里河旁，他的惆怅和心伤之痛，大概也只有顾准才能懂得。

人们，你不妨夜深人静时驻足一会儿今天还静静流淌在京城闹市的三里河，兴许你还能听到那一场“高山流水”的依依余韵。

人生得一知己如此，足以。

顾准和孙冶方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本书不想再去重复前人的描述和感叹了，他们留给后世何等的精神遗产也已早有定论。只是有一件事情至今未曾弄清楚：

1982年冶方逝世前再一次郑重指明，他于50年代在中国提出价

58 《顾准自述 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

值规律，是受顾准影响的。谢世前，他殷殷请求自己的两位学生吴敬琏和张卓元，将来在出版他的文集时一定要把发表于1956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的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后记，因为那个后记上有这样一段话：

“还在今年年初，吴绛枫同志就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我在那时虽然感觉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因为即要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而未能对这个问题深入学习。此外那时在自己的认识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理论问题对统计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联系。”

后记中的吴绛枫就是顾准。冶方毫不含糊地指明自己的经济观点是受顾准启发和影响的，甚至对自己的秘书说过“我不过是拾人牙慧”⁵⁹ 这样谦逊而明确的话语。冶方一生的道德文章都是这样写过来，写到“顾准一章”更是不会“荒腔走板”，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会质疑。

1982年冶方去世，顾准离世已近8年。1993年张劲夫在《文汇报》发表《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不但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事实，还指出早在1956年顾准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问题的观点，这是非常难得的。此时顾准作古已经近20年，孙冶方也已作古11年了。这一段被多少后人说不完“喔，善哉，嵯峨兮若泰山”道不尽“喔，善哉，洋洋乎若江河”的学林佳话却因为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归宿而令人遗憾，在1998年10月版的《孙冶方全集》中人们未在那篇著名文章的《后记》中找到这段话，及至10年后2008年版的《孙冶方全集遗补》，依然没有应该补充了这段话的《后记》的遗补⁶⁰。

人们，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会是一次改变生命形态的历程。假如你还在看书，请今天就开始读顾准吧。

59 孙冶方秘书冒天启口述

60 本书为此事向多位经济所的老人请教、查证，结果都认为是由于编者的疏忽。这对顾准、孙冶方都是不公平的。

二十 暮靄沉沉楚天闊

从黄仁宇先生开始，历史学家们提出了“中国大历史”这一概念。

中国近代这一百年，相对于大历史真是一瞬而已。人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就像是一支放大镜，将这支放大镜抬得越高，看到的東西就越全貌，但很多细节会模糊不清；而将这支放大镜放低，就能看到很多令你兴奋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却又会令你迷失在大历史的广袤和繁杂中。某些史家视野中往往只有事件没有人，或者只有伟人没有普通人，而薛家的两兄弟却都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弟弟孙冶方又是一段小历史中的大人物，这段历史就是对于全体国人来说都过于漫长的“文革十年”。

这一篇的开篇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乖张、诡异的时段，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1968年，孙冶方整整六十岁。

四年前孙冶方就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1966年的浩劫伊始，他已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已升格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¹。他每天的“工作”，就如他对老伴洪克平轻描淡写的那样“还不就是站站，弯弯腰，低低头”。

孙冶方那时可是个“角儿”，《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大块大块的专题文章批判他，他的批斗大会常常是在天安门广场召开，那可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哦，名声大，舞台大，能站上去的可不会是“一般角色”，那个“站站”“弯弯腰”“低低头”是什么意思，我想每一位6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明白。

如前所述，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有一本藏书《对孙冶方的

1 《对孙冶方的批判和经济战线的斗批改》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书。

批判和经济战线的斗批改》，打开第一页是毛主席语录：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这是一本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才看得懂的书，不是因为它的深奥而是因为它的浅薄。照这本书里罗列的“罪状”，毫无疑问孙冶方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魁祸首，领头黑羊。对于后人说这倒是个崭新的说法，和大家熟知的“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目”是刘少奇大相庭径，真可谓“天外有天”。

1968年4月5日，孙冶方被逮捕。

一位60岁的老人，一位学者，要抓也就抓了。没有罪名，没有程序，没有解释，这些东西既不值得做也不需要，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正常和常态的事情，没有人大惊小怪。更何况四年前孙冶方就已经被中共主管思想，文教和意识形态的康生先生内定为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四清运动”头号的靶子，头号的“思想犯”了，现在还没抓倒是奇怪。

其实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不是康生要抓孙冶方的根本原因。

这个憨直的书生大半生都在追问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的下落。董，俞，周的生死不明和历史冤屈是冶方无论如何都放不下的心理重负。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自己的“历史问题”可以先放在一旁，可寻觅董，俞，周的下落他却当做使命一般，下决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是一份对生命的尊重，也是一份同志间的道义，孙冶方生而俱来的文化基因令他认为这份道义自己非担不可，别无选择。

从新政权建立伊始，孙冶方就没有停止过对董，俞，周下落的追问。1956年访苏时，他还曾下大力气，将一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多年的流苏同学家属弄回国和亲人团聚。这些事早就弄得素有“小斧头”“刑官”之称的康生同志心惊胆战，又怕又烦。文革初，冶方点点滴滴涉及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往事疑问的日记和来往书信又被抄查了出来，想都能想象得出来康老的恼怒。又一次“运动”了，又一

次“革命”了，不趁机收拾这个“隐私知道得过多的”书呆子更待何时？

在国人皆知的北京秦城监狱，孙冶方被囚禁在一个四周都是防自杀墙的单人牢房里。屋顶的电灯 24 小时不灭，皮带，剃须刀，钢笔，鞋带甚至铅皮的牙膏……凡是想象中能令你自杀的东西，统统都被狱卒没收了，这是个能逼人发疯的地方，也确实是个让人想死的地方。

这是他第二次坐牢。距上一次在上海的被捕已经时隔 37 年。那次他被国民党的监狱关了 7 天，这一次却被自己党的监狱关了整整 7 年！

要是有人写一本《孙冶方在狱中》，那将是一本感人而有趣的书：

关于他用打腹稿的方式撰就数十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论》，每天默诵，修改，补充，全书复诵了八十五遍（每月一遍）；

关于他以写坦白交代的名义一再要求多发纸张，结果却写出四万字的《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坚持己见，死不悔改；

关于他读烂了一本俄文版《资本论》，全书插满糖纸、草纸“书签”，牙膏皮、指甲划痕、注痕。此书现在无锡玉祁镇“孙冶方纪念馆”。还有一套《马恩选集》四卷中文本也是他在狱中读的，其中一张“糖纸书签”印的是“上海产品——陈皮梅糖”，因为他肝不好，很爱吃糖，尤喜话梅糖，老妻克平总是千方百计从上海弄到手，再送入秦城；

关于他宁死也不诬陷他的同志，把想逼疯他的人倒是逼得要发疯；

关于他在牢房中学习德语，终日喃喃地背单词，被监管人员以为发神经病，忙不迭通知老伴洪克平来探个究竟；

关于他在单人牢房里无师自通地练就一手太极拳，这可是真正的“一手太极拳”哦，因为犯人进来裤带一律没收，老先生只好一手提着裤子，一手行云流水般地“白鹤亮翅”，“倒卷虹”，把个新来的狱卒看得目瞪口呆；

关于他对牛弹琴般向提审人员讲述他的经济学观点，也不管人

家听懂听不懂，耐烦不耐烦，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弄得提审他的人倒要向他告饶：

关于他以一个犯人之身关注中东战争爆发的原因，继而分析石油垄断的后果，还妄图呈文国家计委；

关于他不顾自己阶下囚的身份，写出批驳郭沫若违反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文章，还希图送达本人；

……。

整整七年，孙冶方可真是一天都没闲着。

许多关心他的人担心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在长期的监禁中会发疯，这样先例在秦城已经发生，单独囚禁的犯人或者发疯，或者丧失了说话的功能。但知他弥深的顾准却幽幽地说：“放心吧，有思想的人就不会发疯，老孙是有思想的人，有经济学孙冶方就绝不会发疯。”

在许多人看来枯燥无比，乏味至极的经济学到了冶方那里却成了长寿操，保健品，娱乐项目加灵丹妙药。这么可爱，这么有趣，是否大家都应该从 ABC 开始学点经济学，以备不时之需？

晚年的冶方常常对亲人们说是经济学救了他，没有经济学的支撑，他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他的经济学倒是和老朋友顾准的历史学异曲同工，没有希腊罗马史，东西方文明史，经济理论和经济理论史研究的支撑，顾准绝活不到疾病夺走他性命的一天，他一定会死于抑郁或者崩溃。

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秦城监狱，犯人们照样饥寒交迫。法西斯式的审讯，精神和身体上的蹂躏是许多人根本活着走不出监狱的原因，国家主席不就死在这上头了吗？

高贵的东西往往也是脆弱的，顾准和孙冶方都是高贵的，前者终于在五十九岁上天折了，后者却以六十七岁的高龄活着走出了监狱，而且又活了整整八年，得以从容祭奠比自己晚出生 7 年，又早走了 7 年的朋友，诤友和挚友。

残酷的单独监禁囚房成了他思维的运动场，每餐从“狗洞子里”递进来的屈辱的“囚饭”迅速就转换成了巨大的思维熵量。原是思维使他受难，不想受难却令他的思维更活跃了，这倒是当局们始料未及

的。身为研究最枯燥数字的经济学家，却像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勇敢、美丽和罗曼蒂克，和十二月党人、牛虻一样是个英雄。

1975年也是4月的一天，孙冶方突然被释放，同样地没有前兆，没有理由，没有程序，更没有解释。面对指望他唯唯诺诺感恩戴德的权势人物，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沉静地说：“我既不知道为什么坐牢，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告诉你，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铿锵“三不改”，掷地若有声。

今天的一代人可能已经不再容易被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所感动，也不再有兴趣去了解 and 思索它们了。可是年轻人，你的族群就是由这样的人和事组成的啊。“观点”会过时，“主义”会改变，“党”更是会消亡，但是你的父祖之国的脊梁就是靠这样的人撑起，历史就是靠这样的事写就的啊。

冶方被释放回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狱中打了无数遍腹稿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写出来。家已经多次被抄，连纸张都没有，他就去捡纸烟盒，翻过来就是上好的稿纸。一位学生冒着受株连的危险，带着孩子去探望老师。她先让孩子打探清楚门口没有外人，然后急步跨进孙家。高兴得话都说不出的冶方，第一件事情却是捧出厚厚的一叠叠烟盒纸。这么多摞在一起，摊平并写满了字的纸盒烟令这位小姑娘终生难忘²。

冶方期望毕其功于一役，以一书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学。然而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过于理想化了。且不说眼下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异化了，式微了，理论怎么可能不起变化，即使在当时，想按照自己十几年的思路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路，冶方也已经发现怎么也走不通。面壁七载，日思夜想，打了85遍腹稿的《论》，蒂落瓜不熟，柳暗花不明，不仅是拓进艰难，几乎是无法自圆其说。对于孙冶方，这种痛苦不但

2 徐方口述。

大大超过了他7年的牢狱之苦，也超过了他最后的病体之苦³。

但是，一切事物都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的。脱离了大背景可以说一切史实都没有意义。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在闭关了几十年的中国，那可是振聋发聩，灿烂夺目的事物。

将近七十岁的高龄加上七年监狱生活的折磨，冶方的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没有底稿，没有参考书，其写作的艰苦更是可想而知，他开始向一切可以信赖的亲友求助借书。整整七年他只能看别人指定的极少的书籍报纸，精神上的极度饥渴，不是个中人是无法理解的，他像一个饿极了的人扑向食物一样扑向印刷物。

冶方的外孙沙沙告诉我，那几个月他的全部课余时间都用在了给外公找书上。图书馆，经济所仓库，囤积抄家物的堆栈，亲朋好友的书架，只要说得出书名，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他上天入地也要为外公找来。就在寻书找籍的过程中，这个20多岁的愣头青小伙子接触了经济学初步，这为他今后的事业奠定了人所不及的基础。

冶方还和老伴洪克平到西单的照相馆照了一张老夫老妻劫后重逢的相片，相片上的他还是囚徒特有的光头，却依然是目光炯炯，嘴角挂着一丝宽厚的笑意。

没有了工资，却也没有人再来聒噪他。他从从容容地读书，大大方方地写作，甚至不顾老伴“老狗不学艺”的善意嘲笑，天天一早起来就背诵德文。读原文版的《资本论》是他毕生的愿望，可他毕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这个愿望他至死也没有实现。

就在他出狱不久，和他一样千方百计要把国计民生搞上去的邓小平又一次轰然倒地，其罪名是“右倾翻案风总后台”。这令孙冶方怒不可遏，以至于在小辈们面前失态地顿足长啸“老匹夫啊……”⁴。

中国人悲喜交集的一年，1976年在北京料峭的冰雪中来到了。

3 吴晓波《吴敬琏传 最后的孙冶方》。

4 沙沙口述。

哀乐在呼啸的北风中骤起，忽远忽近，忽强忽弱，似乎几个月就没有断过。孙冶方忘了自己释放才一年，还是个“待决”的“罪人”，在那个著名的清明节不顾自己68岁的高龄，硬是坐在外孙自行车的后座上去了天安门，去了那个一定会招惹是非的地方。

面对着漫天挽联遍地白花，孙冶方老泪纵横。周恩来走了。50年前，是这个人走进乱到“要枪毙人”地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江浙同乡会”纯属子虚乌有，将年轻的冶方拉出泥淖；4年前，又是这个人指示北京卫戍区彻查北京监狱对待犯人的不人道，使得年已六十五岁的老政治犯孙冶方没有因为饥饿，寒冷和虐待而瘐死狱中。

冶方至死都敬重周恩来。虽然他的对门就住着毛泽东的前秘书、刚从劳改营回到北京的李锐，虽然老哥俩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弄得彼此老伴夜夜要喊人回家睡觉，可那时李老弟还来不及对孙老哥说起周的另一面，两人也都不可能知道周临终时老伴邓颖超记下的他说的话，满满的后悔、追悔、懊悔、反悔却和每个中共党魁一样，唯独没有忏悔⁵。

话说回来。民众对倒行逆施者的愤怒让他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他知道自己“满腹经纶”再一次用到的一天不远了，得早做准备。于是就在这一年，他开始着手撰写《要理直气壮抓社会主义利润》。

为了国家众生，孙冶方准备好了再冒一次大不讳。

虽然谁都知道倒行逆施者的末日不会太远，却谁也没想到来得竟是这样快。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抓了起来。中国历史上应该被格外诅咒的，无聊无趣到始作俑者自己最后也不知所云，不知所措的十年闹剧总算是结束了。

“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又一次如潮水般涌向冶方的胸口，只是和1949年那一次比，他冷静得很快。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和流通几近瘫痪，只是因为国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才没有彻底崩溃，多年前他做出的推断和预测都一一验证了。但冶方要做的不是一个先知，他清醒地知道现在需要立即开始的是对国民经济的挽救。

5 集自多篇《邓颖超日记》。

1977年，孙冶方恢复了公民的一切身份和权利，回到社科院并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以后的三年里，他共写出22篇论文，全面做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理论分析。他的《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和《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的著名文章，为邓小平这位治方五十多年前的学生，同学和同志决策新时期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新时期新的领导人出访如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时，常常听到他们的经济学家们谈到中国的“孙氏定律”，此时他们总要提到的一句话是“我们借鉴了贵国的‘孙氏定律’”。

孙冶方的市场经济和利润价值理论终于被掌握国策的实践家们接受了。

从1974年出狱到1983年逝世的九年间，冶方的生命之树又一次抽出碧绿的新芽，这也是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才够包容的内容。

1980年4月二哥薛明剑离世。其时的冶方也已重病在身，缠绕了他三十多年的肝部动了第一次手术，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指挥助手班子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这篇大文章。家人和助手们合谋隐瞒了二哥故去的消息，怕他倔劲上来要远赴上海去参加追悼会。

1982年，冶方被确诊患了肝癌，并且已是晚期。在他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中共给了他极大的荣誉。邓小平时期伊始，孙冶方三个字在各种大报上出现的次数以及赞颂他的文章的数量之多和感人之深仅次于周恩来。甚至在他还活着的1982年，《光明日报》就开辟了一个“孙冶方颂”专栏，用来刊登那些如雪片般飞来的群众来信和赞美文章，以致沉疴中的冶方不得不专门致信光明日报和中宣部，请求停止这样的报道并欢迎大家转而对经济观点进行争论。

他是一个理论家，深知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生态的重要性。在一个没有经济学，没有经济理论的国度，在一个不准讲利润，“口不言钱而称阿堵物的假清高矫情”年代，匮乏会被故意制造，贫穷会迅速传染，前者的“苛政”会让后者“猛于虎”，阻断传染源，遏制其蔓延是中国当下最要紧之事。

冶方已垂垂老矣，无法到第一线去直接指挥生产，但是他深知在

错误的经济学指导下国家会再一次陷于混乱、内乱和动乱，国民会被再一次地倒悬，这个又大又弱的国家短期内已经无法再经受一场经济混乱了。

像一条吐丝将尽的春蚕，一只蜡泪将干的巨烛，他拼了命地工作，拼了命地写，算，论，说，直到肝癌的病魔把他彻底击倒在床。他的肝肿瘤被切除后护士曾从手术台上端下来给家属们看，连见惯不怪的医生们也惊诧这位72岁的著名病人带着已如豆腐渣一样的肝脏是怎么坚持到手术的。

冶方先生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立下了以后感动无数中国人的遗嘱：

“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广为宣传，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肝脑涂地”，孙冶方为了他的国和他的民所做出的，就是这句成语最好的注脚。

孙冶方在新时期的故事，无论在中国的政治界，经济界还是在人民群众中都曾广泛地流传，赞颂他的文章书籍何止千万。从严格的学术角度出发看待孙冶方，他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他的价值理论用今天的眼光看是不透彻的，比起顾准从根本上评判非人道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悖逆人性的“革命”本身甚至是暧昧的，但他的人格和品格却不会过时，尤其是在中国的当下，这种人格和品格更加显得稀缺和高贵。不敬地说，已经很难在40岁以上的人身上发现这种人格和品格了，只是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还能嗅出当年的薛萼果——孙冶方的气味，是为悲哉。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冶方先生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虽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至今还依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但无可避免，他和

他们，那些逝去了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包括他那位被后人定义为“民间社会经济学家”的哥哥薛明剑，他们的足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几乎要听不见了。

2008年10月，在纪念孙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上，主席台上的贵宾们虽然已经大不如十年纪和二十年纪那样声名显赫，台下的经济学人倒还算是老中青少，人才济济。可是随着每位发言人发言后即行离开会场而显得空空荡荡的主席台，那种悲凉和落寞是很难用文字形容的。眼下的人们有太多太多需要忙碌的事情。社会的多元，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欲望的越来越无节制，使人的人格和精神越来越处于分裂的状态，一切都只需要向前看，纪念和反思成了多余。主席台上唯一留下并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吴敬琏先生，这位顾准和冶方都格外喜欢的学生，只有他也是80岁的老人了，还在正襟危坐，为他尊敬的老师，老领导，老朋友守住这最后的纪念。

在北京稻香湖畔的孙冶方基金会，小辈们种下了100棵青松。

经济学家们，你们的一生都在和大多数人眼中最“乏味”的东西——数字打交道，和那些浩如海沙般的“赤字”“黑字”“灰字”“蓝字”们纠缠着，缠绵着，搏斗着，恋爱着。就让本书把歌德和顾准的两句诗一般罗曼蒂克的话送给你们吧：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

“经济学家，应具有诗人的如火激情和数学家的如冰冷静”。

孙外公，薛外公，顾准和所有逝去的中外经济学家们，在“灰”与“绿”的激吻中，在“火”与“冰”的搏杀中，你们的生命之树常青。

为天下布馨香（代跋）

30年前，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孙治方先生，那是我人生最珍贵的记忆之一。有三个细节使我将这次记忆片段保存得很清晰：

第一，那时我正怀着一对双胞胎，站在孙先生高高的书架前，在眼睛看书脊正合适的位置上肚子已经顶住书架了；

第二，我很不自量地在书架上睃来睃去，想挑一本书借走，最后拿的是一本30年代版的古典音乐导读书。由于版本太老，纸质也不好，回家看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掉渣，印象很深；

第三，这本书里有一张孙先生用铅笔写的便条，内容记不得了，反正不是什么军国大事或至理名言，不过记录了个针头线脑的小事，但孙先生的字写得不好看却让我知道了。

这三个细节让我保留下很温馨也很滑稽的记忆。

其实那时我并不懂古典音乐，兴趣也不是太大，之所以拿了这一本书，是因为先生别的书我根本连书名都看不懂哦，不是外文的，就是经济呀，社会呀，政治呀什么的，看着就头疼。孙先生笑眯眯地站在一边，鼓励我抽一本出来拿走，我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挑来挑去，最后只好就是这一本啦。虽然在后来的岁月里，复外大街22号楼那个温暖明亮的套房我又去过无数回，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可亲可爱的老人。在我的女儿们出世后，他就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在我忙于哺育她们时，1983年2月22日，在北京料峭的春意中老人溘然长逝。

克钢（沙沙）一个月前就从我这里借走了当时还属于稀罕物的立体声LP唱盘留声机，先是放在老人的病床旁，后来是放在八宝山的送别厅里。唱片依然是贝多芬全套九支交响乐，那是他的最爱。《英

雄》《命运》《田园》《欢乐颂》……伴随着他最后的时光。

沙沙告诉我，外公是听着贝多芬的《田园》走的，而送别大厅里则一直是《英雄》那不朽的旋律。我是多么的后悔，天天忙那一对双胞胎，也因为去看望他的大人物太多，我竟然连一次也没有去医院看过老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老觉得他最喜欢的应该是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就是从那本我从老人书架上抽出的书中，我知道了这支交响乐是贝多芬“心灵的大地”，表现的是“寂寞与悲怆”的巨大的美，那是作曲者在质问生命和直面死亡。这些话曾令年轻的我不解，令现在的我震撼，也是我至今最爱这一支交响曲的原因。

孙先生在我眼里是个俊美的老头。见到他的那一次他已72岁了，而我刚好倒过来是27岁，当然先跟着克钢规规矩矩叫了外公。老人清瘦矍铄，个子不高，挺直的鼻子，深凹的眼眶，弄得我一出门就很不得体地问，“你外公是苏联人吧？”克钢当然没好气，骂我胡说，他说外公是地道的中国人，只是太外婆有新疆维吾尔血统，所以他们家许多人鼻高眼凹，还有人连头发也是微黄的，像克钢的妈妈禹闰，还有几个姨妈，甚至又遗传到克钢这一代。外公的这些特点不过格外明显一些罢了。

孙先生去世前后，论述和纪念他的文章和他在各个时期的照片雪片一般出现在当时中国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光明日报》甚至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孙冶方颂》。这时我才知道孙外公竟然是如此有名，如此被国人爱戴。我差不多看了所有的纪念文章，得出了那时一个普通年轻人最简单的结论：这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是的，一个，大写的，人！

1983年6月，由薄一波，姚依林，谷牧，张劲夫，荣毅仁，薛暮桥，汪道涵，于光远等55位中国经济界的领导人和学者发起建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基金会，也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25年过去了，孙冶方奖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基金会所有成员，从理事长，监事长，秘书长到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义务工作者，他们有些原本就是孙先生的身边人，同志，助手，学生，秘书，养子……，有些

是孙冶方奖的获得者，很多人身居高位。他们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为基金会操劳，常常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而来。

我在退休前做企业时曾经是基金会的捐助者，退休后立刻开始为基金会做义工，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在这份工作里我找到了乐趣，找到了自我，渐渐理解了“孙冶方”三个字的魅力。

我常常感到异常的骄傲和自豪。

托克钢的福，我也见过他另一个外公——薛明剑。1976年我们作为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的学生到上海521工厂实习，周末我们几个同学到无锡去玩。登过惠山，游过鼋头渚，他说带我们去看太湖边的一个地方。

我只记得那是一座典型江南风格的老屋子，斑驳古旧，蕉藤婆娑，女人们都还穿着阴丹士林的大襟衣服。克钢告诉我们那是他的老家。回到上海，我们又去了淮海路附近一座幽深的石库门大宅，一位鸡皮鹤发半身不遂的老人躺在床上，一见到克钢就颤颤巍巍地要起来，一连声地叫“沙沙，沙沙……”。克钢告诉我这是他的外公，无锡那座老屋的老主人。

“你外公不是在北京吗？”我有一点吃惊。

“那是我的叔外公，这一位是我的亲外公，解放前他是荣毅仁家的大总管。”

我立刻噤声。资本家的管家？那不就是穆仁智吗？我这位同学可是老红军的后代，这是人家的家事，别问了，别问了。倒是那座木石结构古色古香的江南老屋和这座中西合璧极具沪上风格的石库门大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不是在搜集孙冶方先生资料的过程中偶然看到《薛明剑文集》，我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但是在读罢这套四卷本的文集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看到一位完全能和孙冶方比肩而立并毫不逊色的人，同样是一位大写的人！

其实从1949年开始薛明剑就从中国的民族工业界和实业界彻底销声匿迹了。当时苏南军管会的高层人物曾在公开场合一语定乾坤地宣布“薛明剑是反革命”！

多亏了他在江南几十年的名望，还有孙冶方当时已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女儿禹谷、禹闰、禹满（薛惠）都是年轻的中共老党员，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工人或农民站出来“揭发控诉”他，他才无性命之虞。

然而这样的屈辱对于从骨子里就浸透了“士可杀不可辱”士大夫情结的薛明剑来讲却是无法忍受的。他选择了缄默，彻底的缄默，长达30年的缄默。而在这之前，他只对最信任和钟爱的大女儿禹谷说，他将再也不相信“说话不算数者”。

薛明剑去世于1980年。

从1950年到1980年整整30年间他就是上海，无锡做寓公，搞一点文史特别是民国史的研究，平静地度过了黯淡的晚年。我很难把30多年前在那座石库门老宅见过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他辉煌的过去联系起来，他也曾激情燃烧，业绩非凡，他也曾挥洒政坛，功成名就，这些都是我细读他的文集后才发现的，也由此才知道我崇敬的孙冶方先生还有一位如此睿智善良，才华横溢的哥哥。

在快要成书时，我最后一次请教专攻薛明剑研究的史家沈飞德，“薛明剑在1949年后到底有没有作为，那怕是文史研究方面？”沈先生沉吟很久，他问我用什么做标准来比较，我说当然是和他五十五岁之前相比。听得出沈先生十分为难，沉默了很久他才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作为”。

放下电话我呆坐了很久。不敢说我为一个大我几乎六十岁并且已经驾鹤西去三十多年的老人心痛，只是真切地感觉到一阵黑暗的空虚突然就像潮水一般漫过胸口，眼前蓦地浮现出一个清癯的身影，那是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和薛明剑命运非常相似的我亲爱的祖父。

作为另一位民族大实业家卢作孚的财务助手，民生船舶公司的会计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他被卢先生派往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和美国纽约，为恢复和繁荣战后中国内河和沿海航运事业，奉卢作孚之命向美加两国贷款、购买和监造新船，同时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一批美军二战剩余物资，扫雷艇、巨型坦克艇登陆艇、驳船、大拖船等。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向国外规模派驻人员、集团作

战、利用外资成功的第一例¹。

也是在那个改朝换代的年头，因为船只还未全部到手，他又奉卢先生重托，在其他驻美加人员纷纷回国或自谋生路之际坚守异国，出任民生公司驻纽约办事处主任，继续操持船只的监造和商务的处理²。卢作孚先生和他的民生班子唯一的目的是要把这些船弄回中国，把这件利国利民的事情做到底³。

1951年，44岁的祖父冒着生命的危险，靠了十几名海盗般要钱不要命的挪威籍海员，拖着只能用于内河和沿海的船只和若干根本无动力的船只，居然平安越过波谲云诡的太平洋，把它们完好无损地开回了香港并相继开回祖国。

你能想到他的祖国用什么来迎接他吗？

连抗战胜利后一大家人由重庆迁回武汉老家都顾不上就只身飞

-
- 1 王世钧《卢作孚追思录 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的经过》——“在和外国资本的交往上，荣氏兄弟和穆藕初的纺织企业、范旭东的化工企业、刘鸿生的火柴企业、煤炭企业都有出洋游历、考察、学习、借贷、采购的过程，但真正组建企业的驻外办事处、长期和规模地外派人员和洋人平等交道、买卖，民生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为了适应战后中国航运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民生公司在美国的纽约、加拿大的魁北克、蒙特利尔，泰国的曼谷以及香港和台湾均设立了分支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出自中国的第一家 MNC（跨国公司），虽然其规模无法和眼下的巨型 MNC 相比。”
 - 2 祖父王庭枢在 1949 年后没有留下有关民生公司的任何文字，因此很少有人还记得他的名字。只是在我的家庭中，“卢作孚”三字人人耳熟能详。上世纪 70 年代中加建交后，中国交通部财务部门多次找到我家，向祖父询问民生公司债务问题，老人均以年岁已高、时代久远、记忆消失为由坚不开口。80 年代初，卢作孚之子卢国维先生两次到我家拜访，希望祖父写下回忆文字，亦被婉拒。关于他横跨太平洋的回归之旅，更是民生史上的一段空白，除了家庭的集体记忆，仅剩几位民生老人的口述记录。“1951 年地狱之灾”已经令祖父吓破了胆，他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彻底的噤声。卢国维第二次到我家，因为是我为客人下了荷包蛋面条招待，客人走后祖父告诉我这就是卢作孚的儿子，已经来了两次了，所以记忆清晰。
 - 3 祖父在教我们这些孙辈外语时，常常提到一句话——“What language do you talk about?（胡说八道）”，就是他们和对方谈判谈到急眼时对方骂了过来。我倒没觉得这句话有多厉害，可他老人家说到此处总是很生气。是时民生公司向加拿大三家银行——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和自治领银行贷了款，和两家造船厂——圣劳伦斯造船厂和乔治蒂·台维斯父子造船厂签订了造船和改装船合同。谈判极为艰辛，口出不逊在所难免。

赴魁北克，五年没有回过家的祖父，甚至未被允许在汉口多呆两天，回家看一眼多年未见的老母亲和妻儿老小，他立刻就被“勒令”去重庆，几乎是从朝天门码头就被直接拖进上千人的会场。我那绅士派头十足，操一口流利英语的祖父被揪住头发，拳打脚踢，像一只皮球，从会场的一端踢向另一端，从一只拳头下抛向另一只拳头。他们管他叫做“洋老虎”，他们管这种“游戏”叫做“打排球”！

正值壮年，英俊潇洒的祖父从此剃光一头乌丝，光头示人，几十年都不再蓄发。

随着卢作孚先生的自杀，祖父的命运愈加风雨飘摇。比薛明剑先生更惨的是他上有八十多岁的我的太祖母，下有刚刚七岁的我的小姑娘，除了忍辱偷生他别无选择。我可怜的老祖父就在新政权以“民生公司”改造而成的“长航”（长江航运公司）做小职员，战战兢兢活到将近八十岁，确认中国至少最近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了才不再剃光头，长出的却已是没有一丝黑意的如雪白发。

假如把孙冶方比作一只燃烧自己也照亮众生，“成灰泪始干”的巨烛，那么薛明剑就是一口曾经歌大吕，舞云门的黄钟，只是这口大钟在一个特殊的年头突然就黯哑了，钟还在，只是永远地沉寂了。这是多么可惜，又是多么悲凉啊。

也许人们会说在中国，这样的人和事太多了，悲哀得过来吗？但是人们，难道残酷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就因该把它看作常态，看作合理，看作中国人应该忍受的了吗？我们是不是应该祈祷这个世界多一些薛明剑，少一些顾准，孙冶方呢？或者即使做不到人人都是薛明剑，至少有可能做到像顾准，孙冶方那样说出自己的观点，却不必以牢狱、孤立、摧残以至生命为代价。

明剑、冶方两兄弟在一般人看来除了同父同母这一事实之外几乎毫无相同之处。但是如果你能踏下心来仔细研究他们的历史，你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一些骨子里的东西，有些能用文字写得出来，有些却只能意会无法言传。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作古 30 年了，就让我把能用文字写出的东西先写下来吧。

薛明剑和孙冶方两位老人的外孙武克钢（沙沙）是我认识数十年

的老朋友。有趣的是哥哥薛明剑一生养育了 11 个子女而弟弟孙冶方一生无子女。沙沙的母亲薛禹闰，就是明剑在中日战争中无锡沦陷之际，流亡重庆之时无力带走的两个女儿之一，她们被送到上海“孤岛”的冶方小叔、克平小婶处，在那里继续接受教育直到抗战胜利。小叔小婶给了这两个小姑娘和父母一样的爱，因此沙沙一直将两位老人看作是自己亲外公，亲外婆。他们的这个外孙也走了一条做实业，做学问，参政议政，研究经济的道路。2005 年他写出《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一文，在中国经济和企业界引起很大反响，国内许多报刊杂志纷纷转载，还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届“邓小平思想研究奖”。孙冶方外公的老朋友，老邻居，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老先生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兴奋地到处向人推荐。当有人告诉他作者就是曾经住在您老对门孙家，常常被您老骂“比他外公还敢胡说八道”的三脚猫愣头小子沙沙时，老人家高兴地连连说“好啊，好啊，有他外公之风啊。”而克钢则告诉我，在他构思这篇文章时，两个外公真的就像站在他的眼前，牵着他的手，握着他的笔在写。

让我用几个小插曲来结束本书吧。

几年前我曾经问过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女孩，知不知道孙冶方是谁。她很诚实地回答“不知道”；还有一位毕业于人大经济系的男孩问我“孙冶方是谁？”，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到无锡去寻觅薛明剑的遗踪迹。只见荣氏家族的踪迹比比皆是，薛氏却早已“斯人已骑黄鹤去”，假若不是“借”了四弟孙冶方的光，只怕连“此处空留黄鹤楼”的故居也是不能够留下了。

1950 年孙冶方提议和负责筹建了上海财经学院并兼任首任院长。这个如今已是全国最难考进的财经类重点大学，还有几人知道他们的老院长呢？

我在无锡街头徘徊，一面大书“为天下布芳馨”的广告牌扑面而来。这是宣传梅园的广告，这六个字就来自老一代无锡人为纪念梅园的建立送给荣德生先生对联中的一句，书写者就是薛明剑的亲家公，无锡著名书法家，陆定一先生的父亲陆松笙先生。简简单单六个字令我过目难忘，真是如馨如香直扑上心头，让人千缕思绪，百般惆怅。

人啊，你是最反复无常的物种。眼下孙冶方的“追求真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已过气，反倒是薛明剑们当年须臾不离口的民生，国计，教育，实业，复兴，崛起……又成了最时髦，最热门的话题，不管说不说得到点上，反正人人都在谈论；

人啊，你又是最健忘的物种。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年代中，信仰，主义，贡献，牺牲……都成了又艰涩又陌生的名词，孙冶方们的足音已经渐行渐远，古老而又空灵。

但是人们，请记住他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魂啊。

2009-1-1 完成于北京

2023-1-15 修改于上海

作者介绍

王晓林，1953 年生。16 岁在湖北荆门县插队，18 岁在长江航运公司做工人，20 岁进入北方交通大学做工农兵学员，毕业于该校电信系无线专业，后进入交通部科学院做通信工程师，是改革开放时期深圳特区最早的建设者，与最早进入中国



的跨国公司打交道从事通讯设备贸易和工程者，中国最早的个人电脑与因特网使用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曾经的捐赠者和至今的志愿者。2001 年退休，偶尔投稿《炎黄春秋》和《温故》杂志，正式作品仅有此书（2009 年出版）与《顾准和他的时代》（2015 年出版）。

自 2001 年至今，除了“孙冶方基金会志愿者”之外，没有任何头衔和“挂靠”单位。

